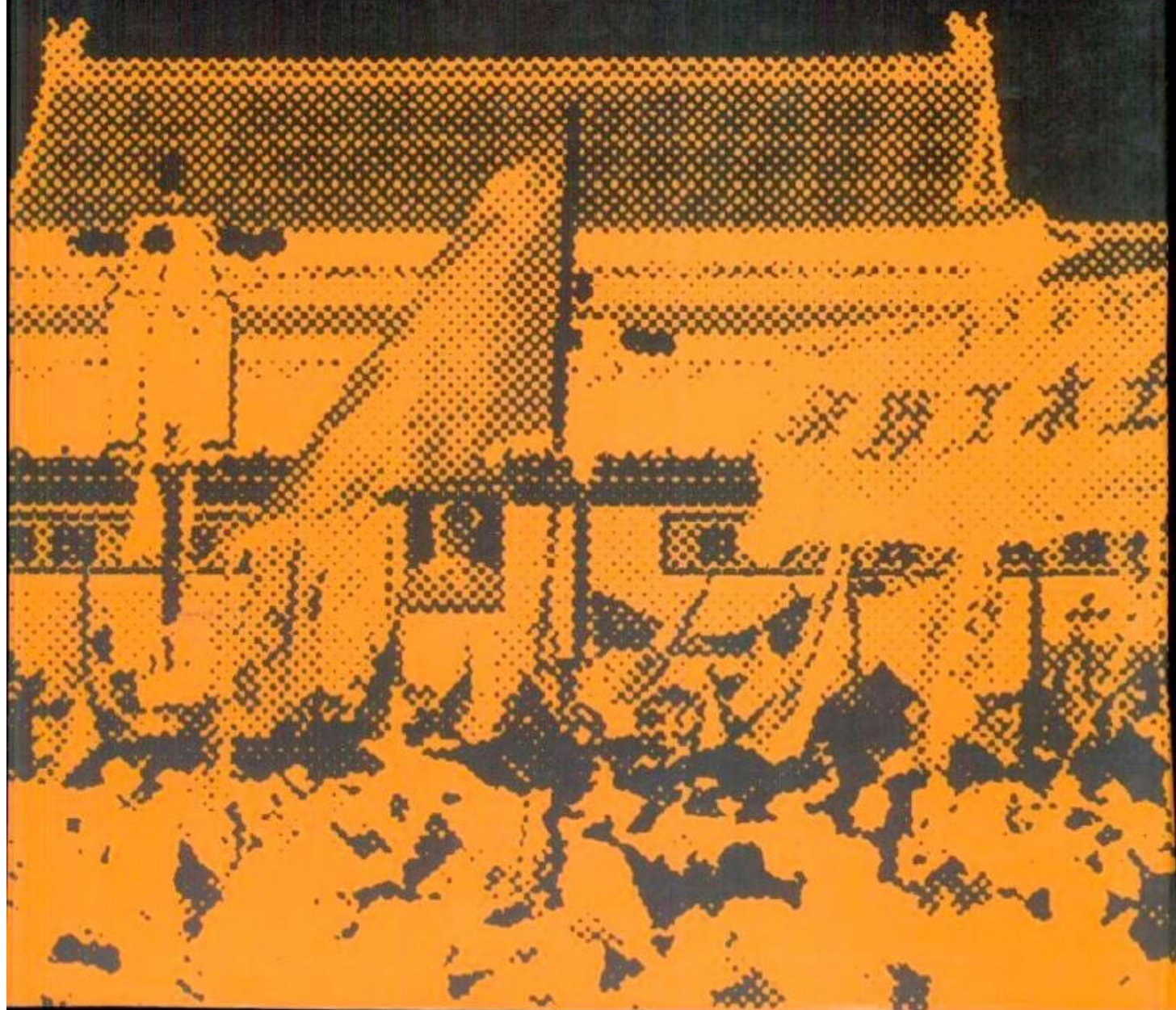

國家・社會關係 與 八九北京學運

■ 趙鼎新 著



目錄

前言	vii
北京市地圖	xiii
大事記	xv
導論	xix
上篇 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的緣起	
第一章 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及其在80年代的變遷	3
第二章 知識精英與八九學運	19
第三章 經濟改革、大學擴招與學生的不滿情緒	49
第四章 大學生控制系統的衰落	71
下篇 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的發展	
第五章 八九學運前夕	95
第六章 八九學運簡史	115
第七章 國家合法性、國家行為與運動的發展	181
第八章 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運動與學運的發展	211
第九章 國家·社會關係與運動中的話語和行動特徵	239
第十章 國家、運動中的溝通和公眾輿論的產生	269
結論	303
附錄一 方法論說明	329
附錄二 訪談問題	335
參考書目	341

前言

1989年，中國社會普遍人心動盪。4月，北京大學生以中國共產黨前任黨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為契機，掀起了一場規模空前浩大的學生運動。從這一年4月15日到6月初，學生們多次發起示威遊行，大多數學生都先後捲入其中。他們佔領天安門廣場，並舉行大規模的絕食抗議。這場運動牽動了億萬中國人的心，並以燎原之勢波及中國大部分城市；世界媒體也予以高度關注。今天在世的成年人當中，未曾耳聞或關注過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滾滾激情和流血衝突的人恐怕不多。這場運動雖然最後以被軍事鎮壓告終，但它歷時之長，規模之大，對中國政治影響之深遠，足可使之位列當代中國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本書即旨在於解釋這場大規模學生運動的起源和發展。

作為開場白，有必要解釋一下筆者下決心研究1989年學生運動的緣起。1989年4月5日，我從加拿大蒙特利爾 (Montreal) 啟程回上海探親，當時我還在麥吉爾大學 (McGill University) 攻讀昆蟲學博士學位。跟很多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一樣，我當時打算完成學業後歸國。但是，一到上海，中國的政治圖景在短短兩年多內所發生的劇變深深地震撼了我。兩年半前我離開上海時，大多數中國人對自己的生活是心滿意足的。不過，在那段時間，不管我走到哪裏，公交車上也好，街頭巷尾也好，通貨膨脹、腐敗肆行、收入不均、犯罪猖獗等等，都成了人們的主要話題。「別回來」、「留在加拿大吧」，這些話成了我最常聽到的「忠告」。我在上海的導師是個黨員知識分子，50年代初響應建設新中國的號召從美國歸來。1986年，我赴加留學前夕，他對中國的未來仍然信心十足，並建議我完成學業後馬上回國。然而，我這次去看望他時，他建議我留在加拿大。我很震驚，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導師對時局的看法竟然發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轉變。

1989年4月15日，也就是我回上海的第十天，胡耀邦猝發心臟病去世。北京幾所著名大學的校園裏立刻貼出大字報，對此事作出反應。又過了兩天，學生紛紛走上街頭，要求悼念這位被迫辭職的前任總書記。八九學運爆發了！當時我有幸躬逢其盛，現在每於靜夜思之，在上海體驗到的那種革命前夜的大眾情緒還不時湧上心頭。

相比今天，當時我對這場運動的瞭解可謂膚淺之至，但我對學生在運動中公開指出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而感到欣慰。我也很高興看到，政府和學生在4月下旬開始對話，中國的主要媒體也開始以中立或肯定的調子報道此事。看起來，經過歷時十年的改革之後，國人的眼界變得開闊了，政府似乎也更能容納異見了。儘管這些政治發展給予我深刻的印象，但我並未捲入其中。即使是在居留北京等待返加簽證的那段日子裏，我也只是駐足觀看學生們的遊行，此時是5月上旬。我當時以自然科學家自居，而我的中國之行只是一次私人旅行。

1989年5月13日，我返回蒙特利爾。這一天，北京的一些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也就在這一天，北京的事件成為所有北美新聞網關注的頭號題材。我也因而得以追蹤北京的事態，一天又一天，絕食抗議的學生人數從數百人上升到三千多，在天安門廣場的佔領範圍不斷擴大，我也見識了廣場內外來自群眾的支持和同情。期間，我和留學北美的大多數中國學生一樣，日益擔憂絕食學生的身體健康，也更加關注事態的進展。其時，北京市民已經開始上街聲援，聲勢達百萬之眾。我從媒體得知，世界各地的華人都在發起示威遊行。北京頓時成為世界的焦點。

絕食第七天，中國政府發布戒嚴令。5月19日晚，幾十萬士兵進入北京。剛開始我惴惴不安，旋又發現大部分士兵並未荷槍實彈，而學生和北京市民也輕而易舉地將其阻截，這又使我暗暗吃驚。接下來的幾天裏，我從電視上看到廣場上的人們或唱或跳的情景，看到慷慨激昂的演講、香港同胞捐助的漂亮的尼龍帳篷、著名的民主女神像，還有西方新聞記者感興趣的其他各種活動。

戒嚴的實施失敗，使海外的中國留學生頓時情緒高漲起來，可是我的憂慮卻日甚一日——這場運動將以甚麼樣的方式收場？對此，我尤其感到悲觀。直覺提醒我，軍事鎮壓即將到來，但我一直深深壓抑

着自己的這種預感。我猜想，在那段時間裏，即使是最現實的頭腦也都希望這場運動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6月3日，戒嚴部隊再次進京。通過電視，我看到隆隆行駛的裝甲車和全副武裝的士兵。我聽到不絕於耳的槍聲，看到火光和子彈劃過漆黑的夜空。在那段日子，傳言蜂起。死亡人數的報道從幾十、幾百竄升到幾千，甚至幾萬。消息的每次更新都像一把尖刀，慢慢刺入我的內心。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的情緒非常低落。運動開始之前，除了論文的最後一章尚未竣稿之外，我已經完成了取得博士學位的所有要求，並有望在兩個月內完成論文的初稿。但在鎮壓發生後的幾個月時間裏，我事實上無法再寫任何東西了。每每坐下來，電視上的悲劇場景馬上就浮現在眼前。我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孩子，目睹過批鬥和殺戮。對於群眾對於意識形態的狂熱，我深懷疑慮，並認為循序漸進往往能夠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我希望中國能夠形成一種容納異見的文化氛圍；我也希望中國政體能夠逐步擺脫意識形態化的支配，政治權力能夠平穩地交接。然而，這場運動的悲劇收場擊碎了所有這些夢想，我更擔心它會延宕中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使平穩的民主過渡變得更加困難。在幾個月的反思之後，我發現，我對國家的關切已經取代了對昆蟲的興趣。

於是我決定改研社會學。下定決心之後，我心情居然平穩了起來，也得以完成我的昆蟲學論文。幾個月後我提交了論文，並於1990年開始攻讀社會學博士，仍然是在麥吉爾大學。在社會學這個新領域，我第一個想研究的當然是八九學運。我同樣下定決心，為了研究的扎實，一定要克制剛剛結束的運動給我造成的情緒波動，需要多少時間我就付出多少時間。

1989年，大部分人都預測說，中國政體將在幾個月或幾年內崩潰。但我很清楚，這個政體不會在短時間內崩潰。相反，它會在90年代從經濟方面進行自我更新。在1994年發表的一篇題為〈防衛型政體與現代化〉的論文中，¹我將這一觀點形諸理論。當然，儘管這個政體沒

¹ Zhao Dingxin (1994).

有立即崩潰，但八九學運的遺產也不會隨風消散。1999年初，在八九學運十周年之際，爆發了一股新的抗議浪潮。在北京，丁子霖聯同另外四人，發表〈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和〈社會平等與公民權利宣言〉。在其他許多省市，知識分子也開始組建新黨，比如中國民主黨、中國社會黨、中國工黨。在紐約，前學生領袖王丹和其他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見者發起波及全球的百萬人簽名請願活動，要求政府在十周年之際為八九學運平反昭雪。在歐洲，二十多個人權組織發起「紀念六四十年國際會議」。他們決定於六四這天在歐洲立起500座天安門廣場的模型。在國內，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事件引發的民族情緒分散了反政府抗議的力量，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八九學運的遺產作將會滲入中國的政治生活，並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我知道，本書作為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能夠發揮的影響是有限的；但我相信，我們應當、同時也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和平穩的民主過渡寄予厚望，我也希望1989年的流血衝突將會是現代中國難以數盡的政治悲劇的一個句號。要避免悲劇重演，我們首先要明白1989年之前和期間所發生的一切。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本書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分析了八九學運的產生和發展。本書包含一章理論性的導論、一章理論性的總結和十章實證性的研究。實證研究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探討八九的起因；下篇追溯八九的進程，並用連續四章的篇幅從不同角度解析了這場運動的發展。導論提供了一個解釋性框架，用於引導實證部分的分析。我盡可能把導論寫得平實，但對那些對社會學理論不太感興趣的讀者來說，仍有可能顯得艱澀。我建議這些讀者不妨略過這些內容。

本書是在很多人的幫助下才得以面世的。我首先要感謝那些接受我訪談的人。對在蒙特利爾和北京（尤其是北京），接受我的訪談的人，在此深表感謝。他們的信任、坦率和勉勵一直鼓舞着我。

在麥吉爾的那段日子，許多朋友幫助並勉勵我。我尤其要鳴謝 Marcia Beaulieu 和 Muriel Mellow，他們為此書初稿的編輯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正是在他們的幫助下，我慢慢學會了用英文寫作。在麥吉爾進行研究時，有四位老師兼朋友深深影響了我：Donald von Eschen 卓有成效地講解了歷史社會變遷在不同地區的複雜性，他的講解使我從

一個執着於尋找普遍規律的自然科學學者，轉變成一個對人類歷史發展多樣性極為敏感的社會科學家；John A. Hall把我帶進國家理論和市民社會理論的殿堂；從Steven Rytina那裏，我學到了組織理論、博弈論和資源動員理論；最後，Maurice Pinard向我傳授了有關社會運動的各種經典理論，讓我懂得非利益性的動機在社會運動中的份量。借此機會，我深深地感謝他們的指導和友誼。

在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我的同事Andrew Abbott, William Parish, Edward Laumann, Roger Gould, Robert Sampson, Martin Riesebradt和Doug Mitchell等先生閱讀了本書的有關章節，並提出了寶貴的改進意見。Mayer N. Zald、John McCarthy、Suzanne Staggenborg、Yuezhi Zhao和Craig Jenkins等先生也分別對有關章節提出了建議。在修改過程中，鄒讜、楊大立、Jack A. Goldstone, Neil J. Smelser, Feigon Lee, Harris Kim, Yiqun Zhou和Yang Su閱讀了我的手稿並提出了寶貴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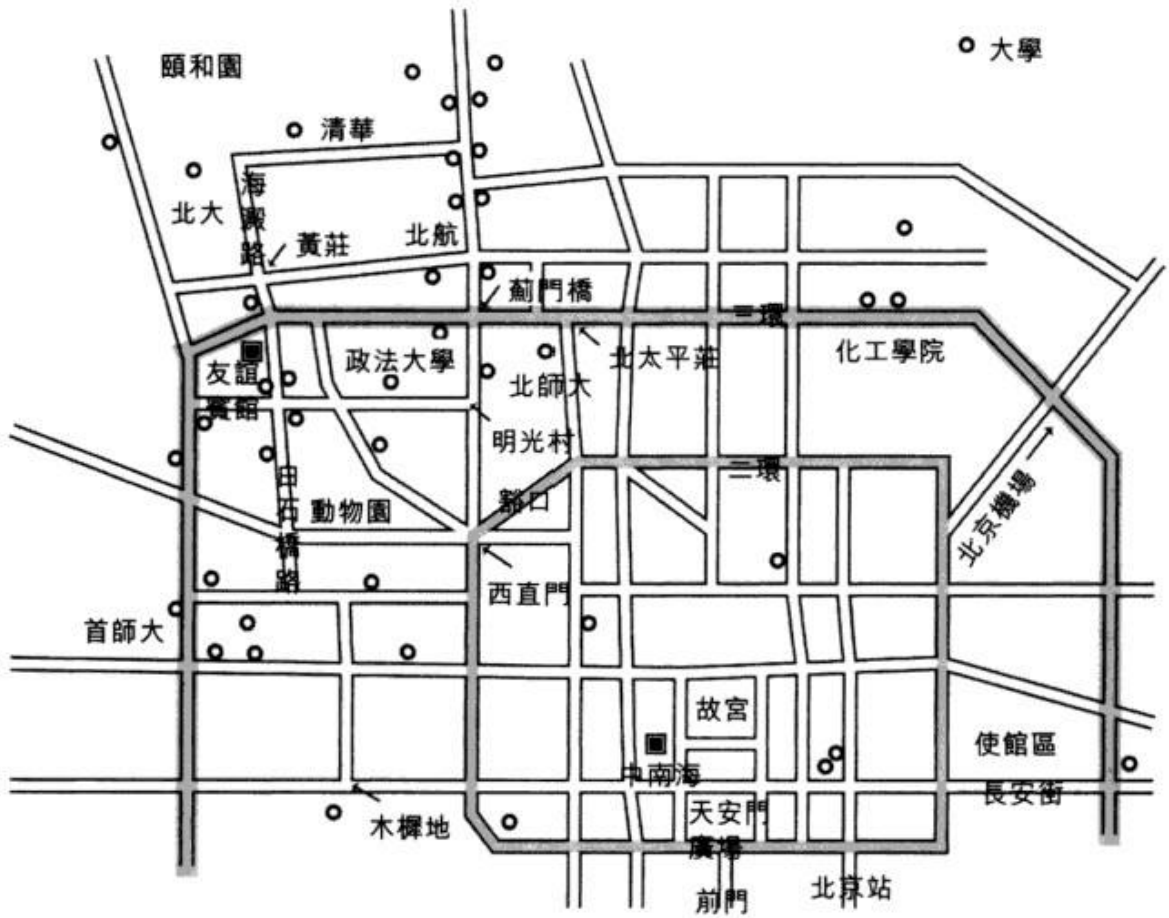
在本書最後的修訂過程中，Charles Tilly教授作為匿名評閱人將手稿審讀了三次，並提出了極有價值的批評和建議。在此，我致以誠摯的謝意。

這項研究受到加拿大社會科學與人文研究會(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麥吉爾大學專題研究基金(Thesis Research Grant)和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社會科學部基金(Social Science Divisional Award)的資助。在本書即將完成之際，芝加哥大學人文研究所(Franke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為我提供了研究員職位。人文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員，特別是Samuel Baker和Pi-yen Chen，也向我提供了許多幫助和建議。

最後，我要向我的夫人陳芹表達最深的感謝。我另選博士研究項目，她對此給予了巨大的理解和支持；沒有她的諒解，這是不可能的。此外，她還是本書初稿的忠實讀者，並且是一個敏銳的批評者，我寫作時因此受益匪淺。她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還為這個世界帶來了兩個至為可愛的小生命——我們的女兒琳達和莉立——她們的到來改變了我生命的意義。

此書的英文版付梓時適逢《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出版。《天安門文件》據說輯錄了中國政府關於八九運動的秘密文件，甫面世就引起巨大爭議：有人擊掌稱好，認為它是研究共產黨中國的一個里程碑，但與此同時，其真實性也遭到嚴重質疑。這場爭論對本書沒有甚麼關係，因為此書中沒有任何新的信息，足以使我重新考慮我原來的論證。

北京市地圖



導論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荀子·王制》

科學的解釋不在於從複雜到簡單，而在於以更合理的複雜取代不那麼合理的複雜。

——克勞德·列維—施特勞斯 (Claude Lévi-Strauss)

1989年4月22日上午，也就是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發端後的第七天，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就在4月21日晚上，約有五萬名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並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外面，想參加這場追悼會。4月22日整個上午，來自不同大學的學運積極分子舉行了形式多樣但又各自為陣的抗議活動，其中的絕大多數內容與胡耀邦的追悼會無關。在這些活動中，最能引起學生共鳴的是三個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請願。他們手捧請願書，跪在那裏長達半個多小時。

四天後的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這篇社論一反政府在前11天相當寬厚的態度，將這場運動定性為一場由一小撮反黨反政府陰謀分子所煽動起來的一場動亂。對政府的這種反應，國人一般會洩氣並開始打退堂鼓，因為它預示政府的鎮壓已經迫在眉睫。然而，令大多數人吃驚的是，學生們並沒有就此罷休。4月27日早上，北京67所高校的大部分學生都走上了街頭。在包括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內的幾所著名高校中，上街學生的比例高達90%以上。有報道估計人數多達十萬，或者說超過總數一半的學生參加了遊行。

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面哭跪請願、官方政策從早期的讓步到4·26社論的急劇轉變，以及4·27大遊行，都是八九學運中廣為人知的事件。4·27學生大遊行標誌着自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老百姓對政府

的第一次大規模公開對抗。從許多方面我們都可以說，這次遊行的成功奠定了今後運動的發展動向，直到最後被鎮壓；此前的那次哭跪請願也是如此。在有效地激發學生情感方面，哭跪請願所發揮的效能在那天的所有事件中是無與倫比的。

從4·22到4·26之間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也揭示了八九學運的三個主要特徵：其一，政府的策略在讓步和鎮壓之間頻繁擺動；其二，迅速和成功的參與性動員；其三，傳統的語言和行動在運動中佔據主導地位。這些特徵主宰了運動的進程，並為這場運動帶來悲劇性的收場。這些特徵因此而一直是學術分析的焦點。

迄今為止，大部分文獻都把政府策略的搖擺，以及隨後運動的發展看作是政府內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派系鬥爭的結果。¹ 它們也把軍事鎮壓的最終實施看作保守派在權力鬥爭中取得勝利的標誌，並認為軍事鎮壓實際上終結了中國的改革；它們對運動中學生動員所取得的超乎想像的成功也有種種解釋。一些學者將八九學運的興起以及大眾對運動大規模的參與，歸因於由經濟改革所激發的市民社會的崛起。他們論證說，中國的經濟變革催生了許多利益集團，而政治變革的緩慢進程則難以支應這一局面。因此，在中國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正是這些利益集團起而對抗國家。² 另外的一些學者則把運動的規模和發展形態歸因於中國缺乏市民社會。他們論證說，極權主義中國取消了市民社會的空間，這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有着類似的經歷和怨憤、卻又沒有能力組織起來的人群。他們又推理說，在這樣的社會中，一旦集體行動爆發，其規模必定龐大並且伴隨巨大的自發性。³ 最後，一些對八九學運中所用的話語和活動形式感興趣的學者一般均

¹ 有關例子，參見陳一諮 (1990) ; Cheng Chu-yuan (1990) ; Dittmer (1990a; 1990b) ; Kristof (1990a) ; 以及Nathan (1990) , 他們的分析強調了派系鬥爭在八九學運的興起和發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

² 見Burns (1989) ; Huan Guocang (1989) ; Strand (1990; 1993) 以及Sullivan (1990) 在這方面的討論。

³ Zhou Xueguang (1993) .

強調中國文化的影響。⁴ 他們認為學生們在為民主振臂高呼的時候，他們的思考方式、所用的語言及其行為仍然如影隨形地遵循着中國傳統文化文本，而這些傳統因素正是這場運動悲劇收場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上這些論證儘管在邏輯上均可成立，卻與一些基本事實有很大的出入。就精英派系理論而言，雖然中共黨內存在權力鬥爭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但要用它來解釋八九學運的發展就會有不少困難。首先，它不能就幾個重要事件發生的時間給出解釋，比如說，人們一般認為趙紫陽是改革派的領袖，4·26社論的出台是因為趙當時身在北韓進行國事訪問。⁵ 但這無法解釋政府為甚麼在4月27日重新採用讓步策略，並在4月29日跟學生進行對話，而此時趙紫陽仍在北朝鮮；其次，八九學運以後中國政治的發展並沒有印證以派系鬥爭理論為基礎所作出的預測。八九學運以後，中共內部並沒有對所謂改革派進行大規模的清洗，而且1992年以後，中國的經濟改革獲得了進一步的動力。用精英派系理論來分析80年代以前的中國政治也許具有一定的價值，因為當時中國政府在做政策選擇時，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不受社會壓力的干擾，而政策本身也可以在社會上得以貫徹並產生巨大影響。然而，到了80年代後期，大部分中國人對意識形態失去信心，而只注重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表現，隨之而來的各種社會壓力大大縮小了國家政策選擇的範圍。⁶

⁴ Calhoun (1991, 1994); Chan and Unger (1990); 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1990); Macartney (1990); Perry and Fuller (1991); Pye (1990) 及 Wasserstrom (1991)。

⁵ 陳一諮 (1990, 152-3); 陳小雅 (1996, 206-7)。

⁶ 典型的例子是 Nathan (1990, 46) 所作的預測。根據這個預測，中國的派系鬥爭有可能會導致諸多有害的結果，比如對鄧小平改革設計的全部或部分的反動，或者導致另一場文化大革命，或者就是一場殘酷的權力鬥爭，從而將中國引向暴民政治。這些估計均未在90年代的中國發生。事實上，Schram (1988, 189) 對中國的政治走向有更為精闢的闡述：「從政治角度來看，我只想說，中國改革的總體進程已經不可逆轉。陳雲及其追隨者，無論在1984年10月的決議之前抱有甚麼想法，現在也不會死心塌地的企圖讓中國回到50年代中期的老路上去，哪怕是以一種經過調整的、更富於時代氣息的形式。」(在那派系鬥爭的模式下，陳雲是一個被公認的保守派領袖。)

關於市民社會興起的論點，有一點可以肯定：在80年代，雖然中國的社會中間組織的確擴張迅速，但它們大部分都帶有半官方色彩，它們與國家的關係一般來說是屈從性的合作，而不是平等意義上的討價還價甚至對抗。⁷ 進而言之，如果所謂的市民社會對運動的興起與發展確有貢獻，並且這個新興的市民社會的確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那麼，在某一特定的地區，運動的規模就應當同這一地區市場改革的程度成正比。而事實上，在市場經濟更為發達的地區，比如廣州、廈門，運動的規模比其他主要城市要小得多。⁸ 市民社會興起理論所引用的一個證據是：在八九學運後期大量工人加入了運動。然而，我在研究中發現，在絕食期間，大部分工人的參與都是由基層單位的政府幹部來組織和協調的；而在戒嚴期間，這些參與一般都是以鄰里為基礎的；甚至在運動期間形成的主要獨立工會組織，實際上也是由學生來組建、指導，並提供資金支持的（見第六章）。

同樣，市民社會缺乏的觀點也不能充分解釋八九學運的興起和發展。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必定有着更為相似的生活體驗，但在那時，除了政府發動的運動外，中國沒有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只是在改革許多年之後，人們的生活體驗和利益開始分化時，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爆發了。另外，在80年代曾經發生過成百上千次的集體行動：1988年，僅僅北京就發生了二百一十多次學生抗議活動，並出現了一千一百多張大字報。⁹ 在這些學生抗議活動中只有兩次具備了一定的規

⁷ White (1993) 及王穎、折小葉、孫炳耀 (1993, 特別見頁34和72) 指出，社會中層組織在浙江蕭山迅速崛起，從1978年的4個發展到1990年的99個，但其中有70%是半官方的。這些組織的首腦人物由當地政府任命，或者至少也要得到政府的認可，他們的資金部分來自國家。這些組織在捍衛其成員利益時雖然多少具備一些自主權，但同樣也增進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關於中國市民社會性質的其他討論，可見Huang (1993); Chamberlain (1993); Wakeman (1993)。

⁸ 比如，在80年代，廣東的改革遠遠超過其他地區 (Vogel 1989)。但劉忠義 (1989) 指出，在1989年，到5月10日為止，廣州只在「五四」晚上發生了一場小規模 (人數大約一千) 學生遊行；這和發生在其他類似規模的大城市中眾多大規模的遊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⁹ 任彥申 (1990, 127)。

模。這表明，中小規模的集體行動在中國是可能的，而大規模的八九學運仍是一個罕見的事例。

把運動中的學生的行為模式簡單地看作中國文化的一種表達，同樣是有問題的。比如，有些學者認為，這場運動能夠持續那麼長的時間，是因為學生在參與運動的過程中，一種以文化為基礎的對學運的認同感不斷得到加深。¹⁰ 儘管在研究中，我發現有一些學生隨着時間的推移對運動的參與變為越來越積極，但這並不是普遍傾向。事實上，截至5月底，大部分北京的學生已經感到非常疲倦，並且回家了，只有來自外省的學生繼續佔領着天安門廣場，這些學生從5月中旬開始就陸續抵達北京了。我們知道，一個人的認同感必須是出自內心而不是他人賦予的。既然早期參加學運的大多數學生已經打道回府，而在天安門堅持的學生多屬新來乍到，我們就不能說學運得以持續是因為學生對運動的認同感在加深。持文化觀點的學者還強闖，因為中國文化對個人主義行為一般要加以譴責，所以學生(和政府)就必須用高尚的、有文化象徵意義的和道德化的話語和行動來攻擊對方，而一場雙方都以道義性和羞辱性的辭藻回敬對方的戰鬥是不可能找到一個妥協點的(這是一個正反饋互動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相互攻擊只會將衝突越演越烈。這不僅預示了這場運動的血腥收場，而且也意味着政府有可能對學生和改革派進行嚴厲的報復。¹¹ 儘管這種論證合乎邏輯，但它忽略了以下兩個事實：首先，在八九學運中，政府與學生均多次做出各種讓步，其中很多妥協曾產生了很好的效果(見第六章)；其次，八九學運以後中國政治並不是由報復的欲望來主導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經濟改革在90年代仍在繼續。

尋求整體性解釋

經過廣泛的研究，我發現，對於上面所說的八九學運的三個特徵，如下解釋更為恰當。關於政府政策的不斷反復，我認為，雖然中

¹⁰ Calhoun (1991; 1994).

¹¹ Pye (1990).

共高層存在權力鬥爭是不爭的事實，但政策反復的關鍵，卻是中共早先處理學運的政策屢屢失敗所致；這些政策的失敗，並不是因為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而是由於國家上層精英集團和一般民眾對於國家合法性有着不同的理解（見第七章）。在80年代後期，大部分中共高層精英仍然忠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但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對政府的評價，卻是依據政府在經濟和道德方面的表現。因此，一旦政府受到意識形態的和道德方面的挑戰，那麼這個挑戰馬上就會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反響。然而，當政府用意識形態和道德方面的權威來控制運動時，只會引起人們的反感。這裏不妨打一個博弈論的比方：當時整個局勢，就如同國家精英集團把那場博弈看作一盤國際象棋，而民眾卻認為是在下一盤中國象棋。由於兩種象棋的棋子頗為相似，因此每一方均未能覺察他們下的是兩種不同的象棋；但由於這兩種棋的規則大相徑庭，而政府與民眾之間又欠缺充分的交流和信任，因此，一方每走一步都會被另一方認為是在犯規，這就像雙方都不斷在對方身上施行賈爾芬高 (Harold Garfinkel) 所謂的「違規實驗」(breaching experiment)，於是，博弈的雙方變得越來越惱火，最後更掀翻了棋盤。

關於學生在運動中的高參與率，我發現，北京高校的校園環境起了關鍵作用（見第八章）。由於50年代的國家政策，在八九時，北京的67所大學大部分都集中在海澱區；這種獨特的空間分佈把大量學生集中在一個狹小的區域；在毛澤東時代，這種安排便利了政府對學生的控制。由於當時的大部分學生仍然信仰共產主義，因此，學生之間就政治問題互相打小報告，並且許多學生並不認為那是不道德的行為。然而，在國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日漸式微、在政治之外的其他升遷渠道打開之後，同樣的校園空間安排就成了學生動員的溫床（見第四章）。在1989年，這種校園生態滋養了許多緊密的學生網絡，並且在學運爆發後立刻把所有的北京學生直接置於一個敞開的集體行動環境之下。這樣的校園環境也為八九學運的動員提供了理想的場所：它維持了學生之間以宿舍為基礎的對運動信息的交流，促進了學運積極分子對其他學生的動員甚至是強制，引發了各大學之間以積極參與學運為榮的競爭，同時也形塑了學生們校內和校外遊行的理想路線。因此，校園的生態環境對學生的動員和學運的發展都起了關鍵作用。

為了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在八九學運發展中的主導作用，不妨將八九學運時學生們所用的語言和運動方式，跟民國時期規模最大的兩次學生運動（即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35-1936年間的一二·九運動）作出比較。如果運動實踐是簡單地按照文化腳本來演出的，那麼，由於中國文化在20世紀經歷了一個深刻的現代化過程，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對八九學運的影響應該比前兩次學生運動更弱才是；然而，我發現，八九學運的語言修辭和活動形式都比先前的二個學生運動更富於傳統色彩——這是出人意表的。對此，我的解釋是，相比以前的二次學生運動，八九學運中的學生們面對的是一個更統一的、更強大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學生自然會求諸中國文化所認可的集體行動方式，以降低被直接鎮壓的可能性。而且，八九學運的組織化程度遠低於前兩次學生運動，參與者也習慣拿道德標準（這是國家合法性的一個主要來源）來評價政府。我認為，一場運動的組織化程度越低，運動的普通參與者、同情者和旁觀者的心理狀態對運動發展所起的作用就越大。傳統的修辭和活動形式充斥於八九學運的另一個原因是，運動參與者更容易為帶有強烈道德色彩的活動所打動，特別是當學生以道德說辭為核心向政府發起攻擊，而政府的反應卻不恰當的時候，人們馬上變得非常情緒化。

讀者也許已經注意到以上各種解釋之間共同點。在解釋導致政府政策不斷反復的背後的力量時，我採用了國家合法性的概念。在解釋八九學運的高參與率時，我強調了校園生態環境如何彌補了運動組織力量微弱這一缺陷，並在學生動員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不過，校園生態環境是國家以往的規劃的結果。特別是，如果不是80年代國家對於大學的控制系統大大削弱了的話，那麼校園環境就不會在學生動員方面發揮如此有效的作用。至於中國傳統文化在學運中的主導作用問題，我強調了諸多因素，包括強大的國家力量、社會中層組織的不發達，以及以道德為基礎的國家合法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這些分析中，我用了三個相互關聯的結構性因素，分別是國家的性質（包括國家的行為、國家的鎮壓能力、國家在大學內的學生控制系統的削弱），社會的性質（中層組織的薄弱、大學校園的空間佈局），以及國家與社

會的關聯(在本書中主要指在國家與社會之間、以國家權力合法性為基礎而建立的各種聯繫)。它們都落在「國家·社會關係」這個範圍內。

本書的中心論點是，八九學運的興起和發展，以及我所發現的它的諸多重要特徵，均可以用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來解釋。這裏所理解的國家·社會關係包括三個在一定程度上相互關聯的維度：國家的性質、社會的性質，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在經濟、政治和觀念上的聯繫。更明確地說，我認為，在80年代的中國，國家處於威權體制之下，在國家控制之外的社會中層組織發育得很差，而國家合法性基礎則建立在道德和經濟績效之上。這種特殊的國家·社會關係，加上國家主導的經濟改革給人們帶來的深刻的不安定感和各種社會衝突，終於導致八九學運的爆發，並塑造了它的發展。在接下來的幾個段落中，我將進一步概括本書的主要觀點。

1976年毛澤東去世之時，中國經濟由於十年文革而瀕臨崩潰。面對這樣的國內形勢，中國政府不得不在1978年發動改革。在改革過程中，中國政府也由一個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革命政體轉變為一個以績效安身立命的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社會也變得日益多元化，儘管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會中層組織仍然十分薄弱(見第一章)。改革在起步階段進行得比較順利。因此在短短幾年之內，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得以大大提高。但到8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卻陷入危機。高通貨膨脹率和觸目皆是的官員腐敗情況已成為極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此，政府不得不進行經濟調整。

八九學運是由一群人數不多的親西方的知識精英和少數受其影響的學生發動的，但普通學生和知識分子很快就參與其中；這兩個群體加入這一運動的原因和目的不盡相同。親西方的知識精英是伴隨改革進程而出現的，這個群體對毛澤東時代的統治懷有非常痛苦的記憶，並把缺乏民主視為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得以遂行暴政的關鍵原因。80年代早期，中國改革進展良好，因此這些知識精英與國家之間尚能在衝突之中保持一些極不穩固的合作。但到80年代後期，當中國的經濟危機日益加深時，知識精英們就把中國的政治體制診斷為經濟危機的總根源。由於對毛澤東時代的沉痛記憶揮之不去，知識精英們對於經濟調整的第一個反應，就把這種形勢視為左傾復辟。他們因此創造了

一個危機話語，不遺餘力地向政府施加壓力，籲請進一步的經濟改革和民主開放。他們的話語和行動為八九學運的崛起鋪平了道路（見第二、第五章）。大部分普通學生和知識分子也都憎惡毛澤東時代的統治而支持改革。然而，由於對市場經濟的本質知之甚少，他們一般都相信市場導向的改革將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利益。令他們失望的是，在改革中，一些沒怎麼受過教育的人，或是一些同政府官員有關係的人，成了第一批暴發戶（見第三章）。時值8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深陷危機，知識分子的生活水準下降，學生畢業後要找到稱心工作也倍加困難。面對這樣的現實，學生和知識分子情緒沮喪。1986年之後，正在校園裏興起的由知識精英創造的危機話語，開始在這群深感委屈的人中產生重大反響，其結果就是在1989年達到巔峰的頻繁的學生抗議活動。¹²

在討論八九學運的進展時，本書將把重點放在以下問題上：在學運中，為甚麼雖然大部分學運積極分子、知識精英和政府領導人，都努力在抗議者和政府之間尋求一個妥協之策，但運動最終卻以悲劇收場呢？為此，我將首先對運動作一個歷史回顧，目的在於詳細描述運動進程中那些最為重要的事件，並借此揭示各種偶然因素在運動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見第六章）。接下來，本書將分別從四個角度出發去剖析八九學運的悲劇性發展（見第七到第十章），每個角度的背後都是國家·社會關係問題。我的基本觀點是，截至80年代後期，中國的國家已經從極權政體發展為以績效合法性為基礎的威權政體，但它對社會仍有較強的控制和壓制能力，相應地，社會中層組織的發展舉步維艱。這種特殊類型的國家·社會關係同時也塑造了八九學運期間國家和運動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模式（見第七章）、整個運動的動員結構（見第八章）、運動參與者所用的語言和行動模式（見第九章）、以及媒體和公共輿論在運動中的表現和作用（見第十章）。所有這些特徵都大大地促

¹² 在有關八九學運的文獻中，一些人認為中國學生對民主知之甚少，另一些人，比如Calhoun (1994)，卻發現學生們對民主的瞭解非常深刻。事實上，他們所指的是不同的學生群體。

進了運動的發展，並把它推向了國家和民眾之間最終的截然對峙狀態。¹³

我選擇國家·社會關係理論來解釋八九學運，還有另外一個考慮。中國擁有一個在全世界堪稱最為悠久、而又一直沒有斷裂過的強國家傳統。儒學，作為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從本質上說，是在具有強大父權主義傳統的農業社會條件下，對國家·社會關係所做的一個天才性的設計。並且，當中共取得政權之後，中國政府對社會進行了許多大規模的工程式的改造，這些改造都旨在改變國家性質、社會性質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所有這些社會改造工程都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各個群體。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以及在相當程度上包括當前的改革在內，都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事實上，如果想要真正地瞭解中國的話，不從國家或者國家·社會關係出發來思考將是很困難的。我想，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許多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在選擇研究方法時，都直接或間接地運用了國家·社會關係的分析方法。比如，鄒譚 (Tsou Tang) 就是在國家·社會關係的框架下來分析八九學運的。¹⁴ 周雪光 (Zhou Xueguang) 所用的「大數量」和「非組織性利益」概念中也包含了國家·社會關係的觀念。在一些其他研究領域，唐文方 (Tang Wenfang) 與白威廉 (William Parish) 最近關於鄧小平時代社會變遷的研究、謝淑麗 (Susan L. Shirk) 就中國經濟改革動力問題所做的解釋、Alan P. L. Liu 關於中國大眾政治的研究、王國斌 (R. Bin Wong) 關於中國歷史上的抗稅問題的研究、周曉 (Kate Xiao Zhou) 對中國農民的研究，以及舒繡文 (Vivienne Shue) 就中國共產黨上台前後的國家能力的研究等等，都明確使用或者暗含了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¹⁵

¹³ 在這裏，我省略了對有關八九學運發展的章節的更詳細介紹，因為在第七、八、九三章中對學運發展的一些論述，在本節開頭已經概述過了。

¹⁴ Tsou Tang (1991).

¹⁵ 見 Zhou Xueguang (1993) ; Tang and Parish (2000) ; Alan P. Liu (1996) ; Wong (1997) 及 Shue (1988) .

從理論上說，在最近幾百年間，自從現代社會運動誕生以來，¹⁶ 國家以及國家·社會關係對社會運動的崛起和發展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這對發生在威權政體下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來說更是如此。¹⁷ 首先，在最近幾個世紀裏，世界一直經歷現代國家建構、民族建構以及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隨着這些進程的推移，國家不斷地改變自己的性質，並擴張其在社會中的權力和功能。¹⁸ 稅收、司法、軍事和其他一些從前屬於地方團體的權力都在這一進程中逐漸收歸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日益提高，相應地，國家的權力也益發引起社會的關注。從某種意義上說，許多現代社會運動可以看作是民眾試圖控制日益擴大的國家權力，或利用國家權力來推進自己的局部利益的政治行動。¹⁹

其次，同理可推，較之於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內，國家對社會運動的作用就更大；從歷史上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傳統要比發達國家弱得多，因此，它們就得用比發達國家短得多的時間完成國家建構；而且，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常都在本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²⁰ 從後果上說，在所有遲發展國家，政府的現代化政策都會導致社會資源在各個社會集團間的再分配，在此過程中，各個社會集團的利益和認同感本身也在急速地變化。在國家主導的現

¹⁶ Tilly (1982, 1986) 就現代社會運動在西歐的崛起曾作精彩的分析。

¹⁷ 所謂大規模社會運動，我指的是那些有相當多的人參與、旨在進行根本性社會變革的社會運動。在大規模社會運動與革命及其他社會運動之間，並不存在固定的界限。波蘭團結工會運動、發生在60年代美國的學生和公民權利運動，以及1989年的北京學生運動，都是大規模社會運動的顯而易見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本導論提出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更適用於解釋大規模社會運動和革命，而不是那些小規模的集體行動，比如一個工廠的罷工之類。

¹⁸ Mann (1988; 1993); Poggi (1990); 及Tilly (1975; 1992)。

¹⁹ 見Bright and Harding (1984); Tilly (1975; 1978; 1986); Tilly, Tilly, and Tilly (1975)。

²⁰ 正如Migdal (1994, 13) 所說那樣，所有現代國家都是轉型國家，惟發展中國家往往需要在轉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Evans (1995); Gershenkron (1952); Wade (1990) 及Zhao and Hall (1994) 對於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有更深入的討論。

代化進程中，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詹森 (Chalmers A. Johnson) 以及其他追隨塗爾幹 (Durkheim) 傳統的學者們所描繪的那種社會亂象，在發展中國家要比發達國家要厲害得多。²¹ 最重要的是，在許多不發達國家，政府的許多政策常常是腐敗性的，甚至是掠奪性的，從而引發被壓迫群體的不正義感。

第三，國家對社會運動興起的重要性是隨國家·社會關係的不同而變動的。如果根據極權—民主的譜系 (譜系的兩端都只是理想類型) 來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極權國家下的任何社會運動都是針對國家的，因為極權國家控制一切，甚至最雞毛蒜皮的事情也變得政治化了。²² 另一方面，在民主一端，國家只是一個「裁判」，遊戲規則是由各個組織通過競爭來制定的。這樣一來，國家就幾乎置身事外了，而「社會」則成了社會運動的目標。²³

最後，在一場社會運動所發起的針對國家的直接或間接的挑戰中，總是存在兩個行動主體：國家和社會；然而，面對相同的社會運動，不同性質的國家會有不同的承受能力，並採取不同的對策。²⁴ 在同一個國家，運動參與者對國家處理方式的反應，也依其組織能力和對國家權力的認識而有所不同。在某些國家·社會關係中，強烈的不滿可以被化解，反體制的意識形態也能夠被邊緣化。而在另一些國家·社會關係框架下，有時甚至是微小的不滿也會被強化，起初是改良性的運動也會被推向極端。因此，一個社會運動一旦開始，其發展

²¹ Huntington (1968); Johnson (1982) .

²² 比如，在18世紀歐洲，糧食暴動是很常見的事情。但是在法國，由於舊制度承擔了麵包供應的責任，所以糧食在當時就成了政治問題 (Mann 1993, ch. 6) 。同樣地，在中國，由於國家承擔就業保障的責任，所以工作保障也就成了政治問題。不過，在90年代，也就是在勞動力市場改革之後，工作保障越來越跟各人所在公司的績效聯繫在一起，從而逐漸變成了經濟問題。

²³ 比如西方的同性戀運動，儘管同性戀運動者常常試圖通過影響國家，來增進本身的特定權利和自我的保護，但這些運動主要還是針對市民社會，而不是對國家的挑戰。

²⁴ 在Mann (1993) 的第十五到十八章中，我們能看到不同的西方國家在處理工人運動時，是怎樣採取不同的手段的。

方向就將由國家包容政治衝突的能力來決定，而這種能力又取決於國家·社會關係。

顯然，八九學運是一場爆發於威權體制內部的大規模社會運動。它在很大程度上肇因於國家主導的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在整個運動期間，學生們通過要求政治改革來挑戰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這場運動可以被看作是一場失敗了的革命。假使它像在東歐國家發生的那些民主革命浪潮那樣成功，那麼，它不僅會推翻政府，而且將為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帶來劇烈的變革。因此，在研究這場運動時把焦點放在八九運動前後的國家和國家·社會關係上，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證上，都是一個理想的切入點。

國家·社會關係與社會運動形態

直到20世紀70年代，「國家與社會」、「國家·社會關係」這樣的術語在社會學中還處於邊緣境地。²⁵ 回顧那個時代，社會學中的主流理論和研究主題大都以社會為核心；²⁶ 「國家·社會關係」這一詞彙即使出現，也不是一個理論框架，而是一個偶爾使用的術語。到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這種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斯克包爾 (Theda Skocpol) 對國家在社會革命的興起和發展中的重要性的經典研究，可以說是這個領域中的開創性作品。在這部作品中，斯克包爾強調，我們應把國家看作是「一個自主的結構——它有其自身的邏輯和利益，國家的邏輯和利益並不必然與社會中統治階層的利益等同或融合」。²⁷ 此後，以國家為核心的研究興盛起來，這不僅表現在社會革命研究中，²⁸ 而且

²⁵ 可見Bendix (1968) ; Bletloch (1969) 及Morley (1949, ch. 5) .

²⁶ Skocpol (1985) .

²⁷ Skocpol (1979:27) .

²⁸ Farhi (1990) ; Foran (1997) ; Goodwin (1989) ; Goodwin and Skocpol (1989) ; McDaniel (1988, 1991) ; Skocpol (1994) ; Wickham-Crowley (1992) .

表現在對其他類型的衝突性政治的研究中，比如工人運動²⁹、當代社會運動³⁰和經濟發展等。³¹

然而，隨着研究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社會性因素被重新引入以國家為核心的分析框架中。在經濟發展的研究領域，在失之單薄的「強國家」這一概念的基礎上，筆者和賀爾(John Hall)以及埃雲斯(John H. Evans)運用「有限自主」和「嵌入性自主」的概念，試圖找出甚麼樣的國家—社會關聯對一個民族的經濟發展會起關鍵作用。³²在社會革命的研究方面，一些學者，尤其是戈士棟(Jack A. Goldstone)和麥丹尼爾(Tim McDaniel)，不僅強調國家的結構和性質，而且也注重諸如人口密集度、經濟結構、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相類的因素。³³最近以國家·社會關係為核心的研究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民主轉型和鞏固民主社會之類問題上。³⁴它們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各有不同，但大部分工作都將民主化看作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並且都考察了下列因素對民主化進程的影響，比如國家的性質、市民社會的性質和力量，以及社會—經濟結構。顯然，國家·社會關係的視角不僅強調國家的結構和性質，而且注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重要性，因而能夠對一些政治過程提供更為平衡的理解。

國家·社會關係理論與當前主流的資源動員理論及政治過程理論，在幾個方面都有所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以往的理論模型

²⁹ Katznelson and Zolberg (1986) ; Lipset (1983) ; Mann (1993, chs. 15–18) ; Marks (1989) .

³⁰ Jenkins and Klandermans (1995) ; Kitschelt (1986) ; Kriesi (1996) ; Kriesi et al. (1995) .

³¹ Amsden (1989) ; Deyo (1987) ; Evans (1995) ; Tom Gold (1986) ; Haggard (1990) 及Wade (1990) .

³² Zhao and Hall (1994) ; Evans (1995) .

³³ Goldstone (1991) ; McDaniel (1991) .

³⁴ 見Casper and Taylor (1996) ; Chehabi and Stepan (1995) ; Diamond, Linz, and Lipset (1988) ; Diamond and Plattner (1996) ; Huntington (1991) ; Linz and Stepan (1996) ; O'Donnell, Schmitter, and Whitehead (1986) ; Schmitter (1993) ; Stepan (1978, 1989) ; Weil (1996) .

強調資源的數量和政治機會等結構性條件對社會運動興起和發展的重要性，³⁵ 而國家·社會關係理論則認為，社會運動的發展更多地取決於國家與運動參與者之間，或運動參與者相互之間的互動關係中的各個節點。因此可以說，國家·社會關係理論是一種節點模型 (intersection model)。

近來，學者們逐漸在如下問題上達成一致的見解：大規模社會運動就是國家和民眾在社會層面上的政治鬥爭，運動的結果 (從徹底失敗到成功的革命) 不僅取決於結構因素和行動者的意圖，而且取決於國家與運動行動者之間的具有路徑依賴性的互動過程。³⁶ 如果僅僅把焦點放在其中一個或另一個側面，就很可能忽視紛繁的政治過程中最本質的一環。³⁷ 基於這樣的考慮，最近一些有關社會運動和社會革命的著述都開始把運動和革命置於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係中來考察。³⁸

儘管近來的作品都把注意力集中放在社會運動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和互動過程上，但它們仍有一些共同的弱點。首先，大部分從國家·社會關係出發對社會運動進行的研究，其主題要麼是民主國家中的社會運動，要麼就是威權國家中的革命運動；³⁹ 除了最近由戈士棟⁴⁰ 所作的一個理論探討之外，很少有人去考察國家與民眾之間，以及不同民眾之間的互動在何種情況下會把一場社會運動激化為一場革命，或者相反；本書的研究就是在這個方向上所做的一個努力。儘管八九學運就從其起源來說主要是改良性的，並具有許多改良性社會運動的特徵，⁴¹ 然而，它發生在一個顯然的威權國家中，它與這個威權國家之

³⁵ 見McCarthy and Zald (1973, 1977) 對資源動員理論的探討，Tilly (1978) 和 McAdam (1982) 就政治過程理論所作的奠基性論述。

³⁶ Goldstone (1998) .

³⁷ Hanagan, Moch, and Brake (1998, ix)

³⁸ Hanagan, Moch, and Brake (1998) , Brake (1998) , Weil (1996) , Giugni, McAdam, and Tilly (1998) ; Tilly (1999) .

³⁹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6) .

⁴⁰ Goldstone (1998) .

⁴¹ 見Tarrow (1998, 1-9) 和Tilly (1996) .

間的關係不但塑造了整個運動的進程，而且大大提高了運動以悲劇收場的可能性。

第二，近來從關係角度所進行的社會運動研究，均傾向於將主要社會運動角色之間的互動，處理為理性行動者之間的「討價還價過程」。⁴² 這種方式對理解民主制度下的社會運動也許非常有效，因為在民主制度下，社會中層組織發育成熟，社會運動已經變得接近於利益集團政治。然而，這種視角很難運用於分析威權政體或傳統社會中所發生的社會運動，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國家力量之外的市民組織力量非常薄弱，社會運動的興起往往伴隨着很大的自發性，而政治規則本身也往往以「對錯」而非「得失」為基礎。因此，在本書中，所謂的互動不僅指涉一種基於理性選擇的討價還價過程，同時也指涉一種以價值或規範為驅動的情感過程。這就是合法性這一概念在本書的分析中佔有核心地位的原因，這也是我在本書中廣泛借鑒早期社會運動理論中的符號互動模型及柯林斯 (Randall Collins) 的「互動儀式鏈」模型的原因。⁴³ 我將在結論部分進一步闡述我的這一立場。

第三，大多數以國家和國家·社會關係為視角的研究，題材範圍狹窄。因此，一些重要的社會運動研究領域，如國家的行為模式、運動的語言和活動、運動與媒體間的互動，以及運動動員結構，往往不是被忽略，就是用其他分析框架來處理。政治過程模型的倡導者和追隨者倒是十分關注此等問題，不過，在他們的分析中，國家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是通過「政治機會結構」來研究的。關於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的研究，一般都在組織和網絡這一框架下進行；而對一個社會運動的話語和象徵性活動特徵的研究，則落入策略框架和文化文本的理論領域。最後，媒體在社會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被理解為整個文化霸權的部分體現。⁴⁴ 在這樣的分析中，一個論題中的「被解釋因子」往往成了另一個論題中的「解釋因子」，因此，一旦把一個複雜的社會運

⁴² Brake (1998, 7).

⁴³ 見Blumer (1969) 和 Turner and Killian (1987) 對符號互動理論在社會運動研究中的意義所做的論述，以及Collins (1981; 1990) 對於他的互動儀式鏈理論的論述。

⁴⁴ Gitlin (1980) ;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

動作為整體來考察，它們之間就會形成循環推理。⁴⁵ 在本書中，我打算把這些有關大規模社會運動發展的主要問題，同時納入國家·社會關係理論這個整體框架來研究。

然而，國家·社會關係這一概念的含義十分駁雜。儘管許多研究都提到這一概念，⁴⁶ 但其用法通常都很粗放，除了林茲 (Juan J. Linz) 及其助手論述民主過渡和民主鞏固的著作外，很少有人精確地定義國家·社會關係這個概念，並將其作為分析具體經驗事件的工具。比如，在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發展得較為完善的經濟發展研究領域，為了把握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國家·社會關係，學者們使用了諸如「有限自主」、「嵌入性自主」或「社會中的國家」之類的概念。⁴⁷ 儘管這些概念都很關鍵，但對於理解國家和社會之間具有路徑依賴性的互動過程來說，還是不夠的。而對於研究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動態軌跡來說，理解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具有路徑依賴性的互動過程，卻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環。顯然，我們需要的是更為豐富和具體的、更能把握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的概念。為此，我的方法是把國家與社會關係分解為三個相互交錯但卻不可通約的維度：國家的性質、社會的性質，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聯。

以下，我將會首先界定國家及其性質，然後再討論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聯，最後通過對社會性質的討論，提出一整套把社會運動的發展特徵，跟國家·社會關係的性質聯繫起來的命題。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本書的實證章節並不是要對這些命題進行系統的驗證，也不認為這些命題已窮盡了國家·社會關係的方方面面。毋寧說，這些命題概括了與本書直接相關的在不同國家·社會關係下衝突性政治的若干主要類型，因此可將其視為本書實證部分的一個理論綱領。

⁴⁵ 例如，在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1996) 最近編輯的一本書中，政治機會和資源動員成為框架建構過程的一部分，而資源動員結構又受到框架建構和政治機會的雙重限制。

⁴⁶ 比如Alford and Friedland (1985); Lisa Anderson (1986); Entelis and Naylor (1992); Hildred Geertz (1991); Gellner (1988); Nee and Mozingo (1983) 及Rosenbaum (1992)。

⁴⁷ 見Zhao and Hall (1994); Peter Evans (1995); Migdal (1994) 對於這些概念來源的討論。

國家及其性質

依循麥可曼 (Michael Mann) 的觀點，我把國家定義為一種複雜的、以領土為核心的、擁有一整套具有不同功能和性質 (包括軍事組織在內) 的組織；⁴⁸ 我們不從功能角度去定義國家，是因為國家的功能駁雜，並會因時間和空間而有所變動。在歷史上，國家是藉以領土為中心的組織的面目出現的，其核心功能是防衛和戰爭；但國家也具有階級性，並擁有立法、執法、福利及其他功能。人們通常依其政治性質對國家進行分類，並已經提出多種不同的分類體系。⁴⁹ 在本書中，我簡單地採用民主/威權的二分法。一個國家之為民主，是因為其政府致力以法治國，容納少數，領導人通過由大部分成年人口參與的常規性的和競爭性的選舉產生；一個國家之為威權，是因為其在政治、社會乃至經濟上的多元化發展不足，這種政體的領導人一般不經過普選產生，他們也一般並不完全服從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這些都只是理想類型。民主制的內部存在總統制和議會制的不同，許多民主制國家對待少數也並不寬容。威權制內部的變異就更大了，包括王權神授的專制政體、意識形態政黨統治的極權政體，以及那些因社會滲透能力弱而在事實上與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共存的威權政體；甚至有些威權政體的生存環境極不安穩，以致其領導人的主要執政目標就是在傾覆之前儘量搜刮好處。⁵⁰ 在下一章中我將論及，在80年代，中國的國家性質類似於林茲和史德本 (Alfred Stepan) 所定義的後極權政體。⁵¹ 不過，在本書的大部分篇幅中，我將或明或暗地將八

⁴⁸ Mann (1986; 1993).

⁴⁹ 最近，Finer (1997) 根據制度淵源對主要的政體類型做了分類，這些制度淵源包括宮殿、講壇、教會和貴族。這四種制度淵源之間相互組合產生了十種不同的混合政體類型。在研究民主過渡問題時，Linz and Stepan (1996) 確認了現代國家的五種理想類型：民主制、威權制、極權制、後極權制和蘇丹制，不同類型的政體在向民主過渡的時候將面臨不同的道路和任務。

⁵⁰ Bates (1981).

⁵¹ Linz and Stepan (1996).

九學運與在西方民主制下社會運動的發展規律相比；因此，簡單的威權/民主的二分法對我的意圖來說已經足夠了。⁵²

國家的政治性質塑造國家行為，但它並不完全決定國家行為。一旦一個國家的精英集團感受到實在的危險，那麼國家所做的事情往往就會遠遠超出一個教條主義的結構論者所能想像的範圍。法國大革命對於所有其他歐洲的舊政權具有警鐘性的意義，這些舊政權因而更審慎行事，於是避免了進一步的革命；同樣，大蕭條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所引發的改革浪潮，也超乎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想像；最後，對當前的中國來說，東南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奇迹，以及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也是一個觸動，促使中國主動進行自我變革。這些改革使中國目前看起來更類似於前南韓和臺灣的官僚·威權型政體，而不是斯大林式的極權政體。⁵³ 所以，幾乎沒有甚麼社會後果是不可避免的。

國家是具有自主性的，國家的自主性來自它所履行的一些獨特的、其他組織無法擔當的功能。⁵⁴ 隨着時間的推移，國家也會從構成國家組織本身的諸多要素中獲得自主性，這些要素包括國家在信息、專業知識以及資源方面所擁有的特殊資源。⁵⁵ 國家的自主性使政治精英集團能夠啟動種種以國家為中心的社會改造項目。然而，儘管國家擁有自主性，但它的行為未必是前後一貫的，導致國家行為不一貫的原因很多，包括國家組織所具有的自主性的不同、社會壓力的不同，

⁵² 第九章是個例外。在這一章，我將對20世紀90年代之前發生在中國的三次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所使用的語言和活動方式進行比較，這三場運動分別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5-1936年間的一二·九運動，以及八九學運。由於這三場運動背後的國家都是威權政體，我在第九章中會把這些運動背後的國家性質進行進一步區分。

⁵³ Kornai (1959, 1989) 和 Szelenyi (1986) 以他們對東歐共產主義改革的觀察，及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念為基礎，結論說經濟改革在共產黨政體中無法取得成功，因為在改革過程中，國家為着難以割捨的利益關係，總要設法挽救那些沒有效率的工廠。顯然，在共產黨中國，這種結論是難以成立的。

⁵⁴ Mann (1988)。

⁵⁵ 見Michels (1962) 對於大規模組織不可避免的寡頭傾向所作的經典論述。

以及國家政治精英集團成員認同感的多樣性；但這並不是說國家就不能做出前後一貫的決策，而是說，國家政策的一致性取決於精英集團的團結，或者說，取決於主導性國家組織（很多情況下指的是內閣）控制並協調更為邊緣性國家組織的能力。

即使國家能夠在政策上達成前後一貫，也無法保證政策本身能夠有效地滲透到社會底層。因此，國家的另一個重要維度就是國家能力。國家能力同樣依託於精英集團內部的一致性，同時也取決於麥可曼所說的國家的「滲透性權力」的強弱。⁵⁶ 麥可曼對「滲透性權力」的論述強調道路、統一貨幣，以及交通對國家滲透能力的重要性（我將之稱為「滲透權力硬件」），並把滲透性權力定義為：國家為了取得稅收或出於其他目的動員民眾時，它對社會的實際滲透能力。⁵⁷ 根據這種對於國家滲透性權力的定義，麥可曼預測現代威權政體具有高度穩定性，因為它同時擁有很強的任意性權力和滲透性權力。然而，麥可曼顯然忽略了人民是否願意跟國家主動合作這一問題（我將之稱為「滲透權力軟件」）。「軟件性滲透權力」的大小尤其取決於國家所具有的合法性水平的高低。⁵⁸ 對於合法性概念，我稍後將加以論述。

總的來說，國家的性質在本書中包括兩個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疊的含義：國家的政治性質以及國家的力量。國家力量同時取決於精英

⁵⁶ 這種定義下的國家能力完全不同於傳統的「強國家」觀念（見Peter Evans 1979; Migdal 1988）。

⁵⁷ Mann (1988) 將國家權力分為任意性權力和滲透性權力。所謂任意性權力是指國家精英集團能在多大程度上根據自己意志行事的權力。顯然，對一個現代國家來說，重要的不僅是國家擁有多少任意性權利，以便我行我素，更重要的是國家滲透並協調社會的能力。

⁵⁸ 比如，東歐的共產主義政體突然崩潰了，但它突然崩潰並不是因為缺乏任意性權力，或者因為滲透權力硬件遭到了破壞，而是因為國家既無法維繫精英內部的團結，也無法贏得社會方面的合作。一般來說，一個現代威權國家終究要面對合法性問題，不管它的滲透權力硬件有多強大。這是因為造就威權政體的革命蜜月會褪色，能吸引人們效忠的領袖要過世，經濟會有消長，政治錯誤也在所難免，政治系統的靈活性也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削弱。

的團結和國家對社會的滲透能力。兩者都和國家的合法性程度息息相關。

國家與社會的關聯

政體的性質把國家和社會從政治上聯繫了起來，但與此同時，國家和社會也通過心理上和經濟上的渠道相互聯繫。這裏所謂的心理上的聯繫，是指普通公民和國家精英對國家權力合法性的認同。顯然，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是多方面的，這些方面也是相互交織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經濟關聯的重要性已是一種傳統的智慧，本書中也會加以強調。正如第三章中將要表明的那樣，除了少數為意識形態所驅動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外，大部分學生支持八九學運的初衷都是出於經濟和其它利益上的不滿，他們認為一些改革政策減少了自己的收入，並阻塞了向上流動的渠道。然而，大規模社會運動絕不僅是一場基於理性選擇的策略遊戲；它也是一場情緒性的道德討伐。因此，在政治和經濟聯繫之外，我在這裏想詳細闡述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關聯的另一個環節，即國家合法性的來源。但首先，我要簡短地界定一下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這兩個緊密相關並在本書中頻繁出現的概念。

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文化即可以被界定為一種符號和意義系統，也可以被界定為一種實踐的模式。⁵⁹ 不過，只有當文化被認為是自主的，並且會對社會實踐模式產生影響時，這一概念對社會學分析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如果把文化同時界定為一套意義系統和一套行為系統，那麼文化就包容了一切，解釋就變得毫無意義了。在本書中，我將和格爾茲 (Clifford Geertz)、施奈德 (David M. Schneider)⁶⁰ 一樣，把意識形態和文化都界定為一套意義系統，而非行為系統。意識形態是一套其內容在不同程度上真偽混雜的信念系統，而政治文化則是一套傳統或現代的信念、價值以及符號的總和。在這裏，我將「意識形態」限指諸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以及民族主義之類的宏大

⁵⁹ 見Steinmetz (1999, 4-8) 和Sewell (1996) 關於文化概念的不同定義。

⁶⁰ Geertz (1973, 1983); Schneider (1976).

社會構想，而文化則指涉一套相對穩定的、在社會化過程中逐漸積澱下來的意義系統。毫無疑問，這二者之間也不是判然兩分的。

為了理解國家合法性之於社會運動的意義，我們有必要理清合法性、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直覺告訴我們，國家合法性是政治文化的組成部分；的確，國家的合法性形式將會改變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並會逐漸成為這一政治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政治文化和國家合法性之間也有其精微的區別：文化源於習慣，而合法性則基於國家，文化是人類生活中相對穩定的方面，我們無法期望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不過，依託於合法性的政治行為卻可以在短期內發生迅速變化。合法性和意識形態也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某種形式的合法性可以通過意識形態語言加以支持或駁斥。合法性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在於，國家合法性只是一種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它是人們所共有的關於國家、社會關係的一種理解，而不是一種意識形態。

國家合法性與社會結構有一定關係。一定形式的社會結構(比如強市民社會)通常和一定形式的國家合法性(比如法律—選舉型合法性)相伴而生。但是，國家合法性反過來也會限制國家精英、統治階層及運動積極分子的行為，以及人們對於他人行為的理解和感受(比如，它將決定人們把甚麼樣的政府行為視為不公正並對之產生憤恨，以及在甚麼場合下政府精英會失去士氣並拒絕鎮壓反叛者等等)，簡單地訴諸社會經濟結構並不能解釋這一切。因此，合法性不僅是一個「中介」變量，而且是一個自變量。⁶¹

在政治分析中，合法性一直是非常流行的概念，人們用它來解釋從資本主義危機到威權政體的民主化等各種不同的現象，⁶²不幸的是，這一概念的界定仍然非常模糊，而且濫用的傾向十分明顯。直到最近，學者們仍在不斷地使用諸如「合法性限度」、「合法性危機」或「合

⁶¹ 比如，Skocpol (1979) 堅持認為合法性是一個「中介」因素。

⁶² 見Habermas (1975) 和Offe (1973) 對於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見Chehabi and Stepan (1995)；Linz (1988) 和Huntington (1991) 對民主化的分析。

法性匱乏」之類的概念，來解釋運動的興起或者政體的危機。⁶³ 當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一個國家面臨的是甚麼樣的合法性危機，以及甚麼樣的群體正在經歷一場合法性危機時，我們的分析就缺乏說服力。⁶⁴ 因此，作為第一步，我們必須定義獨立於我們所要研究的社會運動、並可茲實證衡量的國家合法性的諸多維度。在第七章，當分析中國國家和八九學運之間的關係時，我將詳細論述中國主要的城市人口在80年代後期對國家合法性的感受。

根據韋伯 (Max Weber) 的理論，習慣、情感和理性計算是人類服從的三個基礎。相應地，他提出了權威關係的三個理想類型：傳統型 (traditional)、克里斯瑪型 (charismatic) 和法理型 (rational)。⁶⁵ 儘管這種分類方法遭到多方面批評，⁶⁶ 但批評家們基本上還是接受了它。韋伯的分類的確富有啟發性，但拿這種分類來分析國家權力，就會產生兩個問題：首先，如柯林斯所論，⁶⁷ 韋伯的分類方法是靜態的，而權威關係是動態的和互動性的；人們對國家合法性的感受將影響他們如何與國家互動，相應地，這些互動將進一步塑造他們對國家合法性的判斷。其二，韋伯的理想類型將人們對國家合法性的感受中的情緒因素和認知因素割裂開來；而在現實情境中，不管國家在將自身合法化的過程中做出何種努力，人們，對國家合法性的感受總是混合着情感

⁶³ 比如Wolfe (1977); Habermas (1975); Offe (1973); Johnson (1982); Oberschall (1996).

⁶⁴ 譬如，Lipset (1981, 64) 將合法性定義為「一個系統所據有的產生並維護以下信念的能力：現存的政治制度最適合於目前的社會」。Barrow (1993, 25) 則認為，「國家合法性最終體現在人民是否願意服從國家機器所作的決定」。Linz (1988, 65) 將合法性定義為「對於政治制度所持的信念，即是，儘管存在諸多缺陷和失敗，但這套制度仍優於其他可能建立的制度，因此，這套制度可以要求服從。」這些都是合理的定義。正如我在文中所解釋的，它們又有着共同的缺點，即它們並未對國家權力合法性的維度作出分析，而這對於實證分析是很關鍵的。

⁶⁵ 見Weber (1978, 28) 和Bendix (1962, 290–97) 關於這種分類法的論述。

⁶⁶ 見Blau (1963) 和Eckstein and Gurr (1975) 的一些批評。

⁶⁷ Collins (1995, 1565–66) .

和理性，這對於統治階級成員來說更是這樣；比如，在中國歷史上，皇帝以天子的形象而得以合法化，然而，一旦天子無法提供基本的服務，王朝就會不斷遭到挑戰和顛覆；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克里斯瑪型領袖身上；人們這麼做，既是出於感情，也是出於對得到補償的希望。由於韋伯忽視了權威關係的動態性，割裂了權威關係的情感和認知基礎，因此，當我們把韋伯的理想類型作為實證分析的基礎時就會出現許多問題。

在本書中，合法性是一個關係性的、互動性的概念。我的目標是去經驗地、詳細地描述人們對國家合法性的評估，以及這種評估在八九學運的參與者內部，以及參與者與國家之間的中觀和微觀互動關係中是如何體現的。在本書中，國家合法性的來源不是根據人類服從關係的理想類型，而是根據國家權力合理化的方式來加以分類，這些合理化方式包括：普遍接受的精英選拔程序、國家提供的服務，以及國家對未來所做的承諾。相應地，我根據不同民眾和國家精英本身對國家合法性的感受，而將之界定為三種類型：法律·選舉型、績效型和意識形態型。

我們說一個國家立基於法律·選舉型合法性，意思是說，這個國家將法律作為對所有社會集團的（包括國家精英在內）行之有效的約束性原則，並且，國家領導人是通過常規性的普選渠道所產生的。當一個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基於一個宏大的構想，這個國家又正為實現該理想而努力，那麼我們就說這個國家的統治是基於意識形態合法性。⁶⁸

⁶⁸ 法律·選舉型合法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之間有很多類似之處，這是因為法律·選舉型合法性通常以民主作為其意識形態的基礎，但是，法律·選舉型合法性與民主在兩個方面是不同的：其一，民主只是承諾一個選舉領導人的程序，它並不允諾一個烏托邦式的未來；最重要的是，我所定義的法律—選舉型合法性強調的是程序，而不是意識形態。儘管法律·選舉型合法性可以由民主信條來證成，但最終來說，從根本上給予國家合法性的不是國家所遵循的價值體系，而是人們所共同接受的領導人選舉程序。其二，也需要強調的是，穩定性是法律·選舉型合法性的一個重要特徵，由於選舉成為一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中，政府統治並不需要一個宏大的意識形態的支持，政策失誤和醜聞可以導致政府更迭，而不會帶來合法性危機；在這種體制下，精英衝突和選舉變動使在野者仍然擁有許多政治機會，在野者的政治運作將使得社會逐

當國家統治的正當性源自國家在經濟上和/或儀式上的表現，以及國防能力時，我們就認為這個國家的統治基於績效合法性。最後，當人民把自己的希望跟一個或為數不多的幾個領導人的能力和個人魅力聯繫在一起時，這個國家便享有克里斯瑪合法性。克里斯瑪合法性可以成為任何一種國家合法性的補充，但是它一般來說是一種具有極端傾向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在這裏，有必要再次強調，上面提到的那些合法性維度都不是純粹的，而是混合性的建構，任何國家都無法倚賴單一的合法性來源來生存。不管怎樣，在一個特定的國家和一個特定的時間，往往會有一種合法性來源居於主宰地位。通過確認這種主要合法性來源，我們就能夠在威權/民主二分法之外，進一步確認一個國家的性質。

以上定義使我們能夠衡量社會上不同群體（其中也包括國家精英集團）所感受到的各類合法性及其水準。法律·選舉型合法性是最容易判斷的。根據定義，西方民主制下的國家是以法律·選舉型合法性為基礎的。西方民主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即使民眾對某些領導人或政府機構失去信任，國家依然享有穩定的合法性；⁶⁹ 這種情況之所以能產生是由於民主國家的合法性基礎並不在於領導人的素質和政府組織的效率。另一方面，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威權型國家中，如果相當部分的公民對一些國家領導人和某些政府機構變得非常反感，那麼政治穩定就很難持續下去，這是因為中國沒有常規的選舉渠道，使人們能將那些不受欢迎的領導人和制度掃地出門。

法律·選舉型合法性往往是民主制度的基礎，而意識形態合法性常常是威權政體的特徵。在80年代的中國，國家依然以「四項基本原則」的意識形態術語作為其合法性基礎，並將之寫入憲法的序言。⁷⁰ 因

漸開放，同時也鞏固了民主制度 (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不過，這種多元主義的擴張也會促使個人以局部和宗派利益為基礎而組織起來，從而進一步降低大規模革命性動員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我們一定要將西方選舉型民主看作是一種文化，那麼這種文化的「霸權」是無所不在的。

⁶⁹ Dogan (1995, 65) .

⁷⁰ 「四項基本原則」分別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此，要評估人們對國家合法性的感受，我們可以從人們對這些原則的態度入手。

績效合法性的主要維度包括：經濟績效、⁷¹ 道德行為和領土防衛。沒有即時的外來威脅的時候，經濟績效和道德行為通常會在一個國家的績效合法性中佔有主導地位。經濟績效可以客觀地加以衡量，比如經濟增長、特定群體的福利，也可以主觀地加以衡量，比如，你可以直接詢問一些人如何看待國家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一個國家的道德行為往往是該國傳統的未成文「社會契約」的有機組成部分；一個好的統治者必須履行獲大眾認可的恰當的行為和儀式。這是一種防衛型的、以文化形式表現出來的維度，要測量這種維度首先要以對當地文化的理解為前提。在本書中，我將論證，在80年代後期的中國，國家合法性的來源主要是經濟績效和道德表現，而不是意識形態，而國家合法性的這種形式也塑造了八九學運時大部分抗議者的行為。

社會的性質、國家·社會關係與 社會運動的發展

一個社會的性質首先取決於該社會的結構。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文獻當中，社會結構等同於經濟和階級關係；然而，相比起那些具有明確的以領土和語言為基礎的身份認同範疇（例如民族和種族），階級是一種相對較弱的身份認同，一個客觀上存在的階級必須克服許多障礙才能形成一個想像的共同體。⁷² 有關工人階級運動的研究表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除非受到國家某種特定形式的對待，工人們是不會自發形成階級意識的。⁷³ 從歷史上看，大部分大規模的人類衝突都是有組織的政治鬥爭，而不是以經濟為基礎的階級鬥爭。因此，我將從更寬泛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結構，包括民眾之間在工作、居住和其他活

⁷¹ 這一概念部分地源自Durkheim (1933) 的「非契約性的契約因素」概念。

⁷² 「想像的共同體」這一概念來自Anderson (1983)。

⁷³ Katznelson (1985) ; Lipset (1983) ; Mann (1993, ch. 15–18) ; Marks (1989) .

動的基礎上所建立的空間關係，以及社會中社會組織的密集度、多樣性和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⁷⁴

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之外，「市民社會」是目前流行的一個用來描述社會結構的概念。⁷⁵ 市民社會可被狹義地定義為國內那些獨立於國家力量的自主性社會組織的總和。⁷⁶ 最近市民社會又被定義成一種理想的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形態中，社會組織的成員身份「既是自願的，也是交叉的」，個體不但免遭國家的苛政，同時也倖免於各種社會牢籠。⁷⁷ 在蓋爾勒 (Ernest Gellner) 看來，這種類型的社會實際上比民主更值得信賴。然而，在大多數非西方社會中，社會中層組織的形態與這一理想界定相去甚遠；因此，本書在運用「市民社會」這一概念時，其用法更接近上文提到的狹義定義。根據這種定義，一個強市民社會就意味着存在強有力、異質性、並能抗衡國家的社會中層組織。

社會中層組織的密集度、多樣性和力量，是衡量社會的性質和國家、社會關係的一個重要指標。⁷⁸ 首先，有效的和多樣的社會中層組織不僅制衡着國家權力，同時也有利於國家對社會的滲透；沒有社會中層組織，國家權力將走向專制，而民眾的注意力也會以國家為中心；沒有社會組織與國家之間的合作，國家權力將無法深入社會，無法產生協同的社會能量以推動各種以國家為中心的規劃，比如現代化或戰爭。⁷⁹ 其次，社會中層組織可在社會群體中培養出彼此連接的紐帶和契約關係，創造並維繫共同的認同感和傳統。組織化程度較差的個體之間往往缺乏相互理解和對現實的共同感受，不能以協作的方式

⁷⁴ 在這裏，我將「組織」定義為這樣一種社會集團，它可以通過協作來達成特定的目標，並通常在勞動、權力和溝通等方面有着非隨機性的職責分工 (Etzioni 1964)；教會、工會、鄰里組織、學生和職業組織和社會運動組織都是這方面的例子。

⁷⁵ 見 Gellner (1994)；Hall (1995)；Keane (1988)；Schmitter (1993) 及 Seligman (1992)，他們最近均對市民社會理論有所發展。

⁷⁶ 類似的定義可見 Kumar (1993)；Wank (1995) 及 Whyte (1992)。

⁷⁷ 這方面的定義請參閱 Gellner (1994) 和 Hall (1995, 15)。

⁷⁸ 見 Tocqueville (1972) 關於社會中層組織在穩定美國民主方面的作用的討論。

⁷⁹ Hall (1985a)；Zhao and Hall (1994)。

去獲取自己的利益。最後，極度密集和多樣的社會中層組織雖然可以增進各個組織內部的社會運動動員能力，但同時也大大降低了發生全國範圍內大規模社會運動和革命的可能。

支持資源動員理論的學者們批判了科恩考斯 (William Kornhauser) 的大眾社會理論，並在此基礎上強調組織在社會運動動員中的重要性。⁸⁰ 不錯，組織在一個具體的社會運動動員過程中確實發揮着關鍵的作用，但是，如果把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那麼有效的、多樣的中層組織實際上也減少了全民族大動員的可能性，這是因為不同的組織往往有着不同的利益，並且往往會在其成員間培養起彼此交錯的身份認同——對一個社會群體來說可能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對另一個社會群體來說可能是無足輕重的，甚至是有害的。因此，在社會中層組織比較成熟的社會中，整個社會走向極端的可能性很小。上述討論可以總結為如下命題，這個命題將社會的性質同中層組織的強度聯繫在一起：⁸¹

- a. 一個社會如果具有大量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異質性的中層組織，那麼，該社會一般是順服的，而一個中層組織發展不良的社會則容易走向極端。

所謂「順服」(conformist)，我的意思是指，一個社會中激進的觀念和行為處於邊緣，而社會主流一般都維護現存秩序，或者僅僅追求改良式的變革。至於「極端」(radical)，我指的是一個社會中民眾更傾向於支持反體制的觀念，並參與旨在進行根本變革、甚至摧毀當前社會

⁸⁰ 有關「大眾社會理論」，可見Kornhauser (1959)，也可參照Oberschall (1973)；Pinard (1975)；Tilly (1978)；Halebsky (1976)；Useem (1980) 和 von Eschen, Kirk, and Pinard (1971)。他們均對大眾社會理論有所批評，並強調社會運動動員中組織的重要性。

⁸¹ 我在這裏要澄清的是，首先，本章提出的所有命題都是以「其他條件相等」為前提的；其次，當中有些命題把社會性質同政體類型聯繫起來，對這些命題來說，當它們用以解釋其他社會運動的動態時，其有效性須視該政體同本章前面所定義的理想政體類型的關係如何而定。

政治體制的社會運動。因此，這個命題實際說的是，在中層組織發展不良的國家，大規模社會運動和革命更容易發生。不過，社會中層組織發展不良並不構成產生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充分條件，大規模社會運動往往暗伏一些社會變化，這種變化破壞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能力。因此，我們需要把社會運動的興起和性質，與社會中層組織的強度和變化幅度聯繫起來，於是得到下面的兩個命題：

- b. 一個國家在以下兩個理想條件下可以達到政治上的穩定：要麼存在有效的、異質性的社會中層組織，要麼完全缺乏社會中層組織。在前一種情況下，政治穩定並不意味着沒有社會運動，或者發生社會運動的可能性減少，而是意味着爆發革命性動亂的可能性降低。
- c. 社會中層組織正在興起或趨於衰落時，革命性動亂最有可能爆發，儘管在這兩種情況下，革命都不是不可避免的。

在一個理想形式的極權政體中，中層組織完全付諸闕如，國家徹底主宰社會。⁸² 因為社會中不存在反對力量，所以不可能發生任何形式的社會運動；這一點不難理解。因此，我們只需更詳細地解釋一下命題b的後半部分即可。自70年代早期以來，資源動員學派嚴厲地批評科恩考斯的大眾社會理論；不過，我的這一命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為科恩考斯的理論正名。科恩考斯的大眾社會理論的要點是說，中層組織很弱的社會更有可能發生大規模的社會或政治運動，⁸³ 而其反對者的研究重點則是那些發生於中層組織發達的民主社會中的社會運動，而且這類研究往往側重於運動的微觀動員過程。既有的組織對微觀層次上的運動動員來說肯定是重要的，因此，一個具備有效的中層組織的社會將比大眾社會經歷較多的社會運動。然而，這些中層組織

⁸² 尤其見Arendt (1951) 和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1965) 關於極權的討論。

⁸³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裏，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6) 也論證說，威權政體更容易激發罕見但具革命性的動員，也就是說，他們一定程度上其實也同意科恩考斯的觀點。

發達的社會本身擁有的以下的機制，從而阻止了革命性動亂，這包括發動運動的低成本、中層組織的多樣化、以利益為基礎的現實感，以及組織的多樣性所衍生的認同感與利益的高度分化。因此，大眾社會理論至少清楚地闡明了「社會中層組織的薄弱，為大規模革命性社會運動創造了政治空間」這一問題；至於組織是如何在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那完全是另一個層面的問題。

命題c是塗爾幹式的，因為它預測大規模社會運動更容易在社會變遷過程中發生。那些失敗的國家集權化嘗試均可作為「社會中層組織衰落誘導革命」這一命題的實證案例。舉例說，在伊朗，巴列維國王(Shah)的現代化計劃威脅到社會的許多階層，尤其是伊斯蘭教會和傳統商人勢力這兩大精英集團，因而觸發了革命。⁸⁴ 關於社會中層組織的興起，全權政體的衰亡和20世紀80年代這些政體中所發生的國家主導型改革，就是例證。⁸⁵ 不過，中層組織無論興起還是衰落，革命性的運動都並非不可避免。簡言之，國家集權過程是完全可以成功的，一個正在冒興的社會也並不一定會跟國家發生決然的衝突。

在民主政體中，國家不禁止依法建立並在法律框架下運作的組織，因此，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一般也會有發達的中層組織。相形之下，現代威權政體一般都出現在那些社會中層組織很弱的國家，並壓制國家掌控以外的社會組織。既然社會中層組織的密集度和多樣性同政體的性質息息相關，那麼一個社會的動員潛力也就與國家性質直接關聯：

d. 在威權國家中，社會傾向於激進，而在民主國家中，社會則傾向於順服。

這項命題刻畫了在不同類型國家中國家、社會關係的不同性質，它意味着反抗運動在威權政體中會趨於激進，而在民主國家則容易趨

⁸⁴ Arjomand (1988) ; McDaniel (1991) 及 Skocpol (1982) .

⁸⁵ 關於極權政體的衰亡，可參見Janos (1986) ; Jowitt (1983) 及 Rigby and Feher (1982) ; 關於國家主導的改革和社會運動，可參見Di Palma (1991) 和White (1993) .

於改良⁸⁶——這是社會運動發展機制的一個根本區別之所在。從這個命題的角度來看，可以說，許多在西方發展起來的社會運動理論往往只適用於解釋西方民主國家的社會運動，而不適用於發生在其他地方的社會運動。比如，甘遜 (William A. Gamson) 曾論證道，一些不那麼激進的社會運動在社會中比較容易壯大起來。⁸⁷ 然而，在八九學運當中，我們看到的卻是：那些旨在從根本上變革政體的抗議活動在八十年代中國往往廣受歡迎 (見第六、九、十章)。

在80年代，中國的國家在組織和意識形態等兩方面的控制均有所鬆馳 (見第一章)。相應地，許多往昔隸屬於國家的機構，例如媒體、公共輿論和大學，都從國家的嚴密控制下擺脫出來，並在性質上日益成為「社會」的一部分。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可由上一命題作出如下推論：

- d.1. 在民主政體下，媒體和公共輿論傾向於順服。但在威權政體下，它們則很有可能成為激進機構，特別是在它們遽然擺脫國家控制，獲得一定獨立性之後。
- d.2. 與西方民主政體中的大學相比，欠發達威權政體中的大學更有可能成為激進機構。

上述第一個推論刻畫了媒體和公共輿論在不同類型政體中的不同性質。關於西方主流媒體和公共輿論的保守性，各家已有詳盡論述。從事新聞與公共輿論研究的學者一般都同意，西方媒體往往服從主流文化和多數意見，其信息來源主要依靠政府。對於挑戰體制的社會運動，它們要麼採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要麼進行帶偏見的報道。⁸⁸

⁸⁶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1996) 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⁸⁷ Gamson (1975)。

⁸⁸ 但是，學者們把這種保守態勢歸因於不同的因素，包括媒體功能性的常規活動 (如Fishman 1980; Gans 1979)、市場力量 (Epstein 1973; Ryan 1991; Tuchman 1972)，以及文化霸權 (Gitlin 1980; Herman and Chomsky 1988; Molotch 1979) 等等。在第十章，我將會詳細討論這些文獻。

而且，在西方，公眾通常把媒體看作是獨立於國家的機構，他們通常以建設性的態度從媒體中攝取信息。⁸⁹ 對比之下，在八九學運中，中國媒體力圖擺脫國家控制，以爭取對此運動進行正面報道；公共輿論在大部分時間裏都被謠言牽着鼻子走，除非媒體對運動進行了正面報道。在第十章，我將就中西方媒體和公共輿論行為的這一根本差別作出解釋。

儘管大學在民主政體中可能是一個比較激進的機構，但是作為西方文化的產物，它基本上是作為一個順從性機構而存在的。在歐洲中世紀，大學由教會控制，其課程以本土性高層文化為基礎，學生們差不多全部來自上流家庭，直到中產階級在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以後，他們才也開始把孩子送往大學。西方大學是在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之後才逐漸轉化成為一個現代機構的，⁹⁰ 相比之下，在大部分欠發達國家的威權政體中，大學是一個外來的機構，它基本上不是根植於本土文化中的一個組織。發展中國家都是在受到西方挑戰之後，才被迫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而大學的建立則是這種強制性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發展中國家中，大學所講授的課程都是從外國引進的，此等舶來的觀念往往對傳統社會秩序具有破壞性。⁹¹ 更重要的是，為了發展現代工業，大部分欠發達國家中的威權政府往往大力發展高等教育，「過量生產」學生，隨之而來的就業困難也常常會誘導激進主義的產生。⁹² 在第三章，我將分析80年代中國國家的一系列政策是如何把中國的大學生推向激進的。

⁸⁹ 尤見Lang and Lang (1981) 及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 對於西方公共輿論的這種建設性立場所做的討論。

⁹⁰ Ringer (1979); Vaughan and Archer (1971).

⁹¹ Lipset (1967); Altbach (1981).

⁹² 因此，在西方國家的國家政治中，除1848年德國學生運動之外，學生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成為一支主要力量；而在不發達國家中，學生運動從來就是民族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以及當前民主運動的主力軍（見Altbach 1968a, 1989; Chow 1967; Shils 1968）。

西方學者通常都強調到組織和社會中業已存在的人際網絡關係在社會運動動員中的關鍵作用。⁹³不過，在大多數威權政體中，國家控制範圍之外的社會組織發展不良，持不同政見者的關係網絡往往被局限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範圍內。在這種情況下，假設西方學者們的見解是正確的，那麼在這樣的社會中，大規模社會運動何以產生就成為一個疑問。⁹⁴然而，威權政體可以壓制社會中層組織的發展，但它決無可能消除人們的日常關係。就像第八章所表明的那樣，當一個強威權政體實施一場大規模的變革規劃時，通常會把龐大的具有同質性人口聚集到同一個物理環境中，這種空間佈局促進了人群彼此的積極交流，也增強了他們在此環境下得以互相接觸的可能性。當一場政治危機到來之時，這種生態環境往往會成為社會運動的動員基礎。⁹⁵我們因此而得出如下命題：

- e. 當一個社會中獨立於國家之外的中層組織發育不良時，社會運動的動員往往會帶有很大的自發性，並且高度依賴於被動員群體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在第六章，我將詳盡討論自發性概念在八九學運中的經驗性意義。在此，所謂「自發性」(spontaneity)，是指社會運動組織往往不能控制其參與者，運動裏中大量的活動都由個別參與者，或其中一小撮並非運動之領袖或組織者的人所發起。這項命題意味着，如果一個社會的中層組織發育得不好，那麼，在該社會所孕育的社會運動中，參與者的動員方式以及運動的發展，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大眾居住的

⁹³ 可參見Fernandez and McAdam (1989) ; Roger V. Gould (1991) ; McAdam (1986) ; McCarthy (1987) ; McCarthy and Zald (1973) ; Opp and Gern (1993) 及 Snow, Zurcher, and Eklund-Olson (1980) 。他們對社會網絡在運動動員中的作用都有詳細討論。

⁹⁴ Olson (1990) .

⁹⁵ 最近，Goldstone and Useem (1999) 展示了監獄生態環境對監獄暴動所發揮的作用。另外，在對伊朗貧民區社會運動的研究中，Bayat (1997) 也強調了人們在空間上的接近，而非正式的網絡和組織，對於運動參與的重要性。

密集程度、空間分佈和空間常規活動的影響；從這項命題也可以推論，在威權政體下爆發的社會運動，其動員過程具有較高的自發性。

下面的推論進一步將運動的自發性同運動的發展規律聯繫起來：

e.1. 社會中，如果中層組織發育不良，那麼社會運動中的活動傾向於發生在個體層面上，社會運動的發展也更可能是由情感而不是由策略來驅動的。

e.2. 一個社會中，如果中層組織發育不良，那麼社會結構就會對一個社會運動的發展起更大的作用。換句話說，在這種形勢下，儘管個體行動更為「自由」，但其隨形勢而不斷變化的種種選擇對社會運動的發展所起的作用卻較小。

第一個推論假設，組織往往能更好地消除和克服個體性情感行為對社會運動發展的影響，並作出策略性的選擇；第二個推論的背後是「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 原則。換句話說，當同一時間同一地方有許多行動發生時，導致某個行動在其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往往不是行動者的想法，而是觀眾的感受；某一個行動之所以能夠從許多行動中脫穎而出，佔據主導地位，是因為這個行動更能打動觀眾；相應地，這一行動之所以能更有效地打動觀眾，是因為它與當時社會上廣為接受的「解讀圖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 (本書中，這些圖式就是大眾對國家合法性的普遍感受) 吻合。本書有好幾章，尤其是第八和第九章，是從上述命題和推論出發來對八九學運進行分析的。

自90年代早期以來，學者對大眾行為和情感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重新產生興趣，⁹⁶ 然而，大部分研究在強調大眾行為和情感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的同時，並未指明大眾行為和情感在甚麼社會結構條件下對一個社會運動的發展會起主導作用。以上一系列命題可以看作是為修正這種傾向而作的一種努力。

⁹⁶ 參見Oliver (1989) 和 McPhail (1991)。他們提供了最近的有關大眾集體行為的文獻，也可見Jasper (1997; 1998); Scheff (1994) 和Goodwin (1997) 有關集體行動中情感的作用的討論。更早的文獻可見Smelser (1962)。

上述命題從不同方面把社會運動的動員形式和特性與社會的結構和性質關聯起來，同時又將社會的性質（就社會運動動員潛力而言）與國家的性質聯繫起來，描述了在民主政體和威權政體下社會運動的不同發展機制；當然，這些命題並沒有窮盡國家·社會關係的可能性，以及其他各種國家·社會關係對社會運動發展特徵的影響。就像第九章的分析將要顯示的那樣，在不同威權政體內部，國家·社會關係也有所不同，這些都需在實證層面上加以驗證。然而，國家的性質、社會的性質、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聯方式，永遠會是分析國家·社會關係對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影響的三個基本視角。

方法論檢討

在進入實證研究章節之前，從方法論角度對本書的理論論證和經驗資料做一個簡要的探討將是不無裨益的。在本書中，我作了多種理論和論證，一些讀者可能對其中某些論點馬上舉出反例來表示反對，例如，當我提出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動員方式主導着八九學運時，有些讀者馬上就會指出組織在此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我想指出的是，本書的論證方式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定義型、比較型和競爭型；儘管每個論點在出現時我都會加以充分論證，為了使有關問題的討論更具有普遍意義，有必要對上述三種論證類型所涉及的問題做一番專門的解釋。

首先是定義型的論證。比方說，當我把民主制下的媒體定義為一個順服性機構時，我並不是忽略極右和極左媒體的存在，也不是對主流媒體報道方式的差異以及西方民主國家中新聞界人士的改革努力視而不見。事實上，當我做出這樣的定義時，我認為我所定義的事物服從某種「統計分佈」(statistical distribution)，而我的定義則抓住了這一統計分佈的「中心趨勢」(central tendency)。除非反例能改變我的定義的「中心趨勢」，否則反例個案並不能削弱定義的正確性。

其次是比較型的論證。例如，我論證說：在經濟不發達的威權政體下，大學通常要比西方民主制下的大學激進(見第三章)；這並不是說，在不發達國家中的大學生會天天造反，而在民主政體下大學從不

鬧事；也不是說，發達(或不發達)國家內部，學生的政治行為不存在變異；或者說，一個國家中學生的政治行為一成不變。在此，如果使用統計學方法做個類比，我們可以把這種比較看作是在做一個T檢驗(*t*-test) (或者在所比較的群體超過兩個時，做一個方差分析〔ANOVA〕)。因此，只要大學作為一個整體在發展中國家比在發達國家更為激進，我的這項論證就是有效的。就西方大學的政治特徵來說，像1848年德國學生運動和1960年代的新左派運動這樣的學生運動的例子，一旦將其與威權政體中的學生運動相比時，均可視為西方大學政治特徵內部所存在的變異。⁹⁷

最後是競爭型的論證，本書在第七、八、九及十各章的主要論點均屬於這種類型。這種類型的論證往往只是針對某一現存觀點或理論而立論，它旨在指出，本書所提出的對八九學運所做的一系列解釋要比其他理論更有說服力。比如，在第七章，我論證說，八九學運的發展以及學運中的國家行為，主要是由當時的國家·社會關係，而不是由高層精英的派系鬥爭所決定的。我的這種立論並非否定當時共產黨高層精英之間存在着權力鬥爭。但是，除非有人能實證地證明，黨內的權力鬥爭更能解釋八九學運的發展，否則我的解釋就能繼續成立。

不過，我還需說明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本書所用的大多數資料的收集方法和來源。在本書最後的附錄中，我會詳細闡述我的採訪過程，在此我只想討論一些最關鍵的問題。本書的資料主要有三個來源。第一，在1992-1993年期間，我正式採訪了70位人士，其中包括八九學運的組織者和積極參與者、一般學生，以及大學裏的老師和政工幹部。第二，我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收集了所有與八九學運相關的資料和背景材料。第三，我還去了中國的幾個主要圖書館，並在一些朋友的幫助下獲取了大量書籍與材料，這些資料信息渠道各有其長處和弱點——舉例說，就採訪而言，我很關注

⁹⁷ Lipset (1967); Altbach (1981; 1991).

受訪者在回顧時可能加入的偏見，因為其中可能會有遺忘或記憶的誤差，也可能有事後根據社會上的流行說法或個人觀點對一些歷史事件進行的重構。儘管我在設計採訪問題時已採取了種種防範手段，但上述許多問題仍不可能完全避免。讀者會問，我是如何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來源中選擇材料的——這就是關於本書所用資料的可靠性和真實性問題。

我的根本原則是，首先，對所有資料均保持高度警覺甚至懷疑，對那些對八九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有重要影響的事件更加小心過濾。對於同一事件，我往往不單比較不同人的不同說法，而且還將這些說法與其他背景材料加以參照。我這兒使用的可以說是中國史家所用的「考證」方法，並在此基礎上努力勾畫出一個較為真實的輪廓。我應當承認，這並不能使我在作出判斷時完全免除個人偏見，不過，由於我在判斷時運用了證偽邏輯，從而把潛在的偏見減到最低。寫作時，我有時依據那些受訪者所提供的信息，有時依據一些非官方二手渠道的說法，有時依據官方及/或半官方的資料，有時會從各個渠道都汲取一部分信息來重構一個畫面。有時我甚至對所有資料來源均不滿意，於是就通過對各種資料進行仔細解讀，從而建構出一幅圖景或者把握住當時的某種社會情緒。由於研究範圍很廣，而且事件也高度複雜，要概括本書中每項事件的重構過程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僅舉一個典型的例子，藉以說明我是如何建構本書中所描述的重要事件的。

1989年4月19日，警察試圖恢復新華門前的秩序。經過幾個小時的努力，大部分學生與圍觀者均被疏散，但直到20日凌晨，約兩百名在新華門前抗議的學生仍然拒絕離開。於是警察把這些學生強行拖進一輛大巴，將其送回北京大學。這些學生回到學校後，就手拿血衣，怒呼口號開始在校內遊行。與此同時，一個關於警察暴行的謠言立刻在北京各高校散佈開來，好幾所著名大學也立刻開始了罷課行動。整個事件被冠名為「新華門慘案」（我在第六章還將對此進行討論）。迄今，大部分論著都認為「新華門慘案」確有其事，該事件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廣為接受的「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⁹⁸

⁹⁸ 關於歷史記憶在衝突性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見Corney (1998) 和Tilly (1994)。

官方報紙則聲稱，新華門前的流血事件是一些學生試圖打破大巴的車窗玻璃時被割傷所造成的，當窗玻璃被砸碎時，司機踩了剎車減速後，幾十個學生乘機跳下了大巴，大巴司機看見學生們攔了一輛卡車，坐上去離開了——這些敘述與被廣為接受的「新華門慘案」的敘述大相徑庭；我也看到一個學生在當時寫的一張大字報，其中說道，他的幾個同學商量如何引誘警察來打他們，藉此動員其他學生，這張大字報的作者因而斥責了他的一些同班同學的行為。然而，我也不能簡單聽信這個學生的說法，否則人們會說，那張大字報是在政府的授意下寫的，但這張大字報使我對該問題有了警惕。

在我採訪的過程中，有兩個學生說，他們親身經歷了這次事件。一個學生提供了警察毆打他的一個同學的細節。但是，通過其他渠道，我瞭解到，這位名叫王志新的學生是在前門地鐵站附近和幾個警察發生口角時被打的，當時他是一個人在回學校的路上，和「新華門事件」沒什麼關係。另一個學生則是當時最後堅守在新華門前的200名學生中的一個，他告訴我，當天早上確有衝突發生，不過警察並沒有用全力打學生。我雖然相信他回憶的真實性，但由於200人是個具有一定規模的人群，有可能是他和他的朋友沒有遭狠打，而其他角落裏的同學卻遭到了警察的毆打。

我因此繼續在相關的資料中搜尋。這時我見到了由學生領袖張伯笠提供的一項敘述，張離開新華門比這200名學生稍微早一點。他回憶說：

我剛回到北大南門，彭榮和其他學生（他們都在那200名學生之列）也回來了。他們站在一輛大卡車上。我聽到他們在喊：「警察打人了！」我問彭榮發生了甚麼事。彭榮給我看了一塊大玻璃，上面有很大的一塊血污。然後他說：「這是血腥罪行的鐵證。怎麼辦？」我說：「集合所有的學生，出去遊行。」接着我計劃了主要的標語口號：「警察殘暴，毆打學生；全國罷課，如此等等。」⁹⁹

⁹⁹ 見《回顧與反思》（1993，52–53）。

讓我吃驚的是，這裏有關碎玻璃和卡車的敘述和官方的說法幾乎完全一樣。張在提供這項敘述的時候，他不過想說明北京大學的罷課是怎麼發起的，而不是提供有關「新華門事件」的證據；像這種無意識的回憶，其系統性偏見一般會更少一些，因此，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非常倚重這類敘述。我接着探訪了新華門區域，發覺附近幾乎沒有甚麼玻璃窗——我們不能假設警察會拿着玻璃打人，因為那是很荒唐的；我們也不能假設受傷的學生會四處收集碎玻璃並刮取身上的血迹來作為證據，因為這完全沒有必要，有關警察暴行的指控也不符合社會的背景。許多觀察人士都同意，中國政府在那個階段是很害怕惹惱學生的，因為他們仍然希望能找到一套平穩的解決運動的辦法；¹⁰⁰ 剩下的問題就是，中國大巴的側窗玻璃是不是安全玻璃：如果是，那麼玻璃被砸碎後就不會割傷學生。對此，我請教了一個中國汽車專家，他告訴我，在中國安全玻璃很貴，因此直到我諮詢他時，中國製造的用於國內的公交車的側窗玻璃還是普通玻璃而已。到了這一步，我才不失信心地總結如下：在那天晚上確實發生了警察和學生的衝突，警察也確實打了一些學生，但是，所謂的「新華門慘案」則很可能是沒有根據的謠言。我以上所描述的就是本書第六章中的一個小節的寫作過程。讀者可以看出，這種資料採集與寫作十分勞神，但它同時也帶來了很大的收穫。它不僅使我對自己所收集的實證證據很有信心，而且也就運動本身給了我許多意料之外的洞察。

¹⁰⁰ 對於政府在此階段所採取的寬容態度的考察，可見Feigon (1990, 139)。

上篇

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的緣起

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及 其在80年代的變遷

在本書的導論中，我們構建了一個理論框架，其中心思想為：國家·社會關係是導致大規模社會運動，或促使革命產生及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因素；要分析國家·社會關係對一個運動的影響，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包括國家的性質、社會的性質，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聯繫。我認為，中國在80年代特定的國家·社會關係導致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八九學運的產生，並推動了其後的發展。在運用上述理論框架對八九學運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瞭解一下八九學運之前的國家·社會關係史，以及80年代中國社會的概況。這是本章企欲達到的兩個目的。

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簡史

從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911年，中國大部分時間都處於一個大一統農業帝國的統治之下；二千多年間，中國無論在人口、政治、經濟，抑或社會結構方面，都經歷了巨大的變遷。不過，最為劇烈的變化卻發生在20世紀（1911-1978）。漫漫歷史長河裏種種巨大的變遷，任何簡單的概括都難免失諸偏頗。因此，我這裏的敘述只想抓住當中幾個最重要的特徵。

從公元7世紀開始，中華農業帝國就一直是以皇帝為首，並由一個複雜的官僚體系所治理。皇位根據血統傳承，官僚體系的官員則通過定期的科舉考試來選拔。¹ 皇帝作為「天子」擁有不可質疑的合法性，

¹ 在中國古代宮廷政治中，宦官有時也會起重要的作用。

這種合法性不僅賦予皇帝以超自然的、神聖的品格，亦使他負有兩項職責：為社會秩序提供基本保證，以及遵守繁瑣的禮節和習慣。關於第一項職責，中國經典文獻中有很多說法，如「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及「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²顯然可見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合法性帶有很強的績效色彩。如果皇帝未能供給民眾以預期的公共物品，他就失去了皇天的認可，民眾亦因而有權利反叛。

皇帝必須遵循的禮節和習慣隨着王朝的更迭而有一定程度的變化，不過，總體上它們都淵源於孔孟之道，並由一個國家官僚群體來闡釋——這個官僚群體的支持對皇權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對這些禮節和習慣的任何侵犯都會激起強烈的反應並引起嚴重的混亂」。³從這個意義來說，在華夏帝國，皇帝的權力非常有限，現代意義上的「極權」(totalistic) 政治不但在技術上無法操作，而且在規範上(禮節和習慣方面等) 也不可行。⁴

另一方面，科舉制也塑造了中國社會的許多性質。由於通過科舉步入仕途是最重要的進身之階，這就導致了地方教育的發展和士紳階層的崛起。但囿於財力的限制，國家只能吸收士紳階層中的一小部分進入官僚體系。⁵基於中國幅員和人口的考慮，國家所任用的官員人數顯然遠不足以對整個帝國實施有效的統治，所以，地方事務實際上是由地方士紳來維持的；國家也需要地方士紳的合作，才可以完成稅收，以及維持市井和鄉村的秩序。這種由士紳所領導、以村莊為基礎的權力網絡，構成了社會的主導結構。在這一結構中，村鎮範圍以外的橫向聯繫一般只限於各種秘密社團間的交往。⁶在社會動盪的時節，秘密社團因其規模及嚴密的組織網絡，往往成為叛亂的主要力量。

² 見Hsieh (1978, ch. 1).

³ Gernet (1987, xxii).

⁴ Gernet (1987); Hsieh (1978, ch. 1); Ray Huang (1981).

⁵ 清朝時，官僚系統的規模僅為四萬多人 (Skocpol 1978, 69).

⁶ Chesneaux (1972); Eastman (1988, ch. 1); Esherick (1987).

總而言之，在歷史上，中國擁有一個官僚—威權政體，國家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本建立在績效的基礎上，皇權則為一套複雜的禮節和習俗所節制，並由官員加以解釋，至於小農社會則受士紳階層垂直領導、由秘密社團橫向連結。在19世紀，這種以規範為核心的「生存導向型」(maintenance-oriented) 政府遭到「目標導向型」(goal-oriented) 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挑戰。⁷ 面對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開始着手各種改良措施。這些措施雖然帶來了許多變化，但始終未能造就一種能夠捍衛中國、免受西方列強欺凌的政體(見第二章)。這些不那麼激進的改良運動的失敗了，引發更激進、也更具顛覆性的改革和革命，最終促成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1949年共產黨執政之後，中國社會的國家、社會關係發生了歷史性巨變。現在，中國由一個「目標導向型」的列寧主義政黨所領導。在政權建立之初，由於人們信奉共產主義，再加上中國共產黨過去屢次戰勝國民黨政府，中共(尤其是毛澤東)享有高度的意識形態上的和個人魅力型(charismatic)的合法性。從5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實施了眾多社會改造工程，以期改變社會的性質，當中最重要的是農業集體化、工業國有化和實行計劃經濟。隨着50年代後這些社會改造的成功，以人民公社組織為核心的農村社會及以工作單位為核心的城市社會得以建立起來。

隨着人民公社和單位體制的相繼建立，國家的權力也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得以滲透到村莊和工廠的層次；同時，國家也開始運用自己的權力，根據烏托邦設想對社會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在這一背景下，毛澤東成為中國歷史上極少數既可免受禮節和習慣的限制，又能根據個人眼光和興趣去主宰整個官僚體系、乃至決定國家命運的一位「皇帝」。這個時期社會的橫向聯繫幾乎被完全斬斷，甚至連本來就薄弱的秘密社團，也在毛澤東的統治下遭掃地出門而銷聲匿迹了。可以說，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成了一個高度原子化的社會。

⁷ 本文關於「生存導向型」與「目標導向型」社會的概念來自Schwartz (1987, 3)。

這種經常被人們標籤為「極權」(totalitarian) 或者「全權」(totalistic) 的國家、社會關係，給中國的發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⁸ 由於沒有甚麼東西可以制衡政策失誤和個人權力，50年代中期以後的國家政策為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災難。1959-1961年餓死3000萬人的三年自然災害和1966-1976年持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兩個最廣為人知的例子。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的國民經濟陷於崩潰，⁹ 人民生活貧困，社會中怨聲載道。文化大革命所引發的危機，迫使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在1978年發動改革，並在改革初期取得成功，給中國人帶來了一定的政治自由和經濟寬裕，這是人們在毛澤東時代連做夢都不曾想到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也同樣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以下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後所發生的種種變化，為讀者勾勒出一個粗略的輪廓。至於對80年代的國家、社會關係及其對八九學運的影響，我們將在隨後的章節作出更為系統的討論和分析。

作為變化標誌的「社會熱點」

觀察改革時代的中國社會有多種可能的途徑，¹⁰ 但為了更好地理解八九學運的緣起以及八九期間的大眾參與，我選擇以政府主導型改革所帶來的社會變遷作為切入點。¹¹ 改革啟動之後，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階級成分取消了；經濟現代化成為國家首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標；開始引入市場經濟，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之類的新興部門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當然腐敗和其他反市場的力量也繁衍孳生起來；國家開始放寬對知識領域的控制，從而使西方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的市場得以迅猛地擴張；國家還放鬆了對公共領域和私人生活的控制，使

⁸ 關於「全權政體」的概念可見Tsou Tang (1991)。

⁹ Meisner (1986)。

¹⁰ Baum (1994) ; Nathan (1997) ; Shirk (1993) ; Kate Xiao Zhou (1996)。

¹¹ 關於中國的經濟改革，見Byrd (1992) ; Byrd and Lin (1990) ; Fewsmith (1994) ; White (1993) 及 Harding (1987) ; 關於改革時期的其他方面，見Barnett and Clough (1986) ; Baum (1994) ; Davis and Vogel (1990) ; Lull (1991) 及Schell (1988)。

宗教和一些古老的傳統在中國大地上再度興起；對普通民眾來說，他們的生活標準也自1978年起開始上揚——1978年，機械手表還算是奢侈品，到了1989年，彩電、冰箱之類的耐用消費品，在中國農村和城市家庭中已經很常見了……類似的變化不勝枚舉。

無疑，經濟改革使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的規模和影響在80年代一浪又一浪的「社會熱點」(social fevers)¹²中可以看出。¹³表1.1列出發生在這十年中的主要社會熱點，¹⁴並簡要解釋了不同熱點的含義(內容不言自明者除外)。需要說明的是，這個列表並不完全，例如，表中沒有列出與八九學運具有更直接聯繫的一些例子，比如「講座熱」、「紀實小說熱」等等(對這些熱點，我將在下一章單獨討論)，但表1.1仍能清楚地顯示80年代社會變遷的規模。我想強調的是，頻頻變動的社會熱點，給大部分人的生活帶來了不確定性：文化方面的各種熱點帶來了離經叛道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社會經濟方面的諸多熱點則使許多人身不由己地被捲入改革浪潮，又往往使曾經的既得利益者喪失了許多利益。因此，儘管社會熱點是在求變的動力下形成的，但它們也給置身其中和其外的人們帶來了巨大的不安。

表1.1所列出的社會熱點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社會·經濟熱、上層文化熱和流行文化熱。¹⁵社會·經濟熱可以看作是人們對突如其來的、由國家改革政策所帶來的新的經濟和政治自由的反應。上層文化

¹² 中文的「熱」，可用英文表達為hot, warm, fever, fad，甚至wave, tide等等。在80年代的背景下，我把「熱」譯為fever，用以形容一個龐大的人群對同一問題的興趣突然增加，比方說，「出國熱」的意思即指許多人突然對出國興趣大增。

¹³ 頻繁出現的社會熱點，是一個以前孤立、封閉的國家突然暴露在大量新的信息和社會潮流時的必然反應。在一個封閉社會中，人們機會不多，觀念狹隘，又具有很強的同質性。在這種環境下，新機會或者新觀念很容易使人們興奮起來；一個封閉的社會剛剛開放時，所有的事物都是新的，信息和機會於是迅速湧入。由是觀之，社會熱點本身就體現了社會變遷的規模和範圍。

¹⁴ 表1.1中的資料主要來自蕭勤福(1989)、王金堂(1990)及楊雄(1991)，還有部分來自我的採訪。

¹⁵ 見Wang Jing (1996) 關於80年代上層文化熱的討論。

表1.1 80年代發生在中國城市中的主要熱點

類型	案例	解釋
社會、經濟熱	學習熱和文憑熱	改革早期強調知識分子在經濟改革中的作用，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從而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從政熱	80年代早期，國家大量選拔大學畢業生充任國家幹部；80年代中期，幹部飽和，熱潮消退。
	經商熱	市場導向的改革創造了大量商機，並在1988年達到頂峰；當時，部分知識分子和學生下了海，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卻對此仍然懷着觥觸的情緒。
	出國熱	學生和城市中的一些青年工人盡可能地爭取出國學習或工作的機會，以改善生計並逃避中國的現實，這在80年代晚期達到高潮。當時，改革深陷危機，越來越多的學生也開始熟悉申請國外大學的程序。
	經濟特區熱	人們大量湧入經濟特區尋找更多更好的機會。最為著名的當屬80年代晚期的「海南熱」。當時，成千上萬的人湧入這個新成立的省份和經濟特區，以尋找改善生活的機會。
上層文化熱	西方文化熱： 薩特 (Sartre) 熱、 尼采 (Nietzsche) 熱 和弗洛伊德 (Freud) 熱	構成一個熱點序列，影響了那些在馬克思主義沒落後尋找人生和社會意義的知識分子和學生。
	西方宗教熱	發生在城市，主要是基督教熱。人們在尋找可以替代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當然，許多人當時還只是出於對西方文化的好奇。

表1.1 (續)

類型	案例	解釋
	文化批評熱： 文化熱、《河殤》 熱、球籍 (world citizen) 大討論熱	發生在80年代中期，並在1988年隨電視系列政論片《河殤》的播出和中國公民球籍問題大討論而達到頂峰。其核心看法是：中國文化應當對毛澤東時代的失敗和悲劇負責。
	尋根熱： 尋根文學熱、新 儒家熱、易經熱 和氣功熱	大部分是非政治性的，標誌着中國文化在毛澤東死後的復興。由執着於傳統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領導。
流行文化熱	港台流行歌曲熱	80年代早期，港台流行歌曲湧入大陸。中國政府曾試圖阻止，最後還是默許了。
	牛仔褲熱、名牌 服裝熱、化妝熱	西方和香港風格的服裝以及審美觀念廣泛流行於城市內。
	西方食品 and 節日熱	80年代中期以後，西方食品和諸如聖誕節之類的西方節日非常流行，在學生當中尤甚。
	流行歌星、 影星熱	從80年代晚期開始，追星族的行為與西方的追星行為越來越相似。
	麻將熱	我在這裏僅以麻將熱代表一些傳統娛樂活動、儀式和迷信的復興。

熱和流行文化熱則可以視為西方各種信息的湧入和對中國種種傳統的再發現的結果。上層文化熱可再細分為三種類型：西方文化熱、(中國)文化批評熱和傳統中國文化(尋根)熱。前兩種類型看起來恰似一枚硬幣的兩面：文化批評熱的中心是把中國文化看成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障礙，而西方文化熱則力主從西方文化中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良藥。

然而，如果我們進一步透視上述種種社會熱點，就不難發現，國家、社會關係在這一時期也經歷了相當大的變化。事實上，在這個時

期，不論國家、經濟，還是社會均在經歷重大轉變：國家正逐漸從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極權政體轉變為以績效為基礎的威權政體；¹⁶ 經濟生活正逐漸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社會則總體上處於復興狀態，雖然橫向組織仍然十分薄弱，但正從昔日以集體主義理想為基礎的社會，逐漸轉變為一個更為多元化的社會(如表1.2所示)。以下我將沿着這三個維度來探討這一時期的主要變化及其對城市人口的影響。

表1.2 80年代中國的三大主要變化

國家：	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極權政體	→	以績效為基礎的威權政體
經濟：	計劃經濟	→	市場經濟
社會：	高壓性的大一統社會	→	逐漸多元化但仍欠組織性的表達

正在退卻的國家

在建國後一系列國家政策失敗的巨大壓力下，中共政府於1978年踏上了改革之路。雖然這場改革在政治層面上始終局限於決策的科學化以及有控制的政治參與，但改革後的國家性質依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80年代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目標是黨政分離。改革前，一個單位的黨的書記通常也就是這個單位的行政負責人；即使行政負責人的職位由專業人員擔任，該單位的決策權實際上仍然掌握在黨書記手中。改革後，許多單位都引入了形形色色的責任制：大學開始給校長放權，研究機構開始給專業領導放權，報紙、雜誌和出版社開始給編輯放權，國營企業開始給廠長放權。有了這些責任制，黨組織便不能像以前那樣直接干涉管理部門的決策。農村的情況與之相類似。譬如，在建立家庭責任制的過程中，人民公社被逐漸削弱並進而解散，傳統

¹⁶ 這裏所謂的極權政體，指的是毛澤東時代國家的極權意圖，而不是當時的現實。關於當時的現實情況，見Walder (1986) 及 Friedman, Pickowicz, and Selden (1991)。Zhao Dingxin (1994) 對改革開放後中國國家政體的性質也曾有詳盡的討論。

的鄉重新成為鄉村政府的基本單位。在此過程中，黨的絕對權力被削弱了。

政治改革的另一組成部分是擇優選拔官員和取消領導幹部終身制。在新的政策下，年邁的或教育程度較低的官員往往喪失晉升的機會，甚至被要求離任，取而代之的則是一些受過更好教育的人。

儘管中國國家的性質處於迅速蛻變之中，然而，這並不簡單地意味着國家權力的衰落。許多政治改革措施至少從初衷上說是要增強國家對社會的滲透能力；¹⁷ 而且，由於當時大部分國家高層領導人早在革命勝利前就加入了共產黨，對共產黨政權也保持着強烈的忠誠(第七章)，因此，國家政權仍然保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相當強的鎮壓能力。但是，在新的開放政策之下，國家再也沒有能力像以前那樣統治人民了。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改革開放以後，對那些敢於挑戰國家合法性的人的懲罰，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溫和了。改革之初魏京生因挑戰國家權威而獲刑15年，而到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這樣做時，他們失去的僅僅是黨員身份，而依然享有基本的自由，可以搞研究，可以出書，可以公開演講，甚至可以出國。即使是1989年6月4日的鎮壓，與其說是毛澤東時代「強硬政策」的回歸，不如說是出於當權者的無奈，以及對運動進一步發展下去的恐慌。一旦政權從八九學運危機中恢復過來，政治氣氛就再次變得寬鬆起來。要言之，隨着改革的推進，中國的國家正逐漸從一個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極權政體，轉變為一個以績效為基礎的威權政體。

走向市場經濟

經濟改革是中國80年代改革的核心。儘管經濟改革的方向最初不甚清晰，但隨後則變得越來越確定，即改革的基本走勢是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經濟改革給社會結構帶來了相當大的變化，譬如，人們的空間流動能力增強，鄉鎮集體企業迅速崛起，私營企業主和商人階層嶄露頭角。這些變化加快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和帶來了人民生活水

¹⁷ 見Shue (1988)。

平的普遍提高。但與此同時，這也導致了中國人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衡。¹⁸

經濟改革擴大了收入差距，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期望。¹⁹ 改革前，城市的高收入階層與低收入階層之間的工資差距一般不過兩至三倍，最大也不會超過十倍。可是，到80年代末，一些著名歌星唱一首歌即可收入數千元，這相當於一個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一個私營企業老闆一天的收入就相當於一位教授一個月的工資；²⁰ 最高收入階層和最低收入階層之間的差距已達數百倍之多。於是，許多高收入者開始購買進口名牌服裝、汽車和西式洋房之類的豪華物品。雖然富豪只佔整個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其影響卻不可低估，對遠未習慣收入不平等的老百姓來說，他們已然構成一個參照群體。

經濟改革還給城市居民帶來巨大的不安全感。人們越來越明顯地感到，再也不可能不管活兒幹得怎麼樣就穩端「鐵飯碗」，穩拿「鐵工資」；²¹ 即使是國營工廠，如果賺不到錢，也不得不宣布破產。退休的人因通貨膨脹而對未來憂心忡忡，²² 先富起來的人群則整天擔心政策會發生不利的變化。事實上，由於經濟的快速增長和政策的不斷變化，所有人都感到前途未卜。

¹⁸ 「失衡」是中國學者在分析社會問題時最常掛在嘴邊的兩個詞之一；另一個詞是「失範」，可以看作是對塗爾幹 (anomie) 一詞的中文翻譯。我在1993年回國時，發現這個詞差不多成了中國人用來形容人們在經濟改革中的焦慮和躁動的標準用語。

¹⁹ 論者不應過高地估計中國在80年代時貧富收入的絕對差距。1988年，中國城市的基尼系數 (Gini index) 為0.18，鄉村為0.30。即使是鄉村地區的收入差距也比1976年的韓國 (基尼系數為0.36) 低得多，比拉丁美洲則更低；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國家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5 (周小川、楊之剛 1992, 69-74)。關於改革時期收入分配的其他討論，見Walder (1990) 及 Zhu Ling (1991)。

²⁰ 根據中國政府的分類法，從事私有經濟的人，依靠自己的勞動或雇工不超過八人者算是個體勞動者；雇工超過八人則算私營企業主。

²¹ 「鐵飯碗」、「鐵工資」是毛澤東時代的比喻，用來比喻高度穩定的國家部門和國營企業的工作和工資體制。

²² 1988年，在安徽省，甚至享受特殊待遇的退伍老幹部也去申請遊行，以抗議他們日益下降的生活水平 (武仁 1991a, 15)。

市場經濟鼓勵競爭、營利、冒險和個人奮鬥，這些都和改革前政府所提倡的集體主義的、合作的倫理相衝突。²³ 市場經濟需要法律，但大部分中國人還不習慣遵守那些與傳統相左的法律。²⁴ 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也對中國知識群體自命為社會精英的優越感造成極大的衝擊，這種衝擊構成了知識分子和學生不滿的一個重要根源(第三章)。

市場經濟的不成熟還給社會帶來了其他負面效應，舉例說，計劃與市場同時並存，給官員的大規模腐敗開了方便之門。由於沒有堅實的法律制度，商業領域處於一片法律空白。在農村，人民公社的解體，使以前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大量釋放出來，其中的大部分湧入城市尋找機會，大大增加了城市裏的競爭和犯罪率。²⁵

經濟改革對城市人口的影響，因其部門和地位的不同而程度各異。不過，大量正式和非正式訪談給我的印象是，事實上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均有所提高。然而，至少在80年代，幾乎所有國民，包括學生、知識分子，乃至成功的私企老闆，都多多少少對改革懷有怨氣，當中某些人甚至開始懷念起毛澤東時代，說那個時代比現在更好。事實上，大部分中國人並非真正想回到毛澤東時代，他們只是還沒有完全適應新的變化而已，所以嫉妒那些在改革中比自己獲利更多的人；他們不清楚中國將向何處去，轉而把怨怒灑向這個飛速變化的時代。

²³ 比如，在80年代早期，經商在北方和內陸許多地方被認為不光彩的職業(王小強、白南風1986)，這些地方的大部分商業活動都是由浙江溫州人進行的。直到80年代中後期，溫州人還因其職業「下賤」而被當地人瞧不起。

²⁴ 中國人遵循的許多傳統是在共產黨上台後才形成的。比如說，中共在80年代取消了直接稅，所以到改革開始時，人們已經沒有交納直接稅的習慣，使國家稅收成為私營企業和個體勞動者的主要抱怨對象之一，人們有理由把這些抱怨歸因於稅吏的腐敗。事實上，政府的稅率並不高。對私人企業的銷售稅僅為5%，收入稅僅為2%(Ma 1987)，再加上大規模的逃稅現象，實際交付的稅額就更低了。不過大部分中國人並不認為逃稅是犯罪(和平 1993)，這一習慣導致了嚴重的抗稅現象，在鄉村地區尤甚。據報道，1987年共發生了2,493起規模不等的抗稅案件，有1,830名稅務人員遭到毆打，其中263人重傷，7人死亡。1988年發生的抗稅案更多(陳居奇、楊水校1989)。

²⁵ 武仁(1990a)。

社會的復興

在毛澤東時代，國家幾乎完全主宰社會，個人的欲望不斷受到壓制和打擊。改革開放以後，隨着經濟發展和政治環境逐步寬鬆，社會力量開始復興。復興的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就是改革後一次強大的「西化」浪潮。在這潮流的影響下，人們把中國傳統文化看作萬惡之源，認為它應對毛澤東時代的極權統治和惡劣的經濟狀況負責。在這種氛圍下，《醜陋的中國人》由於深入揭露中國人人性中的弱點而成為暢銷書；²⁶ 系列電視政論片《河殤》也因為着力批判華夏傳統而廣受歡迎（第二章）。然而，更為顯著的變化體現在流行文化的西化上，這方面的變化表明國家對個人欲望的壓制已經有所鬆弛。現在，流行歌曲和搖滾樂取代了革命歌曲；狂放的「蹦的」（disco dancing，又名「的士高」舞蹈）取代了呆板的革命舞蹈；香港或美國的流行歌手迅速在大陸走紅；以前衣著單調的中國人（「藍螞蟻」們）也開始仿效其他國家的百姓的打扮；個人主義亦隨着西化潮流洶湧而來。人們的態度和觀點迅速地發生變化，甚至認為只差兩三年就會產生「代溝」。雷鋒精神受到公開質疑。²⁷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獨立思考，公然把個人實現作為他們奮鬥的終極目標。²⁸

可是，80年代發生的轉變並不能簡單地歸納為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的興起。在80年代，雖然國家在退卻，但它仍有能力封殺社會，

²⁶ 作者柏楊是60年代台灣最為著名的中國文化批判者之一。

²⁷ 雷鋒是60年代在中國樹立起來的一個模範士兵，他曾是60年代和70年代初中國年輕人爭相學習的榜樣之一。雷鋒精神的核心是「做黨和國家永不生鏽的螺絲釘」。然而，80年代後期的一項調查表明，甚至在通常被認為是中國年輕人中最為順服的士兵群體中，也只有8%的人視雷鋒為榜樣，且大部分人都認為雷鋒是個「傻冒兒」（王貴勝 1989）。亦可參見楊東平、陳子明（1984）對60年代中國年輕人的探討。

²⁸ 舉例說，1988年，九個省的2,552名年青人被問及「甚麼使您感到最幸福」（陸建華 1991）時，在所提供的幾個選項中，被選得最少的是入黨和入團；而在15年前，這是大部分人所夢寐以求的。而與此相反，被選得最多的則是「家庭美滿」、「自由自在」、「事業成功」和「發家致富」等選項。

尤其是封殺那些試圖挑戰國家權威的行為。有研究顯示，²⁹ 儘管社會本身和人們的利益越來越趨向多元化，但政府仍能牢牢控制正在湧現的各種民間組織。民間組織與國家的關係更類似傳統社會中地方士紳與皇帝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獨立於國家而存在的市民社會。八九學運興起前，在國家之外獨立發展的社會中層組織尚處於初級階段，但國家的控制網絡卻仍然相當嚴密。因此，儘管人們的利益日益多樣化，但社會的組織化程度仍然很差。³⁰

這場轉變也不完全是西化。與西化同時而來的還有中國古老傳統的強勁回潮，人們對儒家和新儒家的興趣開始復興——「《易經》熱」、「氣功熱」和反傳統的「《河殤》熱」並存；許多傳統的節日得以恢復，再次以傳統的方式加以慶祝；宗教也在快速復興；³¹ 麻將、賭博、吸毒和賣淫死灰復燃；在農村，舊日以宗族為基礎的村莊之間的「世仇」重新浮出水面，多達數千人的械鬥時常發生，導致大量傷亡；³² 這一切均表明中國社會的發展具有複雜多樣、甚至相互衝突的趨勢。

這樣的轉變肯定不會平平順順，人們對改革的疑慮因此而蔓延開來。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集體主義的倫理正在瓦解，但人們還遠未適應在相互衝突的價值和信仰體系中生活。作為一個整體，中國無疑是在前進，但是，伴隨着這些發展，傳統與現代、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的緊張情況也處處可見；例如，當城市年輕人開始穿牛仔褲時，老年人就找出從「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到「不衛生」等種種理由來表示鄙夷。然而，僅僅幾年之後，牛仔褲就成了老少咸宜的休閒衣著；對的士高的態度也是如此，到了80年代後期，老年人不單最終接受了它，甚至喜歡上所謂的「老年的士高」。

²⁹ 見White (1993) 及王穎、折小葉、孫炳耀 (1993)。

³⁰ Zhou (1993)。

³¹ 關於中國80年代宗教復興的情況，可參見MacInnis (1989) 及薛文祥 (1989)。

³² 譚庚炳(1992) 記載了1989和1990年間52次此類事件。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江西省的一個縣。每次打鬥的人數從數百到數千人不等，有時候甚至動用了烏槍土炮，造成大量的傷亡。

在認知模式、思維方式、價值體系，以至經濟資源的再分配方式等各方面，80年代所發生的變化，無論速度還是規模都相當大。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都對改革產生了一種自發的觥觸和反抗，不管他是知識分子、學生、工人、農民還是官員，也不論他多麼認為自己是改革的忠實支持者。這不是說大部分人都想重返毛澤東時代，毋寧說，他們希望改革能給自己帶來更多的好處，因而對當時飛速變化的國家·社會關係所造成的某些後果普遍感到不舒服。因此，在這個時期，人們的怨氣不但越來越大，而且都衝着國家而來；原因在於，不同群體都認為種種變革對本身不利，而這些變革均是國家的改革政策所致，所以國家應為此承擔責任。

結 論

我在上文闡述了中國歷史上的國家·社會關係及其最近的發展，重點討論了1978年開始啟動的改革給中國國家·社會關係帶來的巨大變化。在改革過程中，中國的國家開始從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極權政體，轉向以績效為基礎的威權政體——中國的經濟開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社會雖然仍然缺乏獨立於國家之外的中層組織，但也開始從高壓下的大一統向更為多元的方向轉變。如此這般勾畫了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之後，我將在後面的章節中分析八九學運的產生和發展。

可以說，這些變化的規模以及因此而給人們生活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對八九學運的產生是至關重要的；然而，僅僅在這個層次上解釋八九學運的成因就顯得太籠統了。其他城市人口，比如工人和一般官員，也因改革而有很多怨憤和強烈的不安定感，但他們沒有發起運動，他們對學生的大規模支持也只出現在5月中旬當學生已經在廣場上發起絕食之後(第六章)。因此，要理解這場學運本身，必須更深入考察經濟改革前後，國家·知識精英關係與國家·學生關係的性質。

在本書上篇的以後各章，我將闡明，毛澤東時代中國政府對待知識分子的方式，促使具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的、激進的知識精英群體的崛起，正是這些知識分子為八九學運提供了意識形態準備(第二

章)。中國政府在80年代採取以市場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的經濟改革策略，但同時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所謂馬克思主義信念的影響下，又非常強調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這套自相矛盾的國家政策導致當時大學過度擴招，使接受高等教育成為不良投資，從而為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準備了一支生力軍。年輕學子們一旦覺得受了委屈，就有可能隨時投身到社會運動去(第三章)。此外，共產黨在剛剛掌權之際所採用的、以相互監督為基礎的學生控制系統在80年代衰落下來。在毛澤東時代，由於國家享有高度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再加上相互監督對學生而言在經濟和政治方面都有好處，這一系統在當時顯得非常有效。到了80年代，中國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從意識形態轉向績效，社會晉升渠道也逐漸變得多元化，這一系統因此而失去其原有的效能。在毛澤東時代，學生擁擠的生活環境曾有利於國家對學生實施控制，但如今同樣的環境卻推動了「異端」觀念的傳播(第四章)。這樣一來，當中國在80年代後期深深地陷入經濟危機，而主要的「社會安全閥」(safety valves)也日漸式微之際，大規模的學生運動終於爆發了(第五章)。

知識精英與八九學運

異端的政治觀念和理想是現代革命和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核心，而離經叛道的觀念通常是由一些知識分子創造出來的，這些知識分子要麼不再認同現有的政治體制，要麼打算大規模改造這一體制。在一個社會中，一旦有相當數量的精英知識分子涉入反體制的話語 (discourse)，那麼大規模社會運動或革命就離我們不遠了。八九運動是圍繞經濟危機和民主政治改革等問題而形成的，這些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即表明了80年代知識分子話語在民眾當中擴張。普通學生為八九運動提供人力資源，而知識精英則為這場運動提供了意識形態。在這一章，我要討論的也正是這一過程。更具體地說，我將討論改革前和改革中的國家·社會關係關係是如何導致激進知識精英的崛起，以及後者又是怎樣推動八九學運的興起的。

在本書中，「知識精英」 (intellectual elites) 指的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意識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強烈地渴望通過自己的政治活動來改造國家。80年代後期，儘管城市中大部分自認為是知識分子的人事實上已經不再相信共產主義，並對體制有各種各樣的不滿，但其中仍然只有極少數人肯花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旨在推動政治變革的社會活動。¹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時中國的知識精英為數甚少，其核心也

¹ 從一般意義上說，「知識分子」指的是文化的創造者，比如教授、作家和研究人員。中國現代教育發軔之初，為了鼓勵學生進入現代學校，清政府同樣授予那些接受西方教育的人以士紳頭銜。當時，大學畢業生相當於於進士，高中畢業生相當於於舉人，初中畢業生相當於於秀才 (Bastid 1988, 37-40; Fairbank and Reischauer 1978, ch. 12)。因此，中學畢業生在中國也一度被看作是知識分子。

許不過幾百人。但是，由於他們在中國的社會溝通網絡中位居戰略要津，甚至佔據着各類機構的領導職務，又與國家高層領導人保持着密切聯繫，因此，這些知識精英對政治的影響力十分巨大。當然，他們也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² 那些在國家主要研究機構或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知識精英更傾向於從國家內部開始進行體制改造，而那些沒有政府職位的知識精英則要激進得多。不過，總的來說，不管是甚麼類型，知識精英們都具有一些共同屬性。本章將重點討論其中的幾個主要屬性以及這些屬性對80年代中國政治的影響。此外，由於本章主要探討的是「知識精英」的情況，所以在敘述中我將簡單地用「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一詞來指稱這一群體。在第三章中，我還會就中國的一般知識分子群體與八九學運的關係作專門的討論。

在80年代後期學生運動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知識分子所發揮的作用值得留意。³ 在這方面，目前所見的文獻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把全部過程表述為一個由知識分子不斷推動民主開放的過程，然而，儘管知識分子在80年代確實始終不遺餘力地推動民主，但八九學運的進程卻完全脫離他們的控制，而且運動的結果(軍事鎮壓)也是他們最不希望看到的；⁴ 因此，我們需要解釋，為甚麼知識分子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恰恰就發生了。第二類則把關注的焦點放在中國傳統文化上，有學者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的知識分子對民主政治抱有特定理解，正是這種特定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八九學運的發展方向；這種解釋多少闡明了為甚麼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動使八九學運日益激進，並朝着他們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發展，但是，它無法解釋為甚

文革後，由於於大部分城市青年已至少是中學畢業，中學畢業生便不再被認為是知識分子了。不過，大學生直到最近仍然被認為是知識分子。所以，這裏我將大學生視為廣泛意義上的知識分子。

² 見Ding Xueliang (1994) 對改革中不同類型知識分子的討論。

³ Black and Munro (1993) ; Ding Xueliang (1994) ; Goldman (1994) ; Perry (1991) .

⁴ 在第六章和第八章，我將表明，儘管當時許多知識分子試圖控制運動，使之向他們希望的方向發展，但都沒有奏效。這場運動最終陷於學生與國家之間的正面衝突。運動之後，大部分上層知識分子要麼流亡海外，要麼被迫保持沉默。中國的政治改革因此而推遲了。

麼中國知識分子在90年代會對大規模改造國家的激進主義失去興趣，特別是在此期間，中國文化尚未發生很大改變。因此，上述兩種分析雖然都各有其合理性，但作為對八九學運興起和發展的解釋，卻有很大的局限性。在本章，我將吸收上述兩種思路的合理之處，但把重點轉移到對毛澤東時代國家、社會關係的分析上。我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國家、知識分子關係，才是塑造80年代知識分子的品格及其政治活動模式的主要力量。

以下各節將會先簡單地考察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在共產黨上台之前的特性，然後探討共產主義，尤其是毛澤東的統治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這一部分意圖說明：由於知識分子深受毛澤東時代那種強大而又不受制約的國家權力所驚嚇，所以在改革開放後國家統治放鬆之際，他們既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卻又只會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分析問題；他們曾經親歷文革，因此而對民主有着很深的民粹主義理解；由於中共長期的信息壟斷，他們的知識面極為狹窄。以上這些特定問題都嚴重限制了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的思考，也大大阻礙了他們對中國問題的全面理解，而他們這些對民主和中國問題的有限理解卻成為中國80年代民主浪潮的思想基石，最終觸發了八九學運。在本章末部，我將討論知識分子在八九前夜的主要活動，以顯示這些活動是如何促成八九學運。

強國困境

要理解8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對他們的過去有基本的瞭解。但是，應該把這個過去追溯多遠呢？一些學者把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特性追溯到儒家或其他古老的文化傳統。⁵ 遙遠的過去當然不會沒有作用，但我相信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主要特徵是由近百年來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所塑造的，這一節簡單地勾勒了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幾個主要特徵。在此之前，需要說明的是，以下描述旨在抓住知識

⁵ 例如Chang Hao (1987); Schwartz (1964); Tillman (1990) 及Wasserstrom and Perry (1992).

分子的主流傾向，並不意味所有知識分子都以類似的方式思考和行動。

從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間的廿多年，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形成的關鍵時期。⁶ 19世紀中葉，中國知識分子曾認為西方技術是治療中國積貧積弱的萬能靈藥。然而，1894年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單靠西方技術不能革新自強。同樣重要的是，這次戰敗改變了東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此後，中國成為日本這個新興強國對外擴張的直接目標，因此，擺在中國知識分子面前的迫切問題，已不再是「何以圖強」，而是「何以圖存」。⁷ 這樣，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以拯救中國，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最強烈的願望。

為了實現救國的願望，成千上萬的學生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葉留學西方和日本，他們在國外不僅學習科學技術，而且汲取政治思想。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嚴復翻譯了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的《進化論與倫理學》 (*Evolution and Ethics*)，漢譯本名為《天演論》，將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 傳入中國；⁸ 甚至連梁啟超這樣具有強烈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也宣稱，政府即使剝奪人民的部分甚至全部自由，但只要能成功地擔負起國家防禦的責任，就仍然是一個好政府。⁹ 在這段時間，知識分子從西方引入了各種社會學說，其目的只有一個——拯救中國，使之免受帝國主義的欺凌。

晚清知識分子還一再敦促清廷進行變革。但直到20世紀早期，由於社會、政治問題積重難返，保守的改革舉措對於解決問題更相去漸遠。¹⁰ 百日維新失敗之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開始傾向革命。¹¹

⁶ 關於這一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參見Chang Hao (1971); Philip C. Huang (1972); 余英時 (1992); Schwartz (1964); Pusey (1983) 及Meisner (1967)。

⁷ Pusey (1983, 7)。

⁸ 與其說是翻譯，倒不如說是重寫；嚴復的評註佔了該書一半的篇幅。他翻譯此書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國有一個強大的國家，以抵抗西方列強、挽救中國。

⁹ 見Nathan (1986, 62)。

¹⁰ Fairbank and Reischauer (1978); Skocpol (1979); Spence (1990)。

¹¹ 林家有 (1990)。

然而，1911年的國民革命並未解決清王朝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中國依然積貧積弱，列強一直對之虎視眈眈。因此，1919年，當有消息傳來，列強在《凡爾賽和約》中要將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而不是歸還給中國時，中國知識分子毅然發動了五四運動。五四這一代人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旗幟，因為他們相信民主和科學才是強國之本。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在30年代初日本侵華之後，越來越多的年輕知識分子開始相信和選擇共產主義，並將共產主義視為強國的唯一途徑。¹² 由是觀之，在共產黨執政之前，「建立一個強大國家以救中國」的夢想，一直塑造着中國知識分子的行為。

共產黨執政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所期待的「強大國家」終於變成現實，當中大多數人，甚至一些自由主義傾向頗強的學者，也轉投於正在興起的共產主義中國門下。然而，此後幾十年的歷史表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這一強大國家非但未能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他們夢寐以求的現代化，反而大舉動用現代國家資源，去懲罰那些稍具獨立傾向的知識分子，在文革的混亂統治中，鎮壓知識分子的行動更達到頂峰。混亂的共產黨統治，使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在文革後重新認識民主的重要性。在五四運動差不多60年後，中國知識分子重新舉起五四時他們曾經高舉的「德先生」大旗；他們舉起這面大旗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限制國家的權力。不過，在經歷三十餘年的共產黨統治之後，知識分子也被賦予了一些新的特性，對他們在80年代的政治行為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活在毛澤東時代的陰影下

當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歡呼的群眾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的激動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捍衛民族不受外侮的強國之夢終於實現了。新中國的成立，教許多留學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在50年代初期懷着滿腔熱情返回祖國，雖然對有些人

¹² 例如，Check (1997) 描述了鄧拓是如何在那個時候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

來說他們回國之前首先要承受麥卡錫主義 (McCarthyism) 的迫害。¹³ 國內一些已經成名的學者，例如金岳霖、馮友蘭、朱光潛等，都付出了真誠的努力，把自己轉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¹⁴ 對年輕一代人而言，他們對共產主義的接受更是無條件的。80年代持不同政見者的領袖人物方勵之就回憶說：

在剛解放以及隨後的50年代中，我曾堅定地信仰共產主義。在我1955年入黨的時候，我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指路明燈，相信共產黨絕對地好。

1958年我在反右運動中被下放了。當時我做了真誠的自我批評。我確信是我冤枉了黨。¹⁵

可以說，方勵之的敘述確實表達了他們那一代大部分知識分子的感情。¹⁶ 直到70年代早期，社會危機日漸深重，黨內政治鬥爭日漸激烈時，知識分子才開始覺醒。不過，在此時，共產黨二十多年的統治已經賦予知識分子一些新的特性——絕對國家權力的負面影響讓他們成了驚弓之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式的民粹主義的思維方式，已經深深地扎根於他們的腦海；最後，與外界的隔絕導致他們在信息上的匱乏和思維上的偏執。下面，我將考察知識分子的此類特性及其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行為的影響。

驚弓之鳥

1979年，《北京之春》刊發了一個未來主義味道甚濃的故事，題為〈2000年可能發生的悲劇〉，這個故事想像鄧小平1998年去世後，黨內

¹³ 中國遠程導彈之父錢學森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在他回國之前，美國政府將他監禁了好幾年。

¹⁴ 李澤厚 (1989, 151)。

¹⁵ Fang (1990, 208–209)。

¹⁶ 在中國人用英語寫的許多自傳中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說法 (如Chang Jung 1991 及 Liang 1984)。

隨即展開一系列權力鬥爭，鬥爭以強硬派得勝而告終；結果，鄧小平的追隨者被處死，左傾政策得以復辟，包括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凍結工資、擴充警察隊伍、強化意識形態的灌輸，以及重新割斷中國與西方的經濟和文化聯繫。¹⁷ 這個故事所描繪的悲劇場面事實上表達了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深切憂思，舉例說，巴金在《懺悔錄》一書中，不僅對自己曾經無條件服從國家利益，並轉而信奉共產主義這一歷史事實，表示深切的懺悔，而且非常擔心文革那種無法無天的局面會否在中國大地上重演。為了避免類似文革那樣的革命運動在中國再次發生，他提議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教子孫後代將文革作為一場民族悲劇而銘記於心；¹⁸ 巴金的觀點在80年代的知識分子中引起廣泛的共鳴和熱烈的討論。¹⁹ 事實上，自「傷痕文學熱」之後，在當時發表的大量文學作品中，觸目可見知識分子對自己當年緊跟政府走向左傾這一歷史事實所表達的痛悔之情。

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絕對國家權力所帶來的悲劇，中國知識分子在80年代對國家權力已變得極端反感，抱有一種深深的不信任。在這種形勢下，他們再次發現了民主。不過，在五四時，知識分子將民主視為強國的手段，而現在他們則把民主視為約束國家權力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80年代知識分子和學生的許多特性——包括他們對民主的功利主義式與理想主義式的理解，以及他們的激進心態——都可從他們在毛澤東時代的經歷中得到理解。當時知識分子所提出的各類改革建議，包括取消終身制、黨政分離、加強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等等，都旨在防止左傾悲劇在中國重演。80年代早期和中期有關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所體現的也是同樣的邏輯。甚至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也是圍繞這個核心問題展開的：在中國，到底是甚麼文化因素促成了毛澤東的極權統治？總之，當「國家」成為問題時，「民主」再次成為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¹⁷ 這個故事引自Nathan (1986, 87)。

¹⁸ 巴金(1986)。

¹⁹ 公劉(1986)和葉永烈(1988)。

由於對國家政權抱有深深的不信任，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大擔心就是左傾復辟。在整個80年代，國家政策的任何變動都極易被解釋為左傾回潮（這種理解在某些情況下並非毫無道理）；因此，任何類似國家政策的變化都會引起知識分子的廣泛關注，這種關注對當時國家政策的制定構成一個有力的約束。在這個意義上，當時中國的國家自主性其實是非常有限的，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極度不信任也極大地影響了八九學運的產生和發展。當中國經濟在1988年陷入危機時，政府開始調整政策。由於當時市場很不健全，國家也缺乏有力的經濟槓杆可資利用，因此經濟調整以行政手段為主；然而，這種以行政手段為主的經濟調整政策馬上被指斥為左傾回潮。一些知識分子更提出，惟有進一步改革才能解決改革中產生的問題。²⁰ 阻止左傾回潮的強烈衝動，促使知識分子在1988年前後創造了一個危機話語，而這個話語又大大地促進了八九學運的產生。

一群失去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共產黨執政30年之後，儘管許多知識分子已經不再信仰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傳統仍強有力地影響着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和行為方式。試舉數例：在整個80年代，知識分子都持有一個毛澤東式的觀念——除非群眾得到啟蒙，否則社會不會取得真正的進步；1988年出台的系列電視政論片《河殤》以及「球籍」（world citizen）問題大討論（後文對這兩項事件會有更深入的討論）就是這一觀念的絕佳體現。金觀濤是當時知識界的一個風雲人物，他曾經盛讚《河殤》，認為《河殤》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把一些艱澀的理論問題解釋給大眾，貢獻巨大。他稱讚《河殤》，並不僅因為《河殤》採用了許多他個人的觀點來解釋中國的過去，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先進思想只有為大眾所知，才「能夠產生改造社會的力量和動力」，他在文中熱情洋溢地

²⁰ 在陳一諮（1990）的書中，這種不信任者到處可見。

說：「中國人民對這些思想的需要，就像乾涸的黃土地需要甘霖那樣。」²¹

80年代的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仍然機械地相信馬克思主義關於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辯證關係原則，因此，他們堅信「民主是發展或現代化的大前提和必要條件」這一說法。²² 他們相信，民主如同自然科學規律一樣，是不受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限制的，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²³ 他們還相信，「沒有全方位的改革，經濟上的改革是不會成功的。因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緊密相關」。²⁴ 當中一些較溫和的人士也認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和四個現代化」。²⁵ 80年代後期，「沒有民主，經濟就無從發展」成為知識分子間普遍流行的觀念。在這種信念的推動下，知識分子都積極製造輿論以推進政治改革。

最後，當時知識分子儘管已經不怎麼相信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種種設想，但依然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綫性歷史觀和對社會進行大規模改造的憧憬。²⁶ 他們相信，「只要有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²⁷ 他們都擊節讚賞戈爾巴喬夫 (Mikhail Gorbachev) 的改革，因為戈爾巴喬夫在啟動前蘇聯的改革之前，曾經精心設計一幅改革的宏圖。他們把中國當時的經濟危機歸咎於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經濟改革思路，²⁸ 還抱怨中國改革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持，改革政策也前後不一。

²¹ Jin Guantao et al. (1992).

²² 見Wei (1980, 54)。他論證說：「我們偉大的祖國在過去30年的〔悲劇〕經歷，再好不過地證明瞭〔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辯證原則〕。」

²³ Fang (1990, 219).

²⁴ 前揭文，151。

²⁵ 李洪林 (1986)。

²⁶ 錢學森是「系統論」最著名的倡導者。甚至著名的報告文學家蘇曉康也宣稱：「『中國文化的重建』是一項極其艱難而複雜的文化、哲學系統工程」(蘇曉康 1990, 6)。

²⁷ Yan Jiaqi (1992)。

²⁸ 見陳一諮 (1990, 71) 對中國改革方式的批評。

一個受民粹主義影響的群體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對民主都抱着一種盧梭式 (Rousseauian) 的理解。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還沒有聽說過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甚至很難說讀過甚麼西方典籍，但他們無疑認識毛澤東關於「造反有理」的說法，也知道文化大革命和「四大」，如此，他們從毛澤東思想中獲得了對民主的盧梭式理解。²⁹

毛澤東對程序民主是非常蔑視的，他將此稱之為「小民主」；相應地，他倡導「大民主」。他的「大民主」的核心是「雙百」方針和「四大」。「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1956年，毛澤東聲稱這一方針乃是「通向藝術和科學的繁榮之路」；³⁰「四大」則指「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中，這「四大」曾經肆行無忌，最終還寫入憲法。不過，人們享有這些自由的實際權利從未得到確定和保證，基本的人權和適當的法律約束也從未得到認可。所以，在文革中，這些「自由」通常只是用來對他人進行無情指責和肆意誹謗的工具，同時也是國家頻繁動員人民以推進種種極左工程的一種手段。鄧小平當政以後，才把這「四大」從1979年憲法中刪去。

然而，大部分非程序民主的行動方式都是集體行為的理想手段，「四大」也不例外。雖然毛澤東思想現在不再流行了，但毛澤東時代風行一時的群眾動員方式仍然深深扎根於中國人的思維中。在80年代，中國人仍繼續用大字報和其他毛澤東時代盛行的動員方式來進行各種抗爭。儘管中國政府想盡辦法清除之，但最後都是徒勞。在第六、八及九章，我將進一步闡述毛澤東時代的動員方式如何對八九學運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²⁹ 可以參考李少軍 (1988) 對中國知識分子關於民主的民粹主義理解的分析。

³⁰ 1956年，毛澤東倡導「雙百」方針，邀請知識分子對政府多做批評，並保證說不會秋後算帳，於是知識分子群起響應。然而，這些知識分子的批評和建議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受到嚴厲鎮壓，當時有超過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前程毀於一旦。

一個信息匱乏的群體

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斷絕了同西方的大部分聯繫，並因此而中斷了19、20世紀之交開啟的啟蒙進程。當1978年改革啟動時，大部分知識分子對西方的社會現實以及西方的政治、社會理論的瞭解，可以說是少得不能再少了。他們即使對個別理論有所瞭解，也不過極其膚淺，其態度也往往具有很強的功利性。下面兩個例子可以說明毛澤東時代的體制所具有的「洗腦效應」。

案例1：對社會科學的影響。中國在20世紀30至40代出版的一些社科類學術作品的質量是很高的，即使用現在的標準來衡量也是如此。³¹然而，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確立統治地位以後，許多社會科學就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偽科學」而遭到嚴厲批判，即便是在經濟學和哲學這樣處境稍好的學科中，馬克思主義也成為不容質疑的聖經；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理論在課堂上通常只能以扭曲的方式加以講授，以供批判之用。因此，當1978年改革啟動時，政治學和法學的報考率從建國初期的6.3%下降到了0.2%，而財政學和經濟學的報考率則從16.7%下降到了2.1%。³²在改革之初，30年前教授社會學的專業人才大多已經去世，即使活着的也都在60歲到80歲左右。因此，大部分80年代教社會學的人根本就沒有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³³應當指出的是，我這兒雖然僅僅討論了當時社會學的狀況，但其他相關學科的處境也都相去不遠。³⁴

³¹ 見趙子祥(1986)及 Yan Ming (1989)。他們的文章就中國社會學在1949年之前的發展和1952年的取消，以及1978年的重建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³² Du (1992, 47); Kwong (1979, 74)。

³³ 費孝通等(1984)。

³⁴ Hayhoe (1989, 37) 發現，在文革期間，「政法類專業也從中國人民大學和四個地區性研究機構中取消了，這樣的情況持續了整整十年。經濟學和財政學的情況也壞到了極點。」

不妨拿一本社會學教材來說明情況糟糕到了甚麼程度，這本教材是由費孝通牽頭編寫的。³⁵ 費孝通本人是一位聲望卓著的社會學家，他的一些早期作品也可以歸入經典佳作之列。³⁶ 他牽頭編寫的這本教材與中國同一時期出版的其他社會科學的教材相比，其質量也不能完全說壞。我之所以選擇這本教材，是因為這本教材是1978年後編寫的第一本社會學教材，因此其質量能夠再好不過地彰顯毛澤東時代的遺產。為簡明起見，我就拿這本教材所引用的參考文獻的數量和類型來標示其質量。雖然教材的引證率並非其質量的絕對指標，但如果一本教材不能納入本學科的大部分最新成果，它的質量就一定不會很高。

這本教材共有129處引用了參考文獻。其中，有71處(佔55%)來自西方和日本作者，58處(45%)來自中國作者。但是，在那71處對非中國作者的引證中，有32處(45%)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另外39處對非馬克思傳統的引證都非常初級，其中大部分不是來自一些入門教科書的某個章節，就是來自某一百科全書的條目。綜觀全書，我沒有發現一篇來自西方刊物的專業學術論文。同樣地，在那58處出處為中國作者的引證中，有42處(72.4%)不是來自黨的領導人或在政府任職的學者，就是來自政府文件；真正的社會學文獻少之又少，而且大部分發表於1949年之前。為了對比，我這兒從我的書架上隨意抽取一本西方社會學的入門教材，發現裏面有790處引證，涉及的作者大約有630人。³⁷

案例2：對知識分子觀察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的影響。改革期間，中國知識分子有機會因各種學術交流活動而訪問西方。這些人回國後通常都要到大學就他們的訪問觀感作報告。一般而言，他們均會把西方描繪成一個完美社會，這種報告往往會大大加深年輕學生對中

³⁵ 我引用費孝通等(1984)編寫的教材做例子，是因為我相信教材的質量是反映學科狀況的良好指標。

³⁶ 比如他的*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江村經濟) (Fei 1939) 和*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Hennan* (鄉土中國) (Fei and Chang 1945)。

³⁷ Rosenberg et al. (1987)。

國現實的不滿。下面的例子取自方勵之對中國大學生發表的演講；以此為例的原因在於他在改革後曾作為中國知識界名人訪問了二十多個國家，又是80年代持不同政見者的領袖人物。³⁸

方勵之於1985年在浙江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向學生傳達了這樣的信息：同西方國家相比，中國是個絕對貧窮的國家：

日本的人均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國民生產總值)是11,000美元，美國是13,000美元……上海是2,300美元。因此，五個上海公民的平均生產率加起來才抵得上一個美國公民。而上海卻是中國生產力水平最高的地區，〔用物理學的術語來說〕這實在是個「特例」；更何況那些人均GNP在100美元之下的省份呢？在我們的30個省份中，這樣的省份有9個，將近佔了全國省份的三分之一。³⁹

毋庸置疑，與日本、美國相比，當時中國確實非常貧窮。但方勵之用美元來衡量中國的GNP，這無疑是誇大了差距。

方勵之對西方國家政策制定過程的描述，也顯得非常幼稚。在這次演講中，他說：「美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會向專家學者們諮詢；政府想知道他們的決策過程是否建立在一切可利用的信息基礎上。」這種說法無疑與事實有相當大的差距。⁴⁰不妨再來引證方勵之的另一個演講：

西方的年輕人和中國的年輕人是不同的。西方是自由社會，年輕人的機會很多，有很多人已經完成了自我訓練。因為機會多，人們的競爭性很強，所以他們只需要採取行動；沒有人會找不到機會。所以，那裏的學生首先鍛煉了自己的獨立性和創造能力：只要你有能力，你就能做任何事情。⁴¹

³⁸ 跟方勵之一樣，溫元凱在這一時期也頻繁地做訪問報告。

³⁹ Fang Lizhi (1990, 102).

⁴⁰ Kraus (1989) 曾出色地分析了方勵之對西方社會所做的這些描述。

⁴¹ Fang Lizhi (1990, 304).

方勵之向學生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美國社會公平，機會無限。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時方勵之對年輕學生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演講使他本人在80年代的學生中成了英雄。⁴²

一個機會主義的群體

改革期間，政治控制的突然放鬆使來自西方的信息得以大量湧入。由於缺乏學術權威和規範，機會主義行為在知識界佔據了主導地位。⁴³ 需要強調的是，這裏所探討的投機行為並不僅限於知識精英這個小群體，而是涉及知識活動的幾乎所有方面。一般來說，優秀的學術成果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健康的學術環境中，成功與所付出的精力大體上呈正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機會主義與學術是水火不容的，前者削弱了知識分子和學生的道德感，給知識界帶來巨大混亂。機會主義一旦佔據主導地位，就會在知識分子和學生中引起怨恨，即使他們自己也在從事這樣的行為。⁴⁴ 事實上，整個80年代，知識分子和學生都滿腹牢騷，他們指責別人靠欺騙取得成功，埋怨在這種環境下，他們本身的才能得不到施展。最後，所有怨氣都灑向國家，因為當時的遊戲規則主要是由國家來制定的。⁴⁵

⁴² 也許有人會認為，出於某種考慮，方勵之在他的演講中會故意使用過於簡化甚至歪曲的手段，使他的演講在廣大聽眾面前更有煽動力。這種說法在邏輯上可能存在，但如果我們仔細閱讀一下他的主要演講和作品，就不得不承認，他所持的論點並不能完全看作是一種政治策略，而是的確代表了一種思維方式。

⁴³ 博弈論 (game theory) 的研究表明，在頻繁變動的環境中，機會主義行為將佔據主導地位 (Axelrod 1984)。同樣，根據生態學原理，在多變的環境中以及在群落演替的早期階段，R-策略 (機會主義) 的物種將會在競爭中處於優勢。

⁴⁴ 當成功的機會有限時，即使所有人都投機，最後也只有極少數人能成功。而且，即使是那些成功者，他們處在一個投機環境裏也不會感到安全。此外，大部分靠投機成功的人並不認為自己曾經依靠投機獲取成功，他們因此也會痛斥機會主義。

⁴⁵ 葛承雍、任大援 (1992) 曾描述了阻礙歷史研究的主要問題：嘩眾取寵、華而不實、粗製濫造，以及各種形式的抄襲。這非常恰當地勾畫出了當時中國知識界的眾生相。

80年代中期以來流行的所謂「叢書熱」，是反映知識分子投機行為的一個絕佳範例。⁴⁶ 一位知情者(第1號受訪者)向我描述了這些書是怎樣編出來的：

所謂的「叢書」，就是選擇一系列相關的主題。這些主題應該吸引人而且看起來時髦：比如愛情藝術、生活秘密、如何減少痛苦等等。然後，你得去找一個出版商；當出版方面沒問題時，你就可以找人寫了……其實所謂寫作就是從別的書上抄錄一些內容，比如從圖書館找幾本書抄抄。有的人甚至嫌麻煩不願意用手抄寫，他們只是剪刀加漿糊，把內容裁下來，然後再拼接；弄完後，就可以送到出版商那邊了。

一套成功的叢書能夠賺得豐厚的利潤。這位知情者告訴我說，如果作者能從出版商那裏買下書號，自己操刀完成從印刷到發行的所有工序，光是一本書就能賺上十多萬人民幣。

當時，在個人進身渠道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的投機行為，甚至國家也公開鼓勵人們不必通過正常的進身渠道來出人頭地。在80年代，有兩個詞經常出現在中國的報紙上——「自學成才」和「伯樂相馬」⁴⁷——它們通常出現在新聞故事中，用於描述一個沒有受過正規高等教育的人，因為發明了某種東西或建立了某種新理論，而獲擢升到重要的學術位置；或一個有魄力的官員親自選拔一位有才幹的年輕人擔當要職；在新聞裏，這些伯樂通常都會被高度讚揚，而那些反對這種做法的人則會受到嘲諷。確實，這種做法很有可能選拔出一些青年才俊，而這些人以前確實是不幸為主流精英篩選渠道所遺漏；但是，如果將這種做法作為普遍規則在媒體中大肆宣揚，無疑會大大地鼓吹投機行為，並使那些仍在奮力向上攀爬的知識分子和學生氣為之沮。

⁴⁶ 方鳴、陳沙、余亦赤(1988)。

⁴⁷ 伯樂是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22-481年)的一個人物，他因長於相馬而著稱於世。後來，「伯樂相馬」成為一則成語，意指那些知人善任的官員。

知識分子與國家改革政策

為了提高決策的質量，中國政府在1978年後建立了幾個主要的顧問機構，嘗試使決策更為科學化。但由於學術質量差強人意，加上學術研究中投機頗為盛行，從而影響了國家決策的質量，甚至加劇了政治動盪。1988年，中國經濟陷入危機，政府決定發起激進的價格改革，也就是所謂的「闖價格關」。⁴⁸ 可惜，這項政策還未實施，就由於消息走露而導致搶購風潮和價格暴漲。最終，雖然改革從未正式施行，但已經備感不滿的城鎮居民更加感到委屈和不安。對於這次闖價格關，迄今為止的大部分文獻都歸咎於鄧小平。⁴⁹ 確實，鄧小平非常支持價格改革，然而，「改革中的問題只能用改革來解決」這一觀念，卻肯定不是出自鄧小平，而是出自知識分子的普遍信念，包括闖價格關在內的改革措施都是這一信念的一部分，這一點可以從《中國改革：挑戰與選擇》這一書中所表達的一些觀點中得以看出。⁵⁰ 我之所以選擇這本書，是因為這本書基本上彙集了當時中國政府的一個主要智囊機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推薦給政府的一些主要政策；並且，這本書所表達的觀念也盛行於80年代後期的知識分子中。

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過去的改革政策取得了全面成功，大部分人不是從中受益，就是即使不惜犧牲生活水平也會支持改革（第二部分）；儘管改革出現了許多問題，但這些問題並不是由於人們對改革的承受能力有限，而是由於原有的經濟體制結構仍然沒有得到調整（第三部分）；因此，目前解決經濟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加快改革（第四部分）。簡而言之，這本書認為改革具有極高的公眾支持率，並認為公眾願意承擔包括通貨膨脹、失業以及破產等種種改革可能帶來的後果。

⁴⁸ 「關」用英語表達就是pass或者gate。在這裏，「價格改革」被形容為一支軍隊正在試圖奪取戰略險隘。「闖價格關」意味着一舉實現價格調整，為此甚至甘冒風險，這正是中國式的休克療法。該比喻在1989年之前的報紙上經常出現。

⁴⁹ 陳一諮（1990, 125）。

⁵⁰ Reynolds (1987) 已經將這本書譯成英文，書名為 *Reform in China: Challenges and Choices*。

然而，這一觀點顯然有失偏激。事實上，早在1988年，公眾對通貨膨脹和腐敗等問題的怨氣已經在不斷蔓延。在八九學運期間，許多工人甚至高舉毛澤東的畫像，表示他們對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穩定」生活的懷念。公眾的反應與這本書所指出的方向恰恰相反。對此，不妨舉一個例子，說明究竟是甚麼地方出了問題。

這本書預測公眾會強烈支持價格改革。這項預測主要是依據絕大多數受訪者對以下兩個問題的肯定性回答。其一是在價格改革之前問的問題：「你是如何看待價格改革的目地的？」其二是半年後價格改革已經開始時間的一個問題：「有人認為價格改革最終會促進國家繁榮，你同意嗎？」⁵¹ 然而，當同一批受訪者在價格改革前，被問及價格是應當「由國家來控制」、「由市場來調節」還是「由二者共同作用」時，有61.8%的人選擇了應當「由國家來控制」，選擇「由市場來調節」的僅佔5.9%。⁵² 這一結果明確顯示，受訪者並不懂得價格改革的真正內涵。僅僅半年之後，當價格改革已經開始實施時，同一批受訪者再次被問及相同的問題。這一次，認為價格應當由國家來控制的人的比例降到了34.7%。在我看來，第一次回答和第二次回答之間的差別，明顯是由於受訪者對價格改革的含義起初談不上甚麼理解；他們是在接受國家對該問題的大力宣傳之後，才在認識上取得了某種程度的共識。⁵³ 然而，對於這樣的調查結果，《中國改革：挑戰與選擇》一書的結論卻是：「在對市場經濟有了短暫的接觸之後……許多人擺脫了傳統觀念的

⁵¹ 見Yang, Yang and Xuan (1987, 63)。兩年後，本文的第一作者就同一問題又寫了一篇文章 (Yang Guansan 1989)。這篇文章的英文版發表在《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上。面對當時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狀況，這篇文章的觀察和評估顯得現實了一點。但作者關於人們對進一步改革的心理承受力的估計，在總體上仍持樂觀態度。在他看來，儘管存在着種種問題，但人們對改革的熱情仍然高漲，並且對改革的理解也更加深刻、更加具體了。作者最後的結論認為：「只要人們在主觀上對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市場供給的形勢仍然具有信心，那麼價格上漲並不會引起社會不安。」(頁38)。

⁵² Reynolds (1987, 70)。

⁵³ 在那段時間，中國的報紙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以強調價格改革的重要性。顯然，這些宣傳影響了人們的看法。

束縛，並已接受了價格在社會主義國家也是可變的這一觀念。」⁵⁴正是以這些正面的評估為基礎，政府作出了「闖價格關」的決策。其結果是物價飛漲，民怨沸騰，從而為八九學運的發起奠下了群眾基礎。⁵⁵

知識分子與八九學運

毛澤東時代的極權統治在80年代知識分子的記憶裏揮之不去，並由此造成知識分子對國家權力的極端恐懼。他們也因此而一再敦促中國政府進一步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開放。不過，無論這些知識分子多麼激進，在80年代早期，大多數知識分子仍然表現出一種充當「忠誠反對派」的強烈願望，他們旨在改良而非徹底打破現有體制。不過，無論他們的意圖如何，知識分子的活動和要求卻往往在事實上對體制的合法性提出了顛覆性的挑戰。這些挑戰導致國家與知識分子之間發生了幾次重大的衝突，比如1979年的西單民主牆事件、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和1987年初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⁵⁶每次運動，一方面使一些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成為眾人心目中的英雄，另一方面使其他知識分子感到沮喪。這造成了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中國越來越開放，同時，國家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卻在不斷惡化。因此，一旦經濟改革陷入危機，知識分子對危機的診斷不是改革過快，而是改革不夠深，並且認為中國政府對此所做的一些調整政策是保守思潮的回歸。於是，他們立刻發起了一場危機話語，這場話語也立刻在大學中傳播開來，1986年之後引發了頻繁的學生運動，到了1989年更達到頂峰。在這一節，我將從一個批判性的視角來觀察中國知識分子在80年代後期的主要活動，以及這些活動對八九學運的發起所起的作用。為了簡單起見，我把討論集中在四個相關的知識分子話語和活動上。它們是：「報告文學熱」、「《河殤》熱」、「球籍」問題大討論和「講座熱」。

⁵⁴ Reynolds (1987, 70) .

⁵⁵ 不過，也不能說「闖價格關」完全是一場失敗，特別是考慮到中國1992年以後經濟改革的動力都曾獲益於這些早期嘗試。當然，「闖價格關」的代價確實相當大，1989年社會動盪的程度表明了這一點。

⁵⁶ 見 Goldman (1994) 對這些運動所做的討論。

報告文學熱

報告文學熱緣起於知識分子對現實的不滿和焦慮。許多報告文學作品表現出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令人動容。它們所探索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現實存在的，其中的某些分析也不失精彩。不過，報告文學這種體裁也在相當程度上顯示出中國知識分子強烈的精英主義、理想主義和投機色彩。

甚麼是報告文學？就其形式而言，報告文學是一種新聞報導和小說的結合體，也就是說，報告文學的內容不是虛構的，而是真實的、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但是，一部報告文學絕不僅是一條新聞，而是應當讀起來像一部小說，應當具有藝術色彩。另外，報告文學的作者為了使其分析顯得更有權威性，他們也會從「哲學、經濟學、倫理學、法律、社會學、心理學，甚至環境科學和建築學」中截取隻言片語，加以利用。⁵⁷ 為了證明自己的論點，有人甚至會使用社會調查和統計報表的數據，或是運用訪談和實地調查等方法。⁵⁸

不過，這一時期的主流報告文學，並不是真正想以小說的形式向讀者報告真實的故事。它們的主題幾乎涵蓋社會問題的各個方面，包括通貨膨脹、官員腐敗、犯罪、賣淫、乞討、自殺、人才外流、人口問題、城鄉從中流動、獨生子女政策、私營企業、教育問題、社會倫理、婚姻問題、歷史問題、民族衝突等等。⁵⁹ 報告文學作家的寫作，主要是出於他們對社會問題的普遍關注和對社會的責任感。

可以說，報告文學是社會科學、新聞報導和小說三者的雜糅，但是，若與社會科學相比，報告文學對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一般不是基於科學，而是由作者的既定觀點所驅動的；同時，新聞報道追求轟動效

⁵⁷ 這個評論來自蘇曉康。何西來 (1989) 也曾引用過這個評論。中國的文學批評家們亦注意到報告文學力圖學術化的特點 (謝泳 1990)。

⁵⁸ 最典型的例子是賈魯生的《丐幫飄流記》(1988a)。為了寫這部報告文學作品，賈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把自己裝扮成乞丐。

⁵⁹ 從《神聖憂思錄》(斯超 1988) 一書所收入的報告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報告文學作品題材之廣泛。在這部兩卷本的集子中，20部報告文學作品幾乎涵蓋了上面列舉的大部分主題。

應，社會科學則講求具有普遍意義的代表性的結果。此外，小說寫作方法與社會科學方法以及新聞報導規律都有很大的衝突，因為即使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的作者也不會完全忠實地再現一個真實的故事。事實上，在當時，大部分報告文學作品對事實的收集和描述更多地傾向於新聞報導，甚至呈小說化。比如在《神聖憂思錄》中，⁶⁰蘇曉康與張敏試圖為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危機敲響警鐘，又企欲把危機的根源歸咎於教師可憐的經濟地位；為了表現中小學教師生活條件的惡劣，他們描繪了這樣兩幅極端的畫面：

兩個小房間，總面積只有18平方米，住了六口之家。房子很低，你舉手就可以摸到天花板；裏面很潮，整天不見陽光，因此地板是濕的。房子很破，冬不遮風，夏不擋雨……

這是一位已有了40年教齡的特級教師的住房。他在這裏已住了33年……惡劣的環境毀了他的身體。多年來，呼吸道炎症一直折磨着他，在課上他也不斷地咳嗽。在晚年，[疾病和環境]對他的折磨日益加重。他最後死在了這間破落的房子裏。

第二個故事是這樣的：

在南方的一個大城市裏，有一位老教師，教了三十多年的書。他們一家八口總共只有21平米的住房。這位老教師因患肝癌住進了醫院，但他在昏迷中還在不斷喊叫着「房子」、「房子」。死前，家裏人向他撒謊說他們家已經分得了一套「三居室」。他也因此得以瞑目。

在80年代，中國所有大城市的住房問題都可以說是很嚴重，但教師的住房條件果真像這部報告文學作品中所暗示那般，要比其他城市人口的平均水平低得多嗎？答案有可能是肯定的，儘管其中的問題不應當只通過幾個極端的例子來揭示；但是，極端的例子在激發已經備感委屈的知識分子和其他人群的不滿這一點上卻非常有效。以我自己

⁶⁰ 蘇曉康和張敏（1987）；亦刊載於斯超（1988）。

為例，當我讀到上面兩段話時，我確實感到感情沸騰，我還被作品中一些有力的質問深深地打動，例如：「不是說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嗎？為甚麼他們自己的靈魂卻不得安居之所呢？」⁶¹「同樣是人，為甚麼有的人活得如此寬裕，而有的人竟活得如此卑微、窘迫、痛苦？」我的這種情緒反應是有代表性的。「他〔蘇曉康〕的作品一出版，在一些山區就出現了手抄本，從一個村莊流傳到另一個村莊。在有些縣，人們還複印了他的作品，許多人讀他的作品時都熱淚盈眶。」⁶²

當時大部分報告文學作品都擷取了各種社會理論來支撐自己的觀點。字眼如「在社會學上」、「在心理學上」、「在語言學上」、「在哲學上」以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等等，有時會彙集在同一部報告文學作品中；這樣的寫作手法無疑給報告文學增添了學術的光環，比方說，在《第二渠道》中，賈魯生使用了「智商」這一概念來美化在缺乏法律規範的市場中，個體書商之間、個體書商和國營書店之間的惡性競爭：

80年代是智商競爭的時代……

在商業競爭中，文盲甚至擊敗了大學畢業生〔指作品中的一位國有書店的經理〕。這說明了甚麼呢？這說明了蜥蜴的智商高過恐龍……我們所需要的僅僅是一點點靈活性。這就是為甚麼大部分「萬元戶」的教育程度都不高。教育程度決定不了甚麼。一個人能否致富完全取決於其智商水平。⁶³

下面這段話出自同一部作品，它借一位個體書商之口表達了同一看法：

我的成功主要還是因為我的智商高……競爭越激烈，道德和競爭之間的衝突就越大。我們應當遵循道德還是競爭的法則？道德〔只是〕可以幫助弱者的武器，而自然法則卻〔只會〕站在競爭這一邊……嬰兒是怎麼誕生的？三億精子撲向了一個卵子，但

⁶¹ 「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個說法來自斯大林。

⁶² 賀興安(1988)。

⁶³ 引文出自這部報告文學的刪節版，刊載於《人民日報》海外版(賈魯生1988b)。

成功的只有一個。我可以肯定，它就是最強的那個。嬰兒就是這麼誕生的。

很明顯，作者並不真正懂得智商這一概念，他不瞭解這一概念的種族主義的歷史局限性；⁶⁴他所作的蜥蜴戰勝恐龍的類比也表明了他不懂生物進化的機制。最後，作者顯然不明白，當沒有一個國家來提供諸如法律、教育以及其他基礎設施等公共物品時，競爭決不會自行帶來一個健康有序的市場。

然而，不管這些報告文學作家們如何幼稚，報告文學仍然高度吸引着學生和飽受委屈的市民。事實上，報告文學在80年代中期剛一出現，「報告文學熱」就跟着流行起來了。它們之所以廣受歡迎，除了因為存在眾多的社會問題之外，報告文學家們描繪社會問題的方式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報告文學中，小說這一形式允許報告文學家們對「真實的故事」加以改造，並將之誇張成一種更有效的表達方式；新聞報道這一形式為追求轟動性而非代表性提供了市場；最後，加以社會科學的點綴，使單純的學生們把這些報告文學家當成了精深的思想家。⁶⁵通過文學的威力，這些政治化的報告文學有效地把苦悶的學生引向特定的思考方式。⁶⁶

電視系列片《河殤》

系列片《河殤》是文化熱和報告文學熱兩者的結合，它以類似於報告文學的風格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批判。文本的第一作者蘇曉康，也是

⁶⁴ 有關智商測驗史及其問題的精彩分析，可以參見Gould (1981)。

⁶⁵ 事實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也是以同樣的方式來對待西方流行的社會學家的。Kraus (1989, 300) 曾注意到：「《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 一書的中譯本在中國讀者眾多。許多知識分子都覺得這本書很有吸引力，因為該書試圖表明知識分子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許多中國人都不加思考的接受托夫勒 (Alvin Toffler)，認為他是個嚴肅的西方社會科學家，就如同他們錯把沃克 (Herman Wouk)、史東 (Irving Stone) 和塞戈 (Eric Segal) 當作嚴肅的小說家一樣。」

⁶⁶ 在我看來，報告文學的流行還由於中國法律體系的薄弱。否則，單是控其誹謗的訴訟就足以令這些作品的出版困難重重。

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報告文學作家之一。不過，由於電視系列片將現代的電視、藝術、新聞報導、歷史和社會學熔於一爐，其影響已非一般報告文學作品所能比擬。

這部系列片的要旨可以歸納為：中國以河流、大地為根基的、內向式的「黃色文明」導致了保守、愚昧和落後；為了生存，中國必須向以海洋為根基的「藍色文明」學習，並應該建立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為了使這部系列片的論證顯得更加權威，作者引用了眾多的西方理論，比如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的灌溉·專制論(irrigation-despotism thesis)、黑格爾(Georg W. F. Hegel)有關中國陸地文明趨於保守的說法、以及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一個早期觀點——除基督教文明之外，所有其他文明不是已經湮滅，就是正在走向死亡。此外，作者還邀請了十多位來自各個學科領域的「傑出中青年學者」到「演播室」做客，要求他們「簡短地解釋或者表達對相關主題的看法」。⁶⁷最後，大量歷史事實也被組織起來，以支持該系列片所表達的一些觀點。

由於作者隨心所欲的歷史引證方式、對有爭議性的西方理論的盲目引用，以及粗枝大葉的結論，這部電視系列片受到許多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者的批評，⁶⁸其中的大多數都非常中肯。不過，這些批評者顯然是把事情看得太認真了，即使《河殤》的作者們曾經有心給這部系列片蒙上一層學術色彩，但就片子本身的性質、質量和所採取的態度而言，它決不是一部學術作品。

不管怎樣，《河殤》非常成功地抓住了一般民眾，尤其是學生的注意力。它奔放的激情、飛揚的文采以及莊嚴的語調，被那不受時空限制的電視畫面渲染得淋漓盡致，再配上一些理論調料和新型的思考方式，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這一切都顯得十分新穎。所以，1988年6月，這部系列片在中央電視台黃金時段剛一播出，就立刻抓住了億萬

⁶⁷ 蘇曉康(1990, 3)。

⁶⁸ 見Fu(1992); Wang and Qiu(1992); 張國祚(1989)及趙光賢(1989)。有興趣的英語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Rosen and Zou(1991-92)編輯的一本優秀的選集。該選集包括《河殤》文本和幾篇來自台灣和大陸作者的立場各異的文章。

中國人的心。「《河殤》熱」應聲而起。大學生們就電視片中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反復爭論。許多人在看過節目之後，還想獲得《河殤》的腳本，結果，五百多萬本《河殤》剛一出版就被一搶而空。⁶⁹由於觀眾的強烈要求，再加上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支持，中央電視台後來又完全重播了這部系列片。⁷⁰對於這部片子，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收視率之高，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當我向58位受訪者詢問是否看過《河殤》時，有50人表示看完了全部，有5人說看過部分，完全沒有看過的只有3人。

正如所預期的那樣，學生對此片的評價是非常正面的。當我問他們：「你在當時是怎麼看這部片子的？」在55個看過這部片子的人中，僅有6個人表達了負面的看法。在49個贊同者中，有30個人說，這部片子為他們審視歷史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而且他們完全贊成片子裏的觀點；另外19人則不同程度地堅持說，儘管這部片子從學術上看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它喚起了中國人的危機感，因而對中國的發展是有利的。出於同樣的理由，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也高度讚揚這部片子。比如，麥德遜 (Richard Madsen) 就稱讚它「出色地運用影像技術，從歷史和哲學上對中國文化的處境做了非常有震撼力的論述，它在修辭的力量和概念的精確性上所達到的水準，即使在西方電視記錄片中亦罕有其匹。」⁷¹ 麥氏一語中的，確實，以西方媒體保守的本質，類似的系列片在西方主流媒體中注定是不會製作和播放的。⁷²

「球籍」問題大討論⁷³

1988年，當中國的經濟改革面臨嚴重危機時，中國知識分子都在積極地尋找解決辦法，這是不同尋常的一年。一元初始，2月15日的

⁶⁹ 曹放 (1989)。

⁷⁰ 靳人 (1989)。

⁷¹ Madsen (1990, 256)。

⁷² 對這一問題的更多討論將在第十章進行。

⁷³ 毛澤東曾說過，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當對世界文明做出更多的貢獻，否則就會喪失「球籍」。「球籍」這個觀念就來自毛澤東這個浪漫的比喻。

《世界經濟導報》(*World Economic Herald*)發表了一篇文章，主標題是〈本世紀的最後一個龍年：中國最緊迫的問題仍然是「球籍」問題〉(“Facing the Last Year of the Dragon of the Century: The Most Urgent Problem for Chinese is still the Problem of World Citizenship”)，⁷⁴副標題為〈警告：中國與發達國家、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差距仍在拉大〉(“Alarm: The Economic Gap is still Widen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ve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⁷⁵這篇文章與當時正在發生的經濟滑坡遙相呼應，立刻就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關於「球籍」危機的大討論。單是《世界經濟導報》，在1988年就至少發表了15篇這一主題的文章。⁷⁶許多別的中文報紙也加入了討論，其中包括頭號官方報紙《人民日報》。⁷⁷在8月份，北京甚至還就此問題舉行了一次專題研討會。然後，《世界經濟導報》把各方面的討論彙編成冊，出版了一套叢書。⁷⁸在此過程中，甚至台灣和香港的媒體都介入了這場討論。⁷⁹

在當時，危機意識備受推崇。比如，中國科學家錢學森就說過，「球籍」問題的討論能夠加強民族團結感；⁸⁰《人民日報》也發表文章稱

⁷⁴ 《世界經濟導報》是上海的一份自由派的報紙，也是中國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喉舌。六四之後，該報被封。

⁷⁵ 副標題中所得出的結論是以一些報告中按美元換算的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國家生產總值) 為基礎的。事實上，中國同西方之間的經濟差距正在縮小，但這一事實在80年代被人民幣的大幅貶值所掩蓋。

⁷⁶ 它們分別發表在：2月15日；3月7日和29日；5月15、16、30日；6月6、20、27日；7月4日；9月5、12、19日；10月24日；12月19日。這裏我只能說「至少」，因為我尋找的這些文章藏於上海社會科學院，但其中有幾期丟失了。

⁷⁷ 1988年9月15日的《人民日報》。

⁷⁸ 1988年12月19日的《世界經濟導報》。

⁷⁹ 1988年9月12日的《世界經濟導報》報道了香港和臺灣媒體的介入。一篇署名聶岩(1988)的文章發表在臺灣的《中央日報》上，《世界經濟導報》轉載了這篇文章。

⁸⁰ 見1988年5月30日的《世界經濟導報》。

「危機意識是國家發展的動力」；⁸¹ 1988年5月16日出版的《世界經濟導報》上，亦有一篇文章在標題中赫然指出「中國需要有人站出來說話」。在這場討論中，「信件像雪片一般地飛向《世界經濟導報》」。⁸² 其中許多信件中充斥着諸如此類的話語：「世界給了中國黃牌警告。中國必須全盤動員起來！」、「起來，不想失掉『球籍』的人們！」⁸³ 到1988年夏，這場討論已經成為一次新的社會熱潮，大眾對其關注的熱烈程度不亞於同時期的《河殤》熱。一種廣泛的危機感就在這種情況下形成了，此時，這種危機感已經不單局限於知識精英群體，而是開始向廣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這一更龐大的群體擴散。

講座熱

在80年代，人們普遍把大學生看成是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大學生們的自我感覺也是如此，知識精英和大學生之間的關係也非常密切。舉例說，在方勵之的演講和作品中，⁸⁴ 我們不難發現，他的受眾主要是兩個，首先是學生，其次是西方人；其他知識精英的演講在大學校園中也廣受歡迎。下面的例子展現了學生對劉賓雁在上海一所大學做演講時所表現出的熱情：

受同濟大學學生會的邀請，劉賓雁於〔1986年〕11月6日在同濟大學禮堂發表演講。該禮堂能夠容納三千人，但有許多外校的學生也來了。最後，禮堂的過道和周圍都擠滿了學生。聽這次演講的學生至少超過五千。⁸⁵

大約兩星期之後，方勵之也來同濟做演講，同樣的火爆場面再次出現。⁸⁶ 1986年，這樣的大學演講還不太風行；但到了1988年，正當

⁸¹ 子超 (1988)。

⁸² 曹放 (1989)。

⁸³ 前揭文。

⁸⁴ Fang Lizhi (1990)。

⁸⁵ 李新華 (1988)。

⁸⁶ Fang Lizhi (1990, 157-188)。

中國經濟走下坡時，到大學發表演講已經成為知識分子傳播其觀點的主要渠道。因此，「講座熱」在中國幾所著名大學中頓時興起。一位知情者(第68號受訪者)告訴我說，1988年和1989年初，北京大學一天內會有好幾場這樣的講座，一些學生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聽這些講座上，而不是進行正常的學習。

講座演講和正式出版顯然不是一回事。政府對正式出版物的審查常常迫使大部分知識分子把他們的想法隱藏起來，但在講座時，他們往往就可以放開來講。比如，金觀濤就曾在北京大學的一次講座上說：「20世紀的遺產之一，就是社會主義的實驗和失敗。」⁸⁷這樣的評論他既不會、也不可能正式的場合發表。一位經常參加北京大學講座的受訪者(第63號)告訴我：「在這樣的講座上，大家都在嘗試挑戰政府。〔在這段時間〕，如果誰想在北京大學完成一次演講，他就必須攻擊共產主義。否則，學生就會把演講者『噓』下台。」

講座對八九學運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我曾經在我的採訪對象中間及他們參與這些講座的頻率，在42位被問及此問題的學生中，有23人說他們很少參與這類講座，另有19人則表示他們經常參與(見表2.1)。而在這23人的低講座參與率群體中，有19人(82.6%)對運動

表 2.1 講座參與率和運動參與水平之間的關係

講座參與率	運動參與水平				總計
	低	中	高	組織者	
低	8	11	4	0	23
高	2	1	10	6	19

註：在70個受訪者中，有48人在八九時是學生，這48個學生中有42人就其講座參與率和運動參與水平提供了信息(細節見附錄1)。表2.1顯示，講座參與率與運動參與水平之間存在着強相關($\gamma = 0.82, p < 0.001$; γ 的性質類似於回歸系數)。其中，講座參與率：低＝從不參加或很少參加；高＝經常參加。運動參與水平：低＝只是八九學運的一般同情者；中＝參與幾次遊行或其他活動；高＝參與絕食或在運動全程中均積極加入；組織者＝學生領袖。

⁸⁷ 引自武仁(1990a)。

(八九)的參與保持在中低水平。相比之下，在高講座參與率群體中，有16人(84.2%)在八九期間不是積極分子就是組織者。可以看出，在學生的講座參與率與運動參與水平之間，存在着強烈的正相關($\gamma = 0.82, p < 0.001$)。⁸⁸

通過《河殤》熱、「球籍」問題大討論和講座熱，80年代一些主要理論思考和現實關懷已經越出狹小的學術圈子，向更為龐大的人群擴散。它們限定了學生在幾個關鍵問題上的價值取向，並成功地推進了一些反體制學生網絡的發展。1989年，中國社會出現一場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條件業已成熟。

結 論

本章試圖闡明，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動模式是由中國近百年來，特別是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國家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所塑造而成的。在列強的壓力下，晚清和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一直在不屈不撓地為締造一個足以抵禦外侮的強大的國家而奮鬥，他們的行動最終導致共產主義的崛起；但是，共產主義國家，也就是知識分子一直夢寐以求的強大國家，本身又成了問題。因為這樣的國家從事政治鎮壓似乎十分在行，而在經濟現代化上卻不怎麼有力。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時代的慘痛經歷，驅使他們在毛時代之後不斷地為民主而戰；不過，他們在為民主而戰的同時，也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大量遺產——那個時代無法無天的國家權力，使他們備受驚嚇，並把民主看作是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那個時代曠日持久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模式賦予他們一種烏托邦的情懷；那個時代各類運動中的大眾動員方式培養出他們對民主的民粹主義的理解；那個時代的政治鎮壓和與世隔絕也使他們成為一個信息極度匱乏，而投機色彩又十分濃厚的群體——所有

⁸⁸ 該數據應當謹慎地理解，因為學生的運動參與水平可能還有其他因素有關。在隨後的討論中，可以看到，這樣的因素還包括大學的名氣(見第四章)、大學中是否存在人文社科類專業(見第三章)等等。由於有許多講座就是在綜合性大學或人文社科類院系舉行的，所以上述因素與文中所述原因有相當大的重疊。

這些因素都使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與行為籠罩着一種理想主義、機會主義和激進主義色彩。這些因素同時還造就了一種社會氛圍，這種社會氛圍反過來又塑造了80年代的知識分子話語，最終促進了八九學運的產生。

經濟改革、大學擴招與學生的不滿情緒

在上一章，我討論了80年代前和80年代中的國家·社會關係如何促成了一個激進知識精英群體的形成、這個群體的活動，以及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最終如何誘發了八九學運。這個可以被稱為自由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精英的群體，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只佔很小部分，但八九學運卻最終贏得了大部分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參與及支持，為甚麼廣大的知識分子會支持這次運動呢？我的研究表明，這與改革期間國家一系列政策的變動有密切關係。70年代後期中國的國家政策非常強調知識分子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但到了80年代初期，國家政策就轉向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戰略。¹ 與此同時，大學開始大規模擴招。由此而來的後果是，80年代後期，學生和知識分子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正在大大下降，大學生畢業後也越來越難以找到滿意的工作，接受高等教育成了一種不良投資。於是，一般知識分子和學生開始與國家疏離，整個形勢的發展有助於學運的形成。在本章，我將考察當時中國的高等教育，並討論它是如何對知識分子和學生產生負面影響的。另外，本章也將從理論上闡明，由於大學在中國是一個激進機構，大學招生的過度擴張對中國的政治影響要比發達國家深遠得多。

¹ 許多學者都曾指出，在共產黨執政後，中國經歷了頻繁的政策變動 (Lin and Xie 1989; Whyte 1984)。Skinner (1985) 討論了從1949年到1977年間中國經歷的11次重大的政策循環。

大學擴招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華國鋒成為中國政府新的領導人。他發起了一場「新躍進」，目標是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² 在1976-1985這十年中，「新躍進」確立的短期目標是：「幾個主要農業部門至少要實現85%的機械化」，要生產「4,000億公斤糧食和6,000萬噸鋼鐵」，要「建造或者完成120個大型工程，包括10座鋼鐵冶煉廠、9座有色金屬冶煉廠、8座煤礦、10座油田和汽田、30座電站、6條新鐵路和5個港口」。³ 這種新斯大林主義式的經濟發展戰略，無疑對科學和技術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知識分子作為實現這些目標的關鍵力量，其地位也因此而大大提高。⁴

中國知識分子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到的高度尊重同他們在文革期間的經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他們的政治地位從文革時的「臭老九」一躍而成為「腦力勞動者」，同時還獲得了更大的學術自由。⁵ 此時，

² 「四個現代化」指的是工業、農業、軍事和科技現代化。這個「四個現代化」戰略最早是由毛澤東在50年代提出的。在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對此予以重申。在其實施的早期階段，鄧小平也曾對其表示支持。

³ 摘自華國鋒1978年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所作的報告。

⁴ 華國鋒(1978)指出，「我們必須大規模地提高現代科學和技術，廣泛地使用新材料和新能源，並使我們的主要產品的生產流程現代化。」鄧小平(1983, 86)更明確地宣布：「四個現代化的關鍵就是科技現代化。沒有現代科技，就不可能建立現代農業、現代工業和現代國防。沒有科技的快速發展，就不會有經濟的快速發展。」

⁵ 「九」這個數字在兩方面和知識分子有關。首先，在60年代，毛澤東用「老九」來指代知識分子；他是受當時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一句話的啟發。這部戲的主角，一名解放軍戰士，為殲滅一個匪幫而打入其中並取得匪幫頭目中「老九」的地位。其次，所謂的「臭老九」是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很低，這使得他們只能排在既有的八個被打入另冊的社會群體之後（這八個群體分別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見Han and Hua (1990, 14)。

毛澤東時代的工農兵大學生政策也被取消了，高考制度得以恢復。⁶ 整個社會環境給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美好的前景，使得高考恢復的最初幾年間競爭非常激烈，毛澤東時代之後的第一次社會熱潮就是「讀書熱」。⁷ 從毛澤東去世到80年代中期這段時間，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曾為「科學的春天」的到來而歡欣鼓舞，也希望為之做出貢獻。⁸

國家政策和社會需求的相互推動導致大學不斷擴招。從1977年到1985年，中學的招生人數減少，而大學的數量和大學生的數量卻急劇增加。⁹ 1977年，中國只有404所大學，但到1988年就增加到1,075所。這11年間，大學的第一次擴張發生在1977-1978年間，當時，許多在文革期間停辦的大學得以恢復。

第二次大學擴張發生在1982-1985年間。三年內大學的數量從715所上升到1,016所，平均每三四天就有一所新的大學成立。結果，大學招生人數在11年時間一下子增加了3.3倍(如表3.1所示)。¹⁰

⁶ 文化大革命時期入學的學生被稱為「工農兵大學生」，他們由所在地政府推薦入學。事實上，被推薦人同當地政府官員的私人關係、特別是被推薦人的父母同當地官員的關係，通常是推薦的基礎。

⁷ 在1977年的全國高考中有超過570萬的考生競爭278,000個名額(黃杰、牟曉光1990)，升學率為1:20.5。競爭之所以如此激烈，主要是因為這次高考是十多年來的第一次，因此人們的熱情普遍很高。1980年以後，「學習熱」逐漸演變為「文憑熱」，並於80年代中期開始消退(劉向陽1989)。

⁸ 「科學的春天」是當時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在1978年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發表的一篇令人振奮的演講中提出的。這句話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成為一句時髦用語。

⁹ 由於普遍強調高等教育，再加上人民公社解體之後農村地區公共教育的衰落，中國的中學教育在80年代大幅滑坡。Henze (1992, 115) 指出，小學到初中的升學率從1976年的94%下降到1980年的76%，到1988年則進一步下降到69.4%。而初中到高中的升學率分別是，1977年71%，1980年37%，1988年21.2%。有關80年代中國教育的整體狀況及其對高等教育的傾斜，可參見Hayhoe and Bastid (1987); Hayhoe (1987; 1988; 1989; 1992)。

¹⁰ 見《中國統計年鑒(1990)》。請注意，成人高等教育的大幅增長並沒有在這個表中反映出來。

招生人數漲幅最大的是人文社科類專業。從1977年到1988年，人文社科類專業的招生人數增長了7.8倍。同一時期，政法類專業的招生人數更是增長了75.8倍(表3.1)。¹¹ 如果像我在導論中所論證的，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在其社會中往往是作為一個激進力量而存在，那麼，人文社科類專業無疑又處於激進主義的風頭浪尖。其中的部分原因在於，這些專業所講授的觀念，許多都是來自西方的文化和政治思想；對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政治傳統來說，這些觀念都是帶有革命性的。這也是為甚麼在發展中國家，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更傾向於參加激進運動的原因。¹²

表3.1 改革時期中國大學的擴張

年份	大學的 數量	入學學生 的總數 (1)	財經類 (2)	政法類 (3)	人文類 (4)	藝術類 (5)	政法類 百分比	人文社 科類 百分比	師生比
1977	404	625,319	7,992	576	35,038	4,783	0.09	7.71	0.298
1978	598	856,322	18,190	1,229	46,153	5,662	0.14	8.32	0.241
1979	633	1,019,950	21,597	3,315	57,244	5,319	0.33	8.56	0.232
1980	675	1,143,712	37,082	6,029	58,054	6,023	0.53	9.37	0.216
1981	704	1,279,472	47,895	9,944	69,076	7,326	0.78	10.49	0.195
1982	715	1,153,956	55,980	14,635	59,663	5,540	1.27	11.77	0.249
1983	805	1,206,823	71,100	18,286	67,909	6,266	1.52	13.55	0.251
1984	902	1,395,656	97,450	25,237	89,146	7,501	1.81	15.72	0.226
1985	1016	1,703,115	147,543	36,129	126,828	12,644	2.12	18.97	0.202
1986	1054	1,879,994	169,384	43,178	128,091	13,175	2.30	18.82	0.198
1987	1063	1,958,725	180,398	42,034	113,423	14,012	2.15	17.56	0.197
1988	1975	2,065,923	206,088	43,654	111,683	16,685	2.11	18.30	0.190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0)》。如每一欄的標題所示，第(1)到第(5)欄的數字是大學學生總人數[第(1)欄]和各學科的學生人數。

¹¹ 這一部分所有不是從表3.1直接獲取的數據都是根據表3.1的數據計算得出的。

¹² Altbach (1968a, 58; 1989, 8); Nasatir (1967, 324-26)。

表3.2 八九期間學生專業和講座參與率之間的關係

學科	講座參與率	
	高	低
社科類	14	7
非社科類	5	16

註：在接受採訪的48個學生中，有42人提供了有關他們講座參與率的信息（詳見，附錄一，「方法論的註解」）。結果表明，人文社科類學生的參與率要遠遠高於其他專業的學生（ χ^2 檢驗， $p < 0.01$ ）。社科類表示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非社科類表示其他非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

80年代，擁有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大學舉辦的各種以西方政治思想和當前中國政治為議題的講座和座談會，比沒有這類專業的院校要多得多。從上一章我們知道，學生對座談會的參與率與其在八九學運時的運動參與程度是高度相關的。我同樣發現，與非人文社科專業學生相比，大部分人文社科類的學生對80年代末的各種講座與座談會的參與率也是很高的（表3.2， χ^2 檢驗， $p < 0.01$ ）。

在八九學運中，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在運動的參與者中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比如，1988年，中國18.3%的大學生選擇人文社科類專業，北京的學生也基本上保持了相近的比例；但在軍事鎮壓之後國家安全部通緝的21個學生領袖中，人文社科類學生的人數卻達到14人（66.7%）之多。¹³ 中國政法大學是個小學校，它在1988年的招生總數只有3,141人，而在通緝名單上，卻有兩名學生來自該校。而且，該校學生的激進程度在北京各大學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很明顯，人文社科類專業不成比例的擴招，使中國政府在不經意間擴大了大學擴招的政治影響。

¹³ 《光明日報》，1989年6月14日。

從四個現代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¹⁴

「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很快就無法持續下去了。儘管「新躍進」在1977年和1978年分別為中國帶來了11%和超過12%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它所需要的巨大投資規模已經遠遠超出當時國家的財政能力。同時，國家貿易進口的增長速度也遠遠超過了出口速度的增長。僅在1977年和1978年兩年中，貿易進口就增長了85%。這使中國出現了自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後最大的貿易赤字。

伴隨經濟挫折而來的是黨內的權力鬥爭。華國鋒的影響力逐漸被削弱，鄧小平則重新崛起。1980年9月，華國鋒不得不將總理的位置讓給鄧小平的支持者趙紫陽。一年後，華國鋒又辭去中共中央主席職位，由鄧小平的另一個支持者胡耀邦接任。這樣，華國鋒所倡導的「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戰略逐漸被拋棄，最終由鄧小平的新經濟發展戰略所代替。新戰略的目標已不是實現一個宏偉的現代化藍圖，而是一個較為現實的目標，即到2000年時將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這不僅是經濟目標的變化，它還意味着整個經濟政策的根本改變。新的經濟政策不僅強調市場、農業、輕工業和服務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而且強調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如果說最初連鄧小平自己都對新政策的確切指向不十分清楚的話，那麼現在，所有人都已經清楚了，那就是走向市場經濟。¹⁵

¹⁴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概念出現在80年代早期，進而在1987年召開的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正式採納。這一概念強調，處在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應當大力強調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並應該允許包括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的存在。

¹⁵ 許多學者都試圖對這一變遷做出解釋（比如Harding 1987; White 1993），而他們的解釋也都有一定道理。我想強調的是，改革的動力並不完全來自國家領導人。改革早期兩項最重要的措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私營經濟，起初都是人們在某些地區進行自發性的嘗試，然後才獲得國家的認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78年從安徽省興起，最初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大災之後的糧食產量。這項措施因其有效性而得到迅速推廣——尤其是在貧困地區，但直到1981年它的合法性才獲得國家承認。與此相類似，私營經濟最早是從溫州這樣人口密集的

中國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對這一政策變化感到無所適從。他們親西方的傾向使他們非常支持這一變化，但另一方面，他們對自己在這一政策下所獲得的經濟地位又十分不滿。新政策的實施帶動了許多新的經濟部門的興起。在80年代，新興的集體企業的技術含量尚低，私營企業主要由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人經營，合資和外資企業則帶來了它們自己的技術；因此，尖端科學和高等技術沒有直接的用武之地，知識分子和學生也被邊緣化了。這樣，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個人收入和教育程度開始呈現出明顯的負相關。大部分中國人都知道，私人企業老闆和娛樂圈中的人，雖然沒有受過甚麼正規教育，賺的錢卻比大學畢業生要高許多倍。¹⁶ 當時有兩個流行的說法：「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刮魚鱗刀的」。這充分顯示了知識分子和學生對私營企業主的普遍態度。¹⁷ 學生對娛樂圈人士的不滿可以從我的一位被訪者的評論中看出來：

那些真正富起來的人不是倒爺就是明星，這就是我的感受。¹⁸ 像我父母那樣的人，一輩子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卻沒有得到甚麼回報。比如說我的母親，每天備課、講課；她耗費的精力肯定不比歌星在台上唱歌少。總之，我覺得，一個人辛勤勞動卻不能帶來好收入，這一切是很不公平的。(第30號受訪者)

地區開始的，當時是70年代中期，毛澤東尚在世(陳一諮1990, 25-35；費孝通1986；Kate Xiao Zhou 1996)。國家採納私營經濟的初衷，主要是為了解決當時緊迫的失業問題(Rosen 1987; 時憲民1992)。

¹⁶ Bai (1987, 16) 指出：在11類職業中，個體戶(第一章，註20)在經濟收入上排第一位，但其社會地位評價居第九位。相反，大學生和研究生的社會地位評價最高，但其經濟收入評估則只排在第九位。該結果是從一個在29省市進行的有3,340人參加的分層隨機抽樣調查中得出的。

¹⁷ 在漢語中，這兩個說法都押韻。它們充滿了幽默和諷刺的意味，並且琅琅上口。許多關於80年代中國的其他類似說法，見柴效武(1988)和蕭勤福(1989, 240)。

¹⁸ 「倒爺」也就是掮客。但在80年代，「倒爺」是個貶義詞，專門用來形容一些不法商人。

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還不很理解資本主義和市場的力量。他們覺得市場經濟會給國家帶來繁榮；但他們從來沒有想到，市場經濟還會瓦解知識分子在傳統社會中享受的地位和特權。這種反差是他們對許多社會現象產生強烈不滿的一個主要原因。

高等教育質量的下滑

1977-1988年間，中國大學招生的總人數增長了3.3倍，而同期教育投資在政府總預算中的份額卻只增加了2.4倍，從1.35%增加到3.27%。¹⁹ 但即使是這一數字，也因為當時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和國家不濟的稅收能力而大打折扣。²⁰ 如此一來，儘管中國政府在不斷強調高等教育的重要性，相應的投資卻遠遠趕不上大學擴招的規模。

這種狀況直接導致高等教育質量的下滑。這首先可以從師生比率上看出來。1977年，這個比率是0.298，到1988年就只有0.190了(表3.1)。²¹ 而且，由於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大大降低，大學再也無法留住有才幹的年輕教師。²² 1981-1989年，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清華大學和其他兩所著名大學共錄用年輕教師6,104名；但至1989年底，其中32%都出國了。²³ 由於政府規定，應屆畢業生如果沒有完成一定年限的服務(碩士和博士為兩年，本科為五年)就出國的話，需要繳納一定金額的罰金，因此，許多年輕老師即使留下來也都是暫時的。²⁴ 如果把這一因素考慮在內的話，中國當時實際的人才流失程度應當會更高。

¹⁹ 這是根據Min (1991, 表2) 所提供的資料計算出來的。也可參考Pepper (1990, 147-152)，他對此問題有更為詳細的討論。

²⁰ Min (1991)。

²¹ 在印度，師生比率下降曾導致大學教育質量的下滑和學生運動的爆發，有關分析請見DiBona (1968, 131-71)。

²² 張炳升、鄧海雲 (1989)。

²³ 高咨 (1990)。

²⁴ Pepper (1990, 169-70)。

那些出不了國的年輕教師，很多都離開大學進了公司。一位受訪者(第2號受訪者)回憶說，在畢業後留校的16個同班同學中，有8個去了美國或加拿大，7個去了公司，只剩下1個還在教書；這種現象並不反常。一項在中國大學進行的調查表明，在56個新錄用的年輕教師中，有54人表達了離開學校的強烈願望。²⁵ 教育質量下滑的現象在人文社科類專業中尤其嚴重。因為，大部分設立此類專業的院系都是在文革後剛剛建立的，它們的教師幾乎沒有受過任何良好的訓練；²⁶ 與此同時，這類專業的擴招幅度卻比其他專業大得多。不管從哪方面說，在這種環境下，那些即使仍然留在大學裏工作的人，也都已經沒有積極性可言了。

經濟依附性增強

國家對高等教育投資不足所導致的後果之一，便是大學生在80年代中期以後在經濟上已無法獨立，不得不依靠父母。在此之前，大學生可以獲得助學金。根據各自家庭的平均收入，他們每月可以得到零到27元不等的補助。事實上，當時大部分學生每月的補助都在10元到27元之間。依照當時的生活標準，學生只要節儉一點，20元即已足夠應付一個月的生活費用。

但在1985-1986年間，國家將大部分大學的助學金制度改為獎學金制度。這樣一來，學生能夠獲得的獎學金的數量取決於成績，而不是家庭收入狀況。在新的制度下，大部分學生沒有獎學金，而成績最好的學生每年可以得到500元的獎學金。這種新的分配制度並不僅是為了激勵學生認真學習。更重要的原因是，由於通貨膨脹，學生所得的補助已遠不足以應付他們的生活開支，但國家卻沒有足夠的財力來提高助學金。因此，國家只能把這些錢集中起來，獎勵給成績好的學生。可是，到1988年，一個在北京上學的學生，每月生活費至少要花100元。這意味着，學生即使得到一等獎學金，仍不能依靠獎學金獨立

²⁵ 張炳升、鄧海雲(1989)。

²⁶ 見第二章。

生活。這些18、19歲或20出頭的年輕人，通常都很希望擺脫家庭的控制，實現經濟獨立。因此，新的獎學金制在學生中引起廣泛不滿。

畢業後的工作安排問題

文革剛結束時，一些大城市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量很大。自文革以來，中國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已經十多年沒有招過合格的員工。文革期間，大批幹部遭到清洗；文革結束後，許多老幹部即使恢復原職但也到了離休或退休的年齡。這樣，各級政府機構在文革後都需要招收大量幹部。²⁷ 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畢業的近350萬大學畢業生很容易在大學、研究機構、大型國有企業或高級政府部門找到工作，而這些工作一般也都集中在幾個大城市。與此同時，一大批成人大學也紛紛建立，其畢業生的工作前景同樣樂觀。²⁸ 這樣，在短短幾年內，大城市裏的理想職位就迅速達到飽和。²⁹ 但此時，政府已經沒有能力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把學生分配到仍然需要他們的偏遠地區。³⁰ 至於鄉鎮企業和私人企業這樣的新興部門，當時既無法吸引到學生，也不真正地需要學生。而與此同時，大學仍然在擴張，大學的

²⁷ 楊曉偉、崔少鵬(1989, 39)。

²⁸ 從1980年到1986年，成人教育擴張了16倍，其中大部分是成人高等教育。到1985年，已經有1,216所成人大學，學生總人數達1,725萬(劉向陽1989, 106)。1986年，有45萬成人大學學生畢業，這一數字超過當年普通高校畢業生的數量(黎蕪1988)。這些成人大學學生從普通高校學生那裏搶走了不少工作，也大大衝擊了普通高校學生的精英意識。

²⁹ 楊曉偉、崔少鵬(1989)提到，1981-1983年，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有60%畢業後可到高層政府機構就職。在1984-1985年間，仍有大約30%的人可以找到類似的工作，儘管大部分是在省級或更基層的地方政府機構。但到80年代末，國家幹部已超編五十多萬，不得不開始裁員。

³⁰ 如果被分配的工作是在偏遠地區，許多學生乾脆就拒絕派遣。比如1982年，國家分配109名大學生去黑龍江大興安嶺地區，但最後只去了42人；1985年，有86名學生被分配到這一地區，實際上只去了31人(楊曉偉、崔少鵬 1989, 73)。

課程設置也仍然遠遠落後於社會需要。³¹ 諸多因素合在一起，使80年代中期以後，大學畢業生找到滿意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小。

1987年，超過3,000名大學畢業生遭到指定的接收單位所拒絕。³² 儘管這些學生只佔畢業總人數的1%，但因為這種情況前所未有，所以立即在大學和社會上引起恐慌。³³ 據198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有21.9%的大學生為此深感不安。³⁴ 這種情況對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產生的影響更大，主要原因在於，儘管這些專業傳授給學生的東西在新的市場經濟下並不尤其實用，但它們的招生規模卻在飛快地擴張。結果，在1987年那些被拒絕接收的畢業生中，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多得不成比例。在北京，1987年有600名學生遭到用人單位的拒絕，其中政法類專業的學生佔到10.5%，儘管在招生人數上，政法類專業只佔1.9%。³⁵

更為糟糕的是，國家恰恰在這個關口上，開始了畢業分配制度的改革。1988年，許多大學都實施了所謂的「雙向選擇」的工作分配政策。在這項新政策下，用人單位和學生都可以自主選擇，雙方都可以拒絕學校的分配方案，但對沒找到工作的學生，學校仍有責任為其安排工作。出於對舊的分配制度的不滿，大部分學生起初都很歡迎這項政策。可是，這項新政策一旦開始實施，80%的學生都對「你是否同意國家不再承擔為大學生分配工作的責任？」³⁶ 這樣的問題選擇了「不」的回答。這部分是因為80年代後期，好工作不多了，競爭變得非常激烈。這種形勢使「雙向選擇」變成了「由後門選擇」。學生們發牢騷說：

³¹ 即使到80年代末，大學課程仍深受過去的影響。在中國高校系統的826個專業當中，大約有200個是基礎理論學科（黎蕪1988）（中國學者一般稱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和地理學為六大基礎學科）。由於當時中國經濟還處於勞動密集型階段，這些領域的畢業生所學的東西通常與中國的經濟需求相去甚遠。

³² 劉向陽（1989，126）。

³³ 黎蕪（1988）。

³⁴ 楊力偉（1989）。

³⁵ 《光明日報》（1987）。

³⁶ 劉向陽（1989，127）。

「兒子負責搞成績，老子負責搞工作。」³⁷許多在1988-1990年間畢業的學生都有類似的感慨。他們舉例說，學習成績很差的學生因為父母有背景而找到好工作，成績優良的學生卻一無所獲。一位受訪者甚至堅持認為，造成1989年初怨氣在學生中瀰漫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新的工作分配政策的不滿。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不得不去競爭空中小姐或酒店招待之類的職位。³⁸其中一位受訪者是這麼來總結「雙向選擇」對她的同齡人的影響的：

我們這些從北京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的學生要找到稱心的工作是很困難的。我的一些同學畢業後有一些做了百貨店的店員，有一些去了建築公司，還有一些去了非常小的研究機構。我覺得非常悲哀，因為像國家部委、外貿公司和銀行這樣的好工作，只有那些有後門的人才能得到。³⁹而且，即使有好的工作，也會同時有好幾百人在競爭，最終仍然只是那些後門最硬的人得到這份工作。(第30號受訪者)

學習熱情跌落

在中國，上大學必須通過競爭非常激烈的高考。所以，通過高考的大學生們通常都有很強的精英意識，對未來也抱有很高的期望。⁴⁰

³⁷ 王殿卿等(1990, 131)。

³⁸ Hua and Cao (1988)；冬雷(1990)。

³⁹ 所謂「有後門」的人，是指那些能夠通過私人關係而得到好工作的人(這種關係最有可能來自學生的父母)。

⁴⁰ 李國慶(1988)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北京的好幾所大學，當學生被問到：「上大學前，你在中學裏得到過多少獎勵？」有80%的學生回答說至少得到過一項獎勵；在一些重點大學，這個數字則達到90%。在某重點大學一個班的45名學生中，每3.7個學生就有1個曾經因為成績出色而獲得過國家級或省級獎勵，每個學生都曾獲得過平均1.5個地區級或縣級獎勵，幾乎所有學生都曾獲得過校級或班級獎勵。甚至，即使是那些高考成績不是很出色的學生，實際上也都是當地的佼佼者。

這些學生一旦看到文憑的價值、大學的教育質量、尤其是自己未來的經濟地位大打折扣時，其挫折感是可想而知的。80年代後期，學生們越來越不關心學習了。

當我要求一些受訪者描述一下他們的大學日常生活時，那些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入學的學生的回答都很一致，也很簡單。除了睡覺之外，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但80年代後期入學的學生的回答可就千差萬別了。一些人仍在努力地學習，另一些人則平均每天只花兩三個小時來學習。⁴¹ 從下面的回答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學生是怎麼打發時間的：

我一般早上八點或九點起床。通常，我會讀一會兒書。但是如果有人來找我打麻將，我就會去。中午，女朋友上完課後……我們就一起去吃飯。如果她下午還有課，我就繼續打麻將。如果她沒課，我們就一起出去。吃完晚飯後，她一般會去圖書館。我則會找個藉口，還是去打麻將。(第48號受訪者)

這位受訪者告訴我，自大二以後他就很少去上課了；他還說，他們班大部分同學都是這樣混日子。⁴² 另一位受訪者(第45號受訪者)說，他選修的有些課程的曠課率甚至高達70-80%。學生普遍曠課這一問題在80年代末曾經引起廣泛關注。⁴³

在採訪中，我還請受訪者回憶一下他們每天大概有多長時間用在學習上。他們的回答顯示，從7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後期，大學生們花在學習上的時間一直在下降(圖3.1)。1978-1979年間，學生每天平均花9-10個小時在學習上。這個數字到1988年已降為5.5小時。我們還可根據學生的入學時間區分出四個明顯的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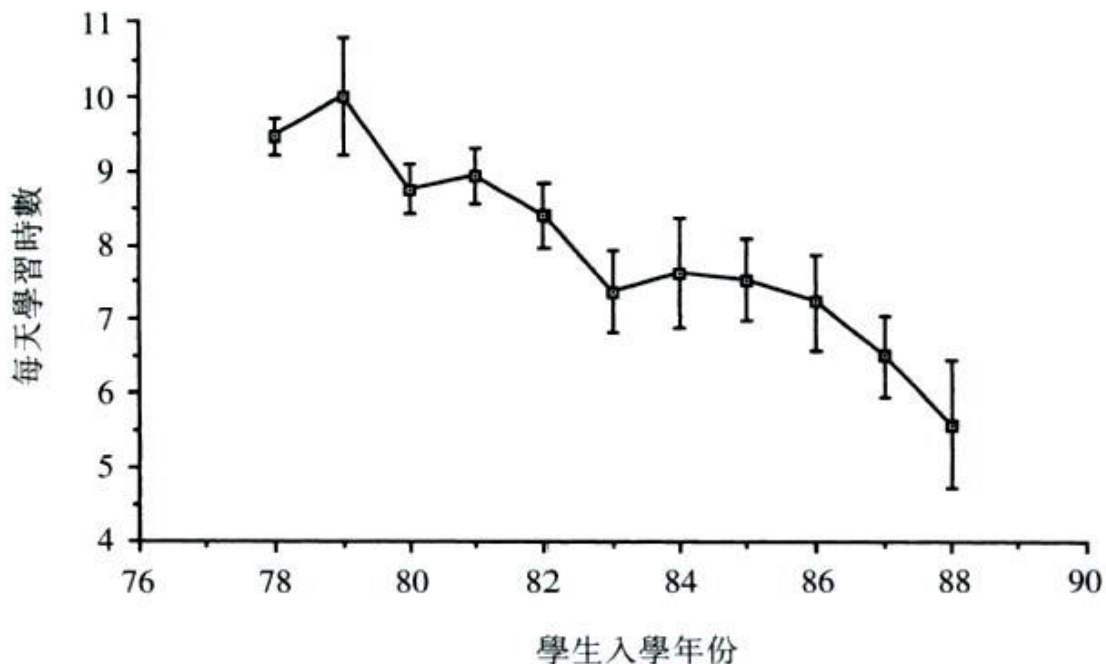
⁴¹ 這裏的「學習」是指跟課程有關的活動，包括上課和課後做作業。花在學習上的時間如此之少，表明這些學生不怎麼去上課。

⁴² 這位受訪者說，他平均每天花4小時來學習。在我的採訪中，最低的數字是2小時。

⁴³ 比如草日大(1989)及朱文濤(1988)。

年，⁴⁴這兩年間入學的許多學生曾經是紅衛兵或下鄉知青，⁴⁵他們的年齡較大，覺得文革浪費了他們的青春，所以他們一般學習都非常刻苦；與這一階段相對應的也就是一般社會上所說的「學習熱」時期。第二個階段大致在1980-1982年間，這幾年入學的學生大部分都是直接從高中上來的，他們學習的努力程度雖然明顯遜於文革一代，但總體上學習熱情還是很高的；這一階段大致對應於社會上所說的「文憑熱」。處在第三階段的學生是在1983-1986年間入學的，他們都受到於1984年開始的城市經濟改革的影響，學習熱忱也比先前的學生有較大幅度的退減。第四階段是1987-1988年間，在這個階段，中國的經濟改革陷入危機，通貨膨脹飆升，官員腐敗現象普遍，社會整體情緒低落，學生們的情緒尤甚，許多學生都十分厭倦學習；此時，一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的時機已經孕育成熟了。

圖3.1



⁴⁴ 1978年有兩撥學生同時入學，即1977年就參加了考試但推遲到1978年春季才入學的學生和1978年正常的夏季招生的學生。春季這一撥一般被稱為77級。

⁴⁵ 在60、70年代，中國政府把大約170萬城市青年送到鄉村；名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但主要還是為了解決城市中的失業問題。人們稱他們為「知青」。文革後，這批人中的大部分都回城了。進一步細節可參考Bernstein (1977)。

表3.3 學生專業與他們對「麻」、「托」、「旋」、「鴛鴦」四派的說法能否概括當時學生的普遍狀況這一問題之間的關係

	人文社科類專業	理工類專業
贊同	12	4
不完全贊同	3	9

註：對學生的這一劃分在1986~1989年間非常流行。因此，我在這裏的統計僅包括那些在1986年和1989年間入學的學生。在34名符合條件的學生當中，有28人被問及此問題。很明顯，在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中，認同這種劃分方法的人數要比理工類專業的學生多得多。 $(\chi^2$ 測驗， $p < 0.01$)

在80年代後期，一個流行的說法將中國大學生分成「麻」、「托」、「旋」、「鴛鴦」四大派系。「麻派」是指那些沉迷於麻將、撲克或其他遊戲的學生；「托派」是指那些積極備考TOEFL測驗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GRE考試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 以圖出國的學生；「旋派」是指那些整天沉溺於各類舞會的學生；最後，「鴛鴦派」則指那些把大量時間花在談情說愛上的學生。在採訪中，我曾問及受訪者這種說法是否概括了當時學校或班上的真實情況。對此，在28名1986–1988年間入學的學生中，有16人作出肯定的回答，另外12人則在做了各種各樣的說明以後也都給予了肯定回答；沒有人加以否認。

在回答最為肯定的16名學生中，有12人是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而在做出保留回答的學生中，只有3人來自人文社科類專業(表3.3, χ^2 檢驗， $p < 0.01$)。這也說明，人文社科類專業的學生相對於其他專業的學生，學習更不用功。⁴⁶

在所謂的「四派」當中，「麻派」和「托派」在我的受訪者的敘述中佔多數。⁴⁷ 一位受訪者(第26號受訪者)回憶說，她所在大學的學生非常

⁴⁶ 學生在宿舍裏花很多時間閒聊，還有一些學生則忙着參加或者組織各種聚會和討論。這些活動對學生們的政治行為造成很大影響。關於這方面的更多討論，可參考第二章和第四章。

⁴⁷ 出國對學生政治行為的影響將在第五章討論。

沉迷於麻將，他們不僅白天玩，甚至還玩通宵。她告訴我說，當晚上11時宿舍統一熄燈以後，學生們就把桌子搬到走廊，借着走廊上的燈光繼續玩。沒有人會抗議他們的喧鬧，因為其他人不是在玩，就是在看。學生們在玩麻將時通常還進行賭博，賭博的輸贏有時候甚至會導致學生們大打出手。另一位受訪者(第30號受訪者)回憶說，這樣的爭鬥是她所在班級男生之間關係緊張的一個主要原因。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學生都沉溺於「四派」的活動。比如，有些學生開始在校內外打工，另外一些學生開始做生意，一小部分有政治興趣的學生則開始捲入各種「異端」活動。

高等教育和學生的激進主義

在本章，我已經闡明中國大學在改革後的大幅度擴招所導致的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是導致八九學運之前學生們不滿情緒的一個主要原因。大學的大幅度擴招在其他國家同樣會導致頻繁的學生運動：比如在拉丁美洲的兩次革命潮流中(1956–1960和1965–1975)，經歷過大學大幅擴招的那些國家的學生都與游擊隊革命運動有密切聯繫；⁴⁸在西歐和北美，大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過度擴招也曾引發過「文憑危機」，並因而推動了60年代的大規模學生運動；⁴⁹但是，西方的諸多學生運動，包括在當代觀察家眼中非常激進的60年代的學生運動，很少能在規模上與八九學運相提並論。⁵⁰這是為甚麼呢？

⁴⁸ Wickham-Crowley (1992, ch. 3 and 9).

⁴⁹ Collins (1979), Lipset (1972) 及 Scott and El-assal (1969)。Hall (1985b) 也認為，60年代英國的學生運動之所以要比其他發達國家來得少，主要是因為英國的招生政策比較謹慎；同時，英國的教育系統也為一些初級的研究人員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⁵⁰ 就規模而言，在八九學運中，像4.27遊行(見第六、八章)這樣一個關連事件的參與率，在北京幾所主要大學裏高達90%。而在西方國家，還沒有哪次學生運動的參與率能達到如此高的水平。

在這一節，我將對該問題做一個比較性回答。⁵¹ 正如在導論中已經提及的那樣，我的核心觀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學平民教育崛起之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大學基本上是一個保守的機構；而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激進機構出現的，並在發展過程中保持了這種激進特徵。⁵² 這是造成西方的大學生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大學生之間政治傾向不同的重要背景之一。

歐洲早期的大學，比如巴黎大學、波羅尼亞大學和牛津大學，都是從12世紀出現的教會學校演變而來的。⁵³ 14世紀以後，大部分中世紀的大學都處於國家和教會強有力的控制之下。⁵⁴ 在19世紀以前，大學的主要功能是培養神職人員和國家官僚，⁵⁵ 其課程主要是教會法、民法、醫學和神學這些根植於拉丁基督教文化的課程，學生則幾乎是清一色地來自上流社會。⁵⁶ 簡單地說，中世紀大學在本質上是西歐的

⁵¹ Lipset (1967) and Altbach (1981; 1989) 曾指出，大學生在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中具有更大的影響：與西方同輩相比，他們更多地來自高層的社會—經濟群體；由於與精英群體聯繫緊密，他們構成了公眾輿論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同時，因為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夠接受大學教育，他們的地位也很特殊。在做出這些判斷時，Lipset及Altbach無疑是在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當代大學生。不過，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是，傳統的西方上流社會中的學生也具有所有這些特徵，但他們在政治上是保守的；而且，西方學生恰恰是在高等教育失去貴族特徵時，才開始變得政治化的。

⁵² 有必要對這裏的說法做一個說明。我說歷史上的西方大學是保守機構時，並不意味着貴族學生就不參與任何集群行動。比如，在早期的歐洲大學中，大學生會經常因為租金或其他問題而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 (Haskins 1971; Rait 1971)。同樣，學生和系裏的衝突也是美國大學的特徵之一 (Horowitz 1987)。不過，除1848年的德國之外，西方學生在60年代之前從未捲入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⁵³ 關於西方大學的起源，見Haskins (1957) 及Rashdall (1936)。

⁵⁴ Baldwin and Goldthwaite (1972); Lytle (1974); Riddle (1993)。

⁵⁵ Lawson and Silver (1973); Lytle (1984); Ringer (1979)。

⁵⁶ 這種情況在歐洲隨着時間和地點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比如，在牛津大學的早期歷史上，平民學生的數量實際上超過神職人員和貴族學生的數量；但到工業革命時期，平民學生卻完全消失了 (Stone 1974)。正如Vaughan and Archer (1971, 213) 所論證的，這不是因為中產階級家庭支付不起教育費用，而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經常因為社會和宗教的原因而被拒於大學門外。

本土產品；⁵⁷ 從形成的那天起，它就一直是一種「在知識上體現既有權威的手段，無論這種權威是屬於神的，還是屬於人的」。⁵⁸

在歐洲，國家和中產階級的共同努力最終迫使教會勢力在大學裏逐漸淡化。⁵⁹ 此後，中世紀大學才慢慢轉變成現代大學。這一轉化過程的時間很漫長，進行得也非常平緩。中產階級學生逐漸進入大學，教會主導權逐漸衰落，現代課程的設置也是逐漸地被引入的。⁶⁰ 等到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多起來時，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了。這個階級的成員往往仰慕貴族文化，對激進變革並不感興趣。另外，大學的現代課程本身也是拉丁基督教文化自然發展的結果，因此對本土學生的革命性影響要比對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小得多。可以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西方大學就一直是一個保守的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正如其他奢侈商品變得平民化一樣，市場力量也進一步推動了西方大學的平民化。⁶¹ 不過，即便是現在，經歷過60年代新左派運動之後的今天，西方大學仍然保持着種種保守機構的特徵。

但是，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而言，大學是舶來品，很少或者完全不具備本土文化的根基，它往往是作為一系列被動變革的一部分而建立的。發展中國家的大部分大學是由殖民主義勢力建立起來的，其目的是傳播西方宗教或培養基層官僚以治理殖民地；如果某個大學不是由外來殖民力量而是依靠本土力量建立起來的，其目標也是為了向

⁵⁷ Cobban (1975).

⁵⁸ Riddle (1993, 48).

⁵⁹ 韋伯曾正確地指出：「在所有關於教育體制基礎的討論的背後，新型的『專家型人才』和舊有的『教養型人才』的鬥爭往往是關鍵的一環。」(Vaughan and Archer, 1971, 題記)

⁶⁰ 儘管法國的教育改革更為激進，但教會在大學的主導權在法國大革命後仍然維持了很多年 (Vaughan and Archer, 1971)。直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中產階級的學生才開始大規模進入大學。(Worms 1971)

⁶¹ 正如Halsey所指出的，「煤炭和蒸汽工業時代的歐美大學的歷史」，是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築」的其他因素對經濟變遷帶來的壓力所進行的一次成功的抵抗 (引自Ringer 1979, 7)。

西方學習以改造本民族。對所有非西方的本土文化來說，大學所教授的課程都是外來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大學生都來自上層家庭。⁶² 然而，與歷史上西方國家的同齡人不同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大學生往往感到他們自己的文化正在消亡，他們無法像西方國家的那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那樣，在體制內成熟並最終融入該體制。在被動的社會變遷的壓力下，他們在經濟上也無法再保持傳統的貴族生活方式（即使他們希望如此），類似的危機感是西方的貴族學生所從未經歷過的。

在發展中國家中，大學發揮着雙重作用：一方面，它傳播西方文化以推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它鼓勵學生認同本土文化以維護政治穩定和民族情感；⁶³ 然而，這兩項任務在根本上是矛盾的。一旦學生認識到西方文明的「魔力」，而面對的是一個大多數人口仍然按照傳統方式生活的社會時，他們的思維方式往往會變得激進起來。當殖民勢力依然存在，國家政權依舊軟弱時，學生們往往會轉向民族主義、共產主義，甚至是法西斯運動。而國家獨立後，他們往往又會把自己窘迫的經濟條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歸咎於本土文化的落後、政府領導階層的腐敗，以及制度安排的不合理，這使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們尤其容易捲入政治。⁶⁴

除文化之外，國家的性質也是塑造大學性質的力量，而且很可能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力量。跟威權政體之下的大學相比，民主制下的大學更具有保守性。這有兩方面的政治原因：首先，正如本書的導論已經論述過的，大部分民主國家不像威權國家那樣，需要借助一場超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工程來使其政權合法化；因此，在民主國家中，產生

⁶² 關於中國的情況，見Israel (1966, 5) 及Yeh (1990)。

⁶³ Lipset (1967)。

⁶⁴ 比如，在印度，學生是民族獨立運動中的一支主要力量 (Altbach 1968b; Shils 1968)。在韓國和泰國，學生運動屢屢導致政府垮台 (Douglas 1971; Kim 1989; Samudavanija 1989)。在伊朗，學生和世俗知識分子也是伊斯蘭革命早期的主要力量之一 (Bashiriyeh 1984; Malani 1994)。在中國，在共產黨上台之前抵抗日本侵略的學生運動此伏彼起。

針對國家的普遍不滿的可能性較小。其次，民主國家不對思想、結社自由施加嚴厲的限制，而這些自由對知識分子的生活至關重要；從長遠來看，這些自由卻能把各式各樣的問題、視角和政治力量帶入政治舞台。因此，在民主制下，社會問題往往是在局部發生、並在局部得到解決；各種社會群體的政治利益相互分隔；眾多政治力量和話語之間的相互衝突反而會給予人們一種現實感，甚至會使人們開始對政治冷漠。在這個意義上，在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威權政體中，大學不僅是作為一個激進機構而誕生的，其激進的特徵還是通過特定的國家·社會關係而得以維繫的。特別是，如果我們比較一下中國的大學和另一個發展中大國——印度——的大學，這個觀點就會變得更清楚。印度的大學生同中國一樣，都具有很強的學生運動傳統。但是，在印度獨立以後，印度的大學生已越來越不可能組織一場全國範圍內的統一的學生運動，而中國的學生運動卻至今仍是左右國家政治的一股重要力量。⁶⁵

結 論

本章考察了對政治一般來說並不熱衷的普通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心態。在我看來，80年代國家政策的變動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造成了相當大的不滿。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戰略從「四個現代化」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轉變。這一新的經濟政策直接導致了知識分子和學生經濟地位的下滑，而其他國家政策又進一步擴大了新政策所帶來的影響。其中最為明顯的是1978年以來大學招生的大幅度增長。擴招不僅使知識分子進一步貶值，更重要的是，它為學生運動提供了大量人力資源。

擴招還造成了其他問題。擴招和隨之而來的國家對教育投資的不足，使教育質量和學生生活質量大幅下滑。擴招也導致大學畢業生相對供過於求，學生們在畢業後很難找到滿意的工作。結果，學生們在

⁶⁵ 見Altbach (1974) 及 Shils (1968) 就印度的情況所做的進一步的討論。

80年代後期對學習日漸失去興趣，把越來越多的時間花在玩麻將、打撲克、準備托福測驗、參加舞會，或者談戀愛上。

本章同時還想闡明，同西方大學相比，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大學是一個有激進傾向的機構；這既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首先，在發展中國家，大學通常是舶來品，沒有甚麼本土根基；它傳授外國文化，從而成為被動現代化和反傳統的動力，可以說，發展中國家的大學自其誕生之日就是一個激進機構。而且，當這樣的大學處於轉型中的威權政體之下時，就會顯得尤其激進，因為在這種類型的政體中更容易出現大量的針對國家的不滿。

人們普遍認為八九學運是一場「親民主運動」，但一些學者以學生在運動中使用的傳統語言為由，質疑八九學運的民主性質。⁶⁶我在研究中發現，運動參與者其實上可以分成兩類：一小部分積極分子確實把民主視為這場運動的首要目標（見第二章），但大部分學生的參與卻起因於對中國正在崛起中的市場經濟的不適應——正是後者構成了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我發現，在80年代，中國的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普遍認同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政治自由，他們中的許多人也自認為是市場改革的支持者，但他們既不信任國家，也不理解何為市場經濟，他們認為經濟改革一定會給知識分子帶來更多的好處，而一旦實際情況恰好相反，他們就憤怒了；於是，當為數不多的激進學生發起這場運動時，其餘的人也因不滿社會而旋即捲入了這場運動。然而，對這些學生和知識分子來說，民主僅僅是一種「借來的語言」，而不是一個明確的政治綱領；民主對於他們的意義類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西方早期工人階級運動的意義。⁶⁷

⁶⁶ 比如，Pye (1990) 就認為，八九學運中，學生們只是拿民主作幌子，實際上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公開爭取自己的利益會被看作是「自私」而遭受譴責。

⁶⁷ Calhoun (1983) .

大學生控制系統的衰落

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我討論了知識分子群體在八九學運的興起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學生群體產生不滿情緒的特殊根源。然而，歷史經驗一再表明，一個社會中即使有大量的不滿人群，但只要國家能夠對其實施有效的控制，就仍然可以避免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或革命。事實上，自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以來，許多學者都注意到，一個非常專制的國家裏一般不會發生革命；可是，一旦國家為應對國際競爭或國內壓力，不得不放鬆或改變其既有的政治控制方式時，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或革命就有可能爆發。¹ 在本章，我將考察80年代中國大學的學生控制系統。我的研究表明，經濟改革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結構的變化，大大地削弱了大學的學生控制系統。學生控制系統一旦遭削弱，就會加快叛逆觀念從知識精英群體向不滿的學生群體的擴散，從而對八九學運的爆發起了實際的推動作用。

本章將首先對中國大學的學生控制系統的結構和常規的學生控制渠道，進行一個概括的描述，然後考察中國政治控制系統的基礎及存在的問題。接下來，我將討論在毛澤東時代，曾經有助於控制學生的校園環境如何變得有利於學生運動，並分析北京各大學的政治控制系統在政治控制衰弱之後如何反過來被用於推進運動。最後，我將使用一些定量材料論證上述主要觀點。這些定量分析將一個學校的政治控制有效性與該校學生在八九學運中的激進程度聯繫起來，並指出弱化的學生控制系統與學生運動激進程度之間的關聯機制。

¹ Collins (1981b) ; Huntington (1968) ; Skocpol (1979) .

學生控制系統的結構和常規渠道

同大部分東歐共產黨國家相比，中國的政治控制在八九學運之前對秘密警察的依賴要少得多。² 5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政治控制主要是由在基層黨支部領導下的普通積極分子來完成的；³ 這種被稱為「內部控制」的控制手法與中國文化是一脉相承的，⁴ 它也反映了毛澤東對制度化政治的反感，以及共產黨上台掌權的法門。

在大學裏，負責學生事務的最高組織是學生工作委員會。它負責制訂控制策略，並評估學生的情緒和控制措施的效果，這個機構通常由一名校黨委副書記負責。到了80年代，隨着一些大學採取校長負責制，一些非中共黨員的副校長也可以領導該委員會。在學生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有兩個負責學生日常管理工作的組織，分別是負責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青年工作部（或學工部）和負責招生、工作分配、註冊、獎懲等事務的學生處。80年代中期以後，有一些大學將這兩個部門合而為一。

再次一級的控制組織是各系的學生工作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通常由三位系級幹部組成，分別是系黨總支副書記、系副主任和系團總支書記，負責領導各班的班主任和輔導員；各班主任或輔導員則負責一個班，從而構成大學基層學生控制系統的基本單位。1978年以前，許多輔導員都專職從事學生工作，但改革以後，輔導員的規模大大縮小，一些大學正式取消了專職的輔導員，其工作由青年教師甚至高年級學生兼任；另一些大學甚至取消輔導員這個崗位，其職責轉移到班主任身上。班主任一般由青年教師擔任；名義上，班主任的職責是提供學習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幫助；但事實上，班主任就像一個班的「保姆」，從學生因失戀而導致的心理創傷到日常的班級工作，事事都得過

² 跟東歐共產主義國家不同，中國共產黨是在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勝利的基礎上逐漸奪取政權的，這為它贏得了堅實的群眾基礎和堅固的合法性。對統治這個新成立的共產黨國家來說，它不真正需要一支力量強大的秘密警察。

³ 見Schurmann (1968) 關於毛澤東時代中國國家控制系統的討論。

⁴ Parish and Whyte (1978) ; Whyte and Parish (1984) ; Troyer (1989) .

問。所以，在下面的討論中，我有時把班主任和輔導員都作為政治工作者來對待。⁵

中國大學的政治控制往往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或是學生控制人員的直接干涉來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分為兩部分：首先，學生要修幾門必修課；這些課程的目標是介紹馬克思主義，敦促學生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以及中國社會的基本價值體系，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課程有「中國共產黨史」、「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時事政治」等等。1987年後，許多大學嘗試通過一些新的方式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增加了一些新的課程，比如「法律基礎」、「思想道德修養」、「職業倫理」及「人生哲學」等。其次，學校一般都會要求學生每週抽出一個下午來進行政治學習，內容包括有關的政府文件和報刊文章等等。雖然學習討論會由班長主持，但班主任或輔導員也經常來參加。

班主任或輔導員負責日常的學生管理工作。80年代以後，尤其是在取消了輔導員制度的大學裏，班主任的角色變得越來越重要。他們的任務包括監督每週例行的政治學習，以至傳達、解釋大學或國家的最新政策，閱讀、討論重要的報刊文章，選拔優秀學生，批評乃至決定違反校紀的「差生」的處罰程度等方方面面的事務。班主任或輔導員也會前往學生宿舍，跟學生談心。80年代早期以前，一個班主任或輔導員身邊通常會有好幾個學生積極分子，他們主要通過這些積極分子瞭解學生的情況，甚至包括學生的私生活。而這些學生積極分子一般也會因而得到一些特殊資源，比如入黨、分配好的工作，甚至是獲選拔到領導位置等等。⁶ 但是，當政治環境變得十分惡劣時，比如在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即使不是積極分子的學生也開始相互揭發。⁷

⁵ 共青團也是對學生進行政治控制的一個渠道。黨委委托青年工作部管理團委的工作，同時團委可以指導包括官方的學生會在內的各種學生組織的工作。見 Francis (1991) 關於北京大學官方學生組織的更詳細的描述。

⁶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見 Shirk (1982) 和 Unger (1982)。Unger 的論題是關於中學生的，但他的一些論述同樣適用於大學生。

⁷ 一位受訪者講述了他的父親在反右運動中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我父親在宿舍裏談論50年代他們當地的饑荒，當時誰也沒有把他的話放在心上。但反右運動開始後，其他學生就把這件事報告了學校。因為還有一些右派名額需要完成，於是我父親就成了學生右派。畢業後，他被遣送到東北。」

政治控制系統的問題

毛澤東時代的這種以「內部控制」方式運行的政治控制系統的效率是非常高的，⁸但到80年代改革期間，這一系統衰落得非常厲害。⁹然而，無論是它的高效率，還是它的迅速衰落，都根源於這個系統自身的一些特性。在這一節，我將勾勒這一政治控制系統的基礎及其存在的主要問題。

內部政治控制系統的基礎和特性

毛澤東時代高效率的政治控制系統是以如下四個條件作為基礎的。第一個、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個條件，就是共產黨政府在80年代之前還享有高度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因此，政治工作者和大量學生不但積極地相互監督，並且認為這種行為是合乎道德的（即使可能會危害他人的事業甚至生命）。大多數人都或多或少地認為，對他人的監督甚至揭發是有利於國家的。就這樣，在這種行為背後，個人利益和政治信念實現了統一。我和丁子霖的一次非正式訪談很好地揭示了這一點：丁子霖自從兒子在1989年6月3日晚上的軍事鎮壓中罹難之後，就成了激進的異見分子。她告訴我：「1957年的那些右派學生實際上都是有思想的好學生。但是，我們這些幼稚的學生卻嚴厲地批判他們。現在，每每想起這些事情，我都深感內疚。」

第二，對學生來說，從事政治工作是最好的進身之階。在毛澤東時代，除去文革高潮那段時間，學生控制人員一般很少受到政治迫害，大學中較高的職位也主要面向那些在政治工作中表現良好的學生。一個年輕的政治工作者，如果仍然想當一名學者，政治表現將有

⁸ Rosen (1985; 1990) 和 Shirk (1982) 也曾做過類似的考察。

⁹ 政治控制只是學生控制系統工作的一個方面。因此，這裏的分析並不是說整個學生控制系統都衰落了。80年代後期，學生幹部仍然在學生的道德行為、學習成績和其他一些非政治活動中發揮作用。而且，中國政府也曾做出種種努力以試圖加強對學生的控制，取得了一些效果。不過，相比80年代後期的社會大趨勢，中共在政治控制方面所做的努力之收穫可謂微不足道。

助於他更易獲得講授好課的機會，或更有機會被領導任命為一個科研小組的領導。

第三，作為共產黨社會改造計劃的成果之一，到1989年為止，北京共有67所高校，其中大部分位處海澱區及其附近，學生總數超過162,572人。¹⁰ 在學校裏，每個宿舍一般住六至八個學生，一棟宿舍樓往往能容納上千名學生。這種居住環境非常有利於學生之間的相互監督，尤其是學生認為這種監督行為是道德的，並且會給自己帶來好處時。¹¹

第四，在毛澤東時代，學生控制人員手中掌握着一些有效的手段，可用來獎勵那些聽話的學生或懲罰那些「政治落後分子」。比方說，黨票用以獎勵「好學生」，「差學生」分配以差的工作作懲罰。¹² 某個學生一旦被認為犯下了嚴重的政治錯誤，這些學生控制幹部就有權決定採取何種懲罰，並把這些懲罰寫進這個學生的檔案裏。這些檔案將伴隨這個學生走上工作崗位，並會嚴重影響他的前途。

然而，經濟改革使國家·社會關係發生了迅速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下降，以及國家之外的新的進身渠道的拓展。國家·社會關係在這兩個維度上的變化，使得學生之間的那種積極的相互監督不僅在政治上變得道德，而且在經濟上也毫無意義，並最終動搖了內部政治控制系統的基礎。

例如，許多懲罰措施在80年代紛紛失去效力。1978年以來，中國政府將經濟發展置於首位。由於經濟發展需要知識分子的合作，政治氣候不得不放寬。於是，國家一般不再鼓勵政治控制人員用嚴厲的措施懲罰學生。而且，隨着國家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下降，在檔案中留下不良政治記錄不再是一場噩夢；相反，政治上的異見分子通常會得到

¹⁰ 這個數據來自《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89)》和《中國高等教育大全(1989)》。該數據不包括走讀、夜校和函授的90,927名本科生在內。

¹¹ 在註7中所引的那位受訪者(第15號受訪者)的敘述就可以很好地說明大學宿舍具有增進學生之間的相互監督的功能。

¹² 直到80年代後期，國家仍然要對學生的工作實行分配。在這一制度下，成績不好、政治表現差或跟學校當局關係緊張的學生，通常都分不到好工作。

他人的尊敬。最後，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就業於私營、合資或外資企業，工作分配制度越來越失去意義，尤其對那些學生積極分子而言。以我在1993年採訪的六個學生領袖來說，他們雖然在軍事鎮壓之後要麼被關進監獄，要麼被學校開除，但並沒有人反映說此後找工作有很大的困難。事實上，我在北京尋找當年的學運積極分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到了1993年初，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到南方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去了。

可是，絕大多數學生並不需要甚麼嚴厲的制裁，就能使他們遠離反體制的政治活動。事實上，大學的政治控制系統在80年代早期仍然非常有效，其作用在短短幾年之內迅速衰落，是因為該系統的兩個特性所致，使它在面對不斷變化的國家·社會關係時顯得特別脆弱：首先，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對國家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是極為敏感的，專業控制系統的有效性往往依賴於竊聽、監控等先進控制技術，而內部控制系統的有效性則主要依賴於人們的合作。只有當大部分學生和基層政治控制人員以合作的態度參與到相互監督之中，並視之為道德行為時，內部控制系統才能行之有效。其次，內部控制系統的有效性也跟一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報酬模式緊密相關。一個國家只要有足夠的財力，就能為職業秘密警察提供報酬。對於在內部控制系統下人數眾多的非職業人員來說，國家要做到這一點顯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不僅國家的花費過於昂貴，另一方面，這些並非職業的控制人員和學生積極分子也會因為收取報酬而成為「警察」，從而與其他學生拉開距離。內部政治控制在這種情況下很快就會失效，因為內部控制只有當被控制者把控制人員看作「自己人」時才是行之有效的。接下來，我將進一步論述與中國大學的政治控制系統聯繫在一起的諸多問題，同時會討論一個更為一般性的問題——衰落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和下降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中國政府對中國高校學生的政治控制。

學生控制人員士氣的低落

我在上文已經提到，內部控制系統在毛澤東時代非常有效，主要是因為大批積極參與相互監督的政治工作者和學生，或多或少都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有益於國家的；然而，這種想法在經濟改革之後就越來

越難以站住腳了，因為市場導向的改革需要開放政策。自改革以來，越來越多海外華人和西方人來到中國，同時也有越來越多中國人出國，¹³ 國內旅遊也越來越興盛。許多大學生都養成了收聽美國之音 (VOA, Voice of America) 和英國廣播公司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節目的習慣，並在很大程度上將此作為學習英語的手段。¹⁴ 富裕的西方，尤其是台灣和韓國的經濟奇跡，跟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的可憐的經濟成就，三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中國廣大民眾的眼裏，共產黨政府遠未兌現其許諾。伴隨文化大革命的苦難記憶和正在興起的國際民主化浪潮，人們對國家社會主義和政府的信仰大為減弱，這種現象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顯得尤為突出。¹⁵

意識形態合法性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的衰落，從我的採訪中也得到證實。在回答「八九學運之前，你對四項基本原則持甚麼看法？」這一問題時，60位受訪者中有21人(35%)的態度是堅決反對，有9人(15%)表示完全接受，剩下的一半人在表示接受的同時附加了不同的保留意見。在這些持保留態度的人中，大部分人接受這些原則並不是因為他們確實贊同這些原則，而是出於一些實用方面的考慮。只有為數甚少的學生和青年老師完全接受國家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在持保留態度的受訪者提供的答案中，下面兩個回答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我的基本看法是，我們國家應當盡可能地保持穩定。穩定對經濟發展確實有好處。國家要發展，這才是最關鍵的。這個原則也好，那個原則也好，都只是次要問題。(第45號受訪者)

我不贊同四項基本原則，但我認為這只是個形式。四項基本原則的內容是可以發展和調整的，這一點許多人都明白……只要改革能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就行了。(第68號受訪者)

在這兩個案例中，受訪者或多或少都表示可以接受四項基本原則。但這並不是因為他們確實信仰這些意識形態本身，而是因為他們

¹³ 見第五章或Zhao (1996) 所做的更為詳細的討論。

¹⁴ 全京聯(1990)；He and Zhu (1994)。

¹⁵ 見Hayhoe (1989) 和 Ho and Huenemann (1984) 就「開放」政策所做的其他描述。

感到只要國家能夠保持穩定並沿着正確的方向發展，這些原則就不會令他們感到困擾。對於這些受訪者來說，一旦認為國家的走向發生偏差，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反對；這就是為甚麼此類受訪者中的大部分都參與了八九學運的緣故。

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衰落所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青年教師不再願意從事思想政治工作。即使不得不進行這項工作，他們一般也不再會嚴肅對待；而且，即使有些人確實很嚴肅地對待這項工作，也不會有多少學生跟他們合作，原因在於這項工作的性質常常會使人聯想到那段極左的歷史，以致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再受尊重，在開展工作時，更往往受到嘲笑和譏諷。¹⁶

在80年代，為了監測政治控制的有效性和學生的情緒，中國高層的學生控制機構曾進行過多次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越是逼近1989年，政治控制就越是軟弱無力。例如，1986年劉慶龍在北京一所大學對隨機抽樣的344名學生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表明，有57.8%的學生對政治課程表示不滿，表示滿意的只有14.3%，餘下的人則持中間立場。1987年，劉慶龍在同一所大學就同一問題再次進行調查，樣本規模為993人。結果，對政治課程表示不滿的比例增加到63.6%，而表示滿意的比例則急劇下降到6.7%。很明顯，學生對陳舊的政治教育模式越來越感到不滿。在北京進行的另一項調查提供了一個可資比較的結果。¹⁷ 在這項調查中，學生被問到他們是否贊同下面兩個說法：(1)「資本主義將會使中國發展更快」，(2)「我對當前的改革不抱希望」。表4.1總結了學生們的回答。正如該表所示，學生對前一個問題做肯定回答的比例在1986年之後大大增加了，而對中國改革抱有希望的人則越來越少；換句話說，越來越多學生認為資本主義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學生們的心態同大學校園內日益熾烈的激進氛圍是一致的。

¹⁶ 全京聯(1990)；鄔大淵(1993)。

¹⁷ 王殿卿等(1990)。這項調查是在北京的16所大學裏進行的，樣本規模為1,104人。

表4.1 學生對兩個說法的反應：(1)「資本主義將會使中國發展更快」；
(2)「我對當前的改革不抱希望」

回答	1986 (%)	1987 (%)	1988 (%)
同意 (1)	16.8	28.7	34.3
同意 (2)	23.2	51.7	58.9

資料來源：王殿卿等 (1990)

因此，當北京的學生對影響他們意識形態形成的11項因素就重要性進行排序時，他們把班主任和輔導員排在第九和第十的位置，僅在系領導和校領導之前，¹⁸ 而當前政治潮流、報紙雜誌、父母、文學作品和朋友等因素則位居前列。儘管我們缺乏有關政治工作者在毛澤東時代的影響力的對比性數據，但考慮到政治工作者在改革前對學生擁有的權力，就不難設想他們當時的影響會比改革開放後大得多。

對學生控制人員缺乏物質激勵

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大中學生和青年教師的晉升渠道。在1978年以前，與黨組織搞好關係曾經是獲得較高政治經濟地位的最重要的晉升渠道，但在改革後，對政府的政治忠誠變得沒有什麼意義了。

在毛澤東時代，除開文革初期，對黨保持政治忠誠的學生遭受政治迫害的可能性比其他學生要小得多。與此同時，他們入黨的機會要大得多，而入黨是獲得政治地位的金鑰匙。這些政治忠誠的學生在畢業後，或在不再從事政治工作這一行之後，要比其他人更有可能獲得理想的工作機會。而且，大學中較高的政治和行政職位也是向那些在政治工作方面表現突出的人優先開放的。

然而，改革開放改變了這些晉升渠道，使政治上的積極逐漸淪為一個不明智的選擇。自80年代早期以來，工作分配往往是以成績而不

¹⁸ 劉慶龍 (1990)。

是政治表現為基礎。到80年代末，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化，許多大學甚至開始嘗試取消工作分配制度，讓學生自己去找工作。與此同時，改革也在國家的控制範圍之外打開了許多新的、可供選擇的個人發展渠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到非國有部門工作或出國留學。

畢業後留校曾是學生所能得到的最好工作之一。到80年代後期，隨着知識分子的經濟地位一落千丈（見第三章），這一情況也發生了改變。對一個選擇留校的青年教師來說，在校內做政治工作比教書更沒有前途，青年教師有機會被派往國外從事研究工作，而政治工作者在這方面的機會要少得多。從80年代後期開始，一些研究者可以從自己獲得的科研經費中支付自己和助手的報酬，相比之下，政治工作者就很少有灰色收入的渠道。

在大學從事政治工作也不再是仕途發展的不二法門。80年代早期，為了錄用具備改革思維的年輕官員，鄧小平曾要求數百萬幹部退休，餘缺由剛畢業的學生來填補。¹⁹ 當時許多高層領導，包括總書記胡耀邦，都是共青團系統出身，因此，以學生積極分子和系團委書記的身份開始政治生涯，對許多學生都具有強大的吸引力。然而，隨着職位的飽和、胡耀邦的辭職和改革的深化，這一希望逐漸破滅。正如一位系黨總支副書記所指出的：

現在看來，通過這條路很難在仕途上取得成功。如今，在大學只有兩條路對仕途升遷有幫助：要麼是在學術上成名，包括從西方大學獲得學位，然後再轉入仕途；要麼就是成功地經營起一座校辦企業，²⁰ 只要你辦得好，你的能力就會得到認可。（第44號受訪者）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大學就招不到足夠的政治工作者，因為對於一些想留在大城市而又無其他門路的大學生來說，這一位置還是有吸

¹⁹ 楊曉偉、崔少鵬（1989）。

²⁰ 在中國，大學可以同時興辦工廠或公司，其利潤的大部分被用來支付院系職工的獎金。在一些學校，獎金額甚至可以超過工資。

引力的。在80年代，許多來自農村的學生畢業後都想留在大城市，由於當時仍很嚴格的戶籍制度的限制，留校從事政治工作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出路。對另外一些學生來說，他們希望留校做政治工作，是因為大學政治工作者這一位置和其他工作相比，不但可以為他們提供更多的與外界和國外人士聯繫的機會，還使他們有更充裕的時間為出國而準備托福測驗和GRE考試。不過，儘管當時大學仍能從學生中招到足夠的政治工作者，卻無法繼續保持政工隊伍的穩定。一位受訪者(第2號)告訴我，他們班11個曾經從事過班主任或輔導員工作的同學，現在都離開了大學：有6個去了公司，另外5個去了美國和加拿大。這種情況並不僅發生在普通的基層政治工作者之中。前面提到的那位系黨委副書記告訴我：

[1986年畢業後，我被分到校園委工作]。還有七八個和我一樣的學生得到了類似的工作。除了我之外，現在他們都不再從事政治工作了。至少，他們中沒有人仍像我現在這樣單純地從事政治工作了。在他們當中，有一個下了海，兩個去了公司，還有兩個出國了。剩下的一兩個雖然還在學校，但都換了工作。²¹

八九學運之後，許多發表在中國青年刊物上的文章都談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這些文章提到，有65%到70%的青年教師把大部分時間用在學習英語和準備出國上，²²有超過75%的政治工作者表達了離職的想法。²³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有人認為：大學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嚴重的問題，在於政工隊伍的不穩定。²⁴

²¹ 八九學運之後，為了阻止學生控制系統的繼續弱化，中國政府曾試圖提高大學學生控制人員的地位。比如，1993年我開始在北京進行調查的時候，發現大學的學生控制人員不但獲得了相應的學術職稱，還漲了工資。但問題在於，大多數中國人，包括這些政治控制人員本身，通常並不看重這些學術職稱；與此同時，與其他行業的工資漲幅相比，這些人員的工資增長也不明顯。

²² 何沙(1992)。這一結果來自在北京一所理工類大學所進行的調查。

²³ 全京聯(1990)。

²⁴ 鄒大淵(1993)。

政治控制的衰落和學生運動動員

我在上一節中曾簡要提及毛澤東時代學生的生活環境和校園的佈局是如何有利於校方對學生的控制的。現在，我將闡明，大學的學生控制系統一度有利於控制學生，但在衰落之後，反而助長了學生運動的生成，而且連原來為政府控制學生服務的學校政工隊伍也在推動學運的發展中起了作用。

校園環境和異見觀念的傳播

在這一節，我將說明宿舍環境是怎樣有助於「異見性」觀念 (dissent ideas) 在大學的傳播的 (第八章將更為細緻地分析校園環境如何促進了學生動員和八九學運的發展)。中國大學的大部分本科生都住在學校的學生宿舍裏。這種高度集中的生活環境非常有利於「異見性」觀念的傳播，尤其是當國家無法再約束學生在宿舍內的生活時。

在我的採訪中，大多數受訪者都談到，他們每天都會花上幾個小時在宿舍聊天。雖然政治或政治不滿並不總是談論的主題，但當社會經濟環境惡化時，它確實會成為他們的熱門話題之一。到80年代後期，學生宿舍成了「異見性」觀念藉以傳播並主導學生思想的主要場所之一。當我問受訪者：「你在宿舍談論敏感的政治問題時，不擔心其他學生揭發你嗎？」54個接受採訪的人中，有52人回答說根本不擔心，只有兩個人表示了某種程度的擔心。下面的評論可以反映出這種滿不在乎的態度：

我並不擔心這個問題。我不認為有誰會揭發我。即使有人揭發了，我也不覺得有誰會害怕。在我大學最後一年，也就是1991年，我的一個同班同學甚至公開聲稱要退團……但即使在他真的退了團之後，他的生活，包括畢業後的工作，也沒有受到甚麼影響。(第33號受訪者)²⁵

²⁵ 在毛澤東時代，只有那些犯有嚴重政治錯誤或嚴重罪行的人，才會被要求退團；主動要求退團是不可思議的，並且這種行為本身就會被認為是一種嚴重錯誤。

在80年代，中國大學校園裏不斷湧現出對新引進的西方哲學和政治理論的熱情。²⁶ 這種熱情創造出許多相應的社會熱潮，比如「弗洛伊德熱」、「尼采熱」、「薩特熱」、「文化熱」和「政治改革熱」等等（見第一章）。不過，每次熱潮過後，卻不見得有幾個學生真的讀過原著。²⁷ 事實上，大部分學生往往是因為同宿舍的或鄰近宿舍的同學正在閱讀或正在討論某部作品，才得知有那麼一部小說或學術著作。此外，大學生們還經常從校園裏舉辦的各類座談會中獲取新的、甚至帶有「異見性」的觀念。特別是在1988年和1989年的「座談會熱」期間，同宿舍或相鄰宿舍的學生經常相互通知和相約去參加某個座談會。

在80年代末，知識精英們主要通過出版面向學生的書籍和在大學裏舉辦講座這種方式來傳播自己的觀點。學生們一旦接觸並認同這些觀念，就會在宿舍裏進一步散佈。在一個宿舍裏，只要有一個學生對政治問題開始感興趣，他讀過的東西就有可能不斷成為舍友之間討論的話題：

我們宿舍裏一個經常討論的話題是改革……主要是市場經濟和私有化問題。我們宿舍的一個學生強烈地支持市場經濟。他讀過《世界經濟導報》的很多文章。他還讀過很多方勵之和厲以寧的東西。他一讀完這些書，就向我們傳遞書中的信息。然後，我們就開始爭論。（第54號受訪者）

在這裏，宿舍起到了一個匯聚意見的作用。當然，這並不是說，學生們一定會就某個問題達成一致。這位受訪者告訴我：「在爭論中，我和另外一個同學強烈反對他的看法，但也有一個同學支持他。其他同學都堅持中間立場。」儘管如此，在學生中頻繁開展的此類討論，無疑會使學生對一些問題變得更加敏感。而隨着社會問題的久拖不決甚

²⁶ 其中有些內容並不一定是初次介紹到中國，但對與外界隔絕已久的中國青年學生來說，這一切都顯得十分新穎。

²⁷ 李勁民（1988）的研究發現，甚至在「尼采熱」過去之後，仍有大約三分之二的學生從未讀過尼采的任何著作。這項調查是在八所大學裏進行的，樣本規模為2,005名學生，回收率為85.5%。

至惡化，學生們也逐漸在一些基本觀點上達成共識。就這樣，到8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相信：民主和資本主義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²⁸

政治控制組織的學運動員功能

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衰落之後，大學的一些學生控制人員不僅拒絕同國家合作，甚至通過一些學生控制組織主動去傳播「異見性」的觀念。由於這些學生控制人員佔據着大學信息傳播的要津，他們的行動往往會對學生產生很大的影響。

以前，政治課是學生政治教育的一個主要手段。現在，當學生們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教條時，這些政治課的逃課率就非常高。不過政治課偶爾也會受到歡迎，可能是由於老師在用批判性的方式授課。下面這段強烈感情色彩的敘述揭示了這種課對學生的影響：

大一下學期，我們有一門課是《中國革命史》。通常，這是黨的政治教育課。不過，老師給我們講了共產黨的真實歷史。對共產黨為甚麼會上台這個問題，老師沒有給我們講教條。從他自己的分析當中，我們知道了共產黨在武裝起義之前和之後，有着質的區別。老師解決了我心裏的許多困惑……一般像這樣的政治課，有一半學生來上課就不錯了。但是當這個老師上課的

²⁸ 許多在中國進行的研究都曾指出宿舍內存在着「核心成員」(李光華1992；任家玉1991；孫希俊〔音譯〕1985)。在有核心成員的宿舍內，學生之間的相互影響要更強烈一些。徐昌華、劉平〔音譯〕(1985)就列舉了三個有代表性的宿舍，以闡明這種影響。他們發現，在宿舍甲，核心成員對武術感興趣，於是整個宿舍常常因為學習武術而很晚才睡覺，該核心成員及其室友也成為大學武協的發起者或積極分子。宿舍甲的另一個學生對有關改革的問題興趣濃厚，並經常發起以此為主題的討論。大三時，改革浪潮席捲城市，這個學生就崛起為核心成員。自那以後，改革就成為宿舍討論的主題，該宿舍甚至集體訂閱了《世界經濟導報》。在宿舍乙，核心成員學習勤奮、政治上進，這個宿舍的大部分學生就都追隨他的這種模式。在宿舍丙，核心成員喜歡中國象棋和撲克。一段時間後，該宿舍的其他成員也都迷上了這些娛樂活動。

時候，甚至教室的過道裏都站滿了學生。那場面真叫壯觀！直到現在，我的許多同學都還覺得是這個老師啟蒙了他們。對我來說，那個學期之後，我對許多事情的看法都改變了。我感覺就像是獲得了新生。這真是個再造靈魂的過程！然而，這也是個很自然的過程……我們都極其感激這位老師。有一次，他要搬家，沒有讓我們知道。但是，那天有三十多個學生主動前來幫忙。(第67號受訪者)²⁹

1988至1989年初，知識精英會通過舉辦講座這種方式，在大學裏傳播「異見性」思想。第二章曾指出，學生的講座參與率和運動參與水平之間存在着強相關，但諷刺的是，當時大部分這樣的講座都是由學生控制機構，比如團委和學生工作部主辦的。1989年之前，北京幾所主要大學裏的學生工作部很少阻止學生或知識精英策劃的講座，相反，許多大學的學生工作部和團委都指派專人來組織這類講座；當然，他們並不都是有意要傳播「異見性」觀念。對於許多政工幹部來說，他們只是打算把這樣的講座作為在政治上控制學生的一個手段。在80年代後期，許多高層的學生控制幹部都認為，只有在校內營造一個寬鬆、自由的環境，才能阻止學生們去校外開展種種異見活動。³⁰結果，一些自由知識分子和學生，甚至包括一些基層的學生幹部，都在不自覺地為傳播「異見性」觀念作貢獻。

定量證據

至此，本章已闡述了政治控制系統的衰落對八九學運的形成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本章還論證政治控制系統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下降，以及個人晉升渠道的多元化的結果。對這兩個論點，這一節將用一些定量數據進行檢驗。³¹

²⁹ 這位受訪者後來在八九學運期間參與了為期一週的絕食活動。

³⁰ Rosen (1991a, 439).

³¹ 這只是對此問題進行定量分析的一個初步努力。首先，此處的結論只是確認了學生控制系統的衰落與學生的運動參與水平之間存在正相關，並指出導致這一

表4.2顯示的是北京八所大學中希望繼續作政工幹部的人的比例、學生註冊人數以及學生在八九學運中的運動參與水平。其中，希望繼續長期做政工工作的人數的百分比如果比較低，就表明政治控制系統衰落的情況比較嚴重；如果比較高，情況則相反。在這八所大學中，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清華大學代表了八九時介入學運較深的大學。在胡耀邦逝世當天，這三所大學都馬上出現了「大字報」，且學生在發起遊行和組織學生自治聯合會方面的行動也要比其他五所大學要早得多。5月上中旬，當其他大學都開始復課時，只剩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仍在罷課。另外，唯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在絕食期間在天安門廣場建立起由學生控制的廣播站。³²在發起五月中旬的絕食活動過程中，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發揮了領導作用，而清華大學則在組織糾察隊和維持廣場秩序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由於上述及另外一些原因，這三所大學中的任何一所都比其他大學湧現出更多的學生領袖。中國政府在軍事鎮壓後發佈的通緝名單上所列的21名學生中，³³北京大學有7名，清華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各有3名，而表4.2中的其他大學則一個也沒有。

在80年代，學校一般會為每個新生班級指派一名政工幹部負責該班的學生工作。在當時，無論甚麼專業，班級的大小大致有一個定數。因此，我們可以假設一所大學裏政工幹部的人數跟這所大學的規模成正比。這樣，儘管不知道某個大學政工幹部的確切數字，但我們

衰落的幾個因素，但這沒有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一些大學本來就有學生運動的悠久傳統（像北京大學）（Chow 1967; Israel 1966）。在有運動傳統的大學，校園亞文化（subculture）肯定也推動了該校學運的發展。此外，這項分析中所使用的調查資料的質量也不是很高。一些問題問得不太清楚，從事調查的人員也許沒有受到問卷方面的正規訓練。不過，儘管存在種種缺點，下面的分析卻顯示出有力的一致的結果，再加上前面幾節所提供的定性證據，加深了我對這個結論的信心。

³² 《回顧與反思》（1993，187-93）。在大學裏，學生們也管理着類似的校園廣播站。這些廣播站通過有綫廣播向全校播放各類新聞。在天安門廣場上，這兩所大學的學生也建立起類似的、相互競爭的有綫廣播站。

³³ 這個名單可見於1989年6月14日的《光明日報》。

表4.2 大學政工幹部是否願意繼續其工作的願望和
該大學學生在八九學運中的參與水平

大學(學院)	願意繼續長時期做政工 工作的人數百分比(X) (%)	大學招生人數 (Y)	學生參與 水平 ^a
1. 清華大學	0	14,270	XX
2. 北京大學	12.5	12,682	XX
3. 北京師範大學	7.7	7,035	XX
4. 首都師範大學	37.5	4,761	X
5. 北京鋼鐵學院	12.8	5,879	X
6. 首都醫科大學	50.0	2,115	X
7. 北京林業學院	27.8	1,893	X
8. 北方交通大學	37.5	4,318	X
加權平均 ^b	14.9		
前三所大學的加權平均	6.3		
後五所大學的加權平均	30.3		

資料來源：學生人數資料來自《中國高等教育大全》(1989)。採訪資料來自Rosen (1991a)。這裏的政工幹部包括輔導員和高層政治控制幹部。採訪在九所大學進行，但由於一個工科學院的學生人數無法確定，所以最後只採用了這八所大學的資料。這所被略掉的學院不會影響這裏的分析，因為北京只有三個工科學院，而且都是小學校。其學生的運動參與率都很低。

a. 表中，XX = 高學生參與率；X = 低學生參與率。

b. 在此表和表4.3中，加權平均數的計算方法是：平均數 = $\sum X_i Y_i / \sum Y_i$ 。

能夠通過其新生人數的比例來估計政工幹部的比例。我們也可以通過加權平均數(即是，將某學校新生人數在八所高校新生總數中的比例，與該校政工人員想繼續從事其工作的百分比相乘，再取其平均值)來估計那些願意「繼續長期做政工幹部」者的平均百分比。這種計算平均值方法的公式見表4.2的末部。

計算結果表明，平均只有14.9%的政工幹部對下述問題做了肯定回答：「你還想長期從事政治工作嗎？」這個結果本身即已令人非常

吃驚。如果接着把這八所大學按照學生對運動的參與水平分成兩組，並按照同樣的辦法分別計算兩組的加權平均數，我們卻發現：在學生運動參與水平較高的一組中，肯定回答上述問題的百分比下降到了6.3%；在學生運動參與水平較低的一組中，這個數字則上升到了30.3%。換句話說，在政工幹部情緒低落的大學裏，學生更踴躍參與學運。這就支持了我的第一個論點——政工幹部士氣的低落，以及他們不願意干預學生的異見活動，並大力阻止學生運動的動員，可以部分地解釋北京各大學在八九運動中對學運的不同介入程度。

表4.2還表明，一個學校的學生總數和學生運動參與水平之間存在着強烈的正相關，但這是一個虛假相關；比如，未見諸表4.2的中國政法大學是一個很小的學校，但它在政府發布的通緝名單上卻有兩名學生，其學生的活躍水平在北京各高校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對此，一個更為合理的解釋是：名氣大的學校（這類學校的招生人數也多）或人文社科類專業佔很大比重的學校，通常會有更多受過西方訓練的教授，也會有更多的機會同西方大學交往，因而更容易接受新觀念，也更容易發生政治控制系統比其他學校衰落更快的情況。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活躍水平如此高，正由於它是一所以人文社科專業為主的學校。

表4.3顯示的是許多政工幹部不願繼續工作的原因，以及各個大學學生參與運動的水平。表4.3中所有資料的來源都與表4.2相同。在所列舉的四個因素中（從X1到X4），X1（工作未得到正確的社會評價）衡量的是政工幹部關於社會對政治工作這一行業合法性的看法的理解。由於政工幹部的一個主要任務是政治教育，或者說意識形態灌輸，其工作本身的價值，特別是政工幹部本人對其工作的社會價值的理解，構成了考察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一個指標；X2測量的是政工幹部對未來政策變化的擔心程度（包括他們對自己在將來的政治、經濟地位的憂慮），這是個混合指標；X3中的問題旨在瞭解政工幹部是否認為其工作能給自己的未來提供更好的機會；X4測量的是政工幹部如何看待自己目前在社會中的收入水平；因此，後三項主要是從政治和經濟地位方面來測量政工幹部自己對工作的評估。³⁴

表4.3 政治工作人員不願繼續本職工作的原因和八九時學生的運動參與水平

大學(學院)	社會評價 不公 (X1) (%)	擔心未來 政策變化 (X2) (%)	對自己未來 的發展不利 (X3) (%)	物質 福利低 (X4) (%)	學生 參與率
1. 清華大學	100.0	53.3	6.7	6.7	XX
2. 北京大學	43.3	37.5	31.3	25.0	XX
3. 北京師範大學	60.0	56.4	28.2	10.3	XX
4. 首都師範大學	55.0	35.0	30.0	15.0	X
5. 北京鋼鐵學院	15.4	46.2	7.7	15.4	X
6. 首都醫科大學	25.0	62.0	25.0	12.5	X
7. 北京林業學院	22.2	50.0	11.1	11.1	X
8. 北方交通大學	87.5	75.0	25.0	12.5	X
加權平均：	61.0	49.5	20.3	14.1	
1-3的加權平均	70.7	48.0	20.3	14.3	
4-8的加權平均	43.5	52.1	20.0	13.9	

數據來源：同表4.2。招生人數數據(Y)在此處省略。用於表4.2的腳註也適用於此表。

另外，由於一些受訪者同時選擇了兩項，所以有些情況下的總計超過100%。

我試用與表4.2相同的方法計算每個問題的加權平均數。所得結果表明，平均61%的政工幹部並不認為別人會欣賞自己的工作。在所有四項中，這是比例最高的一項。如果我們繼續按學生對八九學運的參與水平把八所大學分成高參與組和低參與組，就不難發現，低參與組的百分點下降到了43.5%；但是高參與組則上升到了70.7%。由此可見，在學運參與率高的學校，政工幹部的負面自我感受要強烈得多。

³⁴ 原始資料由八項陳述構成。第5-8項考察了對政工幹部的工作形成阻力的其他因素，這幾種因素在我的研究中都被排除了。第5項陳述（「我不適合這項工作」）之所以被排除，是因為對這項陳述的回答有可能是真實的感受，但也可能僅僅是藉口。排除該項的另一個原因是，對該項的應答結果可以做多種不同的解釋。排除第6-8項則是因為很少有人選擇這幾項，這本身也證明政治和經濟原因是導致政工幹部情緒低落的最關鍵因素。

再將選擇X2、X3和X4這三項命題的人加起來，總和達到83.9%，這表明，在政治和經濟上對未來失去信心，也是導致政工幹部不願意繼續從事本行的重要原因。但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學運參與率高低不同的兩組大學中，政工幹部對這三個問題的反應並沒有表現出太大的差異。這意味着，在政治上，運動參與水平較高的大學中的政工幹部的不滿意程度，比運動參與水平較低的大學要高，而在經濟上，所有大學政工幹部的不滿意程度則差不多；這種結果並不奇怪。改革對所有大學的政工幹部的經濟處境都有影響，而來自西方的思潮則對那些運動參與水平高的大學的影響更為強烈。無論如何，正是出於這些道義的或經濟的考慮，學校政工幹部們在80年代末期已經難以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了。至此，我的第二個論點也就得到了證實。

那麼，在實際的學生動員過程中，政治控制的衰落又如何影響政工幹部的行為？從一位班主任（第19號受訪者）對自己在1986年和1989年兩次學生運動中的行為的比較中，我們不難發現一個綫索。在這兩次運動中，這位班主任都接到了上級的要求，讓他勸阻學生不要上街遊行。1986年那次，他這樣做了。那次，他在遊行時間到來之前，把班上的學生找到一起，教他們打橋牌。他的干涉成功地阻止了這個班的學生加入遊行的行列，但到1989年，他甚麼都沒有做。對這次的無所作為，他解釋說：「老師和學生都生活在同一個社會當中。我們也只是早幾年畢業而已……我們與學生的感情是相通的。我們也常常討論學生們經常提起的問題。事實上，我們是支持學生的。」

結 論

中國大學實施政治控制的主要基礎，是政工人員和學生積極分子跟學校高層學生控制機構之間的合作。與秘密警察系統相比，這一系統的有效性對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以及合作行為在多大程度能與自己的社會經濟利益掛鉤，極為敏感。因此，在毛澤東時代，這一系統非常有效，因為在那個時候，國家享有高度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而且政工人員和學生積極分子在地位升遷上佔有優勢。而1978年

以後，這一系統迅速地衰落了。原因在於，不僅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大不如前，而且在國家之外出現了很多別的進身渠道。

本章還表明，在中國大學的學生控制系統衰落之後，以前曾有助於國家控制的校園環境，現在則便利了不滿情緒和「異見性」觀念在學生中的傳播。甚至這一控制系統本身，也在80年代後期一度被知識精英所佔領，用以傳播「異見性」思想。本章的分析亦顯示，一個大學的學生控制系統被削弱的程度越高，它在八九期間的學生參與水平也就越高。換言之，大學學生控制系統的衰落，確實對八九學運的產生和發展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下篇

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的發展

八九學運前夕

80年代後期，中國經濟改革陷入危機。通貨膨脹居高不下，腐敗橫行，人們對改革前途的信心降到了最低點，不滿情緒日深。經濟危機不斷湧現，不僅使知識精英群體變得更加激進，也令數量更為龐大的學生和城市居民與政府漸行漸遠。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場運動的群眾基礎，本章將首先扼要地介紹一下八九學運前夜的社會、經濟形勢。此外，在中國這樣的威權國家裏，參與社會運動的風險較高；因此，對大部分學生來說，在公開用集體行為來表達對現實和政治的不滿之前，他們可能會首先選擇對現實的「迴避」態度。¹ 在本章，我企圖論證的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出國留學成了學生們逃避國內令人壓抑的現實的一條主要渠道；但到80年代末，種種政治變化使出國留學的希望變小，從而把學生重新拉回到國內政治。本章最後一節力圖表明，臨近1989年，一些知識精英曾在社會上不遺餘力地推動他們認可的各種改革，這些行動構成了八九運動前夜的最後一幕。

社會危機加深

80年代後期，改革中出現的社會、經濟問題逐漸擴大，並幾乎波及城市人口的各個階層；比如，農村改革大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從而把以前依附於土地的大量不充分就業人口釋放了出來。然而，在同一時期，儘管鄉鎮企業發展迅速，但農村地區的剩餘勞動力估計仍

¹ Hirschman (1970).

有約兩億之多。這樣，大量農村勞動力不得不湧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1988年10月，僅北京地區的農民工就已經超過100萬，而且還不斷增長。² 在廣州，僅在1989年2-3月，就有超過250萬農民工流入城市。³ 大規模外來人口突如其來，使得本已人口膨脹的城市更趨擁擠，城市中的罪案率也因而大幅上升。⁴ 在一些省份，有組織的罪行猖獗的程度，從持械歹徒公然在擁擠的公交車甚至火車上集體行搶可見一斑。長期以來，許多中國人都已經習慣在極低的犯罪率下生活，這樣的變化使他們天黑後都不敢出門了。

對人們影響最大、並對八九學運的形成有直接關係的社會問題，是官員腐敗、高通貨膨脹和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⁵ 在第三章，我曾分析了收入差距對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影響。事實上，當時大部分中國人都把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看作是腐敗和通貨膨脹的後果。⁶ 因此有必要將腐敗和通貨膨脹這兩個主題分開來專門論述。

² 武仁(1990a)。

³ Kristof(1990b, 35)。

⁴ 1987-1988年，官方報道的平均罪案率增加了26.4%，其中嚴重罪案率增加了65.7%(武仁 1990a)。

⁵ 幾乎所有城市人口都對這些問題感到不滿。比如，在對「九三學社」(中國的九個民主黨派之一，其成員大多為資深知識分子)的在京人員(調查人數為280，回收率為67.5%)所進行的一次內部調查中，曾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您最關心的社會問題是甚麼？」受訪者可以從七個選項中選擇三個。結果，有81.2%的人選擇了「黨內腐敗」，72%的人選擇了「知識分子收入太低」，55.6%的人選擇了「高通貨膨脹」(《北京九三論壇》，1989)。在針對其他城市人口所進行的類似調查中，也得到相似的結果(武仁 1990a)。

⁶ 1988年，在上海進行的一次調查中，當人們被要求判斷下面的說法——「有錢人大多數是靠腐敗或犯罪手段發財的」，有53.8%的人表示贊同，只有27.3%的人不同意，其餘的人未置可否。該調查共發放問卷670份，其中有效問卷642份。在這些調查者中，工人266人，國家幹部165人，知識分子128人，另有14人是私營企業主(《宣傳通訊》1988)。

大規模的官員腐敗

市場經濟的不成熟，以及信息和商品流動的不暢通，為一些人在經濟生活中牟取壟斷利潤打開了方便之門。在80年代的中國，有權力才能自由地獲取短缺的信息和商品，也因此而自然地攫奪了壟斷利潤；這種結構很可能就是80年代中期之後發生大規模腐敗現象的最終原因。例如，在政府對原材料價格實行「雙軌制」後，國有企業仍可以以很低的補貼價取得年度生產所需的原材料，而其他部門的企業則必須用較高的市場價去購買；這樣，那些能獲取低價原材料的人就可以低價購進，然後用更高的市場價賣出，從中得到利益。這種現象造成的一個後果是，許多有權分配原材料或者發放許可證的政府機構都開辦了公司以牟取暴利，一些與這些公司的當權者關係很深的人也會在這些政府公司與用戶之間再開公司，從中漁利；這些大大小小的公司之間的關係就像生態系統中的食物鏈一樣，一環套一環，無數個龐大的腐敗網絡就這樣在社會上擴展開來。⁷ 僅僅兩年之內，全國註冊公司的數量就從1986年的17萬家驟升至1988年的40萬家，甚至是中國最高的行政機構國務院，也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內開辦了七百多家公司。⁸ 許多新開的公司既沒有資本投資，也沒有辦公場所，它們唯一的業務就是權、錢交換，或者拿經濟學專用術語來說，就是「尋租」。

改革開放以後，國有企業的廠長和地方政府的領導都得到更大的自主權。然而，這些廠長和領導沒有用這些權力，為企業和國家謀求長遠利益的物質動力和願望。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通常會花費（更常是浪費）大量的錢財去搞各種形象工程，而國有企業的廠長也會為各種非生產名目而糜費大量資金；比如，一些廠長往往會給工人增加工資，增幅遠遠超過企業利潤的增長速度。很多廠長更是把公共資金用於私人目的，如購買進口豪華轎車、到國內外旅遊等等；這些當權者

⁷ 比如，吳琰、張學虎（1988）曾報告說，一張50噸的鋼鐵訂單，從一個人手裏到另一個人手裏，還沒有出賓館就已經倒手五次，價格也從每噸700元攀升到1,500元。每位中間人都可以在一次交易中獲利5,000到10,000元。

⁸ 吳琰、張學虎（1988）。

還頻頻請客，以保持或擴展自己的人際關係。這種種原因都造成了中國集團消費的迅猛增長。⁹結果，國家不得不印發更多的鈔票，而這又構成高通貨膨脹的其中一個根源。

官僚腐敗所造成的心理影響是巨大的。一項調查表明，超過83%的中國城市人口相信，大部分官員都是腐敗的；超過63%的接受調查的幹部更承認曾與一些腐敗行為有染。¹⁰在1989年3-5月期間，《半月談》雜誌曾在中國28個省、市及自治區進行調查，要求受訪者列舉出八項社會問題，結果，78.15%的人認為腐敗是自己最關心的問題，這個百分點要高過另一個為人們共同關心的問題——通貨膨脹，¹¹然而，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說高通貨膨脹給人們巨大的不安全感，那麼肆無忌憚的腐敗則給人們帶來一種強烈的不公正感。80年代後期，在大部分中國人的眼裏，中國國家合法性的基礎是政府在經濟和道德行為上的表現（見第一章和第四章），因此百姓對官員腐敗問題極其敏感，更為嚴重的是，大部分市民都相信，腐敗並非國家所能控制；即使到了1989年底，國家在八九學運平息後採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反腐敗措施，但仍然只有20.7%的學生覺得腐敗是可以有效遏制的。¹²

高通貨膨脹

除腐敗問題之外，人們最關心的問題莫過於高通貨膨脹了。80年代末的這次通貨膨脹是財政赤字、經濟過熱、腐敗橫行、價格改革，以及公眾對國家的信心降低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通貨膨脹率給推進到大部分人無法忍受的地步的過程中，上述最後兩個因素的相互強化尤為關鍵。

1987年，一些比較審慎的政府官員面對經濟過熱的勢頭，曾經建議進行經濟調整，但遭到趙紫陽和鄧小平的拒絕。趙紫陽堅持說：

⁹ 所謂「集團消費」，是指有國有企業或政府機構所進行的購買行為。

¹⁰ Cherrington (1991, 122) .

¹¹ 武仁 (1990a) 。

¹² 倉理新 (1990, 225) 。

儘管87年有一些通貨膨脹，但是如果我們去看一看工農業的增長率，看一看資本建設的投資，看一看對外貿易，看一看人們生活水平的增長速度，我們就會發現經濟的整體形勢還是好的。我們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讓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抱怨削弱我們改革的決心。我們必須深化改革。¹³

趙紫陽的這種意見主要反映了他的智囊團的看法；他的大部分顧問在80年代後期都高估了人們忍受改革負面影響的能力，這些顧問堅信，改革的問題只能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這種信念部分來自他們對東歐國家早期改革歷程的瞭解，他們知道，這些國家在70年代為了對付經濟危機而啟動的調整措施，實際上是終結了改革；另一方面，這種信念也是由於他們深怕改革受阻後，中國政治又會回到毛澤東時代。儘管他們現在身處國家精英集團之中，但仍對國家抱有根深柢固的不信任；他們相信，任何調整和收縮現有改革的措施都是保守勢力的回潮，還標誌着改革的失敗。¹⁴

因此，闖價格關的呼聲廣為流佈，連鄧小平也支持這一想法。¹⁵最後，在1988年的北戴河會議上，政府決定在五年內確立市場調節價格體系，但這一消息在公布之前即被走漏，隨即導致波及全國的銀行擠兌和商品搶購。¹⁶許多城市居民買走了商店中所能買到的一切商品，一些人的房間裏甚至堆滿了足夠幾代人使用的火柴和衛生紙；在一些城市，大百貨商場都被淘空。有鑒於此，政府尚未正式公布的關於價格改革的決定在不到兩週的時間內即被迫撤銷，儘管這場價格改革最終沒有實施，但其影響在社會上着實持續了好一段時間。

通貨膨脹率也因此而扶搖直上。據官方報道，零售價的通貨膨脹率在1987年還只有7.3%，但1988年就達到18.5%，1989年第一季度甚

¹³ 陳一諮 (1990, 127)。

¹⁴ 見第二章對此問題所進行的更為詳盡的討論。

¹⁵ 關於鄧小平對價格改革的支持，見陳一諮 (1990, 12-29) 和 Nathan (1990, ch. 6)。

¹⁶ 1988年前半年，銀行的個人儲蓄總量迅速下降了36億元 (武仁 1990a, 5)，儘管總儲蓄量自1978年以來一直以雙位數的高速度增長。

至達到28%。¹⁷ 而且，大部分中國人都相信，實際數字比這要高得多。人們的這種看法是有根據的，因為當時食品價格的通貨膨脹率比起其他商品高得多，而大部分城市家庭得花逾半的收入來購買食品。¹⁸ 通貨膨脹使早期的一些改革成果縮了水：1978年以前，工人一般要把收入的60%用在食品消費上。這個百分點在1985年下降到了42%。但到了1987年，這個數字又回升到55%，1988年還回到60%。¹⁹ 通貨膨脹因此而成為1988-1989年其中一個熱門話題。這也說明了為甚麼八九學運期間，許多工人和城市居民遊行時都舉着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畫像（見第六章）；事實上，當中大多數人不是真想回到毛澤東時代，他們這樣做是因為無法承受當前如此大規模的社會變遷，以及這些變遷所帶來的巨大的不確定性。

社會矛盾緩衝機制的削弱

大學招生的大幅擴張削弱了大學生的精英意識，而經濟危機又減少了他們的就業機會。80年代後期，大學生對學習越來越沒有興趣，越來越沉溺於為出國而準備托福考試、打麻將，或乾脆無所事事地消磨時間（見第三章）。對於心懷不滿的學生來說，出國曾經是最重要的選擇之一，這也使出國一度成為維護國家政治穩定的一個「安全閥」。²⁰

¹⁷ 《中國統計年鑒》(1990, 226) 和 Selden (1993, 120)。

¹⁸ 副食品，比如豬肉、雞蛋、蔬菜和糖等食品的通貨膨脹率，在國營商店是30-60%。至於在自由市場，由於國家價格管制的力度較底，通貨膨脹率就更高了。

¹⁹ Cheng (1990, 3)。

²⁰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前往發達國家深造 (Agarwal and Winkler 1985)。高等教育的國際化，以及此趨勢對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已引起了廣泛關注 (Altbach 1991; Altbach and Wang 1989; Hayhoe 1990)。但這些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留學對發展中國家所產生的未預期後果上，包括人才流失 (Adams 1968; Das 1972; Howland 1967; Rao 1979)、學成歸國後重新融入本土社會的困難 (Goodwin and Nacht 1986)、留學對本國可能產生的政治影響 (Hayhoe 1988; Zhao and Xie 1992) 等等。不過，在另外一些研究中，也有學者提到移民會對人口輸出國起到一個安全閥作用；如 Gabaccia (1988) 就曾指出，意大利人前往新大陸的大規模移民，對意大利的國內政治一度發揮着安全閥的作用。

而到80年代後期，越來越多中國學生開始申請去國外留學，但國內政策的種種限制及國外大學對中國學生數量有限的承受力，卻大大地降低了學生們留學申請成功的概率，這些情況在八九學運之前都加深了學生心中的不滿。

出國作為政治「安全閥」

為了弄清楚出國留學在80年代學生生活中的重要性，我們需要知道截至1989年出國學生的人數。²¹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到1989年，留學國外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大約九萬人，其中包括約兩萬名自費生；²² 不過，這些數字可能嚴重低估了實際數量。中國政府一般是通過駐外使館資助的學生組織或國內大學獲得這些數據的，然而，許多自費出國的學生實際上沒有加入這些國外學生組織，申請到國外留學也是通過工作單位而非學校；此外，還有大量學生並不是以讀書為名申請，而是通過其他途徑出國的。

為了更好地估計學生出國的規模，我要求受訪者盡可能地報告本班已出國同學的確切數字。²³ 在蒙特利爾取得的數據可以根據二分法（重點和非重點大學；沿海大學和內陸大學）交叉分為四組，結果如表5.1所示。從該表可以看出，重點大學平均有35.9%的學生（s.e. = 4.1，n = 48）出國，這個比例遠遠高於非重點大學的11.4%（s.e. = 1.3，n = 24）。另一方面，沿海地區大學學生的平均出國比例為34.9%，也比內陸地區大學的17.8%要高；比例最高的是沿海地區的重點大學，這類學校的學生出國比例平均達到了40.3%（s.e. = 5.0，n = 35），其中有六個班級所報告的比例甚至超過了70%；這正體現了出國留學對政權穩定的意義，由於大部分學生抗議活動都是由沿海地區的重點大學

²¹ 大部分出國的學生去往的是北美的大學，其方式要麼是通過正式申請，要麼就是通過隨同配偶伴讀。所以，我這裏的分析也以這個學生群體為主。

²² 李鐵映（1990）。

²³ 由於在大學生活中接觸頻繁（見第四和第八章），中國學生在畢業後很多年中仍會保持相當密切的聯繫。因此大部分學生都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發起的，而正是這些學校的學生出國留學的比例最高。²⁴ 在1979年到1989年這十年間，共有382萬學生大學畢業。²⁵ 把出國留學生的比例與這一期間大學畢業生的總人數加以比較，就會發現，80年代出國學生的數量可能會比各種公布的數據更高一些。

表5.1 不同類型大學的學生報告的同班同學出國比例

	沿海地區大學 %	內陸地區大學 %	沿海和內陸地區大學 平均 %
重點大學			
平均	40.3	24.1	35.9
s.e.	5.0	5.3	4.1
n	35.0	13.0	48.0
非重點大學			
平均	7.4	13.1	11.4
s.e.	1.6	1.6	1.3
n	7.0	17.0	24.0
重點和非重點大學			
平均	34.9	17.8	
s.e.	4.5	2.6	
n	42.0	40.0	

註：此表所用數據來自在蒙特利爾進行的採訪和一次小規模調查。這項調查的目的是收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大學的中國學生的種種信息(見圖3.1)。這裏沒有使用北京的採訪資料，因為北京的採訪所涉及的學生在八九學運時一般都還是本科生。1993年在北京進行採訪時，這些學生要麼還處於政府所規定的五年工作合同期中，要麼就是剛剛開始進入留學申請程序。這些學生報告的同班同學的平均出國率是9.4%，s.e. = 2.5，n = 29。

²⁴ 在我的調查中，沿海地區的非重點大學的出國率是7.4%，而在內陸地區的非重點大學，這個數字是13.1%。由於內陸地區非重點大學的這個數字主要是來自那些公費出國的學生，這個結果反映了中國政府着意把公費獎學金的名額分配給內陸地區的小學校，以推進它們的學術水平。

²⁵ 《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89, 14)。

出國在好幾個重要方面都有助於疏導畢業生的不滿情緒；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提供了出路和希望。一項針對「出國熱」的研究表明，大部分人之所以申請出國留學，主要是出於對國內經濟或者政治的不滿。²⁶ 這一結果同1990年在北京進行的那次調查的結果是一致的。當大學生被問及「你是怎麼看待目前的出國熱的？」時，56.5%的人都答曰：「在國內我看不到前途，出國是唯一的選擇」，只有18.7%的人選擇「學成之後，回國效力」。²⁷ 我的一位受訪者(第10號)也憶及八九學運剛結束時，大學生們是如何嘗試通過出國來逃避國內現實的：

[北京的托福測驗中心]1989年10月開始接受1990年1月份托福測驗的報名。有傳言說，這可能是在中國進行的最後一次托福測驗。其他考試中心都已經報滿了，只有清華考試中心還沒有開始。那種景象真是令人難忘！許多人為了能報上名要整個通宵地排隊等候。但到第二天早上，場面已經混亂不堪。報名不得不因此而取消。然後，他們決定在大學的教務處接受報名……至少有三四千人前往。許多人並不是為自己而去，而是為了同學或者朋友。他們這麼做是想保證，如果自己沒有報上，同學或朋友有可能幫他們把名報上……最後，托福測驗中心的人見了此情景害怕了，於是決定讓所有人都報上了名。他們在京西賓館的世紀廳增設了考場。我就是在那兒參加測驗的。

大學生出國的急切程度與國內所能提供給他們的機會是息息相關的。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北京的托福測驗和GRE考試成績要遠遠高出上海、廣州等南方城市。²⁸ 圖5.1中的照片顯示的是1993年中國大學校園內隨處可見的兩個非常有代表性的海報欄：上圖來自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下圖來自上海的復旦大學。可以看到，中國人民大學的海報欄貼滿了托福和GRE的培訓廣告，而復旦大學的海報欄則被舞

²⁶ 蕭勤福等(1989)。

²⁷ Rosen(1991b, 178)。

²⁸ 兩位受訪者(第10和18號受訪者)主動提供這條信息。

會、音樂會和電影海報所佔領——這並不是偶然的。上海交通大學托福考試中心的兩位管理人員告訴我，1993年正好是上海托福報考人數急劇下降的一年。很明顯，1993年上海蓬勃發展的經濟勢頭為學生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機會，而北京卻無法做到這一點。

為了考出有競爭力的分數，大部分學生不得不將大量的學習時間花在準備托福和GRE上。這就意味着他們用在其他活動上的精力要少得多。再者，如果一個人覺得自己有望很快出國，他就會把在國內的時間看作是逗留，因而減緩少對國內政治的關注。事實上，八九學運期間，中國人民大學確實只有兩個學生群體沒有參與四月底的罷課行動：一個是外國留學生，另一個就是備考托福的學生。²⁹

在中國，學生在出國之前還必須通過當地黨組織的政治審查。自80年代早期以來，雖然這樣的政治審查已經成為擺設，但其存在本身意味着，如果一個學生被斷定為政治異見分子，政府仍然有權禁止其出境。出於這個原因，80年代大部分備考托福的學生都傾向於避免「政治麻煩」。一個相當極端的例子是，甚至連沈彤這樣的學運積極分子也為了順利赴美國，而在八九學運前的一段時間內不敢招惹政治麻煩。³⁰

出國機會的減少和不滿情緒的升溫

80年代中期以後，出國越來越困難了。由於有超過95%的公費留學生都沒有歸國的迹象，國家逐漸停止了公費資助，並為出國留學設立了越來越多的限制。³¹儘管這些政策最後都沒有嚴格執行，但其出台卻使學生開始擔心國家留學政策可能發生的變化，隨疑慮而生的種種傳言更對學生造成重大的心理影響。

²⁹ 曾有位學生告訴Feigon (1990, 146–47) 說：「我不會僅僅為了一次救國的機會而放棄去美國的機會。」

³⁰ Shen Tong (1990, 145) .

³¹ 讓學生最感到頭疼的是工作期限的限制性規定。根據這項規定，出國前，一名本科畢業生必須為國家工作至少五年，碩士生則至少需要兩年。也可以參考Pepper (1990, 169–170) 和Zhao Dingxin (1996) 對國家其他有關規定的討論。

表5.2 不同年齡組的學生瞭解國外大學入學申請程序的時間

學生瞭解	學生入學時間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申請的時間 ^a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高中	0	7	0	25	18	10	30	50	25	60
大學低年級	23	15	27	12	18	50	30	37	60	20
大學高年級	23	7	36	25	36	0	38	0	5	0
畢業後	46	69	36	37	27	40	0	12	10	20
出國後	7	0	0	0	0	0	0	0	0	0
樣本規模	13	13	11	8	11	10	13	8	20	5

註：表中的部分數據來自1993年在蒙特利爾進行的一次小規模調查(見表5.1)。在報告這一信息的學生中，有一個是1983年入學的，另外兩個的入學時間是在1989年。由於這兩個年份的樣本太小，不足以推斷任何趨勢，這幾個學生被分別歸入了1984和1988年這兩個群體。表中的粗體數字表示該年入學的學生最大多數是在甚麼時段瞭解到申請出國留學的種種程序的。

a：這一欄表示學生瞭解留學申請程序的時間，即是，「高年級」指學生在大三或者大四的時候瞭解申請留學程序的，「畢業後」指學生是在畢業以後瞭解到申請程序，「出國後」則指學生是在出國後才知道申請程序。

比來自國內的限制更嚴重的是，中國學生越發難於獲北美大學錄取。80年代早期之前，很少中國學生瞭解北美大學的入學申請程序及獎學金的申請辦法。隨着早先出國的學生對這些事情越來越瞭解，他們開始幫助國內的親戚或朋友，這樣，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熟悉國外大學的入學及獎學金申請程序。表5.2列出的是學生的不同入學時間與其瞭解出國留學申請程序的時間的關係。在該表中，每一列最大的數字都用粗體標示出來，以顯示大部分學生是在甚麼時候對申請程序有所瞭解的。比如，在1978年上大學的學生中，有46%的人是在畢業後才瞭解出國留學的申請程序；而在1988年入學的學生中，60%的人在高中時就知道了。³²

³² 80年代末期之後，沿海地區甚至連一些重點中學的學生也開始申請去北美大學讀本科。金大陸(1993)就曾報告說，在上海一所重點中學的99名畢業生中，有27名學生決定不參加高考，因為他們已經參加了托福測驗和GRE考試，正在準備出國。

這一趨勢也體現在參加托福測驗的人數上。在北京，1981年參加考試的人數為285人，1983年為2,500人，1985年為5,000人，1986年迅速上升到18,000人，1988年則達到35,000人之多。³³北京於1981年成立第一家托福測驗中心，到1989年時已經有17家這樣的測驗中心。³⁴不過，即使這樣的擴張速度仍然不能滿足不斷增長的需求。在80年代後期的北京，為了獲得一個托福測驗的機會，報名者必須在考試中心門前通宵達旦地排隊。

在北美的大學裏，中國留學生是人數增長最快的群體。單在美國，他們就從1980年的2,770人增加到1989年的33,390人，增加了12倍還多；相比之下，其他國家在美國的留學生總數同期只增長了24%。³⁵更應該看到的是，中國留學生群體在增長幅度上雖然令人吃驚，但跟中國申請者每年幾乎呈指數增長的發展速度相比，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在當時，幾乎所有申請非公費留學的學生都要求全額獎學金。即使是政府資助的公費生，中國政府在1986年後也只給去北美留學的公費生一年的資助，這就意味着有部分人一年後必須有全額獎學金資助才能生存。這樣，北美大學的研究生院在接受中國學生時，就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即使這些學生中有很多人的學術成績很出色，他們仍然不得不拒絕一大批申請者。總之，到80年代末期，中國學生在申請出國留學或出國簽證方面遇到越來越大的困難，他們為此而倍受打擊。³⁶

1988年，日本政府試圖限制中國學生進入日本的語言學校，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前為此而立即爆發了騷亂和遊行。³⁷與此相類似的是，當1989年澳洲政府限制中國學生進入該國的語言學校時，澳洲駐上海的領事館前也爆發了同樣的遊行和靜坐。³⁸儘管語言學校的申請者並

³³ 蕭勤福 (1989, 141)。

³⁴ 中國國際考試協調局 (1990)。

³⁵ 國家教育統計中心：《教育統計摘要》(1989; 1993)。

³⁶ 蕭勤福 (1989)。

³⁷ 《宣傳通訊》(1988)。

³⁸ 前揭書。

不全是大學畢業生，但學生們強烈的出國願望和挫折感卻是顯而易見的。整個80年代，不斷傳來學生在外國使館門前抗議的消息，學生與簽證官發生衝突的傳言也不絕於耳。以上兩個例子僅是我在一些冠有「內部流通」字樣的官方出版物中看到的。

然而，學生的不滿並不是針對外國使館的。儘管國外專家們一般認為中國的留學政策「相當寬鬆」，³⁹ 大部分中國學生卻沒有相應的感受。在北京大學，當被問到「你是怎麼看待目前的留學政策的」時，有80.2%的學生認為現行的政策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極其不合理的，認為合理的只佔5.4%。⁴⁰ 當然，這項調查是在1990年進行的，當時大多數學生對軍事鎮壓的傷痕記憶仍揮之不去，因此可能對任何政府政策都懷有敵意。不過，即使是在1989年以前，學生亦對當時的留學限制抱有強烈的批評態度。一位受訪者(第22號)甚至宣稱，李鵬之所以在學生中不受歡迎，原因就在於許多出國留學的限制政策是李鵬掌管教委時制定的。出國之路受阻迫使學生們不得不面對壓抑人心的國內現實。

山雨欲來風滿樓⁴¹

八九學運之前，知識精英群體對中國的社會、經濟危機的判斷可以分為兩種：一部分人把問題的根源歸結於政府的軟弱，因此倡導「新權威主義」；但大多數知識精英和激進學生似乎更願意把政治改革不力視為病根，所以倡導民主化。⁴² 不過，無論持哪一種判斷，他們都把經濟調整政策視為政府內部保守勢力回潮的標誌，相信改革的問題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解決。

³⁹ Altbach (1991, 313).

⁴⁰ Rosen (1991b, 179).

⁴¹ 除了我自己的採訪之外，這一節的主要資料來源是冷銓清和苗蘇菲 (1989)；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1990)；武仁 (1990a) 和《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1989)。

⁴² 關於新權威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爭論的英語文獻，見Zhao Dingxin (1994) 和 Rosen and Zou (1990-91)。

1989年還恰逢三起對中國現代史產生巨大影響的歷史事件的週年紀念。它們分別是：200年前的法國大革命、70年前的五四運動和40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知識精英和學生都想在此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時刻有所作為。⁴³ 這樣，1988年到1989年間，不用太多的協調和安排，從講座、沙龍、大字報到小規模的遊行請願之類活動就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最終導致了八九學運的爆發。所以，現在我們要考察一下知識精英和激進學生是如何演出這場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的序曲的。

學生組織和讀書小組

第二章論及八九學運之前北京校園內的各類頻繁的政治性座談會。除了座談會之外，一些小規模的學生群體在北京各主要大學的校園裏紛紛成立。⁴⁴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王丹組織的民主沙龍及其前身——由劉剛組織的草地沙龍。許多知識精英，包括方勵之、李淑嫻、許良英、吳祖光等等，都在沙龍上做過演講，甚至美國大使伉儷也曾參加過他們的一次聚會。這些沙龍和學生學習小組訓練了許多活躍分子，並成為即將到來的學生運動的主要組織基礎。在北京大學，許多學生領袖（比如王丹、劉剛、封從德，楊濤、熊焱及郭海峰）不是草地沙龍和民主沙龍的積極參與者，就是其組織者。我的受訪者中有好幾位也是這兩個沙龍的常客，他們都是八九學運的積極參與者。

請願行動

1989年，知識精英在這即將到來的運動中發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他們的行動之一就是向鄧小平和其他政府領導人請願，要求赦免所有的政治犯。請願行動是在1989年1月6日發起的，當時，方勵之寫

⁴³ 當時大部分知識精英的請願書都會強調這些歷史事件。

⁴⁴ 這些學習小組雖然最後並未控制住運動的發展，但在運動的早期動員中，發揮着McCarthy and Zald (1973) 所說的「過渡團隊」(transitory team) 的作用。

1989年還恰逢三起對中國現代史產生巨大影響的歷史事件的週年紀念。它們分別是：200年前的法國大革命、70年前的五四運動和40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知識精英和學生都想在此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時刻有所作為。⁴³ 這樣，1988年到1989年間，不用太多的協調和安排，從講座、沙龍、大字報到小規模的遊行請願之類活動就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來，最終導致了八九學運的爆發。所以，現在我們要考察一下知識精英和激進學生是如何演出這場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的序曲的。

學生組織和讀書小組

第二章論及八九學運之前北京校園內的各類頻繁的政治性座談會。除了座談會之外，一些小規模的學生群體在北京各主要大學的校園裏紛紛成立。⁴⁴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王丹組織的民主沙龍及其前身——由劉剛組織的草地沙龍。許多知識精英，包括方勵之、李淑嫻、許良英、吳祖光等等，都在沙龍上做過演講，甚至美國大使伉儷也曾參加過他們的一次聚會。這些沙龍和學生學習小組訓練了許多活躍分子，並成為即將到來的學生運動的主要組織基礎。在北京大學，許多學生領袖（比如王丹、劉剛、封從德、楊濤、熊焱及郭海峰）不是草地沙龍和民主沙龍的積極參與者，就是其組織者。我的受訪者中有好幾位也是這兩個沙龍的常客，他們都是八九學運的積極參與者。

請願行動

1989年，知識精英在這即將到來的運動中發揮了更為積極的作用。他們的行動之一就是向鄧小平和其他政府領導人請願，要求赦免所有的政治犯。請願行動是在1989年1月6日發起的，當時，方勵之寫

⁴³ 當時大部分知識精英的請願書都會強調這些歷史事件。

⁴⁴ 這些學習小組雖然最後並未控制住運動的發展，但在運動的早期動員中，發揮着McCarthy and Zald (1973) 所說的「過渡團隊」(transitory team) 的作用。

了一封致鄧小平的公開信，建議釋放包括魏京生在內的所有政治犯，以紀念新中國成立40週年、五四運動70週年和法國大革命200週年。後來，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加入了請願行動。⁴⁵ 下面所列舉的僅是幾次主要的，並且是前後相呼應的請願活動：⁴⁶

- 2月13日，北島與其他32人聯名致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共產黨，要求實行大赦，尤其是赦免魏京生和其他政治犯，以紀念中國人民共和國建國40週年和五四運動70週年。
- 2月16日，陳軍在北京召開外國記者招待會。他在會上公布了方勵之以及北島和其他32名知識分子的信。
- 2月19日，陳軍在有外國記者出席的情況下，宣布為爭取釋放魏京生而成立一個請願聯絡中心。
- 2月26日，張顯揚、李洪林與其他41人聯名致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
- 3月8日，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其他一些大學的校園裏，張貼了一封由許良英和另外41名知識分子署名的、要求政府避免政治悲劇的再次發生和釋放政治犯的公開信。
- 3月24日，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其他一些大學的校園裏，張貼了一封由戴晴和其他42名知識分子署名的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公開信，要求赦免政治犯，尤其是魏京生，以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40週年。

不難發現，這些活動不斷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40週年和五四運動70週年。它們強烈地向學生和公眾暗示，1989年是不尋常的一年，不能讓它悄無聲息地擦身而過。

⁴⁵ 這些請願活動也包括來自台灣、香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人員。

⁴⁶ 武仁(1990a)；冷銓清和苗蘇菲(1989, 1-15)。

表 5.3 1985年到1988年間的主要學生運動及其目標

地點	爆發時間	主要目標
北京	1985年9月18日	反日，並批判多項改革政策。
合肥	1986年12月4日	抗議大學伙食質量；反對政府操縱地方人代會選舉；呼籲更多的民主。
上海	1986年11月末	當時美國一個著名的搖滾樂隊在上海萬人體育館表演，期間一批大學生衝上台去與樂隊成員一起跳起舞來。警察在維持秩序時毆打和逮捕了一些學生，結果引發學生的示威活動。當合肥學生遊行的消息傳到上海以後，示威的目標逐漸轉向民主和其他政治話題。
北京	1986年12月23日	主要目標是民主。
學生運動浪潮由於國家發起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興起和胡耀邦的辭職而中斷。		
北京	1988年4-6月	擦皮鞋抗議和柴慶豐事件；表達的是一種精英意識
北京	1988年4-6月	反對腐敗橫行和高通貨膨脹；要求民主。

八九學運之前的抗議活動

由於知識分子和學生的經濟處境以及國家的整體經濟處境都日益惡化，自1986年以後，大學裏不斷爆發學生抗議活動。表5.3列舉了八九學運之前的一些主要的抗議活動，這些活動是依其規模和對學生運動的後續影響而選定的，⁴⁷ 現以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為界，分成兩波。第一波學生抗議浪潮開始於1985年9月。當時，日本政府試圖紀念發生於1931年的、標誌日本開始侵吞東北的皇姑屯事

⁴⁷ Cherrington (1991, ch. 4 and 6) 也描述了所有這些抗議活動。另外，Schell (1988) 曾討論過發生在1987年之前主要的學生遊行活動。武仁 (1990a) 則描述了擦鞋抗議和柴慶豐事件。

件。此事激引學生發起了一場遊行；他們在遊行中呼籲抵制日貨，指責政府的開放政策是「出賣靈魂」，是「和誰都能做生意」。⁴⁸幾個月後，這場運動的中心轉向合肥和上海，運動的焦點也逐漸集中到民主問題上。

抗議活動的第二波從1988年4月開始，持續到同年的6月。⁴⁹在此期間，北京大學的學生在第7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期間貼出大字報，上書：「讀書無用，擦皮鞋也能為人民服務。」隨後，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不斷前往天安門廣場，宣稱要為人大代表「擦鞋」以謀取生計。與此同時，北京大學校園內也出現了更多的大字報，其中許多都號召同學們進行生產自救；這些活動持續不到兩個月即被警方和校方制止。另外一個事件是柴慶豐事件。柴慶豐是北京大學的一名研究生，他在學校附近的一個小餐館內與幾個「無業青年」發生爭執時被殺害了，幾個「無業青年」竟敢毆打致死一名研究生，這立刻被學生們看作是自身社會地位下降的信號，於是，一場抗議活動隨即爆發了。對此，中國政府迅速做出了反應，為了安撫學生，學校設立了靈堂，為受害者舉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動。在事情發生的40個小時內六個犯罪嫌疑人即被逮捕，其消息也立刻通過電視播出。這些嫌疑人在審判前就已經被認定有罪了，其中一人很快被處以死刑，其他人則被判處刑期很長的徒刑。同時，大量警察被部署在通往天安門的所有主要路口上，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在此過程中，政府和大學校方反復告誡學生要節制。在政府採取這些措施後，學生們的激憤才慢慢地平息下來。

這些抗議活動所表達的普遍情感，與其說是民主式的，不如說是精英式的。比如，在柴慶豐事件期間，沒有學生質疑審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是否合法，也沒有學生想到這些嫌疑人應當享有與學生平等的權利。不過，這兩次抗議浪潮最後都以民主訴求而告終，這種情況同知識精英和激進學生的存在大有關係，他們平時組織各種研究性群體、沙龍、講座，以傳播「異見性」觀念；一到社會運動活躍期，他們

⁴⁸ Cherrington (1991, 78-79) 對這次運動有更為詳細的討論。

⁴⁹ 據報道，在1988年發生了210次這樣的抗議行動，大學校園內也出現了超過1,100張大字報(任彥申1990, 127)。

就開始寫大字報，將各種「社會病」與中國缺乏民主聯繫起來。可以說，這個活躍的核心群體不但為學生運動提供了組織基礎，而且提供了領袖人物。⁵⁰ 當時許多抗議活動之所以未能往政治問題方面發展，完全是因為那些激進學生的目標出於種種原因未能實現。一位八九學運領袖(第69號受訪者)回憶說：「柴慶豐事件是一次流產的學生運動，……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們都很興奮，但是事情並沒有朝我們所設想的道路上走。我們為此都感到很沮喪。」⁵¹

當時間推移到1989年初，小規模的校園抗議活動日漸頻繁。比如，3月1日，一張標題為「鄧下台——以謝國民」的大字報出現在北京大學和另外一些大學。這張大字報指出：「共產主義政治就是空談，就是強權，就是專制主義、獨裁和權大於法。因此，必須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和四項基本原則。」4月13日，在北京大學，王丹和一些其他學生四處散發傳單，宣稱中國再一次處於存亡危急之秋，要麼退回到黑暗、愚昧的舊制度，要麼就向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新世界進發；但是，做出選擇的權力不在政府及其領導人，它只屬於人民。同一天，一封來自「廣西大學學生會」的題為〈告全體學生書〉的信也出現在北京和其他許多城市的大學校園中，該信宣稱中國已進入最危急的時刻，呼籲學生們應該在5月4日「以70年前的先輩為榜樣，走上街頭，走向廣場」。

兩天後，也就是4月15日，中國共產黨的前任總書記胡耀邦猝死於心臟病。胡耀邦的突然死亡對學生和知識分子來說，具有多方面的意義：第一，大部分知識精英和學生都認為胡耀邦是黨內高層中最坦

⁵⁰ 比如，我的一位受訪者(第60號)說，他和幾個朋友在八九學運之前就組織了一個政治沙龍，並組織了幾次遊行。八九學運期間，他努力使運動從一開始就變得具有對抗性。他和北京的一些青年知識精英也有很密切的聯繫，他一旦感到標語和大字報表達的運動目標有些散亂，就向這些知識精英尋求建議。有一次，一位青年知識精英甚至具體地建議他把口號縮減到十個字，即「民主、自由、科學、法治、人權」。

⁵¹ 這位受訪者還說，草地沙龍的組織者劉剛，在柴慶豐事件期間是一個主要的鼓動者。

率、最傾向於改革的領導人；第二，胡耀邦之所以在1987年失去權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對1986年的學潮持溫和態度，早先的學潮竟然在事實上導致這樣一位改革派領導人下台，許多學生對此深感內疚；第三，胡耀邦因其簡樸的生活方式和對子女的嚴格要求而備受尊重，被廣為傳誦的是，他的子女從未涉足各種可能會導致腐敗的商業行為；第四，當時一個廣為流佈的傳言說，胡耀邦發病時正在政治局同李鵬爭論，要求李鵬增加教育開支；在國外、香港媒體和國內傳言圈子中，李鵬一直被視為保守派人物，所以這個傳言立刻為胡耀邦的死塗上了一層殉道色彩；最後，胡耀邦死時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17個成員之一，也就是說，他仍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在中國，悼念一位國家高級領導人是完全合法的，那麼，在胡耀邦去世之際發動一次社會運動，遭到立即鎮壓的可能性將會大大降低。

這樣，在胡耀邦突然去世的當天，輓聯和大字報就出現在北京的幾所主要大學內。大字報的內容起初集中在悼念胡耀邦等內容上，但很快就擴展到其他問題。4月17日，也就是胡耀邦死後兩天，來自中國政法大學的第一個花圈到達了天安門廣場。當天晚上，北京大學的學生也走出了校園。八九學運爆發了。

八九學運簡史

在分析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是如何推進八九學運的之前，有必要首先瞭解這場運動是如何展開的。本章將以時間為序對這場運動做一個簡單的敘述，並按照四個重要的時段相應地分成四個大節。不過，這個敘述並不是對運動的一般性回顧，它突出了幾個對運動的發展至關重要、但以往的研究卻未予以足夠重視的重大事件。此外，由於後面四章將着重探討事件之間的結構性關聯，所以這一章將特別關注同樣對八九起到塑造作用的偶然事件。當然，這裏所描述的大部分偶然因素和活動，包括胡耀邦猝死、三個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跪哭請願、絕食前學運積極分子因缺乏溝通而發生衝突、絕食事件本身，以及絕食後外地學生進入北京等等，只有放入特定的國家、社會關係背景中去理解才是有意義的，但這些偶然事件對運動軌迹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卻是不容忽視的。

為了避免重複，本章不擬詳述以後各章的分析中行將涉及的事件；舉例說，由於第七和第十章將分別討論政府和媒體對運動的反應，第八章將詳細講述4.27大遊行，故本章就不再對其進行深入考察。同樣，本章的目標，亦不在於提供一部完整的運動發展史；我的敘述只是集中在幾個對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的活動上，同時略去了許多其他獨立地來看似乎重要的活動。我希望這種選擇不會讓讀者覺得運動的進展動態，僅僅是由幾個組織良好的學生精英來推動的。事實上，在本章和以後各章中，我們將會看到，即便是激進的學生積極分子，他們在運動中的行為也往往是帶有「自發性」(spontaneity)的。

「自發性」這個詞語在我對八九學運的描述中將會頻繁地出現，我選用這個詞語，並不是因為我的受訪者在描述他們的體驗時，企圖通

過這個詞語把「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 道德化；¹ 事實上，他們很少用到這個詞。在採訪中，我要求受訪者把談話集中到他們在運動期間的個人經驗和活動上，大部分受訪者都接受了這個建議。當受訪者超越個人經驗和活動給出一般性評論時，我對這些評論並不受特別相信和依賴。相反，我是從分析的角度來使用「自發性」這個詞的，並試圖通過這個詞語，在運動的整體背景下抓住學運積極分子活動的個體或小團體性質。我選用這個詞語是基於如下觀察(或者說，「自發性」這一詞語帶有相互關聯的含義)：首先，這場運動發軔於許多個人或小團體的獨立行動和相互影響，其間並沒有整體性的協調工作。其次，在運動期間，眾多獨立的或近似獨立的行動都在競顯身手，因此而造成了一種高度競爭性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中，某個活動能夠佔據主導，與其說是因為行動者的主觀動機，倒不如說是因為這項活動具有某種獨特的力量，能夠打動其他無組織的觀眾。再者，這次運動中湧現出許多組織和學生領袖，但沒有任何組織在運動前已然存在，也沒有任何學生領袖是通過公認的程序、由相當數量的運動參與者選舉出來的；所以，各個學生領袖並不相互尊重，甚至他們各自領導的組織間也沒有相互尊重，運動的參與者也不尊重他們自己的所謂的領袖和組織；因此，組織的領導權在運動進程中更換得非常頻繁。² 而且，在採訪中或在公開出版的回憶錄中所出現的學生領袖的自述裏，³ 我經常發現類似這樣的表達：「我正走在某某路上，遇到某某(或者，早上醒來，我想到了某件事情)，然後我就決定去做某件事。」換句話說，他們的許多活動都是就事件做出的自發的、個人的反應，而不是由組織集體做出的明確的決定。最後，通過本章和隨後幾章的敘述和分析，我也試圖表明，由於學生對當時的社會現狀相當不滿，再加上校園、廣場上的社會生態環境，在運動期間出現的學生領袖和組織往往能夠有效地組織激進的活動，卻絕對沒有能力有效地控制運動。無

¹ Polletta (1998) ; Tilly (1994) .

² 比如，一位學生領袖(第69號受訪者)就告訴我說，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剛成立的前幾週內，它的上層領導就更換了七次之多。

³ 在Shen Tong (1990) 的英文版回憶錄中我們就時常能看到類似的敘事結構。

論何時，只要運動的領袖或組織嘗試提出一些戰略性動議，而不是一味採取更激進的行動，他們就立刻會遭到排擠。換句話說，在運動期間出現的學生領袖和組織，對這場運動來說只具有單向有效性（unidirectional effectiveness）。對這一點，雖然我在這裏不可能一一羅列搜集到的所有證據，但本章所陳述的許多故事和案例均會支持我的這種觀點。事實上，本書的第二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揭示和分析這場運動的單向有效性的緣起及其影響。

運動的形成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猝死於心臟病。胡耀邦於1987年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這部分是因為他對1986年的一場規模較小的學潮採取了溫和的態度。辭職後，胡耀邦在學生和知識分子中獲得了崇高的威望。對八九而言，儘管在胡耀邦猝死前的一段長時間內，就有一些學生和知識分子為發動一場運動做準備，但這一事件本身肯定為運動的爆發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見第五章）。

4月15日當晚，北京大學就出現了大約80張大字報。⁴當時大字報的大部分內容都是悼念胡耀邦之死，但也有一些開始抨擊政府。⁵由胡耀邦之死而引發的大字報的內容在隨後幾天內發生了迅速的變化。4月19日，北京31所大學的校園內共出現了570張大字報，其中大部分內容都集中在新聞自由、結社自由、政治民主和官員腐敗等問題上。⁶

整個學運中的第一次遊行發生在4月17日中午。當時約有600名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和學生，前往天安門廣場對胡耀邦的逝世表示

⁴ 武仁 (1990b)。

⁵ 下面是兩張當時出現在北京大學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字報：「政府無能、社會腐敗、政治獨裁、知識分子貶值：這就是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現實、我們的悲劇！」及「我們的要求：推翻無能的政府、罷黜專制者、建立民主國家、社會以教育為本。」

⁶ 武仁 (1990b, 35)。

哀悼。北京大學的學生得知這一消息後不甘落後，也於當晚向天安門廣場進發，並在第二天凌晨到達廣場。不過，大部分學生對這次遊行並未抱甚麼明確的目的。比方說，在到達之前，張伯笠曾向王丹問起這次遊行的目的是甚麼（兩人後來都成為這場運動的主要領袖），王丹回答說：「我也不知道，這都是你們發起的。」張說：「那咱們就提出幾項要求。」⁷於是，張提出了三項要求：為胡耀邦平反、擴大新聞自由、增加教育開支。他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停下來之後，一個名叫郭海峰的學生站了出來，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最後，在討論中，學生們的意見逐漸集中到以下七項要求：

1. 為胡耀邦平反，特別是為他的親民主觀點平反；
2. 否定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和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並對在這些運動中遭受打擊的人平反；
3. 公開政府領導人及其家屬的工資和其他財產；
4. 允許發行民間報紙，並取消新聞審查制度；
5. 提高知識分子的工資待遇並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
6. 取消北京市政府發布的《北京市公共遊行暫行條例》；
7. 客觀地報道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

事實上，在這個階段積極參與學運活動的學生並不多。就是參加遊行的學生，許多人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逃避令人生厭的課堂教育，去享受一種狂歡體驗。一位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第14號受訪者）描述了他對遊行的初次體驗：

我記得那是在4月19日……我看到好多學生在街頭遊行集會……我問一個女同學他們在幹甚麼，她告訴我他們要遊行示威。這個時候，我知道運動來了。於是，我就騎着自行車跟着他們。沿路我看到許多人在街旁起哄。[比如]，當學生們喊起「打倒腐

⁷ 張伯笠（《回顧與反思》1993，50-51）。

敗」的時候，街上就有人回應說：「我們支持你們！」隨後就是一起哄笑。整個情境讓我覺得很興奮。⁸

可是，僅僅幾天之後，這種類似於節日的氣氛就讓位於一種激烈的抗爭情緒。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傳言起到了關鍵作用。可以說，在運動初期，圍繞所謂的新華門警察暴力事件，以及李鵬背棄接見學生的諾言而引發的種種傳言，實際上成為學運動員的最為有效的工具。

新華門事件

4月17日以後，原本散佈於天安門廣場周圍的抗議活動逐漸集中到新華門（中共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都在新華門內）。學生在新華門外呼喊著口號攻擊和辱罵當時的政府領導人，並要求公開對話，一些學生甚至向警衛新華門的武警扔了瓶子和鞋。警察曾幾次試圖恢復新華門前的秩序，⁹最後，4月20日凌晨，經過幾個小時的努力，警察終於驅散了新華門左右的大部分學生，但仍有近200名學生滯留不走。於是，警察動用武力，想把這些拒絕離開的學生拉進一輛大巴，將他們遣送回北京大學。在此過程中，學生和警察發生了衝突。回到學校後，一些學生高舉帶有血迹的衣服等物，憤怒地高喊口號。整個事件立刻被學生們稱為「新華門慘案」，關於警察施暴和抓人的傳言也立刻擴散開來。

中國政府方面則否認這一說法。通過媒體，政府宣稱，那些血迹是公交車在行進時，學生砸碎車窗玻璃而割傷自己所致。雖然我收集

⁸ 事實上，狂歡情緒在80年代的其他幾次學潮中也普遍存在。李新華(1988, 15)就曾觀察過1986年上海的一次學生遊行：「12月9日，3,000名交通大學的學生向人民廣場進發。我跟着他們。他們行進時情緒歡騰，就像是去春遊一般。他們在路上相互聊天，而談話主題與遊行毫不相干。一旦他們的行動受到路人的注意，他們馬上就歡呼雀躍起來，興奮不已。」

⁹ 警察所採取的策略是，從街的兩邊開始慢慢往新華門方向推進，每前進一步他們就先把一群人圍住，然後從外面打開一個出口讓被圍住的人群散開。那些留在圈外的人失去了方向，只能逐漸地各自回家了；整個過程很平靜。

到的證據表明政府的這一說法很可能是真實的，¹⁰但大部分學生卻認為政府是在撒謊，他們寧願相信警察確實毆打了學生。下面是北京大學的一名學生(第30號受訪者)，回憶自己聽說警察暴行後的個人感受：

我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胡耀邦逝世後，三角地出現了許多輓聯和大字報。看到這些我非常高興，因為我對當時社會的整體狀況非常不滿。不過我還是去上課了，沒有參與任何活動。……4月20日一大早，我看到幾個學生拿着大字報衝進了三角地，他們臉上還帶有血迹。警察打學生了！這讓我們非常憤怒。遊行是憲法賦予我們的權利，學生們也只是想對政府提出一些批評意見。但是當我們依照屬於我們的權利去遊行的時候，他們竟然打了我們！我們對此都極為憤怒。我當天就參加了遊行，後來還參與了罷課。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緒下，北京的幾所大學在新華門事件後舉行了罷課。隨後又爆發了更多的遊行活動，學生被高度動員起來了。¹¹

胡耀邦追悼會

政府決定於4月22日在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為胡耀邦舉行追悼會。為了阻止學生進入廣場，北京市政府於4月21日宣布，追悼會期間將對天安門廣場周邊地區實施交通管制，並因此而封閉廣場。同一天，一份署名為「北京各大學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公告出現在許多大學的校園裏。公告要求學生們到北京師範大學集合，並向天安門廣場進發，去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

4月21日，來自二十多所大學的學生匯集在北京師範大學，他們於晚上10時左右向天安門廣場出發，沿途又有一些其他學校的學生加

¹⁰ 具體細節見本書導論的最後一節。

¹¹ 在第十章，我將解釋，即使政府所提供的信息往往更為準確，但為甚麼學生依然寧願相信毫無根據的傳言。

入。根據我的一位受訪者估計，約有五萬名學生參加了這次活動，這還不包括那些已經在廣場的學生和北京市民。他們到達後，一位來自中國政法大學的青年教師周旋於幾所大學的隊伍之間，要求各個大學的學生們分別派出若干代表去參加一個協調會。最後，約有廿幾名代表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一角，商量應該向政府提出甚麼樣的要求。我的一位受訪者(第60號)提議三項要求：政府應當(1)保證學生在廣場的安全；(2)允許學生派代表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及(3)承諾決不向學生秋後算賬；¹² 他的提議得到其他學生的贊同。

大約4月22日凌晨4時，警察進入天安門廣場並在學生與人民大會堂之間設立了防綫。這時，一位政府官員過來要求學生們後退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為參加追悼會的來賓騰出停車位。我的這位受訪者(第60號)拒絕了這一要求，並告訴那位官員說：「他們是來參加追悼會的，我們呆在這裏也是為了參加追悼會。我們都想送耀邦最後一程。我們這十多萬學生已經在這裏呆了整整一個晚上，我們的真誠不亞於那些坐車來的人。我不能僅僅為了給他們騰出車位而說服學生離開。」這位受訪者進而向那位官員提出了上述三項要求。稍後，那位官員回覆說：「你們的安全是得到保證的，只要學生方面不發生重大意外，政府是不會干預的。關於允許學生代表參加追悼會的問題，並不是我們所能決定的。至於不和學生秋後算賬，我現在就可以保證這一點。當然，我的保證可能不會有太大作用，但我會傳達你們的要求。」

他們兩人的談判進行了很長時間。早上6時左右，那位官員建議學生派幾個代表到人民大會堂裏面去談。稍後，五個學生代表進入了人民大會堂。這時，上述第三項要求演變成了「政府應當對新華門事件進行公正的報道」。此時，為了體現與政府的合作態度，一些學生積極分子和青年教師聽從了那位官員的要求，帶領學生們後退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的位置。

7時15分左右，五位學生代表從胡耀邦治喪辦公室得到包含五項內容的正式答覆：(1)胡耀邦的追悼會將向學生現場直播；(2)參加胡

¹² 「秋後算賬」的字面意思是「在秋收之後，結算賬款」，這裏是指政府在運動結束後可能會採取的報復行為。

耀邦追悼會的車輛不會妨礙學生的視線；(3) 只要秩序不是特別混亂，學生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4) 辦公室沒有權力決定是否允許學生派代表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但會就這一問題向上級部門請示；(5) 「新華門事件」超出了治喪辦公室的權限，但學生在這方面的要求也會上報給上級部門。對這個回覆，各學生代表表示滿意。

然而，在正式答覆尚未到達之前，我的一位受訪者(第60號)就不耐煩了。他喊道：「三項要求沒有商量的餘地。如果他們不同意，那麼從7時開始，我們將每隔十分鐘，一個大學一個大學地把學生帶回原地。」時間一到，這位受訪者就領着來自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向警察的警戒綫衝擊，他們一往前衝，警察就往後退。看到這樣做沒甚麼事，我的受訪者和幾個學生就不顧其他學運積極分子的反對，把所有的學生都帶回到了原來的位罝。

此後，沒過多久，警察和學生之間形成了一個5-7米寬的隔離帶。這個隔離帶為希望有所表達的學生提供了一個巨大的舞台。在這個隔離帶，總是有學生在呼喊口號、提出要求或發表演講。

胡耀邦的追悼會於上午10時開始，大約進行了一個小時。事實上，許多學生並不把追悼會本身看得很重。我的這位受訪者(第60號)注意到，當哀樂響起的時候，許多學生還在吃冰棍。但追悼會結束後，學生們卻沒有立即離去，許多自發性的抗議活動幾乎在同一時間展開。比如，在廣場的一地，一些學生在一塊巨大的布料上畫了一張魚網，然後在傷心的哭喊聲中用手和剪刀把布料撕碎。¹³ 與此同時，由遠及近的齊聲呼喊一浪高過一浪。人們可以從各個方向聽到類似的呼喊，比如「北大，快作決定！北大，快作決定！」、「前排學生坐下來！前排學生坐下來！」、「對話！對話！」、「李鵬出來！李鵬出來！」。如果更仔細地觀察一下，還可以看到很多個人行動。比如，我的受訪者(第60號)有一刻變得特別憤怒，甚至一拳向自己的臉上打去，打得滿臉是血。事態以這樣的方式發展下去，學生們也變得越來越激動。

¹³ 在這裏，魚網象徵國家的沉重壓制，而人民(魚)正在絕望地試圖掙脫網的束縛。

在眾多的活動中，有兩項活動不僅吸引了大部分學生的注意，而且推動了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其中一項是三個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跪哭請願，另一項是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吾爾開希的演講。

大約11時40分，學生提出，他們已經放棄原來的所有要求，現在只想和李鵬總理進行一次對話。大概20分鐘過後，並沒有李鵬要出來和學生見面的迹象。這時，幾個學生代表被允許穿過警戒綫，前去遞交請願書。他們一走到人民大會堂台階前，其中三人——周勇軍、郭海峰和張志勇——馬上跪倒在地，把請願書舉過頭頂，哭着求見李鵬。吾爾開希此時站在他們旁邊。當時雖然有幾個政府官員試圖前往接受請願書，但遭到那三個學生拒絕；他們堅持要李鵬親自出來接受請願書。

過了一會兒，吾爾開希站起來，拿着一個電子擴音器不斷重複：「我是吾爾開希，我是吾爾開希……」直到學生們都安靜下來後，他繼續說道：「今天，我們學生在廣場上呆了十個多小時，沒吃沒喝。我們想得到甚麼？我們曾經想到許多事情，但是現在，我們只有一個想法、一個要求，那就是：請我——們——的總理出來跟我們談談，哪怕只有一句話也好。」

他接着像是乞求似的說：「我們的總理，為甚麼您還不出來呢？」學生們立刻沸騰了。整個廣場都迴響着「李鵬出來！李鵬出來！」「對話！對話！」這樣的吼聲。學生們開始衝擊警察，跟警察相互推擠，整個局面幾乎失控。這時，吾爾開希再次站起來，要求學生們安靜，並宣布李鵬已答應將在15分鐘內出來會見學生。那三位代表繼續跪在地上，學生們也期待着，可是李鵬並沒有像吾爾開希所說的那樣出來看學生。於是，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感到自己受了極大的侮辱，他們叫喊着：「代表回來！代表回來！」一些學生甚至喊出了「李鵬下台！」的口號。許多學生哭得像小孩子一樣，幾乎成了淚人。最後，學生們在極度失望之下離開廣場，許多人發誓回校要立即罷課。

學生運動組織的出現

學生運動組織此時也開始出現。需要指出的是，這些組織都非常鬆散，既沒有健全的基層組織，也沒有固定的成員。第一個組織是

4月19日晚在北京大學成立的，當時王丹和一些人在三角地組織了一次「民主沙龍」，大約有一千名學生在場。在會上他們討論了過去一些學生運動失敗的原因，歸咎於缺乏能夠領導運動的組織，於是他們決定成立「北大學生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對於那天的情景，沈彤回憶說：「不管是誰，只要有勇氣站起來，報出自己的姓名、專業和班級，就會自動成為該組織的一名領導成員。」¹⁴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幾所主要的大學紛紛仿效北京大學的做法。不過，在多數情況下，這些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成立時連公開會議都沒有舉行過；例如，在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成立幾乎完全是吾爾開希個人一手操辦。整個運動期間，唯一試圖通過公開選舉產生領導人的做法是在4月24日的北京大學。當時約一萬名學生在北大的五四體育場集會，準備選舉學生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的常委。可惜，會上「人聲鼎沸，聽不到或者根本就不聽發言人的演講；許多自封的學生領袖競相爭奪話筒」，¹⁵ 學運積極分子互相爭鬥，甚至惡意攻擊，熊焱甚至指控了張志勇是校方的間諜；這一場景讓很多學生感到十分失望，結果大會不歡而散。此後，整個運動期間各個學運組織再也沒有進行過普選學運組織領導的嘗試。

4月21日，一個名為「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的組織曾貼出告示，要求學生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但此後就再也沒有關於這個「組織」的任何消息。事實上，第一個全北京範圍的組織是4月23日晚上成立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大約有來自21所大學的四十多名學生參加這次集會，他們推選王丹、吾爾開希、馬少方、張凱和周勇軍為該組織的常委，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得票最多而當選為主席。¹⁶ 這次集會的一個主要決定是發動全市罷課。就這樣，在胡耀邦逝世後的八天時間內，北京的學生實現了大規模的動員，並建立

¹⁴ Shen Tong (1990, 172).

¹⁵ Wagner (1990, 52).

¹⁶ 根據我的一位受訪者(第60號)回憶，周勇軍得票最高是因為當晚中國政法大學有多達六名學生與會。

了好幾個正式的、但未經過公開選舉程序產生的社會運動組織。這場運動於是進入下一個階段。

學運的發展與政府的讓步

《人民日報》4·26社論與4·27大遊行

胡耀邦的追悼會一結束，政府就把注意力轉移到這場運動上。4月25日晚，中央電視台和中央廣播電台都播發了《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將運動定性為「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社論號召人民行動起來反對「動亂」，並推論說如果任由運動發展下去，從此將國無寧日。¹⁷這篇社論向北京的學生傳遞了一個很清楚的信號——政府將不會容忍任何進一步的學運活動。

在歷史上，政府的類似反應足以達到遏制學運活動進一步擴散的目的。可是，這一次部分地是由於胡耀邦之死延誤了政府對事件的反應，社論的目的並沒有實現；相反，社論讓大部分學生都感覺受到了侮辱。一位受訪者（第68號）對我說：「4·26社論讓北大的每個學生都感到特別憤怒。當時我們確實並不想推翻共產黨政府，因為我們感到這樣的事情是不可企及的。4·26社論使許多人都感到他們高尚的愛國情操被侮辱了。」

在許多大學裏，憤怒的學生聚集到一起，討論應該怎麼辦。新成立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則決定在4月27日舉行一次大規模的遊行，對社論表示抗議。為了取得更多的支持，他們也調整了策略，在遊行發動和遊行期間將早先許多激進的口號和要求都取消了，甚至還加上了諸如「擁護黨和政府」、「擁護社會主義」之類的口號。

¹⁷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

政府方面也採取了反制學生動員的措施，力圖阻止遊行。但政府反制動員的努力的成效並不大。原因在於，大學內部一些在傳統上政府可以依賴的力量，例如黨員、基層的學生政工人員，當時都和學生一樣對現狀心存不滿(第4章)。一位受訪者(第63號)回憶說：

4月25日下午，學生幹部、黨員和老師們開了會。在會上，系黨委書記向我們傳達了將在晚上播出的社論的主要內容。他要求我們說服學生不要支持運動。聽完之後，一個黨員年輕老師馬上站起來說：「我們說服不了學生。如今電視已經高度發達。這件事情其實很簡單。你們只需要一名國家領導人到電視上講一講就可以了。為甚麼要我們去做這個工作呢？」

除了開會傳達之外，政府方面阻止遊行的另一項措施，是向一些當時已經嶄露頭角的學生領袖施加壓力，試圖通過各種渠道說服他們取消遊行。在巨大的壓力下，許多知名的學運積極分子，包括周勇軍、吾爾開希和沈彤，都猶豫了，想作出讓步。不過，這些學生領袖沒有真正控制運動的能力，儘管他們試圖向政府作一些妥協，但其他大部分學運積極分子仍然希望看到遊行的發生。最終，好幾萬學生在4月27日還是上街參加遊行(詳見第八章)。

政府的讓步

由於學生的決心、政府的克制，再加上以海澱區為中心有利的校園生態環境，這次遊行取得了全面成功。由於4·26社論的強硬說辭已證實無效，而且現階段政府還想以和平方式處理這場學運，於是讓步便成為唯一選擇。4月27日中午，當遊行隊伍仍向天安門廣場進發時，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表達了政府想跟學生對話的意圖。第二天，《人民日報》和其他幾家主要官方報紙都以略帶肯定的調子在頭版報道了遊行。從4月29日開始，政府與學生進行了好幾次對話，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次發生在4月29日當天。

4月28日，政府要求全國學聯(一個政府認可的學生組織)去組織與學生的對話。學聯於是從16所大學邀請了45名學生，包括新成立的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四名領袖人物(我所知道的有周勇軍、郭海峰和吾爾

開希三人)和許多其他學生積極分子。這次邀請有一個條件，即前來的對話者是作為學生、而不是新成立的高自聯的領導被邀請，並且他們也不能代表該組織在會上發言。

應當注意的是，儘管參與對話者接受的是一個官方學生組織的邀請，但那場對話並不像後來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毫無意義。事實上，與後來所進行的多次對話相比，學生和政府官員在這次對話中的討論更具有實質意義。在對話中，學生所提出的多項議題，包括官員腐敗、對學運的不公正報道、4月20日的警察暴行、李鵬在胡耀邦追悼會後對學生要求的拒絕、《人民日報》4·26社論以及為胡耀邦平反，涵蓋了學運之初所提出的七項要求中的大部分。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項小吉，一名來自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還公開質疑了這次對話本身的合法性；他的主要論點是，參與對話的人並不能代表學生，因為他們不是被推選出來的；這次對話只能被看作是學生和政府之間的初步接觸。他進而提出三項建議，以便日後進行一場更具實質性的對話：(1) 組建一個學生對話代表團，由每個大學兩名代表組成；(2) 在正式對話前，應當進行幾次籌備性的對話，以確定正式對話的時間、地點、人數、主題和方式；(3) 實質性對話開始之後，學生應停止罷課。項小吉在此次對話中的突出表現使他成為日後成立的學生對話代表團的領導。

然而，這次對話並沒有讓眾多學生(尤其是學運積極分子)感到滿意；比如，吾爾開希就拒絕參加這次對話，一些與會者也中途離席的方式表達了對這次對話的抗議。對話之後，周勇軍和項小吉聲稱，他們的參與和發言只代表他們自己。許多學運積極分子都認為這場對話是個陰謀，目的在於分化學生。當天晚上，北京一些主要大學內出現了許多攻擊政府、攻擊對話、攻擊參與對話的學生的大字報。

無論如何，政府不斷讓步，緩和了早期政府與學生之間緊張的對峙氣氛。政府的讓步意願在5月4日達到了頂點，當天，趙紫陽會見亞洲發展銀行會議代表時說，¹⁸ 學生遊行時的基本口號是「支持中國共產黨」、「支持社會主義」、「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和「反對腐敗」，因

¹⁸ 趙紫陽(1990a)。

此學生們「決不是要反對我們的基本制度」。他同時要求主管官方媒體的兩位國家領導人胡啟立和芮杏文，開放媒體。趙紫陽對他們說：「把對遊行的報導放開一點，新聞透明度提高一點，風險不大。」¹⁹ 由此，政府幾乎完全修正了《人民日報》4·26社論中對運動的評價，學生運動因此而取得了一次大捷。

對話團

北京的學生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大部分學生領袖也願意相應地向政府做出一些妥協。4月30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開了一次會。考慮到政府可能不會接受直接和他們對話，會議同意王超華和封從德的提議：組織一個獨立的對話代表團。²⁰

5月3日，新成立的對話代表團召開第一次會議。在會上，項小吉提出三項對話議題：(1) 對當前學生運動的性質的評價；(2) 未來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戰略；(3) 憲法規定的權利怎樣落到實處。項小吉有見地的提議使他在芸芸代表中嶄露頭角，因此，在接下來的口頭投票中，他獲推選為對話代表團的主席，沈彤則成為他的副手。

按照項的提議，代表們被分為三組，每組準備一個議題。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對話代表團又開了幾次會。同時，越來越多的大學的代表加入，對話團的規模也擴大到約70人；²¹ 對話團代表和政府接觸過幾次，試圖建立對話，政府方面也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對話的意願。²² 5月10日左右，政府甚至與對話團討論了對話的技術細節問題，要求對話團把正式的對話成員削減到20人。5月12日晚上，項小吉告

¹⁹ Faison (1990, 156) .

²⁰ Shen Tong (1990, 215) 和封從德(《回顧與反思》1993, 68) 。

²¹ 照理說，各個大學的對話代表都要經過選舉產生，但僅有少數大學的學生嚴肅看待此事。在多數大學，包括北京大學在內，代表是在一個很小的圈子裏決定的。事實上，許多參加代表團會議的學生既沒有經過選舉，也沒有受到邀請，而是聽到消息後主動跑來的。

²² 關於政府如何通過大學校方與對話代表團接觸，見Shen Tong (1990, 229-31) 的描述。

我的一位受訪者說(第59號，對話團的一個成員)，與政府的第一次對話計劃在5月15日進行。然而，對話翌日，即5月13日，絕食就開始了。要瞭解為甚麼在政府和學生相互接近的節骨眼上會發生絕食，我們必須更為深入地考察5月初運動的實際情況。

運動的低潮

4·27大遊行之後，政府和學生開始對話。趙紫陽對運動做了重新評價，官方媒體也對運動進行了正面報道，政府的讓步使大多數學生都感到滿意。在5月4日的遊行中，周勇軍代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正式宣布罷課將在當天結束。所以，5月4日以後，除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之外，所有大學都復課了。就北京大學而言，儘管大部分學生都投票贊成5月5日之後繼續罷課，但越來越多學生實際上已經開始上課了。事實上，在5月9日或10日以前，北大一些激進的學生不得不在教室門前設立糾察綫，阻止學生去上課。²³ 即使那些不去上課的學生，對運動也沒有那麼關注了；許多學生(包括一些學運積極分子)都回家了，仍然呆在學校的學生也開始打撲克或玩麻將自娛。北京大學的三角地，自運動開始以來一直人山人海，此時也不再擁擠了；學生領袖們不得不在三角地不斷發表演講，以維持學生對運動的興趣。²⁴ 事實上，在這段日子裏，八九學運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中國記者的抗議活動來維持的(見第十章)。

與此同時，學運的領導權也日益成為問題。由於所有學生運動組織都是匆忙建立起來的，運動組織存在的問題遠遠超出了基於運動策略而引發的爭議。許多學生領袖似乎並不怎麼尊重他們自己建立的組織，他們以組織的名義來宣布個人決定，並且不尊重那些他們不認同的組織決定。²⁵ 在下面，我將概述5月初發生在學運積極分子之間的一些關鍵分歧，並解釋這些分歧如何促進絕食行動。

²³ 王超華(1992a, 77)。

²⁴ 武仁(1990b, 57-58)以及Shen Tong(1990, 226)。

²⁵ 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周勇軍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的名義宣布取消4·27遊行的個人決定，而他本人正是這個籌備委員會的主席。

這一時期的學運積極分子可以分為三個群體：第一個群體是對話團，這些學生期待着即將到來與政府的對話，對話團的領袖也在公開地或私下地同政府接觸；他們知道對話即將舉行，因此所持的立場也最為溫和。

第二個群體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高自聯）的一些成員，其中包括王超華、周勇軍和王志新，這些學生定期參加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會議。一些高自聯的學生領袖和對話團的成員也互相參加對方的會議。由此，大部分高自聯的成員都大致瞭解對話團及其活動。但是，這兩組學生之間存在衝突，對話團的學生認為，當前的運動已經到了以對話取代遊行和罷課的階段，因此，他們現在應該在整個學運中發揮主導作用；而高自聯的學生則認為，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才有了對話團今天的機會。²⁶ 由於這一分歧，對話團的領袖把與政府的接觸看作是自己的特權，並經常將這種接觸保密；而高自聯的領袖則不想讓對話團成為學運的總代言人，並且撇開後者，不斷提出與後者的設想不同的意願和要求。這導致政府不知到底應當同誰打交道，但大多數學生卻認為，政府在與學生對話這個問題上沒有一點誠意。²⁷

無論如何，對於對話代表團與政府之間的接觸，高自聯成員多多少少還是知道一些的。他們當中大部分人都相信，當前運動的重點，應當放在鞏固校園民主這一學運至今為止取得的主要成績上。²⁸ 因此，此時高自聯領袖們的一般傾向也不是十分激進。

²⁶ 關於這兩個團體的學生領袖之間關係的更多討論，見王超華（1992b）。

²⁷ 比如，鄭旭光，北京高自聯的一位學生領袖，5月11日參加了對話團的一次會議。在會上，他說：「我是第一次參加對話團的會議。我現在感到學生和政府之間的對話是很有可能。不過，高自聯和其他學生對此一無所知。他們感到，自5月4號以後，對話的機會就沒有增加過，他們因此才決定進行絕食抗議。你們應當盡快地讓學生知道對話的機會在上升。」（《中國新聞摘要》1994, 16）。

²⁸ 比如，高自聯5月6日的一項公告就反映出這種溫和態度：「民主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高自聯將不再把遊行當作推進中國民主的一個主要手段。在隨後幾天，我們的第一步是組織講座和討論，並邀請著名學者如嚴家其和于光遠來做講座……第二步是辦報紙和雜誌……〔關於學生和政府的對話〕，我們將持靈活

我把學運中湧現出來的第三個領袖群體稱之為魅力型群體。這一群體由包括王丹、吾爾開希等具有傳奇色彩的較為激進的學生領袖所組成。雖然這個群體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或曾在高自聯擔任過常委，但他們都愛自行其事，當中大多數人不去參加定期的高自聯會議。這使他們就對話團與政府之間的接觸的瞭解，比高自聯的領袖要少得多。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學生領袖王丹，他在一次採訪中告訴我，甚至是直到絕食開始之後，他才知道有對話團的存在。對這個群體來說，政府的讓步不過是詭計而已，²⁹ 而此時他們所面對的，一邊是在他們看來毫不妥協的政府，另一邊是對學運熱情日減的學生。這個群體的一些活躍分子於是決定進行絕食抗議。

絕食動員³⁰

在運動形成之前和發展過程中，學生們都曾考慮過絕食，事實上也使用過多次。運動開始之前，一些從外地來到北京的鼓動者就計劃在4月5日發動絕食。³¹ 4月18日，兩名北京大學的學生在新華門前也進行了絕食。³² 在北京師範大學，據梁二回憶，一位學運積極分子在

態度。對話可以通過第三方來與政府進行，也就是通過對話團。」(吳牟人等1989, 180) 根據王超華在《回顧與反思》(1993, 94) 中的回憶，5月11日，高自聯決定：「考慮到政府目前對對話所持的積極態度，高自聯應當反對任何大規模的示威行動，同時支持各類中小規模的行動。」並且，在戈爾巴喬夫訪問期間，不應當進行任何遊行(吳牟人等1989, 180)。

²⁹ 這一時期激進學生的心態可以從5月7日的一張大字報中得到反映：「學生民主運動虎頭蛇尾，沒有任何收穫地歸於平靜……人民對我們懷着巨大希望，我們也得到了高度的讚揚和支持，但是我們何以為報？……有人打我們的臉(比如說我們是陰謀、動亂)，然後再安慰我們以蜜棗(比如，說年輕人是愛國的)。於是，我們就忘記了疼痛，並開始享受蜜棗。」(《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1991, 153)。

³⁰ 絕食抗議的緣起還將在第七章加以討論。

³¹ 沈彤(《回顧與反思》1993, 14)。

³² 白夢(《回顧與反思》1993, 57)。

5月初甚至認為：「我們絕對要進行一次絕食抗議。如果絕食導致流血，那是最理想的。」³³ 柴玲，一個主要的絕食領袖，也回憶說：

運動一開始，我們就有絕食的意思。有一天在跟張伯笠聊天的時候，他說：「你知道嗎？絕食是非常有效的〔抗議〕武器……如果真的餓了，可以到宿舍或洗手間悄悄吃些東西。你們是祖國的花朵。一旦校方看到你們在絕食，他們會像對待孩子那樣對待你。」³⁴

儘管關於絕食的討論一直在繼續，但大規模的絕食是在5月11日才成為現實討論的議題。當天晚上，王丹、吾爾開希和另外四個學生在一家小餐館聚會，討論這次運動。他們都同意，運動正處於危機之中，而政府只是在拖延時間，根本就沒有對話的誠意。³⁵ 在這種形勢下，吾爾開希首先建議發起絕食。最後，他們決定於5月13日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選定這個日子是出於兩個原因：首先，時間不多了，學生對運動的興趣正在迅速減弱；其次，他們預測，一旦學生佔領廣場，政府就會為使戈爾巴喬夫訪華成功而作出重大讓步。³⁶

³³ 據梁二的回憶（《回顧與反思》1993，126–28），吾爾開希在5月8日的一次演講中，也談到了絕食。當時吾爾開希關心的主要是，運動已顯頹勢，因此需要推動力量。不過，吾爾開希一直到5月10日同副總理田紀雲和趙紫陽的秘書會談之後，才下定決心。據吾爾開希稱，在會談期間，田不時回頭與趙的秘書竊竊私語。吾爾開希把這種情況視為一個信號，表明如果學生施加更大的壓力，政府就會做出重大讓步。因此，他決定發動絕食。

³⁴ 柴玲（《回顧與反思》1993，89）。

³⁵ 柴玲也以類似的理由來支持絕食：「〔5月4日，周勇軍宣布停止罷課之後〕學生運動失去了動力；越來越多的學生回去上課了。關於復課還是繼續罷課的爭論消耗了學生運動的很多時間和資源，形勢越來越艱難。於是，我們感到必須發動絕食。」（Han and Hua 1990，107）。

³⁶ 會後，王丹告訴柴玲：「我們在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前兩天〔開始絕食〕，這樣能給政府以足夠的時間做出反應。」見柴玲（《回顧與反思》1993，89）。

他們一回到學校就立即開始絕食動員。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在北京大學這所最為激進的大學裏，經過一整天的動員努力，仍然只有四十來個學生志願報名參加絕食。一直到5月12日晚，柴玲在三角地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講之後，報名參加絕食的學生人數才上升到三百左右（柴玲的演講將在第九章討論）。³⁷

另一方面，高自聯成員在聽到絕食動員的消息後試圖阻止這一行動。比如，王超華就曾代表高自聯試圖說服柴玲取消絕食。柴玲回答說：「絕食是學生自發的。無人有權阻止！」³⁸ 當王指責絕食領袖濫用高自聯的名義動員學生的時候，鄭旭光跳起來反駁說：「你到現在還相信高自聯在學生中有權威嗎？」³⁹ 在某種程度上，鄭是對的。自從絕食起來以後，運動組織的控制能力確實越來越弱。高自聯阻止絕食的行動最後以失敗而告終。

絕食期間

絕食者在5月13日下午到達廣場時，人數只有三百出頭。包括絕食支持者在內，人數也不出三千。就這樣，他們度過了天安門廣場絕食行動的第一夜。當時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都不支持，甚至不關心絕食。而且，由於準備匆忙，加上大部分參與者認為絕食不會持續很長時間，所以許多學生並沒有準備額外的衣物和睡具。5月13日晚上，氣溫降到攝氏5度。因此，所有參加絕食的受訪者在描述絕食第一夜的感受時，都說是「極其寒冷、饑餓和孤獨」。

然而，僅僅兩天之內，絕食人數就迅速超過三千，並吸引到數百萬同情者。絕食還引發了政府內部的領導權危機，導致趙紫陽下台，並使政府實施戒嚴。絕食抗議被證明是整個學運動員的一次巨大成功，但同時也為運動的血腥收場埋下了伏筆。

³⁷ 最後，有兩百多名來自北京大學的學生參加了第一天的絕食。

³⁸ 王超華 (1993, 25)。

³⁹ 王超華 (《回顧與反思》1993, 95)。

對話和知識分子的調解

5月13日和14日這兩天對運動的最終結果而言，無疑是關鍵性的。絕食仍處於起步階段，而政府也在做巨大的努力，試圖在戈爾巴喬夫到訪之前結束絕食。知識精英和持溫和立場的學生領袖們也想迅速結束絕食，以便有足夠的時間去鞏固前些天取得的成果。由此產生的結果是，學生、知識精英和政府之間出現了很多接觸。⁴⁰ 然而，儘管一些學生領袖、知識分子和政府高層領導人都很有誠意，但最終都未能終止絕食。天安門廣場上的形勢越來越失控，中國政府高層領導人對妥協也日漸失去興趣。下面我們就將集中討論這最富有戲劇性的兩天。

政府方面對絕食的消息迅速做出了反應。5月13日一早，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召見一些知識分子，要求他們把學生領袖和一些在學生中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作為協調人）召集起來，在當天下午開個緊急會議。最後，吾爾開希、王超華、項小吉、沈彤、王丹、柴玲、封從德、周勇軍等學生領袖和一些知識分子，包括劉曉波、王軍濤等，都參加了這次會議。⁴¹

閻明復首先發言。他告訴與會者，這次會議的目的，首先是瞭解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想法，並盡快上報中央；其次是說服學生在戈爾巴喬夫到訪之前撤出廣場。接着，從吾爾開希和王丹開始，學生和知識分子們依次表達了他們對運動和絕食的看法，總而言之，他們都強調行動是合法的、和平的、愛國的；他們大多數人都歡迎政府最近對運動態度的轉變，同時也指責政府缺乏誠意；希望政府公開修正《人民日報》4·26社論的論調。他們要求政府與對話團立即展開對話；還有一些人要求政府承認高自聯，並懲罰在新華門事件中毆打學生的警察。對此，閻明復回應如下：

⁴⁰ 在此之前，由於害怕自己的介入會直接導致政府的堅決鎮壓，大部分在運動發生前非常活躍的知識精英都試圖和學運保持距離。

⁴¹ 關於這次會議的細節，見劉曉波（1992, 99）、王超華（1993, 26）及Sheu（1990, 239-40）。

開完會後，我會立刻把你們所說的彙報給中央。學生運動是一次愛國運動。它的到來是因為我們國家在文化、社會和教育方面存在着很多問題，而且其中的一些問題已經極為嚴重了。中央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已經感到了巨大的緊迫感……4·27遊行之後，中央嚴肅地考慮了學生們的要求。所有的問題都可以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加以解決。對話是民主的一個主要構成元素，這對學生和政府來說都可以接受。但很可能是由於缺乏透明度，因而使得學生懷疑政府進行對話的誠意……〔因此〕政府應當對此負責並進行自我批評。中國現在正處於從封閉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當中。在這個過程裏，各個社會集團不可能得到同等的利益，整個社會都充滿了矛盾和衝突。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來自各個社會團體的建設性的努力。學生們的4·27遊行和5·4遊行都是非常成功的，絕食也並非一個不合法的行動。中央所擔心的是，絕食有可能同戈爾巴喬夫的訪問發生衝突。因此，中央希望我們的學生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希望學生能夠以一種歷史責任感來節制自己的行為。我也知道你們會這麼做的，因為歷史決定了你們是關心國家和人民的一代，而不是享樂的一代。⁴²

閻明復的坦誠受到了大部分學生領袖的歡迎。會議結束時，吾爾開希和王丹都保證學生一定在5月15日之前撤離廣場。但是，如果說閻明復已經贏得了大多數人，他卻沒有說服所有人。會議剛開始不久，兩名絕食領袖——柴玲及其丈夫封從德——就告訴身邊的學生說他們在廣場還有事情要做，然後就悄然離席了。

5月14日一大早，閻明復再次與學生領袖王超華、王丹和吾爾開希會面。⁴³ 閻明復告訴他們，政府已經同意和學生代表進行對話。政府方面的代表包括李鐵映、閻明復、羅幹和國務院的十位副部長。王丹和吾爾開希認為政府代表團的級別不夠高。閻明復回答說：「李鐵映

⁴² 閻明復的這次講話引自劉曉波(1992)。

⁴³ 下面對這次會面的描述主要以王超華(1993, 28)的敘述為基礎。

是國務委員，同時是政治局委員；我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書記。難道這樣的級別還不夠高嗎？」三位學生領袖於是便沒再說甚麼。接着，他們開始討論對話的技術細節，最後提出對話要在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閻明復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統戰部沒有這樣的設備，而中央電視台的設備都用來準備戈爾巴喬夫的訪問了。⁴⁴ 三位學生領袖反駁說，如果不能現場直播，他們將無法說服絕食的學生。在進一步討論之後，閻明復同意：「可由中央電視台的工作人員對會議進行攝像……並在晚上進行完整的直播。同時，學生們也可以自己錄製會議全過程，並在天安門廣場播放。」

三位學生領袖接受了這種安排，但仍在閻明復面前竊竊私語。閻明復顯然明白他們的猶豫所在，於是說：「無論學生是否撤離廣場，中央都已經決定不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現在，決定權完全掌握在學生手中。而且，即使你們決定撤離，你們能肯定一定能把學生帶離嗎？」據王超華說，他們立刻感到如果不能把學生帶離廣場將會招致的危險，於是就當着閻明復的面開始討論起如何設法把學生帶離廣場。在討論中，王超華甚至指責了王丹和吾爾開希所發起的絕食是一次不負責任的行動。王超華還問王丹是否真的能夠說服柴玲和其他一些激進學生離開，王丹思忖片刻之後，回答說：如果一些有威望的知識分子能夠前去勸說，學生們一定願意離開；接着，王超華說，她知道一些這樣的知識分子將在下午開個會，她可以到那裏去請他們出面幫助。

王超華所提到的這次會議的組織者是戴晴，《光明日報》的一個經常發表有爭議的文章的記者；該會在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12號，就已經安排好了。當時戴晴參加了胡啟立與幾個傳媒理論家和資深記者之間的一次對話。⁴⁵ 戴晴告訴胡啟立當時已經有外國記者多次就八九一事採訪她，她因此而想到：「為甚麼《光明日報》不能直接發表我們自己

⁴⁴ Shen Tong (1990, 245) 在他的自傳中說，這次會議不能直播，是因為它和一場足球賽在時間上有衝突。我傾向於王超華的說法，因為王超華是直接從閻明復那裏得到的消息，而沈彤則是從別人那裏聽說的。

⁴⁵ 對這次會議的描述主要以戴晴 (1993) 的敘述為基礎。

的觀點呢？」胡啟立回答說這沒有甚麼不可以；戴晴接着問道：「我們的報紙經常邀請學者參加一些專題討論，最後以總結的形式發表他們的看法。我們這次是否也可以採取同樣的做法？」胡啟立的回答是：「至於具體採用甚麼方式你們可以自己作主。」

在得到胡啟立的肯定性答覆之後，戴晴便着手準備這次會議。她最終請來了十個人，包括嚴家其、蘇曉康、包遵信、劉再復和李澤厚。就在這次會議開始之前，王超華跑了進來。稍後，溫元凱帶着幾個私營企業家也不速而至。會議大約在下午2時開始。此時，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數已經暴增至近30萬人，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加入絕食行列。⁴⁶ 王超華的到來改變了會議的主題。在會上，王超華哭着懇求學者們運用其影響力說服絕食的學生離開廣場，許多知識分子也哭了起來，同意擔當這項任務。在前往廣場勸阻之前，蘇曉康還起草了一份〈緊急呼籲〉作為這些知識分子的一個聯合聲明，並準備在廣場上宣讀。

大約下午4時45分，當這12位知識分子仍在開會的時候，政府和學生的對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開始。會議廳是按照項小吉的建議佈置的，⁴⁷ 廳中間設一條長桌，13名政府代表坐在桌子的一邊，同樣數目的學生對話代表團代表坐在另一邊，他們身後是其他對話團代表和來自絕食團的觀察員；會議廳的兩邊則是來自中國主要新聞機構和報紙的記者。

儘管一些政府官員和學生領袖為實現對話都付出了艱苦的努力，但對話從一開始就顯得混亂不堪。首先，不管自己是否被選為對話代表，對話團的每個成員都想參加會議；⁴⁸ 顯然，沒有人願意錯過這個歷史性時刻。結果，儘管計劃中應該是20人，但事實上，對話團有超過40名成員與會。其次，絕食團並不信任對話團，他們派觀察員坐在發言人代表的後面。在對話開始後不久，吾爾開希又讓一位來自北京

⁴⁶ 李錄 (1990, 136)。

⁴⁷ 項小吉 (1995)。

⁴⁸ 接下來關於對話的敘述主要以三位受訪者 (第57、58、59號) 的回憶為基礎。作為對話團的成員，他們都參與了這次會議。

師範大學的絕食者程真宣讀了〈給媽媽的一封信〉；在她宣讀的時候，在場的大部分人，包括記者和政府官員，都聲淚俱下，會議廳裏的學生因此而變得非常情緒化。⁴⁹ 第三，儘管學生十多天來一直要求與政府對話，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做好充分準備。大部分學生代表在幾天前都還相互不認識，彼此間幾乎沒有甚麼共識和協調。驟然暴露在這個他們視為歷史性時刻的閃光燈之下，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無法保持常態。一些發言人常常長篇大論，但其內容卻常與對話的主題幾乎風馬牛不相及；而未被選為發言人的代表則要麼徑直發言介入對話，要麼不停地遞條子催促發言人提出他們認為更為重要的問題，學生代表們有時甚至為搶麥克風而打鬥了起來。

更甚者，在對話開始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廣播站就開始廣播：「請大家前往統戰部支援對話學生，那裏有人想出賣我們。」⁵⁰ 於是絕食者及其支持者陸續到達統戰部。他們不斷要求項小吉甚至沈彤出來，以便提出不同的和更多的要求。大量學生同時到來，堵塞了統戰部的大門，擋住了準備把錄像帶送出去播放的中央電視台工作人員的通路。可是，當發現對話並沒有在電視上播放之後，學生們馬上就不停地在統戰部門外叫喊，要求立即終止對話。⁵¹ 最後，大約在晚上7時15分，一群學生由王超華領着衝進了會議廳，要求要麼立即直播對話，要麼立即終止對話。⁵² 會議廳裏的學生也立即站起來，指責電視

⁴⁹ 一位受訪者(第59號)告訴我，這個行動是預先準備好的。起初他們讓我的這位受訪者來唸，要求她在讀的時候要聲淚俱下。最後，為了更好地打動聽者的心，他們決定讓一名女絕食者來完成這項任務。

⁵⁰ 柴玲(《回顧與反思》1993, 107)。

⁵¹ 大部分學生都把電視台未能播放錄像看作是政府的陰謀。Shen Tong (1990, 247-48) 就認為，對話未能播放是因為一些比閻明復更有權力的人在從中作梗。我的理解是，在這一時期，政府對媒體已經基本上失去控制，比這更有煽動性的報道在主要的官方媒體上也隨處可見(第十章)。因此，我在這裏接受項小吉對這件事情的說法(項小吉 1995, 72)。

⁵² 根據王超華的敘述(《回顧與反思》1993, 102-03)，她進入會議廳是因為她看到許多學生擁擠在統戰部前面喊：「停止對話！立即直播！」她同意把這個信息傳遞進去。兩個學生陪她一起進了會議廳(因為學生也不信任她)，所以她進去之後，不得不採取了激進的行動。

台未能播放對話是政府的陰謀。恰在此時，柴玲在對話的會議廳裏打開錄音機，播放起〈絕食宣言〉。對話最終在一片混亂中草草收場。

當政府與學生的對話仍在進行時，前面提到的12名學者徑直前往國務院信訪局，準備與一些絕食的組織者會面，以說服他們把學生帶離天安門廣場。⁵³ 教戴晴吃驚的是，絕食學生表示完全同意他們這些「老師」的看法，並邀請他們直接去天安門廣場與其他學生交談。

這12名學者到達廣場時受到熱烈歡迎。其中一人在廣播站宣讀了他們事先準備好的〈緊急呼籲〉。⁵⁴ 這項呼籲盛讚學生和這次運動，要求政府承認這次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北京高自聯是合法組織，同時提議學生撤離廣場以使中蘇峰會得以順利進行。⁵⁵ 這項呼籲受到廣泛的稱讚，但學生並沒有撤離。事實上，一些激進學生甚至認為這些學者的真正意圖是要幫助政府。李錄回憶他聽完〈緊急呼籲〉之後的感受時說：

聽起來很動聽，他們好像說出了我們的主要要求。但是靜下來一想，我就意識到，他們實際上代表的是政府。中國知識分子總是優柔寡斷。儘管他們口頭上說支持學生，但事實上卻在為政府說話。他們可以說服學生離開廣場，但是他們並沒有能力保證政府以後不會向我們報復。⁵⁶

當學者們正在努力勸說學生離開時，柴玲遞給封從德一張條子，上面寫着：「請在廣場廣播站連續宣讀〈絕食宣言〉三次。」在封從德宣讀宣言時，學生們的情緒再次沸騰，形勢急轉直下，失去了控制。學

⁵³ 除非另有表明，下面關於12位學者的活動的敘述主要以戴晴(1993)、蘇璋(1992)以及Shu(1990)的敘述為基礎。

⁵⁴ 對這件事情有兩種說法。蘇璋(1992)回憶說是溫元凱宣讀的這項呼籲，而戴晴則說是她讀的；兩人都位列12名學者之中。這裏我傾向於戴晴的說法，因為一個人錯把別人的宣讀當成自己宣讀的可能性要更小一些。(作者中文版補注：根據陳小雅的錄音資料，當時溫元凱和戴晴先後宣讀了這個呼籲書。)

⁵⁵ 這項呼籲也在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中播出，第二天又刊發在《光明日報》1987頭版。其英文版見Han and Hua(1990, 207-08)。

⁵⁶ 李錄(1990, 138)。

生開始對這12名學者充滿敵意。據劉曉波說，這些學者在離開時，學生們不斷對着他們叫罵：「滾出天安門廣場！我們不需要救世主！」、「這是我們的事情！沒有人可以代表我們！」、「我們拋頭顱、灑熱血，你們想坐享其成，做夢去吧！」⁵⁷

這樣，直到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學生仍然佔領天安門廣場。⁵⁸ 戈爾巴喬夫此次訪華，是中國和前蘇聯之間30年來的首次國事訪問，它標誌中蘇這兩個有着四千多公里邊境綫的國家之間敵對關係正式結束；因此，在中國媒體上，這次訪問一直被描述為一次重大的外交突破。然而，歡迎戈爾巴喬夫的儀式不得不改在北京機場進行，國家主席楊尚昆同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的第一次會談也被耽擱了兩個小時。而且，由於天安門廣場被佔領，其他一些活動也被迫取消了。⁵⁹ 對鄧小平和其他許多國家高層領導人來說，學生的行為無疑是對他們的一個極大侮辱；同時，對這些高層領導人來說，學生的行為也表明早先溫和路綫無效，在這個節點上，許多原先支持溫和路綫的政府高層領導人逐漸改變了態度，黨內所謂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鬥爭亦大大加劇（見第七章）。

絕食期間的大眾支持

在這種背景下，絕食進入第三天，即5月15日。在這一天，廣場上成立了絕食指揮部（以下簡稱指揮部）。柴玲任總指揮，封從德、李錄和張伯笠任副總指揮。⁶⁰ 雖然大部分北京學生一開始並不贊同絕

⁵⁷ 劉曉波 (1992, 122)。「救世主」這個說法來自〈國際歌〉中的一句歌詞，其中文的字面翻譯是：「從來就沒有甚麼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

⁵⁸ 事實上，在5月15日早上學生領袖和政府之間還有一次對話。然而，許多重要的絕食組織者都沒有參加這次對話。

⁵⁹ 見Brook (1992, 38) 及 Schell (1994, 85)。

⁶⁰ 根據李錄的回憶（《回顧與反思》1993, 136），指揮部是這樣建立起來的：「由於形勢緊迫，我們沒有時間開會討論如何建立起這樣的組織。我提出的條件是，只要願意站出來、願意獻身於絕食和民主運動的人，都應當成為領袖……當時，周圍大概有十幾名學生。後來，他們都成為秘書班子的關鍵成員。然後，柴玲發表了一個演講，絕食指揮部就這樣正式成立了。」

食，但隨着絕食行動持續下來，他們和北京市民開始越來越關心絕食學生的身體健康，並認為政府對此事反應冷漠，因而倍感憤怒。有一位受訪者（第3號）從5月15日開始就一直在廣場上當糾察隊員，他回憶說：

我非常反對絕食的想法……絕食之前，我們已經復課了，好像一切很快都會結束一樣……然而，絕食開始後，政府的反應就實實在在讓我們感到失望。絕食的第一天，政府竟然沒有想辦法驅散絕食的學生，這讓我們都非常吃驚。到第二天、第三天，我們對絕食學生就越來越同情了。關鍵就在於同情。許多朋友告訴我說，他們來天安門廣場，正是因為他們被感動了。

北京的學生因此而恢復了他們前段時間所抱有的政治熱情。到5月16日，絕食學生的人數已經上升到約3,100人。北京每所大學都在廣場建立了自己的營地，駐紮在那兒以支持絕食學生。最後，許多學生也在廣場上開展各種志願服務，包括護理絕食學生，或者擔任糾察隊員以保證「生命綫」（為能迅速把絕食學生送往醫院而開闢的救護車行駛路綫）不被觀光者和學運支持者的人流阻塞。

5月15日以後，在天安門廣場和通往北京各個醫院的路上，救護車的警笛聲日夜不斷，揪動着北京市民的心弦。在那些天裏，官方媒體就運動作了極其正面的報導（詳見第十章）。受這些因素的激發，北京各行各業的市民都參加了遊行，敦促政府迅速跟學生談判並化解危機。在這些遊行隊伍中，甚至包括一些傳統意義上的政府的骨幹力量，如中低級官員、警察和解放軍軍官。5月17日和18日兩天，每天前來遊行聲援的人數已經大大超過100萬。

許多研究八九學運的學者把這種大眾支持看作是市民社會在中國崛起的標誌，或者看作是中國工人的階級意識覺醒的象徵。我要強調的是，此時參與運動的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出於對身體已經很虛弱的絕食學生的同情。而且，這一時期的大部分遊行在組織上都帶有半官方色彩。下面兩位受訪者的敘述就是很好的例子：

[絕食期間]我們單位的好多人都到廣場去參加聲援活動了，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遊行前，我們研究所團委裏的一些人先通過所裏的廣播站宣布了遊行的日期。遊行是我們所的團委組織的……所黨委書記並沒有出面要求我們參加，但他也絕對沒有阻止我們去遊行……相反，書記還派了好幾輛大巴，送我們到廣場。(第5號受訪者)

在北汽的遊行隊伍裏，我見到了我的同學。我問他怎麼也來了。他告訴我，單位領導對他們說：「你們要是想參加，就參加吧。如果你們去，我給你們提供飲料。」於是他就來了。(第11號受訪者)

是次訪問共有11位受訪者描述了他們在此期間參加遊行的經歷；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的描述其實大同小異。在絕食期間，他們的遊行通常都是由單位團委或工會的幹部所組織的，並且一般都會得到單位領導的默許。⁶¹ 單位方面還允許遊行使用者單位的某些資源，比如金錢、旗子、製作標語的材料、通訊設備、大巴或者卡車等等，更是，絕大部分遊行人士在廣場遊行期間的工資照發。⁶²

在那些日子裏，支持絕食學生甚至成了一項道德準則。這對那些仍未上街聲援的單位是一種很大的壓力。新聞出版總署是一個非常保守的機構，當中到5月18日，仍未有人去遊行。該單位的許多職員都感到非常難受，有的職員甚至公開在單位說：「連國務院和殘疾人都上廣場了。在北京，只有兩個單位還沒上街：一個是中央政治局，另一個就是我們單位。」諸如此類的話使該單位的領導極其尷尬。最終，他們允許單位的職員在工作時間去參加遊行，並提供了包括交通工具在內的資源。⁶³

⁶¹ 有時候，單位領導甚至親自率隊遊行。比如，北京餐具廠的廠長就親自領導工人到廣場上遊行 (Walder 1991a, 485)；南開大學的副校長也親自帶着博士生和教師打着「聲援團」的旗號從天津出發趕到天安門廣場遊行 (第27號受訪者)。

⁶² 我在1997年再次去北京時，採訪了九名來自不同工廠的工人，他們都參加了絕食期間的遊行。對於他們是如何參加遊行的，他們提供的敘述和上面的說法大同小異。

⁶³ 這條信息是由第5號受訪者提供的，他是該單位的一名記者。

運動期間工人的參與

論及大眾支持時，許多學者曾大力強調各種獨立工會組織在運動期間的重要性。⁶⁴然而，根據我的研究，獨立工會的活動在整個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由於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是運動期間成立的一個最重要的、具有獨立工會性質的組織，我下面的論述就圍繞這個組織來展開。⁶⁵

北京工自聯正式成立於5月18日，⁶⁶它的成立反映出一些學生領袖在絕食期間開始把動員的目標轉向工人。李進進，一位來自北京大學的研究生，曾在工自聯的建立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另外一些學運積極分子，包括周勇軍和熊焱，也都曾深度介入創建工自聯的活動，並在工自聯中擁有重要職位。例如，李進進是工自聯的法律顧問，而周勇軍是組織部長。⁶⁷事實上，工自聯的大部分文件都是由李和其他

⁶⁴ 比如，Calhoun (1994, 94-97); Perry (1992); Walder (1991a, 1991b); Walder and Gong (1993); Wang Shaoguang (1990b)。Walder (1991a, 467) 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曾這樣評價八九學運期間工人的參與：「1989年5月，城市工人突然闖入中國的政治舞台。他們數以萬計地在北京寬闊的大街上遊行，他們是來自數百個工廠的代表。類似的行動在全中國的城市中不斷上演，儘管規模要小一些。雖然有組織的罷工非常少見，但持異見的工人大量建立了獨立的工會組織和其他政治組織。這種情況燎遍中國大地，從四川到上海、從內蒙古到廣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於4月中旬成立的北京工自聯。該組織在絕食的那一周正式以組織形式出現在天安門廣場，號稱擁有數千名成員，並大量印發手冊和宣言。在戒嚴令頒布之後，他們在組織遊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工人的這種前所未有的反應幫助了學生，他們把一場有活力的學生運動改造成了自1949年以來對共產黨統治的最嚴重的全民挑戰。」

⁶⁵ 在運動的早期階段，天安門廣場成了公共演講的大舞台。許多北京市民和工人都在晚上去廣場。一些北京市民偶爾也和學生一起發表演講，甚至聲稱要建立新的組織。不過，他們的活動當時在廣場上並沒有太大影響。

⁶⁶ Walder and Gong (1993, 7)。

⁶⁷ 還有許多其他學生介入北京工自聯。比如，一位清華大學的運動積極分子在後來發表的日記中寫道：6月1日，北京工自聯在廣場上舉行了一次新聞發布會。在會上，主事的三個人中，一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一個來自中國農業大學，只有韓東方是個工人(《中國新聞摘要》1994, 2)。

幾個學生起草的。⁶⁸ 因此，有的學者以工自聯頒布的種種文件為基礎來論證工人在這次運動中的重要性，必然會導致他們對整個運動的錯誤理解。⁶⁹

此外，工自聯賴以運作的大部分資金，要麼直接來自學生，要麼是由學生為它籌措的。周勇軍在回憶他幫助工自聯建立廣播站的過程時說：「四通公司幫了我，他們給我一萬塊錢，再外加一個香港記者給我的一筆『救命錢』，我用這些錢買了台發電機。然後在一輛大巴上安裝了一個廣播站並交給工自聯……有了這個廣播站，工自聯就在當時存在的各種組織中脫穎而出，顯得非常引人注目。」⁷⁰ 李錄對此也有過類似的回憶：「不管是工人糾察隊、北京市民糾察隊還是北京市民敢死隊，都是學生幫它們建立組織，並給它們提供資金。尤其是，我們協助建立了北京工自聯，甚至他們的廣播設備和廣播員都來自指揮部。當時，大家每天都工作在一起。他們的指揮部離我們很近，之間的聯繫也很密切。」⁷¹

關於另外一個非學生組織的建立，一位學生領袖在接受我的採訪時，提供了類似的敘述：

北京市民自治聯盟是由萬新金組織的，他是我們學校的一個青年老師。他說，我們需要這樣的一個組織，我也贊同。經過一番努力之後，他最終建立起這個組織，並成為該組織的總指揮。大約有一二十名工人跟着他。該組織的資金支持則完全依賴於我。因為他們不善於做有效的募捐演講，所以籌錢很困難。（第60號受訪者）

⁶⁸ Black and Munro (1993, 222) 曾探討過李進進是如何幫助工自聯起草和準備各種文件的。

⁶⁹ 比如，Walder and Gong (1993) 就曾引用工自聯發布的文件，以論證工人在運動當中的重要性。

⁷⁰ 周勇軍 (1993, 58)。

⁷¹ 李錄 (《回顧與反思》1993, 71)。

北京工自聯宣布正式成立的宣言是由李進進宣讀的，⁷² 李進進亦曾要求張伯笠幫忙，張伯笠於是讓他們使用屬於絕食指揮部的廣播設備，派糾察隊員為他們維持秩序，還為參加成立儀式的工人提供食品。⁷³ 最後，甚至寫有「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等大字的橫幅也是由一位叫張倫的學生領袖準備的。⁷⁴

5月29日，工自聯的三位成員被逮捕。5月30日，工自聯向北京公安部門要求立即釋放三名被捕的工自聯成員。這一行動因曾引起西方媒體的注意而廣為人知，因此被許多學者以此作為論證工自聯在運動期間的力量和重要性的證據。⁷⁵ 事實上，這一行動是由學生領袖發起的，其中大多數參與者都是學生。廣場上的學生聽說工人被逮捕的消息後，曾前往各個工廠動員工人出面營救三位被捕的工人，不過，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⁷⁶ 於是，5月30日一大早，李進進和韓東方就領着人前往北京公安局，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工人。在當時眾多的跟隨者中間，真正的工人實際上只有二十多人。⁷⁷ 與此同時，學生們還在天安門廣場繼續召集更多支持者。⁷⁸ 我的一位受訪者(第60號)回憶說：

[一些學生]過來告訴我，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好幾個工人，要我們到那裏示威遊行，要求立即釋放那些工人。當時，我們帳篷裏只有九名學生。我馬上就帶他們去了北京市公安局。在路上，我們採取種種行動，以吸引路人。到公安局的時候，已經有好幾千人跟着我們。我在那兒做演講，要求他們釋放工人。有人從公安局裏面出來拍照，要我們派代表進去談。但是我不知道甚麼時候、誰、以及有多少人被逮捕了，而且對這次行動

⁷² 熊焱(1992)回憶說那篇宣言是他讀的。

⁷³ 張伯笠(1994a)。

⁷⁴ 張倫(《回顧與反思》1993, 297-98)。

⁷⁵ Walder and Gong (1993, 13-14)。

⁷⁶ 顏婷、黎佩兒(1989, 132)。

⁷⁷ Black and Munro (1993, 229)。

⁷⁸ 張伯笠(1994a)回憶說，王超華也帶來了許多學生。他們的到來使北京公安局前的抗議人數增加到數千人。

的整體規劃，我心裏也沒底。所以，我拒絕進去。我說我想進去，但是我不敢……〔相反〕，我要求他們派人出來與我們談判。我說我這兒可以保證他們的安全。這種僵持狀態持續了兩個多小時。與此同時，我派人去找周勇軍，問他被捕的是誰、是怎麼被捕的……過了一會兒，從東邊來了一大群人，我看到至少有20所大學的旗幟。走在最前面的是熊焱。他們到達的時候，熊焱宣布說：「我是熊焱。我是今晚行動的總指揮。我們的要求如下……」在熊焱宣布自己是這次行動的總指揮之後，我就離開了現場。⁷⁹

總之，如果用領導權、物質資源的來源、主要活動和參與者等標準來衡量，工自聯顯然只是學生運動的一個派生物。

佔領天安門廣場的資金來源

在天安門廣場，有三千多名絕食者需要防雨遮陽、飲水、藥品和醫療支持，宿營的學生和糾察綫上的學生也都需要食品，外地進京學生的規模正在不斷擴大，學生領袖們需要通訊和印刷設備。所有這些都需要錢財支持，可是錢從哪裏來呢？瞭解這一問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場運動的性質，以及運動背後的國家·社會關係。

要精確地估計運作天安門廣場上每天活動所需的花費並不容易。梁二，高自聯財政部的部長，回憶說：每天從他那兒支出的用於天安門廣場各種活動的資金可達20萬元。⁸⁰考慮到絕食指揮部有自己的資金系統、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獨立的資金來源、許多捐贈也各有所屬，在頂峰時佔領廣場每天所需的費用可能高達數百萬人民幣。

⁷⁹ 熊焱也曾簡單地提到過這件事（熊焱1992）：「5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三名工人之後，我發動學生到公安局門前靜坐。」由於熊焱公開宣稱自己是領導者，這次事件甚至在政府的文件中都有記載（冷銓清、苗蘇菲1989, 187）。熊焱的話可與我的敘述相互印證。

⁸⁰ 梁二（《回顧與反思》1993, 244）。

絕食期間，資金的主要來源是個人捐贈，以及中國政府和各類公共機構的援助。《光明日報》的一則報導提供了一條綫索，有助於瞭解北京人是如何從資金上支持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的：

高自聯總部坐落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東南角。在那裏，大量的人前擁後擠，想為學生捐款、捐食品。捐款的人中有工人、農民、教師、政府幹部和個體戶。一位文化部的幹部捐了360元，解放軍的一位副師級幹部捐了1,000元……來自北京輕紡公司的工人集體捐了一萬元……與此同時，全國總工會和全國社會福利彩票基金認購委員會各自捐獻了十萬元；全國冶金礦業進出口公司捐獻了五萬元。

不少記者也看到，餐館、個體戶送來了快餐和麵包。木材廠送來了木材，輕工業部所屬的一個規劃研究院送來了一捆捆塑料薄膜。我們的記者還看到整整一卡車的床墊正在運入廣場。⁸¹

對佔領廣場所需的資源絕大多數都來自國家和政府單位這一點，讀者也許會感到意外。但這事實可從下面林南的描述中得到很好的印證：

在中國政府的默許和北京市政府的命令下，紅十字會、各市醫院、各類診所及救護車隊，都被調動起來去運送和搶救昏厥的絕食者，並在搶救後把他們再送回到廣場。5月17日，80名紅十字會會員、16輛救護車和兩部大巴長期進駐廣場，為絕食人員和宿營人員提供救護。僅在絕食的第六天，即5月18日，救護車就進行了超過3,500次的救護運送工作。由於天氣預報說(第二天)有雨，市政府在紅十字會的建議下，派出了70輛大巴為絕食學生提供庇護。⁸²

政府提供援助的另一個例子發生在5月17日，當時，應清華大學學生的緊急求助，北京市公安局派出數千名警察前往廣場幫助學生維

⁸¹ 吳牟人等(1989, 296)。

⁸² 林南(1992, 85-86)。根據張伯笠的敘述，大巴的數量是80輛(張伯笠1994b, 76)。同一天，學生收到了一萬多件雨衣和其他雨具(吳牟人等1989, 264)。

持生命綫上的秩序。⁸³ 李錄在其回憶錄中說，他從醫院裏偷出了許多瓶輸液鹽水以幫助絕食同伴。⁸⁴ 不管他的記憶確實與否，事實上，當時天安門廣場所用的大部分生理鹽水都是由政府提供的。截至5月16日，僅北京市急救中心就為廣場輸送了5,000瓶鹽水。⁸⁵

北京的主要大學也都做出了巨大努力以幫助學生。據劉曉波回憶：

我要求北京師範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教務處的領導盡快送被子、防寒夾克、雨傘、雨衣、靴子和其他必需品到廣場。方書記和其他人很快就來了。他們為我們紮了帳篷，還帶來大量雨具和其他物品，讓學生們在寒夜裏可以保暖。⁸⁶

同樣是這所大學的校方，曾應學運積極分子梁二的請求，讓學生免費使用該校車輛，並為外地來京的學生提供大量食品。⁸⁷

絕食期間，資金和物資供應之充分，從廣場上學生大肆浪費物質中可見一斑。所有提及這一問題的受訪者都向我講述了他們在廣場上所見到的學生的種種浪費行為。不過，沒有誰的敘述比劉曉波的描繪更令人震驚：

[在天安門廣場]，幾乎所有的飲料都是沒喝完就扔掉。無數瓶輸液鹽水還幾乎是滿的就扔掉了。半盒、整盒的快餐，半條、整條的麵包和其他食品丟得滿地都是。學生們抽的煙和喝的飲料也越來越高級……由於廣場上資金運用缺乏監控，各類腐敗和浪費根本無從查證。廣場上垃圾的數量本身也證明了各種浪費的習慣。各個運動組織、各個絕食團體都不斷地爭搶更多的物品，有時甚至會發生打架鬥毆。每個團體都在你爭我奪，想

⁸³ 吳牟人等(1989, 268-69)。

⁸⁴ 李錄(1990, 136)。

⁸⁵ 吳牟人等(1989, 216)。李錫銘(吳牟人等1989, 332)，中共北京市委書記，也描述了政府如何為廣場上的學生提供物品。

⁸⁶ 劉曉波(1992, 129)。

⁸⁷ 梁二(《回顧與反思》1993, 181)。

得到更多。他們寧願把爭得的物品儲存起來，在以後扔掉，也不願與他人分享……我親眼看到一名女學生一次連續打開13瓶生理鹽水，每瓶只略呷幾口之後就扔掉了。⁸⁸

很明顯，正是這種來自普通民眾、政府和各個單位的充分支持，使學生得以持續佔領天安門廣場。政府付出巨大的努力幫助學生，是因為他們不想看到有死亡發生，也不想極其擁擠、極其不衛生的天安門廣場上滋生傳染病。但是，各個政府單位所提供的物資已經遠遠超出了政府的本意。

運動組織和領導權

在絕食期間，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和其他運動積極分子之間經常發生劇烈的衝突。譬如，5月14日，封從德和其他幾個來自北京大學的學生在廣場上建立了廣播站，該站迅速成為指揮部的喉舌；⁸⁹但到了第二天，清華大學的學生就建立了一個功率更為強大的、名為「學運之聲」的廣播站。⁹⁰高自聯的學生領袖對這個廣播站擁有基本控制權。此後，指揮部和高自聯這兩個組織間的爭鬥從未停止過。「兩個廣播站同時開播，同時做宣傳並發布各類命令。他們的廣播相互干擾。」⁹¹兩個廣播站的主要領導人物，封從德和周鋒鎖，還曾兩次大打出手。

絕食開始之後，學生對話團逐漸失去影響，高自聯對學生運動的影響也趨於衰落，絕食領袖開始對運動發揮更大的影響；然而，絕食領袖之間也是分裂的。絕食領袖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比如吾爾開希（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王丹），把絕食看作是一次政治行動。對他們

⁸⁸ 劉曉波 (1992, 142)。

⁸⁹ 封從德 (《回顧與反思》1993, 151) 講述了這個廣播站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李錄 (《回顧與反思》1993, 138) 聲稱：「我們的指揮部主要是靠封從德的這個廣播站維繫着。沒有廣播站，指揮部就名存實亡。」

⁹⁰ 發起建立這個廣播站的一位學生詳細地敘述了它的建立過程和所進行的各類活動 (《中國新聞摘要》1994)。

⁹¹ 鄭義 (1993, 95)。

來說，諸如戈爾巴喬夫訪華這樣的事件是推進學生運動，並迫使政府做出更多讓步的良機；但對另一類領袖而言，絕食只是一種表達方式，或是一次通過自我犧牲來改造中國的機會，他們不太關心戈爾巴喬夫的國事訪問，也不努力去利用隨之而來的大批外國記者所提供的機會，⁹² 他們只是決心將絕食進行下去，直到政府完全接受他們的要求為止。絕食的性質（這裏指個人為此所需作出的犧牲）決定了參加絕食的學生大多屬於後一個群體，這一點可以從北京大學絕食動員的初始階段（在這一階段被鼓動起來的學生構成了絕食行動的中堅力量）得到反映。正如第九章將要討論的那樣，北京大學的絕食動員一開始並不成功；直到柴玲重新確定絕食的目標，將之從「為民主」轉向「看看政府的真實面目，檢驗中國人的良知」之後，許多學生才加入了絕食行列。

因此，儘管吾爾開希和王丹這樣的學生領袖在發動絕食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但他們自絕食伊始便喪失了控制這一行動的能力。事實上，正是由於他們在談判過程中，以及在與政府官員打交道時所表現出來的相對靈活性，使他們在絕食學生心目中的威望節節下降。絕食開始之後，真正控制廣場的是柴玲、封從德、張伯笠和李錄等的「理想主義」分子。「獻身」、「改革需要犧牲」、「中國需要第二個譚嗣同」、⁹³ 「直面死亡，我們為生存而戰」，類似這樣的標語成了絕食學生的主流話語；一些絕食學生甚至拒絕喝水並計劃自焚。結果，諸如戈爾巴喬夫訪華、大批外國記者到來這樣的重大事件都未能對運動的事態發展產生根本性影響。這恰恰也證明，當時操控天安門廣場的那些學生，並沒有把這類事件看作是「政治機會」。

⁹² 學生領袖們的行為可以表明這一點。比如，吾爾開希和王丹頻繁地參加新聞發佈會，並接受外國記者的採訪；而諸如李錄、封從德、柴玲這樣的領袖則很少參與這類活動。

⁹³ 譚嗣同是清末「百日維新」（1898年）中的一個關鍵人物。變法失敗後，一些關鍵人物遭逮捕。譚嗣同有逃跑的機會，但他拒絕這麼做，而是決心以自己的死喚醒更多的人。譚嗣同死後成了傳奇人物。

不過，甚至指揮部的學生領袖也不是廣場人群中最激進的一類，雖然他們都可被認為是極端的理想主義者，但其領導地位迫使他們要比其他學生考慮更多的問題；因此，他們有時也想結束絕食，以免發生意外。然而，他們實際上也沒有控制絕食同伴的能力。5月16日以後，鄭義一直呆在絕食指揮部總部，他觀察到：

儘管指揮部的領袖們無休止地開會，但是真正的決策權並不掌握在這些能翻江倒海的年輕領袖手中……不管甚麼時候，只要向絕食的學生提出結束絕食的想法，回答都是一個很乾脆的「不」。一天晚上，結束絕食在學生領袖中成為主導意見，但這是不可能得到執行的。絕食的學生們懷疑領袖是要出賣自己辛辛苦苦得來的果實，而政府對絕食行為的置之不理也激發了他們奮戰到底的決心……許多學生甚至聲稱，如果指揮部決定結束絕食，他們就立刻自殺。這種拿生命去戰鬥的心態每時每刻都在擴散並趨於激烈。長達100個小時的絕食已經培養起一種共同的感情，這一認同將3,000名絕食者團結為一體。只要還有一個學生拒絕進食，其他人就會追隨。⁹⁴

不過，儘管學生領袖已經對運動的方向失去控制，但隨着運動的發展，天安門廣場卻變得越來越秩序化和等級化。許多學生領袖都有幾個保鏢跟隨，據說是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糾察綫⁹⁵也形成了，以便救護車能夠快速進出；一套複雜的安全系統也隨之衍生。欠缺有效

⁹⁴ 鄭義(1993, 70)。

⁹⁵ 李錄(《回顧與反思》1993, 139)說，糾察綫主要是他的功勞；而Calhoun(1994, 73)則報告說，這主要是張倫的工作。在那段時間，幾乎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糾察隊，也有些糾察隊在成立時是獨立於大學的。儘管各個大學的糾察隊之間也有合作和協調，但它們不一定是由一個人或一個組織領導的。比如，第3號受訪者(一名糾察隊員)就曾說：「我不知道誰負責管理這些糾察隊，但我們都知道應該怎麼做。確實也有人過來，讓我們做這做那，但他們並不是同一幫人。有時候，我自己也想到一些事情，然後就讓其他隊員去做。關鍵是，如果你有想法，就要讓其他人瞭解。」

的通行證件，人們不再能在廣場上自由活動；但這種有效證件有時一日數變，所以即使是學生領袖和積極分子，想四處走動都感到困難。⁹⁶

絕食的結束

在同學生談判失敗之後，政府高層的內部衝突加劇了。5月15至17日期間，中共中央舉行了一系列會議。在這些會議上，除了趙紫陽外，大部分領導人都想通過戒嚴來終止這次運動（見第七章）。5月17日之後，政府再次和學生接觸。不過，與前幾次不同的是，這些接觸的目標不是要同學生達成一致，而是為了安撫民眾。⁹⁷ 比如，在5月18日李鵬與絕食組織者的會談中，學生仍把對話以及政府對運動作出正面評價為結束絕食的前提條件，而李鵬則只對如何結束絕食，以及如何將絕食學生送往醫院這樣的問題感興趣。⁹⁸

到了5月19日，大部分學生領袖都知道，政府將要宣布戒嚴。因此，許多學生領袖和積極分子都希望結束絕食，以免給政府以戒嚴的口實。5月19日傍晚時分，兩位知識分子來到廣場。他們找到張伯笠，⁹⁹ 並把張帶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那裏已經有約50位知識分子在等候。這些知識分子告訴張，戒嚴將在當晚零時啟動；他們建議立刻終止絕食，以免給政府以戒嚴的藉口；張同意去說服指揮部的其他學生領袖。與此同時，他也要求這些知識分子為他們準備一份聲明停止絕食的宣言。

⁹⁶ 劉曉波 (1992, 131–32) 曾描述過這一安全系統是如何運作的；學生領袖梁二 (《回顧與反思》1993, 241) 也曾憶及他在穿過糾察綫時所遭遇的困難。

⁹⁷ 趙紫陽5月19日對學生的慰問不能算在內，因為趙的到來是出於其他目的 (詳見第七章)。

⁹⁸ 許多來源不同的文獻都對這次會談進行了詳細報道。英文版的文獻見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1990, 269–82)，也可參見 Han and Hua (1990, 242–46)。

⁹⁹ 下文的敘述主要以張伯笠的描述為基礎 (《回顧與反思》1993, 195; 張伯笠 1994c, 46–47)。我也綜合了李錄、柴玲、封從德、劉燕在《回顧與反思》(1993, 164–70, 199–201, 204, 201–03) 中的敘述。

張伯笠返回後，同李錄和柴玲討論了這件事情。兩人都同意終止絕食。晚上7時，他們開會投票表決此事。會議在一輛大巴裏進行，約有200名學生與會，其中有好些是張親自挑選出來以支持自己的人。張特別囑咐看守大巴的人不要讓吾爾開希進來；他的考慮是，如果吾爾開希反對停止絕食，憑他的影響力完全有可能攪黃這次會議。張首先發言。在發言中他強調，如果絕食繼續下去，許多人都會面臨死亡。因為他相信戒嚴令的威脅仍然是個秘密，所以他沒有把他想結束絕食的意圖說出來。¹⁰⁰張講完後，其他人想接着發言，但張只給那些他事先挑選的學生以機會。然後，張要求就這項提議投票，大多數與會者都贊同結束絕食。¹⁰¹

學生領袖們於是組織了一次由柴玲主持的集會來宣布這項決定。決定剛一宣布，許多學生就站起來指責學生領袖們出賣絕食學生。柴玲的丈夫封從德也走到前面，指出這項決定是無效的，要求再進行一次投票。學生領袖們接着就發生了激烈的爭鬥，李錄和王文甚至拳腳相加。最後，封從德辭去了指揮部的職位，並出去進行另一次投票。他得出的結果是相反的：「離開後，我另外進行了一次投票……超過80所大學派來了代表。至少有80%的代表說，他們學校不同意結束絕食的學生比例高達80%到100%之間。」¹⁰²

¹⁰⁰ 事實上，在會議進行期間，指揮部的廣播站已經播出了消息：「今晚12點45分，政府將派軍隊到廣場。」（《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1991, 185）因此，大部分學生應當已經知道即將頒令戒嚴來。

¹⁰¹ 同一天晚上，另一群學生領袖，包括吾爾開希、劉燕、王丹、馬少方、程真、梁二、沈彤、項小吉、以及其他許多人也開了一次會，決定結束絕食。劉燕回憶說，她和吾爾開希下午去見了閻明復（《回顧與反思》1993, 201-02）。閻明復告訴他們，當晚將要宣布戒嚴。吾爾開希讓劉燕到廣場找齊所有的學生領袖到統戰部開會。在那次會上，閻明復告訴了所有學生即將要戒嚴的消息，並要求他們結束絕食。最後，他們都開始進食了。當這些學生返回廣場的時候，張伯笠召開的會議也即將結束。最後，兩個團體的學生都出現在宣布結束絕食的會議上。其他關於統戰部的那次會議的描述，見Shen Tong (1990, 287-88)。

¹⁰² 封從德（《回顧與反思》1993, 204）。

檢驗和判斷哪次投票更為有效，意義並不大。事實是，在決定宣布之後，大部分學生仍在絕食。可張伯笠卻通知北京的記者說，絕食已經結束。半個小時之後，大約在9時，中央電視台終止了正常的節目，改為播出學生停止絕食的決定。學生領袖們認為這是一次巨大的勝利，並認為終止絕食會使戒嚴變得不合法。

晚上10時，天安門廣場上的擴音器開始現場直播國家高層領導人、北京市政府領導、以及軍隊幹部進行的一次緊急會議。在會上，李鵬聲稱政府將「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結束這場動亂，以捍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楊尚昆則強調說：「為了維護首都秩序，恢復正常生活，我們只能讓軍隊進北京。」¹⁰³ 當晚，各路軍隊開始從郊區逼近北京。第二天一大早，戒嚴令正式生效。此後，雖然一些學生直到5月20日還在絕食，但是運動的焦點已經轉向了正在推進的軍隊。

從戒嚴到鎮壓

群眾抵抗

當政府的緊急會議還在進行時，戒嚴部隊已經從四面八方向北京推進。到5月20日，約有七八個師的部隊（每師在10,000到15,000人之間）試圖通過公路、鐵路、地鐵進入北京。¹⁰⁴ 戒嚴令的發布，以及軍隊進城的消息激怒了大部分北京市民。他們聚集在一起，阻擋軍隊、保護學生。在各條幹道上，人們動用了一切可以用來設置路障的東西，比如下水管道、混凝土柱子、自行車護欄、垃圾桶、鋼條和汽車等。¹⁰⁵ 這樣的群眾抵抗通常開始於幾個在走路時偶然發現軍隊的學生或市民，他們要麼直接去阻擋軍隊，要麼就去通知附近的居民。然後人們就上百、上千、上萬地相繼起來，乃至最後在數量上超過了軍隊。

¹⁰³ 關於這兩項發言的英文版，見Han and Hua (1990, 255–58)。

¹⁰⁴ 見Brook (1992, ch. 3) 就軍隊這段時間的推進所做的描述。

¹⁰⁵ 我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公路上，因為大部分軍隊是從公路進入的。

在這一階段，大部分士兵是沒有武裝的。在遭到攔截、不能前進之後，他們就呆在受阻的地方，停滯不前。而人們在阻擋住軍隊之後，就會走近軍隊，甚至爬上軍用卡車，告訴士兵們這次運動的「真相」，並要求他們離開。此時，士兵們通常對北京市民的反應感到十分困惑。無論面對慷慨激昂的勸說，抑或嘲笑，他們一般都保持沉默。當人們問他們為何來北京時，他們的答案從「參加軍事演習」、「保衛天安門」到「拍電影」，不一而足。許多士兵說，他們已經有一週讀不到任何東西了；北京自絕食以後所發生的一切，他們幾乎一無所知。¹⁰⁶

士兵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受到了友善的對待。軍隊的補給由於路障而陷入癱瘓，當地市民和學生就送食物、飲料給士兵。而且，在學生聚集的大學區附近，大學生甚至與士兵聚會聯歡。¹⁰⁷當然，士兵也遭到一些北京青年市民的羞辱：「當兵的都是婊子養的！」、「滾蛋回家吧，你媽就要死了！」、「你家姐妹正在被輪姦，快滾回去吧！」這些惡毒的咒罵深深地傷害了許多士兵的感情，¹⁰⁸緊張和怨恨也開始在他們中間擴散開來。

這個階段偶爾也有暴力行為發生，其中最嚴重的發生在豐台區。5月20日中午，有好幾百名警察動用警棍對付一群人。有45人在衝突中受傷，其中三人傷勢嚴重。¹⁰⁹5月22日晚，基於學生代表和軍隊達成的默契，滯留在這一帶的38軍113師的士兵開始撤退。撤退時，人群中有人喊道：「打他們，往死裏打！」「別讓他們進城！」磚頭於是紛紛向士兵們飛去。第二天一大早，同一地點再次發生衝突。來自政府的資料顯示，在這些衝突中總共有116名士兵受傷，當中29人重傷。¹¹⁰

¹⁰⁶ 大部分已出版的資料都把這類回答當成軍人的真實思想。其實，有些士兵很可能是假裝無知以避免衝突。比如，一位來自東北軍區的低級軍官寫道，他們去北京之前，就已經通過錄像觀看了學運的情形（高子榮1989, 8）。在戒嚴期間，許多士兵還打出V形手勢，或喊親運動的口號，以緩解衝突，並使進入北京更加容易（陳貴水1989, 13）。

¹⁰⁷ 我的一位受訪者（第63號）就在頤和園附近參加了一次這樣的聚會。

¹⁰⁸ 揚清福（1989）描述了士兵在這段時間如何遭到當地青年市民的羞辱甚至毆打。

¹⁰⁹ 武仁（1990b, 69）。

¹¹⁰ 前揭文，75。

士兵們當時沒有還手，但肯定都非常氣憤。¹¹¹ 這樣僵持了兩天之後，政府不得不下令軍隊於5月22日早上撤退。群眾的抵抗活動取得成功。

令人吃驚的是，這次成功的群眾抵抗基本上是自發的，當時確實有人試圖協調各種抵抗活動。例如，5月19日晚，對話代表團的幾個成員組成北京各大學協調處，該協調處有一張一名軍官贈送的軍事地圖，還有兩條電話熱綫。一位受訪者(第59號)回憶說：他們每三分鐘就會接到一個電話，報告軍隊的具體位置，然後他們就通過電話通知各個大學，讓它們派學生到某個地點去攔截軍隊。5月20日，王超華也向幾個已有大量軍隊被阻攔的地方派出了學生小組。高自聯後來甚至繪製了一份標明軍隊位置和主要路障的北京地圖，並指派每個大學分別負責一個地區。¹¹² 最後，飛虎隊，一個由個體戶組成的結構鬆散的摩托車隊(他們駛過市區時所製造的喧嘩使他們非常引人注目)也馳騁北京，不斷地在路上散播有關軍隊移動的消息和各類謠言。

同樣需要強調的是，這些協調工作中的大部分都只是臨時起意，在群眾抵抗中發揮的作用也很小。下面這一段敘述非常有代表性，它表明了北京市民是怎樣被發動起來加入這一場群眾抵抗運動的：

那天晚上我在家。半夜時分，只聽見有人大聲嚷嚷，把我吵醒了。外面有人喊軍隊要來了，讓鄰居們去堵截軍車。許多人都出去了……也有人喊「要帶上濕毛巾，以防催淚瓦斯」，於是大家接着就回去取毛巾。我們來到外面的街上，看到路邊擺放着一些混凝土製成的下水管。我們馬上把這些管道推到路中間。那天晚上，好多人都出來了。我全家也都出來了。廣場上有許多學生，其中就有我的鄰居的孩子。即使自己的孩子不在廣場，許多市民也會出來，因為他們覺得如果士兵進了廣場，學生就一定會挨打。(第8號受訪者)

和北京市民一樣，學生和教師也自發地採取各種行動。一位青年教師(第36號受訪者)向我講述了他們一幫人是如何加入抵抗行列的：

¹¹¹ 任斌(1989)。

¹¹² 王超華(《回顧與反思》1993, 212)。

5月19日，我們得知軍隊將在當晚開進來。許多青年老師來到我的宿舍。我們討論如果軍隊來了，我們應當做甚麼。最終，我們決定去說服士兵撤退。我們便寫了一份聲明，將其印發為傳單，並錄成磁帶。要是我們遇到軍隊，就向他們發傳單，放磁帶……

晚上，我們直奔六里橋……到達那裏時，我們發現軍隊已經到了，而且已經有人在那裏阻攔軍隊了。我們便走過去，打開錄音機。不知怎麼搞的，我們最後分散了，只剩下我一個人。後來我遇到我們學校的兩個學生，我們三個人就組成一個新隊伍。那兩個學生告訴我八寶山那邊軍隊更多，於是我們就去了那裏。

有九名受訪者談到5月19日當晚的親身經歷，沒有一個人表示他們的加入是因為受了某個組織的動員，或某個組織曾經協調過他們的抵抗活動。

外地學生和運動發展

絕食開始之後，全國各地的學生開始大批大批地到達北京。從5月16日到26日，大約有172,000位外地學生坐火車到達北京，而離開的只有86,000人左右。¹¹³ 考慮到還有學生通過汽車、飛機、自行車，甚至步行來到北京，這個數字應該更大。因此，5月20日以後，當越來越多的北京學生對運動開始感到厭倦、並打算離開的時候，外地學生逐漸成為廣場上的主力。

¹¹³ 吳牟人等 (1989, 474)。不過，政府可能嚴重高估了外地學生的返回率。5月下旬，外地學生只要出示學生證，就可以從北京火車站免費得到一張返程車票。政府的統計數字很可能就是以領取車票學生的數量為基礎的。而事實上，許多在北京讀書的外地學生也都利用了這次機會。他們從來自家鄉的外地學生那裏借到學生證，然後就去領取一張回家的免費車票。我的一位受訪者 (第10號) 告訴我，他就是用這個辦法沒花錢就回到了廣州。

大部分外地學生都是免費坐火車來到北京的，其辦法是說服甚至脅迫當地車站的工作人員讓他們上車。如果這一招不奏效，他們甚至臥軌，阻攔火車通過。一位受訪者(第27號)回憶說，天津火車站甚至在5月17日加開了學生專列，使任何人都能免費到北京。那一天，大概有一萬名天津學生去了北京。

大量外地學生到北京後都呆在廣場上，但還有為數更多的學生晚上住在新結識的同伴或高中同學的宿舍裏。我的大部分學生受訪者都記得，當時他們自己的或附近的宿舍裏都住有外地學生。一位受訪者(第33號)告訴我，到5月下旬，他們學校住在宿舍裏的學生有一半是外地的。另一位受訪者(第68號)則說，他本人就曾安排過一百多個外地學生的住宿。

大量外地學生的到達使學生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外地學生來北京一般都是出於以下兩個原因：要麼是當地的學運積極分子，希望進北京支持運動；要麼是想借此機會到北京免費旅遊。不管是那種原因，他們都不希望只呆上兩天就回去。因此，五月下旬後仍然呆在廣場的學生，不是精力充沛的新來者，就是北京學生中的極端激進分子。

戒嚴初期的學運領導權

宣布戒嚴之後，天安門廣場不再是運動的焦點，絕食已經變得沒有任何意義。到5月20日中午，甚至最堅決的絕食者也開始進食，大部分人也開始返校。這時，絕食領袖們仍在廣場徘徊，但對組織學生或北京市民去攔截軍隊，他們未做任何努力。¹¹⁴ 面對軍隊在數量上的優勢，絕食領袖們感到心灰意冷。5月21日，謠言使他們相信，軍隊將在當晚強行進京，直指廣場。因此，所有主要領袖，包括柴玲、封從德和張伯笠等人(李錄除外)，都躲了起來。

5月21日晚，對那些仍然滯留在廣場上的學生來說，那是神經高度緊張的一夜。¹¹⁵ 然而，軍隊在當晚不但沒有抵達，反而在5月22日

¹¹⁴ 張伯笠(《回顧與反思》1993, 207)。

¹¹⁵ 吳牟人等(1989, 364)描述了那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的情緒。

開始撤退。這一新發展立刻改變了學生們的情緒，也改變了他們對運動前途的估計。張伯笠描述了這一變化：

5月20號，一位重要人物告訴我說，大屠殺將在當天晚上開始……他說服我們立刻離開廣場，以避免流血……他還說軍方已經印製了一萬張北京交通地圖。根據這個數字，我估計大約會有一萬個班或者排的士兵將要到來。我們都害怕了。但我們並沒有要求學生或者當地居民去攔截軍隊……第二天，我們都收到一些應急款項，然後就跑了。我到徐剛家裏躲了起來。可是讓我吃驚的是，當晚軍隊並沒有來，一切照常。有人打電話告訴我這方面的情況時，我說這真是好消息，好極了。如果這次我們沒有遭到鎮壓，那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於是我們討論應該馬上着手辦理的事情。最後，我們得出一致結論：如果這次軍隊不敢使用武力，那麼以後他們再使用武力就更困難了。在這個信念指引下，我們返回了廣場。¹¹⁶

不僅學生領袖，而且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也都變得樂觀起來。人們普遍相信，軍隊不會向學生和市民開槍。

5月22日傍晚時分，絕食領袖們回到廣場。但他們很快就發現廣場已經不再屬於他們。在指揮部停止工作後的那幾天裏，高自聯對學生的影響增加了；同時，許多其他組織也冒了出來。最為嚴重的是，在絕食領袖們躲起來之後，王超華曾一個帳篷一個帳篷地去說服學生們離開；而每當一個帳篷的學生同意離開後，她就要求派一名代表簽字。所以，到絕食領袖們返回廣場時，已經有超過200所大學的學生都簽字同意離開了。¹¹⁷ 這樣，對絕食領袖來說，削弱高自聯在廣場上的影響就成了當務之急。

由於王超華手裏有這張超過200所大學的學生簽過字的名單，絕食領袖們第一件要做的工作就是獲得這份名單。為此，張伯笠騙王超華給他看這份名單，然後就沒有再歸還。¹¹⁸ 與此同時，絕食團在5月

¹¹⁶ 張伯笠（《回顧與反思》1993，207-08）。

¹¹⁷ 前揭書，208。

¹¹⁸ 前揭書。

22日晚也組織了一次會議，召集了89所大學的學生「代表」。¹¹⁹ 在會上，他們羞辱高自聯和其他學生組織。其中，柴玲宣稱：

你們高自聯自成立開始就沒有做過一件好事。尤其是，你們佔據着領導的位置，卻沒有表現出領導者的品質。你們從一開始就反對絕食。但是，當絕食在你們的反對下開始之後，你們又把你們的總部移到廣場，來表達你們對絕食的支持。對於你們所做的一切，我絕對無法理解。¹²⁰

張伯笠又補充說：

我們現在正處在戒嚴之下。中共中央已經建立了戒嚴總指揮部，調動了數十萬士兵來對付我們。但是廣場上的形勢卻非常讓人失望。目前廣場上有十多個學生組織，每個組織都聲稱擁有最高指揮權，但是每個組織都不負責任。高自聯在廣場上只有一個光杆司令，那就是王超華。外高聯的領袖們也沉迷於權力鬥爭，一天之內四次更換總指揮，甚至想接管廣播站。如果任由事態發展，即使戒嚴部隊不來打我們，我們也會自己把自己打敗……因此，我建議成立一個臨時總指揮部，對廣場實施48小時的領導。同時，把高自聯拉回北大，讓其自我反省與改組。臨時指揮部在結束48小時的使命後，再把權力交還給高自聯。¹²¹

根據張的敘述，¹²² 大部分與會學生都舉手表示贊同。張繼續說：

〔在絕食期間〕絕食指揮部的領袖們已經確立起他們的威信，並得到了學生們的信任。因此，絕食指揮部的領袖應當在臨時總指揮部中擁有主要位置。常委會的成員應該包括柴玲、王丹、

¹¹⁹ 這個數字來自李錄(1990, 175)。請注意，在運動期間，學生領袖習慣使用各種手段來操縱會議。因此，會議的結果將會隨組織者身份的不同而迥異。

¹²⁰ 柴玲(《回顧與反思》1993, 224)。

¹²¹ 張伯笠(1994d, 57)。

¹²² 前揭書。

王超華、李錄、封從德、郭海峰和我。臨時總指揮部仍然應該只有一個總指揮，那就是柴玲；三個副指揮，張伯笠、李錄和封從德；一個秘書長，郭海峰。¹²³

據張回憶，當時與會者都鼓掌表示贊同；不過，會後王超華情緒非常激烈，她憤怒地指責絕食領袖們製造了一次政變。對此，張伯笠回答說：「決議已經通過了。你得到再大的支持也沒用。這就是民主。」¹²⁴ 這樣，絕食領袖們又重新在廣場上佔有主導地位。

聯席會議

宣布戒嚴之後，一些在80年代曾經活躍於政治舞台的主要知識分子試圖加強對這次運動的影響。5月22日晚，他們在廣場上召開了一次會議，討論是否可能建立一個組織，把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所有力量聯合起來。王軍濤、陳子明、包遵信、嚴家其、劉曉波、王丹、梁二和張倫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還邀請了一些新成立的非學生組織的領袖和一些香港人士參加。¹²⁵ 由於這次會議未能做出決議，第二天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又開了一次會。絕食領袖柴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次，與會者決定建立一個組織來協調並領導這次運動。他們將這個組織命名為「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以下稱聯席會議），以表示其廣泛的群眾基礎——儘管這個組織事實上是由知識分子和學生主導的。

聯席會議建立之初，大家對它的期望很高。但是，學生並不信任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內部也有不同的想法。這使這個組織最終未能對整個運動產生實質性影響。¹²⁶ 一位學運領袖（第69號受訪者）回憶說：

¹²³ 王超華在這裏被提議進入領導層，是因為絕食領袖們需要她的合作。見張伯笠（《回顧與反思》1993, 209）。

¹²⁴ 前揭書。

¹²⁵ Black and Munro (1993, 206); 張倫和老木（《回顧與反思》1993, 232）。

¹²⁶ 見李錄（1990, 176-77）所敘述的關於絕食領袖在這一時期對待知識分子和聯席會議的態度。

那幾天，我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花在聯席會議的各種會議上。每次會議少則半天，多則全天。我們討論了當前的形勢並交流了信息。儘管我們提出了許多建議，但廣場上的學生從來就沒有採納過這些建議。所以，會議最後變成了一群人在一間大屋子裏清談。

話雖如此，但知識分子也確實幫助了絕食領袖們，至少使他們在廣場上建立起了名義上的權威。事情是這樣的：當戒嚴部隊撤退之後，知識分子一度也和學生一樣樂觀。他們相信這場運動是「光明與黑暗之間的最後決戰」。¹²⁷ 他們相信：「只要天安門廣場這面旗幟不倒，運動所引發的連鎖反應必定會燃遍全國。」¹²⁸ 因此，他們支持繼續佔領廣場，並決定建立「保衛廣場總指揮部」（以下稱總指揮部）以控制廣場。他們任命柴玲為總指揮，張伯笠、封從德和李錄為副總指揮，郭海峰為秘書長。第二天，即5月24日，總指揮部在廣場上舉行了由王丹和柴玲主持的誓師大會。會上，王丹宣布了總指揮部的成立以及聯席會議的任命。在日前成立的臨時總指揮部的骨幹人物，也就是絕食指揮部的領導成員，在這個新成立的指揮部中壟斷了幾乎所有的領導崗位。¹²⁹

根據早先達成的共識，絕食領袖們應當在48小時之後將廣場的領導權交還高自聯；因此，這一任命實際上幫助絕食領袖們擊敗了高自聯，並取得對廣場的主導權。李錄描述了柴玲從聯席會議的會上回來之後的感受：「5月23日，柴玲到我這裏，興奮不已。她告訴我說，我們再也不用擔心48小時的期限了……（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得到了一個

¹²⁷ 這是為聯席會議的第一次會議所準備的一份宣言的標題，起草人是甘陽。

¹²⁸ 鄭義（1993, 96）。

¹²⁹ 在一個場合，李錄曾否認了總指揮部的領袖是由聯席會議任命的（《回顧與反思》1993, 238），但在另一個地方他又承認了這個任命（前揭書，219–20）。在此，我採用老木（前揭書，272–74）和張伯笠的說法。這不僅是因為李的回憶前後不一；這樣做還是因為，老木參加了那次會議，張伯笠擁有會後的任命名單，而李錄並沒有參加那次會議。

更大的組織——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任命。」¹³⁰張伯笠於是也用同樣的任命去搪塞王超華。5月24日晚，王超華帶着高自聯改組後的領導人和一個新的運動計劃去找張伯笠，要求他們將廣場的領導權歸還給高自聯。對當時的場景，張回憶說：

王超華來到我這裏。為了避免和她衝撞，我告訴她：「你去跟聯席會議討論這個問題吧。」超華說：「你說話不算話。我們已經進行了整風重組，還成立了由九個人組成的新的領導小組。」……我回答說：「首先，你我之間確實有一個要在48小時之後將權力歸還給你們的協議。但柴玲才是總指揮，我不是。所以我只有建議權，沒有決定權。其次，聯席會議是王丹領導的。王丹目前是整個學運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現在領導着一個包括知識分子和學生在內的組織。我認為他們的決定具有更大的權威性。而且，我聽說聯席會議不但能給總指揮部提建議，還能命令總指揮部。我認為他們有權領導我們……我確實想把權力歸還給你。但是，建立總指揮部的是聯席會議。」¹³¹

由此，通過給予絕食領袖們以關鍵的支持，知識分子的行動在實質上促成了學生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此後，儘管總指揮部遠未達到可以指揮廣場的地步，但它確實成為廣場上的一面最重要的旗幟。

撤還是不撤

到了5月下旬，形勢已漸漸明朗。繼佔領天安門廣場帶來了許多問題。如果佔領持續下去，民眾和政府之間的血腥衝突變得不可避免。此時，大部分知識分子和北京學生都認為，學生應該撤離廣場。¹³²然而，事已至此，無論是聯席會議還是高自聯，都已經不能控制住學生了。這場運動的命運現在已經掌握在那些仍然拒絕離開廣場的人們手中。

¹³⁰ 李錄（《回顧與反思》1993，219–20）。

¹³¹ 張伯笠（《回顧與反思》1993，210–11）。

¹³² 關於北京市民在這段時間中的情緒變化，見吳牟人等（1989，533–34）。

5月27日，聯席會議召開了一次會議。在以前聯席會議召開的各種會議上，與會者事實上從未達成任何共識；但這一次，所有與會者，包括柴玲和封從德，都贊成學生應當撤離廣場。¹³³ 他們決定舉行一次大規模的遊行以慶祝勝利，之後就在5月30日撤離。許多人都大大地鬆了一口氣，認為學生和政府之間的死結看來是可以解開了。然而，在當晚的新聞發布會上，柴玲和封從德又改變了想法。柴玲宣稱這次會議是個陰謀，他們當時投票贊成，完全是出於其他與會者的壓力。柴玲還宣布，她的總指揮部已經決定脫離聯席會議。人們對此都非常失望。三位香港記者在報道中表達了他們的沮喪心情：「儘管撤離的提議以多數票通過，但這項決議卻沒有甚麼效力。讓我們吃驚的是，各個運動組織的提議，甚至包括聯席會議這樣最高級別的運動組織，都必須得到『保衛天安門總指揮部』的同意才有效。多數必須聽從少數，這多麼荒謬。」¹³⁴

那麼，這種情況又是怎樣形成的？在八九學運中，柴玲主意多變的聲名遠揚，常常會上說的是一套，會後在群眾集會上說的又是另一套；¹³⁵ 但這一次，似乎是李錄影響了她。根據李錄本人的說法，當柴玲告知他會議決定的時候，他指出聯席會議只是一個協調性的組織，而總指揮部只對「天安門廣場議會」（這個「組織」的性質將在後面解釋）負責。在李錄看來，聯席會議的決定實際上是不民主的，因為兩天前天安門廣場議會的投票已經決定要繼續佔領廣場了。¹³⁶ 根據柴玲的回憶，李錄之所以打動了她，是因為李警告她這項撤離廣場的決議可能是政府的一個陰謀。李錄說政府一直在和聯席會議的人密謀，千方百計地想把學生騙離廣場。不管怎樣，通過這種辦法，李錄最終說服了柴玲。¹³⁷

¹³³ 關於這次會議的其他細節，見劉曉波（1992, 179–81）。

¹³⁴ 兆強、葛靖、思原（1990, 135）。

¹³⁵ 王超華（1993, 31）和另一個學生領袖（第69號受訪者）的敘述都表達了對柴玲的類似印象。

¹³⁶ 李錄的這個說法是我從他本人（1990, 179–80）在《回顧與反思》（1993, 238–40）的敘述中概括出來的。

¹³⁷ 柴玲（《回顧與反思》1993, 227）。

當然，李錄反對撤出廣場的理由只是一個藉口而已。僅僅在四天前，當柴玲非常興奮地告訴李錄說：「我們再也用不着擔心把權力歸還給高自聯了，因為我們已經被聯席會議任命為總指揮部的領導了。」李錄似乎並不擔心這些任命違反民主程序，或說是政府的一個陰謀。不過，我們在這裏也不應高估李錄個人在運動中的作用。在當時，即使李錄沒有提出反對，即使柴玲沒有改變決心，學生撤離廣場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要弄明白這是為甚麼，就有必要考察一下廣場上的微觀決策機制。所以，下面我將把焦點放在所謂的「天安門廣場議會」的會議上，這也正是李錄為了對抗聯席會議的而打出的一張王牌。

在戒嚴期間，各個組織都頻繁地在廣場上開會。李錄所說的「天安門廣場議會會議」，是指由總指揮部召集的會議。¹³⁸ 這個術語給許多研究八九的學者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即是，廣場內部存在某種穩定的制度，它與總指揮部的關係類似於民主國家中議會與行政部門之間的關係。這種印象是具有誤導性的，這不僅因為很少有與會者是被選舉出來的，更因為在總指揮部召開的這些會議上，與會人員的構成是高度流動的。

5月下旬，在廣場擁有營地的大學達到了約400所之多（這還不包括一些職業技術學校）。但是，在總指揮部召開的會議上，每次都只有部分大學的學生到場，而且每次派代表與會的大學也各不相同。¹³⁹ 從更廣的角度來說，在戒嚴期間，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的變動是非常大的；如果考慮到大量外地學生進京這一因素，更是如此。一個學生可能前一天還在廣場上開會，第二天就離開廣場一去不返了。就與會的代表而言，每所大學派出的代表每次都有很大的變化。與會代表頻繁的變動意味着，那些認為學生應當撤離廣場的人實際上很快就自行離開了，而那些仍然留在廣場並參加所謂「天安門廣場議會會議」的人，

¹³⁸ 請注意，除李錄之外，其他學生領袖並不用這個詞來稱呼這些會議。

¹³⁹ 比如，根據李錄本人的敘述，5月22日的那次會議只有89所大學派來了代表，而5月24日的那次會議則有超過300所大學的四百多名學生代表參加（李錄 1990, 175, 177）。

則更可能是頑固的激進派和精力尚還充沛的外地新來者。在這種情況下，任何緩和局面的努力都變得十分艱難。根據李錄的回憶，關於是否撤離廣場的爭論，每次都是「天安門廣場議會會議」的首要議題，並耗費他們的大部分時間。不過，與會者中的壓倒性多數每次均拒絕離開，他們大多都是外地學生。¹⁴⁰ 因此，李錄和柴玲之所以拒絕撤離廣場，很可能是因為，這實際上是他們可以做出的唯一選擇。因為，他們如果決定撤離廣場，不但不可能得到執行，而且他們本人也可能因此而被驅逐出領導層。關於這一點，吾爾開希在6月2日接受香港記者李佩爾的訪問時，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好多次都想撤離廣場，但每次都改變了決心。比如，5月27日我們曾宣布學生將在5月30日離開廣場，但我們的決定遭到了拒絕。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學生們，尤其是外地學生們，都不願意離開。最後，所有管事的人都必須支持佔領廣場，如果你要學生離開，學生們就會把你拋開。¹⁴¹

事實上，吾爾開希就是在5月22日一大早因為要求學生撤離廣場而被逐出了學運領導層。王超華亦如是，由於她一直堅持帶走學生，最後也被排擠出廣場。6月1日，外高聯的領導連勝德，也因為鼓動學生離開廣場而遭罷黜。對於學生領袖而言，保持在廣場上的影響力的唯一途徑就是保持激進立場。

香港資金

戒嚴令頒布之後，大部分國有企業和政府機構都停止了對學生的資金支持。所以，越來越多的學生組織，甚至學生個人，都不得不致力於募捐活動。¹⁴² 但是，沒有哪個學生組織具備良好的賬目系統，學

¹⁴⁰ 李錄（《回顧與反思》1993, 303）。

¹⁴¹ 李佩爾（1989, 211）。

¹⁴² 比如，一位受訪者（第18號）就向我描述了他的幾個同學是如何出去募捐，又是如何用募捐得來的錢為自己買進口香煙的。

生們假公濟私和腐敗的醜聞也鬧得滿城風雨。¹⁴³ 所以，到5月下旬，北京市民也不怎麼願意捐錢了。在這段時間裏，雖然每天仍然不斷有從其他城市、甚至其他國家帶着捐款的人抵達北京，但面對一個混亂的學運領導層和種種學生腐敗行為，他們不得不在找到一個足以托付捐款的人之前，暫時把錢留存起來。最終，這些錢中的大部分都沒有到達廣場上的學生手中。

在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後，國際媒體對學運進行了廣泛的報道，海外華人也隨之日益捲入這場運動之中。他們組織遊行並舉辦募捐活動，但他們籌集到的資金同樣大部分都未能到達廣場上的學生手中。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錢大量地是通過支票或現金匯票的方式發出的，而由於他們對國內學運瞭解甚少，因此匯款的抬頭寫的往往是「學生自治聯合會」、「絕食總部」、「天安門廣場總部」，或者乾脆就是「天安門廣場」。很明顯，這種捐款到達學生手中的可能性很低。¹⁴⁴

不過，畢竟資金數額巨大，而且渠道多樣，所以，最後總歸會有相當數量的錢到達學生手中。但主要的問題在於，大部分海外華人並不知道新成立的總指揮部，因此，人們送錢的時候，一般會首先想到高自聯或一些主要大學的學生自治聯合組織。由於運動領袖之間的激烈衝突，總指揮部很難從這些組織中得到捐款。¹⁴⁵

到5月底的時候，每天仍然有一兩萬人徹夜呆在廣場上；白天的人數則數倍於此。封從德從5月下旬開始就一直掌管總指揮部的資金，

¹⁴³ 關於學生領袖們對混亂的資金系統和學生領袖中可能存在的腐敗的描述，見《回顧與反思》(1993, 241-62)。

¹⁴⁴ 也有許多捐款是寄給中國紅十字會、中央電視台，甚至著名的知識分子(如嚴家其、劉曉波)，請他們再轉交給學生的。據我所知，這些資金也只是一小部分送達廣場。

¹⁴⁵ 比如，5月27日，總指揮部只剩下五千元資金了，而高自聯和北京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卻仍有相當數量的資金。在當天聯席會議的會議上，封從德請求高自聯發放一萬元給總指揮部，梁二也同意了。但實際上總指揮部的人誰也沒有見到這筆錢。最後，封從德不得不從北京大學學生自治聯合會借了三萬元應急。關於這方面的其他細節，見《回顧與反思》(1993, 241-62)。

對資金的支出情況，他回憶說：5月24日以後，單是購買食品每天就需要四萬元左右，而他每天從捐款中所得的資金只有二至三萬不等。¹⁴⁶到5月27日，總指揮部只剩下五千元了；而此時總指揮部欠周邊各商店的款項遠遠超過此數。¹⁴⁷局面似乎到了僅是資金問題就足以迫使學生撤離廣場的地步。在這個節骨眼上，來自香港的資金就顯得很關鍵了。

事實上，自運動開始以來，香港方面就一直給予北京學運以熱情支持。香港大學學生聯合會早在4月20日就派出一個代表團，作為觀察員前往北京。¹⁴⁸香港市民也舉行了多次募捐活動；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發生在5月27日。當時，有超過300名演藝人員為給北京的學生籌款，在體育場連續演出達12個小時。單是這一次，就籌集到大約1,300萬港元。

同來自其他渠道的資金相比，來自香港的這些錢最關鍵的不是其數量，而是其質量。絕食期間，一些香港學生和北京學生一起呆在廣場，一些香港教授和學生也參加了聯席會議以及總指揮部的各種會議。因此，他們對北京究竟發生了甚麼事、錢應當去哪兒、應當用在哪兒，有着非常深刻的瞭解。

5月23日，在聯席會議的會議上，總指揮部的領袖第一次請求香港的資助。在會上，柴玲請一位香港的教授丘延亮，幫忙改善學生在廣場的生存狀況。僅僅兩天之後，第一批來自香港的現代帳篷和睡袋就送達廣場。到5月30日，已經有數百頂帳篷在廣場上搭建起來，同時還有更多的帳篷在陸續到達。一位運動積極分子，由於廣場日益惡化的衛生條件而於5月24日離開；當在6月3日重返廣場時，他在日記裏這樣描述自己的印象：

我看到廣場的環境得到巨大的改善，現在乾淨多了。我也看到許多帳篷……已經搭建起來，一直延伸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北面。每個帳篷都有一人高，十米長，有山形的頂棚。兩邊是兩

¹⁴⁶ 前揭書，256，262。

¹⁴⁷ 吳牟人等(1989, 466-67)。

¹⁴⁸ 李錄(《回顧與反思》1993, 323)。

個可以敞開的三角形窗口。這種帳篷都有良好的通風條件，可以幫助學生對抗酷熱的天氣。帳篷一排一排地分佈成四方形。在這種帳篷裏，任何人都可以很舒服地生活上十天半個月。怪不得政府對目前情況感到很緊張。我真佩服那些能把亂糟糟的廣場組織得如此有序的人！¹⁴⁹

不單是這些帳篷，而且這一時期發生的幾乎所有重大事件，包括民主女神像的建造、廣場民主大學的設立，甚至還有四位知識分子的絕食，多少都是因為香港資金的支持而成事。¹⁵⁰

香港的學生們還在廣場上建立起香港物資用品供應中心，向北京的學生供應食品、毛毯、睡袋、對講機和其他必需品。香港的資金和物質支持對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的重要性，可以從香港學生自己所做的一個小規模調查中看出來。在調查中，有30個學生被問到：「如果沒有香港物資用品供應中心的支持，你會繼續呆在廣場嗎？」對這一問題，七個人回答「不會」，四個人回答「不一定」，一個人拒絕回答，其餘的人都說「會」。單看這些回答，也表明有11個人，或者說36.7%的人，如果沒有香港物資用品供應中心的供應，就有可能選擇離開廣場。¹⁵¹更何況，想像沒吃沒睡與親身經歷這些處境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而且，由於這個問題是富裕的香港學生提出來的，因此很容易被驕傲的本地學生看作是一種侮辱，一些受訪者甚至可能會有意識地貶低來自香港的資金和物資支持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們知道，許多北京學生之所以在這段時間離開廣場，主要原因就是廣場上的生存條件正在不斷惡化。¹⁵²如果沒有香港資金的支持，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很可能會在資金危機中收場。

¹⁴⁹ 《中國新聞摘要》(1994, 第39期(4): 6)。

¹⁵⁰ 香港學生捐了八千多元以建造民主女神像。民主大學從其籌備的第一天開始就一直獲得香港學生的大力支持。

¹⁵¹ 李錄(《回顧與反思》1993, 325)。

¹⁵² 天安門廣場被佔領了十數天之後，已成為難以停留之地。那種混合着尿臊、糞便、腐爛食品和體臭等多種氣味的惡臭，直到我採訪時仍然縈繞在那些受訪者心頭，揮之不去。他們這些學生都是因為無法忍受那種惡臭而不得不在5月下旬離開了廣場。

尾聲

5月22日以後，儘管激進的學生仍然佔領着廣場，越來越多的北京學生開始返校或者回家。在佔領廣場的巔峰時期，像中國政法大學這樣一所規模較小的學校卻有上千學生常駐廣場；但到5月下旬，這個數字跌落到只有十來人（第60號受訪者）。即使是北京大學，到5月底仍然堅持在廣場上過夜的學生也只有幾十人了（第68號受訪者）。在廣場上過夜的平均學生人數從5月中旬的十到二十萬，迅速下降到5月底的一萬左右；¹⁵³而那些仍然堅守在廣場上的學生，有90%都是外地學生。¹⁵⁴不過，這並不意味北京學生和市民對這場運動已經不再關心。正如一句流行的口號——「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所表明的那樣，大量北京市民和學生仍然天天造訪廣場，從而使白天廣場的人數激增。

當中國政府正在為軍事行動作準備時，激進的學生卻在想方設法延長他們對廣場的佔領。在這一時期，有幾個引人注目的插曲激發了人們對學運的興趣，幫助延長了學生對廣場的佔領。5月27日那一天，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學生被要求按照自由女神像製作一座雕像。因為聯席會議曾決定在5月30日撤離廣場，學生們原本打算在慶祝最後勝利的遊行活動中使用這座雕像。然而，由於學生們拒絕接受聯席會議的決議，結果這座雕像的落成變成了運動中一個令人興奮的新事件。5月30日，成千上萬人前往廣場參觀這座雕像，天安門廣場一時人頭湧動。

在這最後的日子裏，還有兩件事吸引了公眾的注意：一個是由劉曉波發起的四人絕食活動，另一個是在廣場建立民主大學。5月29日，劉曉波邀請周舵和侯德健進行一次長達72小時的絕食；在此過程中，劉的朋友高新也加入進來。這次絕食的初衷被劉曉波表述得極其複

¹⁵³ 吳卓人等（1989, 416, 465）。

¹⁵⁴ 前揭書，535。

雜。¹⁵⁵但從實質上說，它反映的是知識分子對待這次運動的一種不確定態度。他們確實支持運動，但同時也非常擔心運動的去向。他實際上是希望通過這次絕食贏得學生的心，並對運動的發展取得一定的控制權。

這次絕食於6月2日下午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開始。有數十萬人到現場觀看。許多人是衝着侯德健去的，他是一位著名的歌手，也是著名歌曲《龍的傳人》的作者。儘管絕食最後因軍事鎮壓而中輟，使這幾位知識分子未能實現原定目標，但他們的英雄行為確實贏得了學生的尊重，並使之有可能在學生和戒嚴部隊之間進行調和，從而最終把學生平安地帶出廣場。這一點容後再敘。

最後一件可以表明學生將繼續佔領廣場的決心的事，是民主大學的建立。儘管在整個運動中，張伯笠和其他許多學生領袖經常因為他們的行為而被指責為「權力狂」、「不民主」、「腐敗」等等，但他們也因為相同的原因而對其他學生領袖和學運積極分子大為不滿。¹⁵⁶因此，張伯笠決定在廣場上建立一所民主大學，以期加深人們對民主的理解。張在這個問題上獲得了鄭義和總指揮部的一些其他學生領袖的支持；隨後，他又從一些香港學生那裏獲得了人員和資金上的幫助。

這所民主大學起初定於5月28日開學，但實際開學日期卻是6月3日。張伯笠自任校長，並請嚴家其擔任名譽校長。這一活動再次吸引了大批人的關注。為了維持秩序，開學典禮的組織者不得動用繩子，把該大學的「學生」與其他圍觀的人群分開。根據張的個人敘述，大約有一萬人在開學儀式上被圈到繩子裏面。儀式在6月4日凌晨零時50分結束。此時，戒嚴軍隊已經到達廣場。

¹⁵⁵ 見劉曉波(1992, 189–200)對絕食目的的自白，亦可見Han and Hua(1990, 349–54)中〈絕食宣言〉的英文翻譯。

¹⁵⁶ 張伯笠(1994e)。

軍事鎮壓¹⁵⁷

當學生們仍然想方設法滯留在廣場上的時候，第二次軍事行動開始了(詳見第七章)。起初，士兵們是通過喬裝成市民滲入北京城的，有一個團的兵力早在5月26日就以這種方式進入了北京。¹⁵⁸當軍隊在6月初開始以更大規模滲入北京時，當地居民和學生對軍隊的活動也開始警惕起來，結果，越來越多的便衣士兵被居民和學生沿途截住，衝突開始不斷發生。

6月2日晚，在木樨地附近，一輛急速行使的軍車撞死了三位市民。根據政府的說法，這輛軍車確實屬於北京武警部隊，但在過去十個月中，該車一直被中央電視台借為民用，因此這純粹是一起交通事故。但人們並不相信政府的說法，而寧願相信這三位市民是被戒嚴部隊故意軋死的。從那以後，當地的年輕人，尤其是木樨地附近的居民，不僅開始辱罵，甚至開始毆打士兵。這起交通事故實際上成為北京西部民眾情緒趨於激烈的一個轉折點，並為稍後在北京西部發生更為劇烈的軍民衝突埋下了伏筆。清華大學的一位學生(第38號受訪者)描述了她的見聞：

6月2號晚上，政府的廣播抨擊了那座民主女神雕像。我們都感到很好奇，就趕過去看……當快到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們看到一些被阻攔的軍用卡車。許多工人正試圖扎破輪胎，砸毀車輛。他們還向士兵扔磚頭，並把士兵拖出來毆打。這時候大約

¹⁵⁷ 這一節有許多地方參考了一部題為《戒嚴一日》的兩卷本作品。其內容是兩百多名參與軍事鎮壓的士兵寫下的個人經歷。政府出版此書的意圖當然是為了使鎮壓合法化。由於受到政府宣傳和其他原因的影響，大多數士兵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是正當的，因此在描述他們與老百姓之間的衝突時往往也比較坦白。這種較為坦白的描述方式使該書出版後在社會上產生了與政府的預期不同的效果。所以，剛出版不久，政府就停止了該書的發行。我曾對士兵和其他非官方來源的相關敘述做過比較，發現除了立場不同之外，兩者關於事實的描述非常相似。這本書彙集了來自不同部隊的士兵的敘述，算得上是關於軍事鎮壓的最豐富的信息來源。

¹⁵⁸ 李少軍(1989)，也就是這個團的團長，詳細描述了他的部隊的行動過程。

是半夜，地點是西單交叉路口。當時，士兵們都沒有還手……我覺得這是不對的，因此我要求同班的一個男同學去阻止他們。但是，馬上有好多人走過來，問他是誰。他們懷疑他是秘密警察。為了避免進一步衝突，我不得不走上前去，告訴他們我們是學生。於是他們就讓我們走了。我的那位同學仍然想同他們爭辯，但看到大家情緒都很激動，我就把我同學硬給拉走了。¹⁵⁹

許多士兵都講述了他們在6月2日和6月3日晚上是如何遭到毆打的。¹⁶⁰但由於包括記者在內的大部分人都反對戒嚴令，迄今為止，大部分關於八九學運的描述都忽略了市民的暴行，尤其是那些發生在鎮壓行動之前的市民的暴行。

6月3日，軍隊滲入北京的規模更大了。有些部隊開始以統一武裝的方式推進，士兵和便衣士兵到處可見。這些士兵被要求佔領一個地點，但他們往往不知道該如何到達目的地。許多士兵都在大街上茫然四顧，因此很容易被人們認出來。在一些地方，迷路的士兵被抓住，捆起來，帶到某個地方，在那裏遭到當地居民的圍毆、辱罵、唾沫或踢打。而外面則不時有人扔進來一個新的士兵，高喊道：「嘿，又逮住了一個！」¹⁶¹

市民和學生們還開始在進城的部隊中搜尋武器。有謠言說，部隊故意把武器放在大街上讓市民拿走，以為鎮壓創造藉口。¹⁶²從我重新梳理的材料來看，有些戒嚴部隊確實是用民用車輛把武器送入北京

¹⁵⁹ 這位學生的行為並不是個別例子。在整個過程中，有無數學生，許多是運動積極分子，都試圖阻止市民的暴行，許多人還曾把士兵從生命危險中解救出來。比如，周勇軍（1993, 59）就講述了他是如何救助一位後來得知是團級幹部的軍官的。在軍事鎮壓後，正是由於這位軍官的證詞，中共最終撤銷了對周的起訴。關於士兵本人對來自學生的救助的敘述，見任斌（1989, 36）、倪福田（1989, 65）及丹丁（1989, 120-46）。

¹⁶⁰ 見黃小平（1989）、孔憲金（1989）、倪福田（1989）及王宏偉（1989）。

¹⁶¹ 有關士兵的敘述，可參考趙如民（1989）及閻東英（1989）。

¹⁶² 好多年後，李錄仍然堅持這一看法（見《回顧與反思》1993, 306）。

的，主要是因為那些已經滲透到北京的士兵還只是便衣，沒有武器。因此，部隊必須另外運送武器。這使6月2日以後，市民和學生對可疑的民用車輛也開始警惕起來，於是他們阻截了好幾輛帶有軍事裝備的民用車輛。比如，6月3日早上，學生和市民在六部口的一個路口上截住了三輛裝有軍事裝備的旅遊大巴。¹⁶³ 在一片憤怒中，人群中有人拿出手槍、機關槍、手榴彈、子彈、頭盔和防毒面具在大街上展示，控訴政府要用武器對付人民。為此，戒嚴總指揮部不得不派出500名防暴警察和士兵去奪回武器。衝突立刻爆發了，在衝突中，警察使用了警棍和催淚瓦斯，許多人都受了傷。¹⁶⁴ 當天下午，警察和士兵也因為類似的原因在其他地方攻擊了市民。雙方的敵意都加深了。

最後的攻擊是在6月3日晚上發起的。大約在晚上9時，軍隊從四面八方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士兵接到命令，要求他們「用武力排除一切障礙，按時到達目的地」。¹⁶⁵ 至於是否允許開槍，說法不一。從南面進入北京的某集團軍的一名副政委張昆將軍說，他接到明確的命令，不得開槍。後來由於通訊問題，軍隊沒有接到進一步命令，因此就一直沒有給士兵發子彈。¹⁶⁶ 不過，根據趙曉強（戒嚴總指揮部派到同樣從南面進京的另一集團軍的一名特派員）的說法，戒嚴總部給他個人下達了命令，允許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下，士兵可以朝天鳴槍以驅散人群。所以，在部隊無法移動，同時又和總部失去聯繫的情況下，趙就召開一個緊急會議，傳達了總部的命令。¹⁶⁷ 這兩項敘述表明，軍事命令本身可能並不包含任何開槍與否的內容，但戒嚴總部已經決定採用包括開槍在內的任何必要手段來佔領廣場。

¹⁶³ 親政府和反政府的信息渠道都報導了這一事件。見何芝洲（1989）及李勝堂（1989）。

¹⁶⁴ Simmie and Nixon（1989, 173）也目擊這次事件並作出描述。

¹⁶⁵ 這項命令來自38軍政委王福義將軍（1989, 84）的敘述。

¹⁶⁶ 張昆（1989, 294）。因為張將軍不允許他的衛兵還手，他幾乎被北京市民毆打至死。

¹⁶⁷ 趙曉強（1989, 208）。

各個部隊關於如何控制彈藥也沒有一致的做法。在進京的部隊中，有一些部隊把子彈控制在團一級，而另一些則控制到連一級。在一些團或連，指揮官只允許一個人扛着子彈箱，其餘人只帶有空槍；而在另外一些部隊，指揮官則把子彈分發給了幾個信得過的軍官。還有證據表明，在一小部分部隊中，即使不是所有軍官，至少也有相當多的軍官在鎮壓前就有了子彈。¹⁶⁸

儘管軍隊是從各個方向向天安門廣場推進的，但該晚的大部分死亡事件都發生在木樨地與六部口路口之間的地帶。在丁子霖苦心輯錄的《6·4死亡名錄》包括了92例死亡事件，¹⁶⁹ 其中有50例(54.3%)是發生在長安街及其延長綫的復興路上。在木樨地路口，丁子霖列舉的死亡事件達16例，佔17.4%。假設丁子霖的名單涵蓋了實際總死亡人數

¹⁶⁸ 上述各種差異是從士兵們的敘述中爬梳出來的，尤其是李虎祥(1989, 136)、劉新力(1989, 224)、彭虎(1989, 216)、張喜波(1989, 169)、趙曉強(1989, 208)及朱雙喜(1989, 209)等人的敘述。他們的敘述一般都和我的受訪者的說法相吻合。我的一位受訪者(第70號)6月3日整晚都呆在西城。他告訴我說，他看到一個營的士兵在把守一個路口。他們三人一組，背對背站立，非常緊張。當我的這位受訪者試圖走近他們時，他們立刻舉槍瞄準他，命令他停步。我的這位受訪者趕緊出示自己證件，並說：「我是人民大學的老師，我是來找我的學生的！」然而，他一走近他們，就開始控訴他們的殺人行徑。那個營的營長對此顯得非常氣憤，他衝到我的這位受訪者面前，喊道：「誰殺人啦？我們連子彈都沒有！」那位營長還把士兵們的槍都抓過來，一個一個拉開，證明都是空槍。當晚，我的這位受訪者還跟隨市民一起追擊一輛軍用卡車。人們用石頭砸士兵，並試圖靠近軍車。卡車上的士兵向地面開槍，以保持卡車和追擊人群之間的距離。然而，仍然不時有市民被反彈起來的子彈所傷。雙方的情緒到了難以名狀的地步。這時有位士兵把他的頭盔和槍扔到車下，哭喊道：「我他媽的不幹了！」然後從車上跳了下來。他剛一落地，人們就一擁而上，把他打倒，並用腳在他身上亂踏。頃刻間這位士兵就被打得悄無聲息了。我的這位受訪者試圖衝上去阻止這場悲劇的發生，但他馬上就被人群推到了一邊。

¹⁶⁹ 丁子霖(1994)。丁列舉了96例死亡事件。不過，其中一例死在四川，另有三例則發生在好幾個月之後，死因和軍事鎮壓沒有直接關係。所以，這四例都被排除在外。

的20-25%，¹⁷⁰ 那麼，我們可以估計出，在6月3日晚到6月4日晨這段時間內，大約有64-80人死在木樨地路口，大約有200-250人死在西城。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是很清楚為甚麼大部分死亡都發生在西城區。出於種種原因，群眾抵抗在西城要比其他地方激烈得多。在前文，我曾提到，在5月19日到22日之間的第一次軍事行動中，唯一發生嚴重暴力事件的地方就是北京西邊的豐台區；我也曾提到6月2日晚上那次軍車撞死三位市民的事件也是發生在西邊。這些可能都為北京西部激烈的軍民對抗埋下了伏筆。群眾在西邊的抵抗規模也可以從38軍的傷亡中體現出來。從6月3日晚到4日晨，38軍共有6人死亡，159人重傷，另有超過1,100人受傷，大約3,000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毆打。38軍還損失了47部軍車和65輛卡車，其中大部分是街頭戰鬥中被市民燒毀的。¹⁷¹ 市民的抵抗極其強烈，以致38軍為拿下木樨地路口竟花了一個多小時。

八九時的流言一般都稱38軍反對軍事鎮壓並設法進行兵變。其實，38軍可能是整個鎮壓過程中殺人最多的部隊。我們不清楚38軍是不是接到了特殊命令。有證據表明，38軍把子彈發給低級軍官甚至普通士兵的時間比其他部隊要早得多，這無疑是導致北京西部的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高死亡率也可能因為這個軍的前鋒部隊113師，早在5月22日就遭到市民的毆打，他們的士兵很可能為此心存芥蒂。高死亡率還可以歸因於士兵們處在部隊的命令和市民的嚴厲攻擊之間，最後失去了控制。那天晚上，部隊官兵和北京市民的情緒都極其緊張。一位受訪者(第43號)的講述是令人難忘的：「我以前只是在小說裏讀到過，說士兵在劇烈戰鬥中會殺紅眼。但是那天晚上我親眼看見許多士兵和當地居民的眼睛都紅透了！」從一些市民在軍事鎮壓期間遭槍擊的

¹⁷⁰ 6月6日，中國政府承認鎮壓期間的死亡人數為三百出頭，包括士兵和市民在內(袁木 1989)。另一方面，Brook (1992, 161) 計算出，在6月4日當天，至少有478人死亡。在我的計算過程中，這兩個數字被作為死亡人數的上限和下限，儘管實際的死亡數字可能還會高一些。

¹⁷¹ 《38軍軍史》(1994, 第17章)。

了彙報；總部立刻就同意了，並通知侯德健領着學生往南走。¹⁷⁶ 侯和周二人回到學生隊伍以後，戒嚴總部不斷通過廣場上政府控制的廣播系統反復宣佈：「同學們，我們很感謝你們能夠自願離開廣場！同學們，請往廣場南邊撤離！」

當然，這四位知識分子的行動也遭到了抵制。當他們勸說學生離開的時候，不時有諸如「不知羞耻！」「滾蛋！」之類的辱罵在他們耳畔響起。¹⁷⁷ 劉曉波回憶說，有一次，一個工人甚至試圖用一根鐵棒砸他，說他是叛徒。¹⁷⁸ 不過，隨着越來越多部隊陸續到達，離開已經是唯一的選擇。因此，這四個知識分子的勸說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起了作用的。¹⁷⁹

這個時候，士兵們開始躁動起來。大約4時15分，侯德健回到季新國處，要求再多給一點時間。季保證學生們可以安全離開，但時間不多了。他暗示侯德健，如果不能勸說學生一起撤離，他就應自行離開。侯德健回來後，剩下的學生最後決定就這個問題進行一次所謂口頭投票。封從德要求學生們用喊聲大小來表決是否離開。根據我的幾位受訪者的敘述，他們很難分辨出聲音的高下，¹⁸⁰ 但封從德還是宣布贊成離開的聲音更大。¹⁸¹ 於是，學生們開始撤離，並把拒絕離開的學生一起拖走。

大約4時35分，在學生開始撤退後僅僅幾分鐘，廣場上的所有燈光就都亮起來。軍隊發起了最後的行動。士兵向前推進，把學生硬擠向南邊。同時，一組士兵衝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一個點射打掉了學生廣播站的喇叭。

¹⁷⁶ 這無疑是最安全的一條路。一些朝西走的學生立刻就陷入了市民和士兵間仍在繼續的爭鬥中。最悲劇性的事件發生在六部口地區，當時，一輛快速行使的坦克衝進人群，結果，幾個剛剛離開廣場的學生不是被碾死，就是致殘。見丁子霖(1994)對這次事件的更為詳細的敘述。

¹⁷⁷ 李錄(1990, 199)。

¹⁷⁸ 劉曉波(1992, 228)。

¹⁷⁹ 前揭書，230-31。

¹⁸⁰ 香港學生林耀強回憶說，贊同留守的聲音更大一些(方禮年1989)。

¹⁸¹ 見《回顧與反思》(1993, 318)中封從德對自己行為的辯解。

此刻，學生們仍然保持令人吃驚的良好秩序。他們在各自大學的旗幟下，五至十個人為一排前進。他們還把市民和女生安排在隊伍中間，加以更好的保護。他們沿途哭喊著，並高唱〈國際歌〉，到達前門後，學生開始向各個方向散去。但在隊伍後面，仍有一百多人拒絕再走。四人絕食團的成員之一高新，正好也在其中。¹⁸² 根據高的敘述，當他們到達前門時，遇到數千名學生和當地居民聚集在那裏，於是他們停了下來，一起高喊反對軍隊鎮壓的口號。就在他們喊出「法西斯！法西斯！」的時候，被激怒的士兵衝了上來，並開槍射擊。人群四散奔逃，各自尋找藏身之地。據我的一位受訪者回憶，士兵們是朝天開的槍，但他仍見到一名學生因此受了傷。此時是6月4日凌晨6時。高新看到士兵們揮舞着槍，把頭盔拋向空中，高高地跳起來，興奮地叫喊着。在最富有戲劇性的七個星期之後，八九學運終於以被鎮壓的方式結束了。

¹⁸² 高新(1990)。

國家合法性、國家行為與 運動的發展

八九學運期間，中國政府的政策在讓步和鎮壓之間前後多次反復，但無一取得成功；最後，政府動用軍隊鎮壓，整個運動以悲劇告終。政府的政策反復變動，而運動最終又遭鎮壓，通常被認為是政府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權力鬥爭的結果。在這一章，我的觀點有所不同，我認為政策的變動、並促成整個運動的發展動態，背後起支配作用的關鍵因素在於國家控制手段失效；而國家控制手段的失效，則歸咎於當時國家高層精英、運動積極分子和其他北京市民對國家合法性基礎的相互衝突的理解不一致。¹

圍繞這一觀點，本章分為三個部分展開。首先，我將評述中國政治研究中的派系鬥爭理論——從一般的中國政治，到具體的八九運動，這一理論均有很大的市場。其次，我將重點分析80年代中國政體的性質及其合法性來源；我會提出一個模型，用以揭示在當時的政體性質和政府合法性來源的前提下，中國國家在社會控制問題上所面臨的困境和難題。最後，我將提供一個關於八九期間國家行為的經驗性描述，當中也包含我的一些解讀。

¹ 香港的報紙和雜誌刊登了許多黨內鬥爭的報導。據說這些報道都是從高層領導人或其助手的手中洩露出來的；不用說，其中有些消息肯定是真實的。可是，在分析中我會參考但不會直接引用來自這些渠道的信息，因為這些出版物中虛假的信息很多。

精英派系與八九學運的動態

當前，大部分中國政治研究專家都強調中國政治的派系特徵。² 在關於八九學運期間國家行為的研究中，這種理論似乎尤其流行。³ 這些研究，儘管在論述的細節方面有所不同，但一般都會把運動期間國家政策的變動，視為政府內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權力鬥爭的結果。⁴ 可以說，雖然絕大多數派系鬥爭模型都不是以國家理論為基礎，但其中暗含着這樣一種觀點，即國家並不是由利益一致的、統一的精英所構成，而是分裂為一個個權力和政策上互有衝突的派系。從邏輯上講，當政治衝突不是圍繞正式組織，而是圍繞人際關係展開時，派系鬥爭的確是唯一可能的結果。⁵ 不過，當我們用這種理論模型來解釋八九期間中國政府的行為時，卻會遇到一些問題。

首先，這些強調精英之間派系鬥爭的理論模型，往往把中共黨內的人際關係網絡簡單化了。由於公開的派系在黨內是不合法的，所以一個強大而持久的派系是難以建立起來的。事實上，黨內各個「派系」都是內嵌於由各種親密關係所構成的網絡之中的，比如地域關係、裙帶關係、朋友關係、意識形態、親和關係，以及老同事關係等等。由於官員之間在意識形態上的不同和以上說的那些人際網絡關係之間並不對應，所以，在中共歷史上，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劃界只會偶爾佔據主導地位。⁶ 其次，派系理論在分析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時，也許會有一定解釋力，因為當時的國家不僅在制定政策時相對不受社會

² Baum (1993) ; Dittmer (1990a; 1990b) ; MacFarquhar (1974, 1983, 1993) ; Teiwes (1990) .

³ 陳一諮 (1990) ; Cheng Chu-yuan (1990) ; Dittmer (1990a, 1990b) ; Kristof (1990a) ; Nathan (1990) .

⁴ 比如，Cheng Chu-yuan (1990, 38) 就說過：「我們可以把天安門廣場的遊行示威解釋為民怨深重的反映。但是，關於鎮壓示威者的決定卻只有放在黨內權力鬥爭的框架當中才能得到解釋。」

⁵ Nathan (1990) .

⁶ 就像Ding Xueliang (1994, 40) 所談到的那樣，王震和鄧力群一般被認為是保守派的核心，但他們卻和鄧小平關係密切，並且得到鄧小平的信任。

制約，而且在政策的執行過程中還會對社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用它來解釋八九學運就顯得缺乏說服力了。⁷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第二章)。到了80年代後期，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以績效為基礎的威權政體，大部分市民已經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國家為了自身的維繫也不得不日益倚重自己在經濟和道德方面的表現；此時，國家的決策儘管不像民主國家那樣受到制度的牽制和平衡，但它所面臨的來自社會的、體制外的壓力卻是不容忽視的。因此，派系鬥爭理論高估了中國政府在80年代後期的自主性，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政府在當時仍然能夠隨意變更政策，這顯然是與事實不符的。

一般而言，派系理論是這樣解釋八九的產生和發展的：首先，保守派的崛起阻撓了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從而引發了運動；在運動過程中，由於派系鬥爭，政府的政策在妥協和鎮壓之間來回搖擺；最終，強硬派在鬥爭中佔據上風，隨之而來的就是軍事鎮壓；軍事鎮壓既標誌着保守派地位的鞏固，也表徵了改革的失敗。

這種解釋在經驗事實上至少有兩個困難：第一，它無法解釋一些重要事件得以發生的時機，例如，一般認為趙紫陽是改革派陣營的領袖，而措詞強硬的《人民日報》4·26社論之所以能夠出台，則是因為趙紫陽此時正好出訪北韓；⁸ 然而，在學生成功地發起一場抵制4·26社論的遊行後，國家在4月27日又重新採取了讓步策略；4月29日，政府還和學生進行了第一次對話；如果說趙紫陽同4·26社論沒有甚麼關係的話，那麼，由於他訪問北韓是在4月23日至30日之間，我們顯然也不能把他回國之前政府所採取的讓步歸功於他。第二，這個理論模型也未能正確地預測1989年之後的形勢，1989年之後，黨內並沒有發生對所謂的「改革派」的大清洗；最重要的是，國家的經濟改革事實上在1992年後又重新煥發了生機。

⁷ Teiwes and Sun (1999) 的論證就頗有說服力，在他們看來，即使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政治，也不應簡單地歸結為毛和他的對手之間鬥爭的結果。

⁸ 見陳一諮(1990)和陳小雅(1996, 206-07)。

假使中國政府的政策未受派系鬥爭的驅動，那它在八九期間還有別的選擇嗎？面對這一假設，上述理論模型的弱點就更是暴露無遺了，因為答案很可能是「沒有」。在八九期間，中國政府對學運的處理呈現出如下軌迹：最早是對運動的寬容；當寬容不奏效而運動升級時，政府就通過社論對學生施以言辭威脅；當社論也未奏效時，政府就採取有限的讓步，企圖限制運動的發展；問題是，政府有限的讓步得不到學生的響應，於是就實施戒嚴，把大量軍隊調往北京；頒布戒嚴令和調動軍隊起初只是為了威脅學生和市民，然而，當武力威脅也未能制止示威人群對天安門廣場的曠日持久的佔領時，政府才決定鎮壓。

由此可見，當時中國政府幾乎用遍了所有可能的控制手段，可惜都沒有奏效；最後，留給領導層的只有兩個選擇：要麼鎮壓，要麼就像東歐共產黨國家領導那樣下台。但是，當時大部分國家領導人早在共產黨上台之前就參加了革命，無論是改革派還是強硬派，讓他們放棄數百萬同志用生命換來的權力，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軍事鎮壓就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在這一章，我並不是說中共黨內沒有權力鬥爭，或者說權力鬥爭對運動的發展沒有影響；而只是想說，對八九而言，派系鬥爭的理論模型不如國家·社會關係模型更有解釋力。我這裏的分析並不是為殺戮製造合法性，殺戮平民這一事實的本質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辯解的。我希望通過分析清楚地表明，過度強調派系鬥爭在八九政治決策中的作用，會對一些基本問題估計不足，而這些問題正是一個像中國這樣的威權政體在危機時刻不得不面對的。

合法性與國家控制

在本書的導論中，我已將國家合法性的基本來源區分為三種類型：法律、選舉型、意識形態型和績效型。然而，在一個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由於社會地位和個人經歷各有不同，人們對國家合法性的基礎的看法往往大相徑庭。因此，要將這一理論用於解釋八九學運的發展，我們必須進一步區分當時國家精英和北京市民對國家合法性的不同理解。我們同時需要解釋，為甚麼八九期間社會各界對國家合法性

基礎持有不同的理解，會削弱國家控制的有效性？為此，我的探討將集中於四大群體：高層國家精英、知識分子精英與激進學生、普通大學生，以及北京市民百姓。需要指出的是，這一劃分並不意味運動中存在這四類群體，其中每一個群體在對國家合法性的認識上大體一致。毋寧說，這種劃分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每個群體中的大多數人對國家權力的看法，較諸其他群體出現顯著的差異，而正是這些差異性看法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他們在運動中的行為。

國家高層精英

這個群體包括大部分政治局委員，尤其是常委，同時包括一些在長征前就參加革命的老幹部——這些老同志在運動期間積極介入重大政策的制定，說話很有分量。當時政治局共有17名委員，⁹其中既有老黨員，也有一些50年代才入黨的相對年輕的領導人，但其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30、40年代就參加革命了（見表7.1），這些高層領導成員可以說基本上是共產黨內的第二代或第三代領導人；至於那些老幹部，他們都在20年代就加入了共產主義運動。80年代後期，他們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仍然活躍在政治舞台上；這些老幹部力最顯赫的人都列於表7.1中。除了鄧小平和楊尚昆外，這些人在八九時在黨內都沒有正式職位，也不負責政府的日常工作。然而，他們傳奇般的革命經歷，再加上大部分政府和軍隊領導人都曾是他們的部下，或由他們一手提拔起來，這使得他們在退離崗位後影響力不減，甚至有權否決國家政策。據說名單上的前八位在鎮壓八九學運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當時他們被稱為「八老」。¹⁰

大部分關於八九的研究都強調高層精英內部的派系性質，但沒有看到他們當中大部分都絕對效忠於中國共產黨，而且對當前的政治體制深信不疑。在表7.1所列舉的30個人中，只有三個人是50年代入的

⁹ 他們當中一些人在運動期間並未進入核心決策圈。但由於我是把領導層當作一個整體來研究的，名單的一些變動不會影響我的分析和結論。

¹⁰ Cheng Chu-yuan (1990, 209-21) .

表7.1 政治局委員以及一些最有權力的老幹部入黨的時間

政治局委員 ^a	參加革命的時間 ^b	老幹部	參加革命的時間 ^b
楊尚昆	1926	楊尚昆	1926
秦基偉	1929	鄧小平	1922
胡耀邦	1930	彭真	1923
趙紫陽	1932	鄧穎超	1924
姚依林	1935	陳雲	1925
萬里	1936	薄一波	1925
宋平	1937	李先念	1927
吳學謙	1938	王震	1927
喬石	1940	聶榮臻	1922
李鵬	1941	陸定一	1925
田紀雲	1945	宋任窮	1926
江澤民	1946	劉瀾濤	1926
胡啟立	1948	習仲勳	1926
李錫銘	1948	徐向前	1927
楊汝岱	1952		
李鐵映	1955		
李瑞環	1959		

a. 這裏臚列的是八九學運前夕的政治局委員。

b. 這是指他們入黨、入團或加入共產黨軍隊的時間。

黨，四個人是40年代入的黨，其餘都在20、30年代就開始了革命生涯，遠遠早於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這些老幹部都身經百戰，親眼目睹了許多戰友和同志為革命而前仆後繼，他們對革命事業至死不渝的忠誠自然會塑造他們的觀點，並會強化他們對共產黨的忠誠。

除了他們獨特的經歷和身份以外，我們還可以用其他論據來支持這裏的論斷。在學運期間，許多高層領導人，尤其是那些八九十歲的領導人，都曾反復表達他們對黨的高度忠誠。比方說，在與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的一次會談中，陳雲說：「大家都知道，中國革命經歷了數十年的艱苦奮鬥，犧牲了兩千多萬人，新中國才得以成立。勝利來之

不易啊。」¹¹ 老幹部對共產黨的忠誠也可以從許家屯這個頗為極端的例子上看出來。許家屯於1938年入黨，1983-1989年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此期間，他對西方和資本主義的理解經歷了根本性的轉變。由於擔心因自己在港期間對學運表示同情而遭報復，許家屯於90年代去了美國。然而，即使在美國居留三年之後，他仍然對共產黨表示忠誠，並強調他只是不喜歡中共的個別領導人。¹² 顯然，表7.1中所列舉的大多數高層領導人，都比許家屯有着更長的革命生涯和更顯赫的位置，並且都沒有許家屯在香港和美國那樣的經歷，使其忠誠和認同發生分裂，因此，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不可能在80年代後期對一個他們千辛萬苦才取得的政權喪失信心。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知道，中國大陸的經濟與臺灣或韓國相比下處於劣勢。他們同樣清楚八九之前中國的腐敗和通貨膨脹到了甚麼境地，但是，他們都傾向於把中國的落後歸結為經驗不足和毛澤東的個人錯誤，¹³ 他們相信當前的經濟危機不過是短期的衰退。在這種看法的支持下，他們對國家形勢的總體估計仍然是樂觀的。另一方面，儘管這些國家高層精英並非由普選產生，但他們堅信他們有權通過法律 and 憲制手段去統治全社會；他們之所以有這種信念和信心，是因為他們對本政黨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所擁有的合法性抱有普遍認同。與法律·選舉合法性相比，意識形態的合法性顯然是一種層次更高的合法性。在表7.2的第一列中，我列出了該群體對國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和法律·選舉合法性以及績效合法性的大體看法。¹⁴

¹¹ 陳雲 (1990)。

¹² 許家屯 (1993)。

¹³ 鄧小平 (1983, 291-301)。

¹⁴ 高層軍官在最後的軍事鎮壓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大部分80年代晚期的軍隊高層將領都早在20、30年代或40年代就入了黨。長期的軍旅生涯造就了他們對黨的無比忠誠。像1989年時任國防部長的秦基偉，1929年就參加紅軍，曾身歷數百場戰鬥，親眼目睹了成千上萬戰友的犧牲。他還長期處於鄧小平和徐向前的領導之下，而鄧徐二人都是八九時候的老幹部。所以，在本章，我對這些軍人和高層國家精英一般都不區別對待，因為他們對共產黨都有一種長期養成的忠心。有關秦的軍旅生涯詳見秦紱偉 (1996)。

知識分子精英和激進學生

這個群體包括主要的異見分子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其中部分人士，例如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嚴家其、陳子明和王丹，由於一些中國問題專家曾經對他們作過專門研究，他們在西方因此已經廣為人知。在第二章，我亦曾討論過這些人的主要特徵。在此，我先對有關論點做一簡要的總結。這個群體由那些早在毛澤東時代就醉心於政治，又素有政治抱負的知識分子所構成。其中大多數人都曾經是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真誠信仰者。十年文革浩劫，再加上他們個人在當時的不幸經歷，使這批人在70年代後期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政治體制產生了懷疑。他們的力量隨着一些青年學生的加入而逐漸壯大，他們的思想也日益成形。80年代後期，他們普遍相信，沒有人權和獨立的司法體系，尤其是缺乏民主政治，是導致毛澤東時代整個悲劇的罪魁禍首。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經過40年的共產黨統治，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落後的原因，完全是僵硬的計劃經濟和政治體制一手造成的。最後，他們堅信，目前經濟改革陷於難以自拔的困境，其根本原因也在於政治體制改革不力。

因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完全不承認這個政體在意識形態上或法律、選舉意義上的合法性，¹⁵對國家的經濟表現也持負面評價（見表7.2），他們內部的意見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進行政體改革的問題上。¹⁶這個群體的激進核心成員不多，在北京可能不超過幾百人，但由於他們大部分是教授、作家、記者和重點大學的學生，所以能夠廣泛而有效地傳播自己的理念。他們對其他知識分子和學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尤其在80年代後期，隨着經濟危機的加深，他們的觀念在知識

¹⁵ Burns (1989, 497) 較詳細地記錄了80年代後期知識分子對四項基本原則所持的懷疑態度。

¹⁶ 他們爭論的焦點是，中國的現代化究竟應該走民主道路還是走「新權威主義」道路。自由派堅持「沒有民主，就沒有經濟發展」；支持「新權威主義」的人則強調在實現民主化之前，由於經濟發展仍然處於較低水平，一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仍然是必要的。然而，隨着中國經濟危機的加深，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觀念逐漸佔上風。對於這場爭論的詳細討論，見Zhao Dingxin (1994)。

表7.2 80年代晚期北京不同群體對國家合法性的認知

	意識形態 合法性	績效合法性 (經濟)	法律·選舉 合法性
國家高層精英	+	+/-	0
知識分子精英和激進學生	-	-	-
大學生	0	-/+	-
北京市民	0	-/+	0

註：在這裏，符號+、+/-、-/+和-分別表示對國家合法性在該維度上的肯定、部分肯定一部分否定，以及否定；0則表示國家合法性在該維度上對這部分人來說無關緊要。

分子的話語體系中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八九學運正是在這些激進知識分子所創造的各種「危機」話語中萌動的。

普通大學生

激進知識分子點燃了運動，而維持這一運動的則是普通大學生。我對這部分人的訪談比較多。正如第四章所談到的那樣，絕大多數80年代的大學生認為中國政府在領導經濟改革方面是成功的，但他們不認為該政府具備意識形態合法性。在第三章和第五章我曾論證過，由於80年代後期的高通貨膨脹、政治腐敗和知識分子地位的下滑，學生對國家領導經濟發展的能力所抱的信心一落千丈；臨近八九之時，已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對政府持批判態度。¹⁷我對這部分人對國家合法性的看法的評價，亦見表7.2。

北京市民

這個群體包括工人、普通政府職員、個體戶、中小學教師、店員和無業人口等等。雖然八九運動在爆發之初純粹是一場學生運動，但

¹⁷ 例如，在回應「如果實行資本主義，中國會發展更快嗎？」之類的問題時，持肯定答案者從1986年的16.8%，上升到1987年的28.7%，再攀升至1989年的34.3%。具體見表4.1。

在絕食期間和絕食之後，越來越多的北京市民參與其中，他們在5月下旬阻止戒嚴部隊進城的行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當軍隊在6月3日和4日開進天安門廣場時，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參與了抵抗活動，對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戒嚴期間尤甚。

有研究表明，一個人理解、並清晰地表達意識形態的能力，跟其教育程度緊密相關；¹⁸ 基於這一觀點，有人說，合法性問題在根本上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問題。¹⁹ 不過，表達能力不強並不意味對國家就毫無感受、甚或缺乏判斷力；比方說，普通市民對日用消費品市場價格的變動總是有感覺的。在80年代後期，當國家的經濟危機加深、通貨膨脹加劇時，日益嚴峻的形勢立刻引發了所有城市居民的不滿，他們跟學生一樣，對當時國家的經濟表現普遍持負面評價（見表7.2）。

更為重要的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以儒家的「仁政」和「天命」觀念為核心，中國已經發展出一套穩定的關於國家合法性基礎的道德評價。²⁰ 根據這一傳統，統治者必須履行某種道德的、儀式的和物質的義務，以表明他們對臣民的責任和愛護；而臣民則應該以服從和忠誠作為回報。²¹ 當中國政府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合法性日漸沒落之後，傳統意義上的道德和儀式方面的表現重新成為人們評判政府的普遍標準。正因為如此，80年代的許多中國小說，只要是以清官故事為題材，無論其品質優劣，總能成為社會上的暢銷書。²² 也正因為如此，「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之類的俗語流行一時。²³

¹⁸ Converse (1964)。

¹⁹ Mann (1975)。

²⁰ 見第一章。也可見Creel (1953) 和Yang Chung-fang (1991)。

²¹ 有關明朝皇帝是如何在煩瑣的禮儀中接受教育的，見Ray Huang (1981)。

²² 在這方面最有名的小說，也許要數柯雲路所著的《新星》。這部小說描述了一個年輕的縣長如何像古代的清官那樣造福一方百姓。這部小說被拍成電視劇後，上海在每週六的播出時間裏幾乎是萬人空巷。在80年代，除了《河殤》，幾乎沒有甚麼電視節目能夠在觀眾當中引起如此大的反響 (Lull 1991, ch. 6)。

²³ 這句話出自戲劇《七品芝麻官》。該劇講的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清官不惜冒着丟烏紗帽的風險而為民請命的故事。這部戲甫亮相即引起轟動，戲中的這句台詞在80年代中期幾乎成為人們的口頭禪。

國家合法性認知的差異

基於上述討論，表7.2概括了80年代後期不同城市群體對國家合法性在各個層次和類型上的認知，其中的級差，即肯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否定，以及無所謂，都旨在抓住上述不同群體對國家權力的認知的性質差異。遺憾的是，表7.2沒有涵蓋各個群體對政府在道德方面的合法性的評價。人們對政府在運動中的道德表現的認知，主要取決於政府如何處理這場運動。關於國家的道德合法性的評價所具有的這種相映互生的特徵，對八九運動的發展極為重要，卻難以用表格來呈現。

不過，表7.2清楚地表明，在國家合法性的意識形態和法律這兩個維度上，四大群體的態度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儘管國家高層精英堅信他們的政權兼具意識形態的和法律的合法性，知識分子和激進學生——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普通大學生和北京市民——對此卻不以為然。這種認知分歧造成了兩個後果。首先，除了格殺勿論外，大部分國家控制手段都需要對象群體的某種程度的理解和配合。然而，上述認知分歧的其中一個後果，即為人民不信任政府，從而不會配合訴諸意識形態或法律的控制手段。因此，中國政府在面對社會運動時可資利用的有效手段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出於對中國政府在意識形態和法律上的合法性的高度認同，中共的高層精英們也不會像我們在東歐國家所見的那樣，在反對派的壓力下束手待斃。²⁴ 因此，如果示威者與國家硬碰硬，結果顯然只有鎮壓。

最重要的是，即使績效成為衡量政府的主要標準，政府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也不可能是唯一的尺度。如前所述，道德和儀式方面的表現是中國人古已有之的評判政府的重要依據。而在80年代後期，在這個問題上，國家高層精英和民眾的認知存在着嚴重分歧。高層精英往往輕忽社會對道德方面的要求，而市民和學生則把國家在道德和儀式方面的表現看得極為嚴肅。這並不是說，高層精英們試圖給人們留下一種無德政府的印象；毋寧說，對黨的忠誠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他們

²⁴ Chirot (1991, 3–32).

眼中要比傳統的道德和儀式規範的分量重得多。於是，一種令人心寒的結果出現了：當政府在控制學運時訴諸意識形態和法律時，這種作法只會激怒廣大民眾，因為後者並不認可這些手段的合法性；而另一方面，當百姓在運動中強烈要求政府做出道德反應時，後者卻置若罔聞，因為政府精英的道德感首先是來源於他們仍然強烈認同的那些意識形態。就這樣，隨着運動的發展，國家與社會的認知漸行漸遠，衝突亦因而愈演愈烈。

國家、社會關係、國家行為與運動的發展

在上面，我討論了高層精英和北京市民是如何看待國家合法性的，同時非常粗淺地論及在國家合法性基礎問題上的認知差異為甚麼會影響政府和社會在學運中的行為，並阻礙兩者之間的相互理解。以下，我將通過個案研究來展現，認知結構到底是怎樣塑造國家的行為和運動的發展軌迹的。在行文中，雖然我把重點放在國家行為上，但如果其他群體的活動有助於對整個過程的理解，我也會適當地論及。

政府的猶疑和運動的發展

這場運動發端於胡耀邦突然去世。在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之前，政府行事一直比較謹慎。我的看法是政府的這種克制並非是高層精英鬥爭的結果。²⁵ 在這個階段，高層精英中似乎沒有人對這場運動有一個清晰的瞭解。同時，出於下述原因，運動一直沒有被鎮壓：首先，胡耀邦去世前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哀悼他是合理合法的，即使沒有來自民間的動議，政府也會主動舉行追悼會；這樣一來，對打着

²⁵ 趙紫陽下台後，政府的官方文件也指責趙紫陽耽誤了政府處理運動的工作。可是，在中國共產黨內，得勢者總愛誇大自己同失勢者之間的鬥爭。比方說，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對毛澤東表達了自己對目前農村形勢的個人看法，其他一些與彭德懷毫無瓜葛的人碰巧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後來這些人統統被扣上反革命集團的帽子。關於中國政府對趙紫陽的指責，見陳希同(1989)。關於廬山會議，見李銳(1994)。

康曉的運動，政府就難以出手鎮壓。其次，關於胡耀邦的死有很多傳言：有的說，胡耀邦是因為在政治局會議上跟李鵬發生衝突，突發心臟病而死的，甚至有人說是鄧小平的貼身侍衛開槍打死的。政府很關注這些謠言，並希望能夠平息之。最後，值得一提的運動爆發時正值中國高通貨膨脹時期，官員腐敗，肆虐民間。很多人在悼念胡耀邦時也表達了他們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政府當然不願意再去刺激民眾。

在胡耀邦去世當天，北京市委就召開了會議。在會上，市委領導要求學校當局積極引導學生的悼念活動，要隨機應變，警惕一小撮人趁機進行政治煽動；他們還要求學校當局向學生講清胡耀邦猝死的「真相」，並在一些重點大學專門設置靈堂以滿足各種悼念活動的需要。

儘管政府容忍了示威遊行，也通過媒體表達了對胡耀邦的讚譽，但它始終無法公開承認1987年罷免胡耀邦的舉動是錯誤的——如果這樣做，那就意味着承認1986年學潮的合法性，還承認了那次運動提出的擁護民主的要求，以及學生在當前這場運動中提出的七項要求的合法性（見第六章）——這些民主訴求無疑對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構成了挑戰，接受這些要求有可能導致政權土崩瓦解；很顯然，高層精英們是不會對此做出讓步的。而另一方面，截至4月23日，學生已經發動了好多次遊行，他們組織了全市規模的罷課，並建立了好幾個校級的和市級的運動組織。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的有限讓步只會對運動的動員起到鼓勵的作用。

《人民日報》4·26社論

4月24日，也就是胡耀邦追悼會後兩天，政府第一次對學生運動做出認真反應。當天下午4時，北京市委常委開會討論形勢。會議認為，這場運動的要害是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會議向中央遞交了四項建議，包括：(1) 中央必須就目前形勢公開表明立場；(2) 所有的報紙和宣傳工作都必須服從中央的領導；(3) 中央應該授權北京市委處理學生動亂；以及(4) 黨中央和國務院必須採取果斷的措施以平息學生動亂。

四個小時後，李鵬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²⁶ 國家主席楊尚昆也應邀出席會議。根據北京市委的反映及常委們自己的觀察，這次會議把這場學生運動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行動」。他們決定：(1) 建立由喬石和胡啟立為首的處理動亂領導小組；(2) 授權胡啟立撰寫針對學運的4·26社論；(3) 電告各地，這篇社論代表中央的聲音；(4) 授權當時的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將學生動亂的形勢和中央的決定通知各民主黨派；及(5) 動員北京市民共同抵制動亂，確保首都安全。翌日一早，李鵬和楊尚昆前往鄧小平住所彙報政治局的決定，鄧小平不僅表示贊同，還嚴辭抨擊了這場運動，他的不少評論後來也被寫進了4·26社論。

關於這個過程迄今主要有兩種解釋：一種觀點認為，北京市委向中央彙報時蓄意歪曲事實，從而導致中央強硬政策的出台。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由於趙紫陽不在，保守勢力得以在中央佔據上風。²⁷ 然而，這兩種說法都不能解釋下面這些事實；首先，儘管北京市政府的信息通報中的確不乏強硬措辭，²⁸ 但它並不是中央唯一的信息來源。運動開始以後，喬石和胡啟立（兩人都被認為是改革派）一直站在處理運動的前綫，他們還有其他的信息來源；例如，在聽取北京市委的匯報之前，他們會見了許多大學的校長，從他們那裏瞭解情況。²⁹ 其次，這兩種說法不能解釋為甚麼政府在學生發起4·27遊行成功抵制了4·26社論之後，又在趙紫陽仍然不在國內的情況下採取了讓步策略。

北京市長陳希同曾聲稱，到會的人都深信「面臨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³⁰ 雖然這一觀點有點言過其實，但它確實表明當時高層精英之間尚無多少分歧。他們或多或少都贊同強硬路線，主要是因為先前的讓步策略並未使運動得到控制。而這場運動之所以未能在政府的讓步下得到控制，原因就在於高層精英

²⁶ 因為趙紫陽前往北韓進行國事訪問，所以會議由李鵬主持。

²⁷ 陳小雅(1996, 204-06)。

²⁸ 通報見《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1989, 41-42)。

²⁹ 前揭文，37。

³⁰ 陳希同(1989, 967)。

和民眾在對國家合法性的認知上發生了分歧。學生們所要求的，並不是政府能夠或者願意給予的。

高層精英懷疑在學生背後有一小股組織有序的勢力。這種懷疑很可能是因為中共本身早年曾開展過組織良好的地下活動，因而會慣性地把反對勢力的活動看作是一場有組織的陰謀；當然，也有可能是因為高層精英缺乏探知運動內部情況的有效信息。在研究中，我發現政府確實缺乏做出正確的決定所必需的信息。³¹ 既缺乏有效信息又囿於成見，政府只會把很多活動視為有組織的陰謀。

政府的這種所謂「陰謀論」，在某種意義上並非無中生有。運動初期，謠言蜂起。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個學生郭向東因為車禍而死，但外界卻紛紛傳說她是被警車撞死的；李鵬在胡耀邦追悼會之後從未同意過接見學生，但傳言卻說他答應了而沒有履行諾言；政府相信警察在整個新華門清場的過程中是非常克制的，但謠言卻堅持「新華門血案」實有其事。這些四處流傳的謠言既然會對學生產生影響，那肯定也會影響高層精英對學運的看法。然而，儘管如此，中國政府把運動界定為反革命動亂時卻犯下了兩個錯誤：首先，他們沒有看到，大部分謠言不是由於一些有組織的勢力從中搗亂，而只是自發的個人行為；其次，他們低估了隨着社會問題日益惡化，激進學生的行為在其他學生和北京市民中贏得的深切的同情。

國家一旦失去高度的意識形態合法性，意圖再用意識形態來辯白自己的行動，只會招致民眾的反對。4月25日晚上4·26社論剛播出，學生就對社論的調子和內容十分反感。既然學生和北京市民與政府之間已無信任可言，那麼，他們寧願相信謠言是真的，而政府的反應是過頭了。4·26社論只會讓他們聯想起已是陳年往事的文化大革命的調子。這樣，政府在4月25日和26日反制動員措施勢必失敗，學生們則得以成功舉行4·27大遊行。

³¹ 比如，當絕食開始時，政府甚至不知道組織者是誰。政府官員急忙與知識分子一起去找學生領袖來對話（第六章），而他們中的很多人並不是絕食活動的組織和參加者（第六章）。

政府讓步

為了阻止參加4·27大遊行的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中國政府動用了所有可以動用的警力，包括來自警察學校的學生。他們還從38軍調來5,100名士兵作為後備警力，以保衛天安門廣場。³²然而，隨著傳達至最高決策層的信息不斷增加，高層精英越來越清楚，一場大規模的遊行勢所難免了。此時此刻，他們面對的是一個兩難困境——他們不是不可以下令鎮壓，但考慮到可能參加遊行的學生人數，如果不使用超常的暴力，北京的警察根本無法阻止遊行。最後，為了避免暴力鎮壓可能引起的惡劣後果，高層精英人士命令警察以非暴力方式阻截遊行。但是，由於學生人多勢眾，再加上北京海澱區大學校園佈局複雜，這項任務是不可能完成的（詳見第八章）。

一些學者把政府的克制歸功於像閻明復這樣的改革派官員的游說。³³ 閻明復和另外一些高層精英確實可能勸說過政府不要動用武力，卻不能說這是導致政府態度轉變的最重要的原因。相反，我認為在這一階段，中共一方面仍對鎮壓可能帶來的負面後果深感憂慮，另一方面也還沒有把鎮壓看作是解決這一政治危機的唯一出路。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這一點，倘把時間推到五月底，當時黨內大多數高層人士認為，鎮壓可能是唯一的出路，既可以解決這一政治危機，又能保住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見第六章與本章的後半部）。不難想見，在當時，即使閻明復等人欲通過游說高層來解決危機，其結果必定是徒勞的。4月25日，鄧小平對李鵬和楊尚昆說：「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避免流血，但是我們也必須預見到，完全做到這一點也許是不可能的。」³⁴ 鄧小平的言論應當從字面上來理解——當時的中國政府試圖避免流血，但如果在鎮壓和被推翻之間選擇，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³² 《38軍軍史》（1994；第七章）。

³³ Kristof (1990a, 174); Liu (1990, 513)。

³⁴ Oksenberg, Sullivan, and Lambert (1990, 204)。

4·27遊行成功之後，4·26社論就成了一紙空文。既然選擇了不鎮壓，那麼唯一可做的就是讓步了。4月27日，當遊行還在進行時，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表達了政府想同學生對話的意圖。第二天，《人民日報》和其他幾家主要官方報紙都以偏肯定的調子在頭版報道了4·27遊行。4月29日和30日，政府官員開始同學生進行對話。不難看出，在趙紫陽從北韓回國之前，政府已在讓步政策的方向上走得很遠了。因此，如果說趙紫陽與4·26社論的強硬路線沒有甚麼關係的話，那他與當局在其回國之前採取的讓步政策也不應有太多關係。

不過，趙紫陽回國之後確實推進了政府讓步政策的發展。當他還在北韓的時候，中央政治局將4月24日的會議記錄和鄧小平4月25日的講話都發給了他。他的答覆是：「我完全同意鄧小平同志的決定。」³⁵ 趙紫陽於4月30日回國後，在政治局常委的一次會議上進一步表達了對4·26社論的支持。³⁶ 但是，在這段時間內，趙紫陽還接見了他的助手、智囊和一些官員，以瞭解學運在他離開期間的發展。³⁷ 他對整個形勢的看法隨着這些談話而開始發生改變。

隨後的幾天，趙紫陽發表了兩次公開講話。第一次是在5月3日晚上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大會上，³⁸ 第二次是在5月4日會見亞洲開發銀行代表的會議上。³⁹ 5月4日的這次講話是由趙紫陽的秘書鮑彤起草

³⁵ 趙紫陽 (1994)。

³⁶ 陳希同 (1989, 969)。

³⁷ 例如，許家屯是趙紫陽回國後接見的人之一。關於這次會見的細節，見許家屯 (1993, 370)。

³⁸ Zhao (1990b)。這篇講話稿發給政治局委員，供他們傳閱及提出修改意見。根據趙紫陽回憶，當時有兩個政治局委員建議在講話中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趙紫陽沒有採納，在後來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他又重申了自己的立場：「我認為整個草稿已經詳細地論證了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說法也是為了支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且，這次講話主要是從正面來表揚五四運動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樣的話放在這兒就有點顯得不是場合。」(趙紫陽1994) 這份講話由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執筆，胡繩也是當時中國的頭號現代史專家。我對這份講話的感覺是，用中共當時的話語範式來衡量，它沒有甚麼出格之處。

³⁹ Zhao (1990a)。

的，發表後成為八九學運發展的一個重要事件。趙紫陽在講話中指出，大多數學生「絕不是要反對我們的基本制度」，因為他們的口號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改革」、「推進民主」和「反對腐敗」。趙紫陽還聲稱，有一些人企圖利用學生製造動亂，但他補充說：「雖然我們必須保持警惕，但這只是極小一部分人，我相信大部分學生也很明白這一點。」他還進一步說：「此時此刻，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學生仍然在遊行，但我堅信形勢會慢慢平靜。中國不會發生大的動亂。」在這次講話中，趙紫陽也呼籲學生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要通過民主和法律解決問題」。儘管他的講話提到「動亂」一詞，又強調政治穩定的重要性，但基調無疑和4·26社論完全不同。

中央與北京市的矛盾以及絕食運動的開始

學者們傾向於將趙紫陽的五四講話看作是高層精英內部衝突公開化的標誌。在軍事鎮壓之後，李鵬和陳希同也批評了趙紫陽的講話，認為他鼓動了學生，李陳二人還強調自己同趙紫陽之間的分歧。⁴⁰ 在當時，高層精英內部無疑存在着歧見和衝突；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趙紫陽的五四講話當時在高層精英內部的確是頗受歡迎的，包括通常所說的強硬派。例如，在軍事鎮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楊尚昆，就在許家屯面前高度讚揚趙紫陽的講話。⁴¹ 據趙紫陽說，李鵬也對趙的講話持肯定態度：

講話發表後，在一段時間裏得到了廣泛贊同……李鵬同志也表示贊成，並說他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代表時會對此做個呼應。他在講話時，語調確實很溫和。當時我並沒有覺得我們之間存在大的分歧。⁴²

事實上，李鵬確實是這麼做的。在第二天接見亞洲開發銀行的代表時，他以緩和的口吻評價了學運：

⁴⁰ 陳希同(1989)。

⁴¹ 許家屯(1993, 373)。

⁴² 趙紫陽(1994, 10)。

[我們的]政府採取了正確的、妥善的、冷靜的方法[對這一運動]加以處理，避免了事態的進一步蔓延和擴大。這也是政府和學生包括那些參加遊行的和沒參加遊行的學生的共同努力的結果。⁴³

我想強調的是，在這個階段，高層精英內部儘管存在分歧，共識仍是主要的——沒有人願意看到軍事鎮壓發生。但是，4·27大遊行的成功使口頭威脅失去了效力。除了口頭威脅和軍事鎮壓以外，不同程度的讓步就成為唯一的選擇。在這個階段，高層精英中沒有人能準確地預見到有限的讓步政策會帶來怎樣的後果。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包括鄧小平在內，都希望趙紫陽的做法能夠終止運動。因此，他們對趙紫陽的做法至少是傾向於容忍的。就當時鄧小平的權力而言，如果他全盤反對趙紫陽的講話，趙紫陽絕無可能在絕食把運動推向無可轉回的境地之前，一直保持溫和的態度。⁴⁴

不過，趙紫陽的5·4講話確實引發了正在第一戰綫設法平息學運的北京市委領導和大學校方的不滿。陳希同總結了當時他們對趙紫陽講話的反應：

趙紫陽的講話在各級領導、黨團員和群眾骨幹中引起了認識上的混亂。這種混亂在高校工作人員中尤為嚴重。他們覺得學生工作已經無法開展。一些人問：「中央有兩個聲音。誰對誰錯？我們到底應該聽哪一個？」另一些人問：「我們要和中央領導保持一致，究竟是和哪個中央保持一致？」其他人則發牢騷：「趙紫陽在上面唱紅臉，我們在下面唱白臉。」高校領導和學生骨幹普遍感覺「被出賣」了，心情沉重。一些人甚至掉下了眼淚。⁴⁵

⁴³ 李鵬(1989)。

⁴⁴ 正如趙紫陽(1994)在一封信中所披露的，趙紫陽和楊尚昆在5月13日向鄧小平做彙報時，鄧小平仍然是支持趙紫陽的。根據Dittmer(1989, 7)的說法，趙紫陽在5月去見鄧小平時，據說鄧小平曾告訴趙紫陽：「你應當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穩定局勢……如果局勢能夠得到控制，你可以實行你的計劃，不必考慮我說過的話。」

⁴⁵ 陳希同(1989, 970)。

當第一次讀到這段話時，因考慮到八九時高校的大多數政工幹部和學生幹部均同情或支持學生，我懷疑陳希同的講話只是一種宣傳。但令我吃驚的是，在訪談中，我發現陳希同講話中所描述的學校政工幹部的那種感受是非常普遍的。有這種感覺的人不是因為他們自己屬於政治上的「強硬派」，而是覺得趙紫陽的講話確實「出賣」了他們；⁴⁶ 比方說，一個在大學內掌管學生工作的幹部（第44號受訪者）曾告訴我，他在八九之前如何邀請自由派和激進派的知識分子到學校舉辦的各種沙龍和講座。他的話自然使我把他看成是傾向於改革的年輕幹部。然而，當我談起趙紫陽的講話時，他的反應多少出乎我的意料：

趙紫陽的講話讓我非常困惑。雖然學生在4·27遊行時打出的口號是擁護政府的，但他們的所作所為顯然是在藐視政府。他們殺了政府一刀，趙紫陽卻說他們在擁護政府。我們實在是搞不懂……我們中的一些人確實曾經盡心盡力地協助政府平息這場運動，趙紫陽的講話對我們來說是一個轉折。打那以後我們真不知道該怎麼做了。我們怎麼對學生講呢？如果我們支持趙紫陽的講話，那麼我們先前所做的一切就都成了狗屁。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和趙紫陽唱反調，畢竟他是黨的總書記。

趙紫陽的講話激起那些掌管日常學生工作的人的強烈不滿。在訪談中，我發現他們當中不少人的個人觀點都非常自由化，並且對運動抱有同情。只不過，由於他們身在其位首當其衝，政府態度的改變使他們的處境非常尷尬，還大大削弱了他們在學生中的威望。因此，短短幾天之內，任何高層領導在與掌管學生工作的幹部會面時都有可能受到「攻擊」；這也是為甚麼當趙紫陽同大學校方見面時被指責為出賣了他們的原因。我剛才提到的那位受訪者就講述了他是怎樣在一次會議上頂撞當時的教育部部長何東昌的：

何東昌和我們見面時，我對他說我們對趙紫陽的講話充滿疑惑……我還問他《北京市公共遊行暫行條例》是否依然有效。當

⁴⁶ 前揭書。

他說是的時候，我嘲笑他說這不過是名義上的罷了。事實上，學生們在遊行的時候，你甚麼都做不了。我問他我們應該怎麼做。他只能泛泛而談。他說趙紫陽也是同意4·26社論的，我們應當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待問題，應當相信群眾，並且應當學會用法律手段去處理矛盾。⁴⁷

然而，儘管此時一些高層精英對趙紫陽的講話持保留態度，但如果趙紫陽的策略奏效的話，他們仍然會服從他的。不管是一般的學者，還是旨在批判趙紫陽的官方文件，都認為上述意見分歧確實證明當時黨內存在有激烈的衝突。事實上，這些分歧並非關鍵之所在，它們更多的是反映了當時北京市和大學校方對中央態度改變的不滿，而不是強硬派對趙紫陽的宣戰。需要指出的是，在對學生做出讓步的程度問題上，高層精英內部確實存在重要分歧。當趙紫陽有意公開改變4·26社論的論斷時，大多數國家領導人從未想到要走這麼遠。⁴⁸ 他們之間的這種默契，使趙紫陽的行動變得像孤注一擲的賭博。如果運動果真平息下去，那就證明趙紫陽的策略是有效的；否則，他將陷於絕境。不幸的是，在這場政治賭博中趙紫陽輸得很慘；而這，完全是由於絕食運動的發起所致。

關於絕食的緣起，存在着兩種完全不同的說法：一方面，政府後來聲稱是趙紫陽的五四講話鼓動了激進的學生，因此而引發了絕食；⁴⁹ 另一方面，一些學運積極分子則反駁說，是政府挑起了絕食，在他們看來，包括趙紫陽在內的政府領導人的妥協策略，不過是為了拖延時間，先待運動平息下去，再與學生秋後算帳。⁵⁰ 這兩種看法都

⁴⁷ 5月6日李鵬和八所高校的領導見面時，說趙紫陽的5·4講話只代表他個人的看法。一般認為這標誌着高層精英之間的激烈衝突（陳小雅 1996）。但這也有可能是李鵬迫於大學校方的壓力才出此言的。

⁴⁸ 比如，5月4日，當趙紫陽（1994, 11）試探性地和李鵬討論否定4·26社論的時候，李鵬沒有同意。

⁴⁹ 陳希同（1989）。

⁵⁰ 我訪問的幾個激進學生和知識分子都表達了這種觀點。

與事實相去甚遠。趙紫陽的講話肯定沒有對運動的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而當時大多數學生也沒有覺得政府這麼做僅僅是在玩弄手法。

事實上，當時大多數北京學生都認為趙紫陽的講話是政府的一個重大讓步，也對此表示滿意。所謂「政府讓步不過是場陰謀」的說法，實際上是一些激進的學生和教師為了繼續推進學運而有意散布出來的，當時真正支持這一說法的人很少。⁵¹ 5月4日之後，除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之外，北京所有大學都紛紛復課。那些繼續參與罷課的學生也借機紛紛外出旅遊或是加入各種娛樂活動，運動已不再是他們關心的主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重整士氣，一些激進學生發起了絕食（詳見第六章）。總而言之，政府的讓步策略，包括趙紫陽的講話，其實都是非常成功的，而絕食正是被這一成功的策略逼了出來的。

政府的讓步策略會促使一些運動積極分子表現得更為激進，這一點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了。比如，在60年代的美國，當政府就公民權利、越南戰爭和學生校園生活等方面的政策做出適度調整之後，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再熱心於新左派運動。但這反而使一些激進分子，比如「氣象員」派成員（weathermen），採取了越來越極端的策略，甚至用上了暴力。不過，在美國，當這部分學生變得越來越激進時，整個社會對他們卻越來越疏遠，媒體對運動的報導是負面的，政府也通過法律手段來瓦解他們；所有這一切都加速了運動的衰亡。⁵² 可是在中國，起初由寥寥數人發起的絕食卻很快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到底原因何在？

問題的關鍵仍在學生和北京市民對國家合法性的認知上。參加絕食運動者提出兩項要求作為結束絕食的條件：「一、政府應該本着真誠、平等的原則立即同北京學生對話團代表進行實質性的、具體層面上的對話；二、政府應當對運動予以平反和公正評價，並公開承認這

⁵¹ 比如，某個老師對柴玲說：「我是黨員。我收到好幾封外地朋友的來信。我們都非常擔心你會受趙紫陽的煽惑。事實上，政府只是想用緩兵之計把你們一網打盡。」（《回顧與反思》1993，90）

⁵² Braungart and Braungart (1992)；Gitlin (1980, 1987)。

「一場愛國的民主運動。」⁵³ 第一項要求對政府來說已不是甚麼問題，早在宣布絕食之前，政府和對話代表團就已經有過多次接觸了。問題重在第二項要求，從表面上看，趙紫陽的5·4講話似乎已經滿足學生的要求，但那些激進學生仍然要求政府正式否定4·26社論，而這是當時中國政府無法做到的。大部分中共高層精英都明白，儘管絕大多數學生是出於對各種社會問題的深切不滿才參加運動的，運動的核心主題卻是親民主的和反對現有體制的。因此，正式承認這一運動就意味着賦予一個「不忠誠反對派」(disloyal opposition) 以合法地位。當「不忠誠反對派」的力量與人們對現實的普遍不滿相結合時，就會產生通常所說的骨牌效應，即政府連連讓步，反對勢力步步緊逼，直至政權完全垮台，就像90年代初在前蘇聯與東歐所發生的政治變革一樣。由於當時中共內部的大部分高層精英都強烈擁護和認同中共政權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要他們冒着全盤潰敗的危險來接受第二項要求，顯然是絕無可能的。⁵⁴

然而，絕食與包括罷課在內的其他形式的示威活動相比，其效果是很不相同的。國家可以在不接受罷課者的要求的情況下容忍罷課，但對絕食卻不能如法炮製，因為不答應絕食者的條件就有可能出人命。前已述及，80年代後期的大多數學生和北京市民所關心的，主要是國家在道德和經濟方面的表現，而不是它的意識形態傾向。同時，由於廣大市民和學生都對當時的經濟危機深表不滿，他們的心就更容易傾向於學生。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和北京市民所關注的，從來不是絕食者的具體要求和絕食所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而是國家會怎樣對待這些絕食的人。絕食開始後，絕食者的健康和生命馬上就成為北京市民和學生關心的焦點；這樣一來，如果絕食者的健康狀況惡化，政府必然冒犯眾怒，絕食因此而成為對政府在道義上的重大挑戰。既然

⁵³ 關於這兩項要求的一個英文版本，見Han and Hua (1990, 202)。

⁵⁴ 有的讀者可能會質疑為甚麼中國政府在1976年為四五運動平反之後依然無恙。我的回答是，四五運動主要是針對毛澤東的主義而來的，而不是針對共產主義制度本身。因此，它仍然是一次「忠誠的反對」，對它的平反並不會對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構成根本性挑戰。

化解絕食危機的唯一可行的讓步是馬上否定4·26社論，並平反學生運動，那麼，絕食實際上是把政府逼入了絕境。絕食作為一種運動策略固然非常有效——因為它對中共政權發起了意識形態上和道義上的雙重挑戰，從而也是根本性的挑戰，但同時也使運動變成了一場道義討伐與零和博弈。從此以後，政府與學生之間的硬碰硬對撞變得更加難以避免了。

高層精英鬥爭加劇

一直到5月15日，政府官員仍試圖在與學生談判。他們甚至呼籲學生為即將到來的中蘇領導人會晤而停止絕食，但均未奏效。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原先安排的許多活動都因為學生的絕食而被迫更改或取消。戈爾巴喬夫訪華所受到的影響使趙紫陽在高層精英中變得孤立；同時，學生們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態度，迫使高層精英當機立斷。這樣一來，領導層內部的衝突就加劇了。

5月16日晚，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⁵⁵ 在那次會議上，趙紫陽提出要進一步讓步，包括直接修正4·26社論的論斷；李鵬和姚依林則堅持認為，進一步讓步只會導致學生更多的要求和整個局勢的進一步惡化。⁵⁶ 會議一直持續到翌日凌晨，未能達成任何決議；唯一的共

⁵⁵ 包括鄧小平、楊尚昆、李先念、陳雲、彭真和王震等在內的老幹部都強烈要求中共中央召開這次會議。正如楊尚昆5月24日在中央軍委緊急會議上的講話所表明的那樣，他們都深信即使再讓步都必然導致政權垮台（楊尚昆1990），他們的觀點對隨後幾天的政治局常委會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⁵⁶ 這種看法突出反映在6月13日姚依林在國務院部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姚依林1989, 17）：「各位在學習〔鄧小平講話〕的時候，可能都會問一些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如果我們後退一步，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並進而使其組織合法化的話，情況會如何呢？我想在座的很多同志都有這個疑問。事實上，我們對這個問題斟酌過很多回了。如果我們後退一步，中國就會出現一個反對黨……如果我們做這樣的讓步，中國就會步波蘭的後塵。波蘭和匈牙利所發生的一切就是退讓的結果。我們黨、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就取決於這關鍵性的一步……因此，我們已經反反復復仔細考慮過很久了。我們不能做這樣的讓

識是一份書面講話，由趙紫陽在5月17日的「早間新聞」中宣讀。講話正面評價了學生的要求和愛國熱情；呼籲學生要愛惜身體，停止絕食，撤離廣場；承諾政府不會秋後算賬，也不會懲罰運動領袖，並在他們撤離之後，政府仍會與學生保持對話。然而，廣場上的學生絲毫不為所動。

由於第一次會議沒有作出決議，趙紫陽的講話也未收到效果，5月17日深夜，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家中再次召開會議。楊尚昆和李先念也出席會議。鄧小平為會議做了一個簡潔的開場白：「形勢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⁵⁷ 我們該怎麼做？我們還有餘地嗎？我們還可以做出多少讓步？」楊尚昆緊接補充說：「我們已經無路可退了，再退下去，政府就要垮台。」⁵⁸ 當輪到趙紫陽發言時，他依舊堅持讓步。隨後，姚依林拿出一份早就準備好的稿子，開始長篇發言，抨擊趙紫陽。趙紫陽則堅持己見，予以反駁。會議持續了好幾個小時。最後，在場的人不得不投票決定是否實施戒嚴以結束天安門廣場的被佔領狀態。結果，趙紫陽和胡啟立反對，李鵬、姚依林、喬石同意。⁵⁹ 戒嚴令就這樣獲得通過。

必須說明的是，即使常委們不同意，戒嚴令仍然會實施。絕食開始後，表7.1中列舉的所有老幹部幾乎都趕回了北京。這些退休或半退休的老人都強烈反對作進一步讓步。憑藉他們在黨中央的權力和影響，即使沒有政治局的同意他們也能調動軍隊。當然，一個正式通過的決議肯定會在普通黨員當中贏得一定的合法性。

步，絕對不能。」在姚依林的講話過程中，李鵬插話補充道：「如果我們按照學生的要求，把高自聯合法化，那麼工人呢？我們是不是也要根據工人的要求合法化一個團結工會呢？」

⁵⁷ 這裏的「形勢」可能同時指當時天安門廣場的形勢和政治局常委們意見的分歧。

⁵⁸ 吳牟人等(1989, 390)。

⁵⁹ 關於這次投票，有三種說法。陳一諮說喬石和胡啟立棄權。高新在做了一些訪談之後得出結論說沒有人棄權。最後，根據楊尚昆的說法，只有趙紫陽投票贊同進一步讓步。楊尚昆的說法按理應該是最真實的，因為他當時在場。但楊尚昆並沒有說明其他人到底是投了贊同票還是棄權。為此，我採用高新的說法。見陳一諮(1990, 161)、高新(1995)及楊尚昆(1990)。

同時有迹象表明，在那段時間裏，趙紫陽可能已經不打算跟他的同事繼續配合了。例如在5月16日的一次電視直播節目裏，他對戈爾巴喬夫說，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仍然由鄧小平掌舵。當時，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市民都對政府在絕食一事上的反應非常憤慨。趙紫陽的這種說法在隨後的幾天引發了對鄧小平的人身攻擊。5月19日早上，趙紫陽堅持到天安門廣場上去慰問絕食的學生，並努力說服學生停止絕食。這也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

按此，我們可以得出甚麼結論呢？首先，高層精英內部的鬥爭在這段時間內確實加劇了。然而，與其說這是兩個派系之間的鬥爭，倒不如說是趙紫陽一人與其餘人之間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的失敗是不言而喻的。其次，這種鬥爭與其說是保守派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倒不如說是在進一步讓步這個問題上不同態度之間的鬥爭。雖然趙紫陽仍然相信，通過進一步讓步，運動仍可被控制在「忠誠的反對」的限度內，⁶⁰ 但其他高層精英，包括許多曾一度支持趙紫陽的政策的人，比如楊尚昆和喬石，都認為再讓步政權就會垮台。⁶¹ 最後，國家回歸強硬路線（雖然這是通過一場權力鬥爭而實現的），更多地體現了中國的國家以及國家·社會關係的特質，而非政府的派系鬥爭。換句話說，正是由於當時中國政府一方面缺乏一種將「政治抗爭行為」制度化、同時將激進成分邊緣化的機制，另一方面又不肯放棄權力，它們因此才不得不選擇強硬路線。

⁶⁰ 一般認為，「忠誠的反對」是保持民主存在的關鍵。這一觀點的核心機制在於：任何政治制度的穩定都在於互為敵手的政治力量在根本價值體系上是一致的，競爭僅限於規範限度之內。「忠誠的反對」是對英國的所謂「為女王陛下的反對派」這一觀念的延伸。對這一概念的進一步討論可以參考Linz and Stepan (1978, ch. 2)。

⁶¹ 在5月22日的一次會議上，喬石說：「已經有一個多月了，運動一直在升級。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直都是克制和寬容的。只要讓步不觸犯到我們的根本原則，學生們的要求我們都已接受了……總之，他們有很多機會可以脫身。我已經考慮過很長時間了，我想我們不能再讓步了。唯一的問題是找到恰當的辦法結束目前的局面。如果更多的讓步能夠解決問題，那我們早就讓步了。確實沒有辦法了。」（吳牟人等 1989, 392-93）。

戒嚴令和軍事鎮壓

5月19日晚，各路戒嚴部隊開始向北京推進，但立刻遭到學生和北京市民的阻截。僵持幾天之後，部隊不得不向郊區撤退。

既然部隊不能和平進駐北京，那麼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命令部隊不惜一切代價挺進。這項命令之所以遲遲沒有發布，是因為當時中共政府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首先，戒嚴開始之初，雖然多數高級軍官多少都贊同這項決定，但大部分中下級軍官和士兵絕對沒有想過要殺出一條通向天安門的道路，政府必須進一步說服他們。其次，高層精英也需要贏得其他官員和社會精英對鎮壓政策的支持和理解。5月22日以後，政府為此召開了一系列會議，針對聽眾的不同，會議的側重點也各有不同。比如5月24日，楊尚昆在會見軍方高級將領時，着重強調的是學生在運動中提出的種種激進口號，並強調戒嚴得到了鄧小平的首肯、並獲得了長征老幹部的支持等事實。⁶² 陳雲在同中央顧問委員會的老同志會面時，再三強調他們為打下這片江山而經歷的犧牲和磨難，並提醒他們注意，如果學生成功，中國「不僅有可能痛失十年改革的成果，而且有可能讓他們浴血奮戰才取得的革命成果毀於一旦。」⁶³ 而彭真在會見黨外精英時則強調：學生的動機是好的、建設性的，但他們處理社會問題的方式不對；政府對學生所提出的社會問題也很關注；但是有一小撮居心叵測的人正在趁機利用學生。⁶⁴ 由於中共最高層精英統一了口徑，越來越多的中下層領導人物也開始公開在報紙上表達了他們對戒嚴的支持。

然而，高層精英顯然仍然在考慮軍事鎮壓的代價，因此在這段時間裏他們仍然在通過官方或半官方渠道不斷與學生領袖溝通，試圖說服、甚至威脅他們主動撤離廣場。在這方面，可以列舉一些學生領袖的回憶為證。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曾派助手前往北京大學，他們對學生領袖常勁說，如果學生主動撤離廣場，不再堅持反對戒嚴，不再堅

⁶² 楊尚昆 (1990)。

⁶³ Chen Yun (1990)。

⁶⁴ 吳牟人等 (1989, 455-56)。

持推翻4·26社論，鄧樸方可以在事態平息以後力勸鄧小平退休。⁶⁵ 根據學生領袖李錄的說法，5月26日，有一個代表李鵬及政治局的人被派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們離開。⁶⁶ 他告訴學生，戒嚴並不是針對他們的，軍隊不會傷害他們，運動結束以後政府也不會懲罰他們；但是，如果學生固執已見，堅持佔領廣場的話，武力和流血都是不可避免的。據張伯笠的回憶(1994e)，政府和學生的最後一次接觸是5月30日下午在北京飯店進行的。李錄和張伯笠都去了，但沒有達成協議。最後，政府代表警告學生迅速返回學校，因為軍隊很快就要對廣場進行清場了。這些努力表明，即使在戒嚴令發布之後，政府仍然在努力避免流血衝突。這倒不是因為政府中改革派在此時還發揮着甚麼特別的影響，而是中共高層的每個成員都很清楚軍事鎮壓的代價。

學生並沒有就此撤離，戒嚴總部則發布了軍隊第二次推進的命令。軍隊再次遭到北京市民的強烈抵抗，整個過程艱難而血腥。但是這一次，由於中央決意鎮壓，再加上軍隊已準備充分，他們最終開進了天安門廣場。運動於是以悲劇而告終。

為甚麼學生和北京市民完全不顧政府的反復警告，而甘願冒着生命的危險去抵抗戒嚴部隊呢？⁶⁷ 許多因素在同時起作用。舉例說，在運動期間，國家已經多次採取強硬策略；但是，每次只要參加運動的人堅持立場，政府就會後退。既然政府在每次「英雄與狗熊」的遊戲中都扮演了「狗熊」的角色，人們總覺得政府還會再扮演一次。所以，在採訪中，一些受訪者對我說，甚至當有人中彈時，他們身邊的人，包括他們自己，都還以為那只是橡皮子彈而已；那一瞬間，他們沒有害怕的感覺。然而，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政府與學生之間存在着所謂的「信息鴻溝」。⁶⁸ 首先，北京的學生和市民沒有構成一個統一的行動主體。一直到5月底，他們都更像是一群龐大的、無組織的烏合之眾；更重要的是，政府確實沒有把鎮壓的消息秘而不宣。事實上，政府曾多次通

⁶⁵ 《回顧與反思》(1993, 265, 292)。

⁶⁶ 李錄(1990, 179)。

⁶⁷ 鎮壓前，政府在廣播裏面一再發出警告，要求市民為了自身安全而不要出門。

⁶⁸ Deng Fang (1997)。

過公開和私下的場合，警告人們說政府已經失去耐心，鎮壓迫在眉睫，只是學生和市民並未對這些信息做出反應。在這裏，我將再次運用國家·社會關係模型，圍繞國家合法性的來源這個問題，對此做出解釋。

前已述及，當趙紫陽的讓步策略未能奏效時，政府不得不回到強硬路線。但這一次卻不能僅僅依靠意識形態手段，因為4·26社論已經證明這一招非但無益，反而會觸怒學生。在意識形態抨擊和軍事鎮壓這兩種手段之間，對政府來說唯一可行的手段就是通過法律手段發布禁令，亦即戒嚴令。問題是，中共高層精英在過去並未把法律看成是對他們具有約束力同樣的社會契約的一部分，而只是將其當作實現意識形態和個人目的的工具。因此，法律的執行和闡釋會隨着意識形態的風向而不斷變換，一旦國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衰落，法律的權威也就隨即瓦解了。這樣就不難理解為甚麼戒嚴令既不能使學生和北京市民信服，也不能向學生和北京市民傳達所欲傳達的信息，使之做出相應的理性選擇。最終，戒嚴令與4·26社論一樣，只起到了反作用。

至此，政府所有可以嘗試的手段都失敗了，唯一沒有用到的就只有強硬的軍事鎮壓了。在高層精英中，不管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相信沒有人願意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似乎已經是政府唯一可以用來阻止這場反對現有體制的大規模運動的手段。這一手段尚且有效，是因為一直到80年代末，包括大部分軍隊高級將領在內的高層精英，仍然對他們為之獻身數十載的革命矢志忠誠；與此同時，他們仍然能夠牢牢地掌握對手下的軍隊的控制權。

結 論

我們看到，中國政府在學運剛開始時採取了容忍的態度，也試圖將其控制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的範圍之內。胡耀邦的追悼會結束之後，政府轉向更為強硬的路線，4·26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動亂」。當4·27大遊行成功地抵制社論之後，政府的態度又轉向溫和，還試圖通過有限度的讓步來控制運動。然而到5月19日，即絕食開始一週之後，政府發布戒嚴令，把大批軍隊調往北京。政府一開始以為武力威懾足

以嚇退佔據廣場的學生，但當這一招也未奏效時，接下來的就是軍事鎮壓了。

上述政策變動和運動的發展，一直都被解釋為是中共高層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權力鬥爭的結果。在本章，我對這一過程給了一個不同的解釋。在我看來，高層精英內部的權力鬥爭的確是存在的，但導致運動中政策變動的關鍵因素卻是各種國家控制手段的失效。當時，國家高層精英、運動積極分子和其他北京市民之間對國家合法性的看法是相互衝突的，這種衝突正是國家控制手段失效的關鍵所在。我的觀點是：任何一種國家控制手段都需要某種合法性基礎以確保其有效性。然而在80年代，當大多數高層精英仍然相信手中的政權在意識形態方面具有合法性時，大部分學生和市民則主要通過道德和經濟狀況來評價國家的表現。在運動中，學生正是在意識形態、經濟和道德方面對政府提出了挑戰，廣大市民則對此普遍寄以同情。另一方面，政府要麼通過其自以為擁有的意識形態上的或法律上的權威，而對運動做出應對，要麼做出有限度的讓步；然而，前者只會激化矛盾，後者又不能滿足學生中的激進分子；最後，對政府來說，唯一的辦法似乎就只有軍事鎮壓了。軍事鎮壓可行，是因為當時包括軍方將領在內的大部分中共高層精英，都在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就參加了革命，並在80年代仍然保持對革命及其意識形態的高度忠誠。

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運動與學運的發展

在前面的章節，我考察了國家行為以及人們對國家行為的認知如何推動八九學運進程，現在把注意力轉向運動的參與者身上。在社會運動研究中，動員機制一直是一個核心問題。自70年代以來，學者們一直強調正式組織和運動網絡在社會運動動員中的作用。目前，這一觀念已經成為一種共識，¹因此，在這項研究的初始階段，我訪談時所設計的一些問題也是以此為導向的。研究時，我確實找到很多以組織或網絡為基礎的溝通和動員的證據；但我同時也發現，如果不將校園的生態環境考慮在內，許多事情就無法得到解釋。校園環境在推動學生動員的過程中，除了催生學生組織和學生網絡外，還產生了其他影響。在此不妨先舉一個例子。

在北京，幾乎所有大學的校園立起磚牆與外界隔離，只開放部份由學校保安把守的出入口。八九學運期間，少有警察或士兵進入校園鎮壓學生。在訪談中，我發現這一道簡單的圍牆對運動的發展非常重要，因為圍牆把學校與北京的公共公路系統區隔開來，如果校方沒有明確同意，警察就不能大量進入校園。即使校方有人對運動不抱同情，也不會動輒叫警察來對付學生；否則，學生將會疏遠校方，一旦警察離開之後，校方在與學生打交道時就會遇到更多的麻煩。這樣，圍牆就為校內學生運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低風險的區域，從而大大促進了學生運動的動員。²

¹ 近期有關這方面的工作，可參見Roger V. Gould (1991; 1993); McAdam and Paulsen (1993); Zhao Dingxin (1998)。

² 見McAdam (1986) 有關低風險和高風險的社會運動的區分。

這方面的諸多發現使我對校園生態環境在學生動員中的作用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在研究中，我發現，校園環境在八九學運動員中至少發揮了以下幾個方面的作用：(1) 運動開始前，它方便了「異見性」觀念的傳播；運動開始以後，又保證了一些小道消息的暢通無阻；(2) 它培養了以宿舍為基礎的學生群體，這等人相互影響，甚至彼此強制，因此而保證了學生在八九期間的高參與率；(3) 它在校園內造成了許多空間活動場所，大多數學生每天都會經過或是流連於此，這些場所在八九期間成為學生動員活動的中心地帶；(4) 北京海澱區高校的集中分佈便利了不同學校的學生之間的相互模仿和較勁，從而大大促進了學運的發展；(5) 校園環境也有助於許多受環境制約的集群行動的策略的形成，而這些集群行動策略反過來又推動了運動的發展。³ 在這一章，我將集中討論上述發現及其理論意義。

在進入正題之前，有必要指出，在運動期間，不僅學生動員倚重環境，戒嚴期間，市民的動員一般也是以鄰里為基礎展開的。整個學運在戒嚴令發佈之後還能維持下去，在很程度上正是因為北京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特殊環境(詳見第六章)。不過，在這裏，我主要關心的是八九時期的學生動員，尤其是運動早期的學生動員過程。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是考慮到在運動早期由於面臨可能的鎮壓和其他不確定因素，學校環境對於運動的維繫顯得尤為關鍵。而當學生成功地挑戰現政權之後，人們所能感受到的風險也就大大降低了。事實上，到5月中旬的時候，上天安門廣場差不多已經成為一種消遣。

國家、社會關係與社會運動動員結構

為甚麼八九學運的動員結構明顯不同於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背景下的那些社會運動呢？這是一個極待回答的問題。對此，我的主要觀點是，社會運動動員結構首先是受國家、社會關係影響的；同時，它又與社會運動的類型密切相關。比方說，一場學生運動的動員，往往

³ 在這兒，依託於生態環境的策略指的是一套相對穩定的動員策略，而其有效性和被運動積極分子採納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定的生態環境條件。

取決於學生當時所處的學習和生活環境。在此，不妨以國家、社會關係和社會運動的類型為參照，簡單地探討一下社會運動動員結構的三種理想類型。

某些社會運動基本上是通過正式組織來動員的，這在主流的西方社會非常普遍。在這些社會裏，社團生活高度發達，那些政治上很敏感的個體處在某些學者所謂的「多元組織域」之中。⁴ 由於許多這樣的組織並不受地域所限制，其基本制度結構較諸於人際關係網絡，在溝通成員方面一般更為有效；這樣，由人群集居而造成的生態環境就不太可能成為運動動員的主要因素。現代西方的許多社會運動，尤其是一些新社會運動，其動員過程都類近這種類型。

不過，大部分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都是正式組織、以生活和工作環境為中心的人際關係網絡，以及生態環境的直接影響共同作用的產物。因此，環境在不同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由於大學生所處的獨特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使然，校園生態環境對社會運動動員的影響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經受到一定程度的關注；舉例說，許多60年代學生運動的觀察家都曾論述美國大學的校園環境如何促進學生參與運動。⁵ 海因爾希 (Max Heirich) 令人信服地描繪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園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的佈局在50年代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是如何促進該校學生在60年代投身學潮。⁶ 不僅美國如是，研究其他國家學生運動的學者也注意到這個事實。比如，卡索 (Samuel D. Kassow) 為我們描述了尼古拉斯二世 (Nicholas II) 時期的莫斯科，為學生提供廉價食物的食堂如何最終變成了學生的聚會之所，學生在那兒交換信息，進行串聯，還舉行集會。⁷ 周策縱和華志堅 (Jeffrey N. Wasserstrom) 都注意到，民國初期中國校園擁擠的生活環境曾助長了當時學生運動的組織與發展。⁸

⁴ 關於這一概念，可以參考Curtis and Zurcher (1973)；Fernandes and McAdam (1989)；McAdam and Paulsen (1993)；Rosenthal et al. (1985)。

⁵ Berk (1974)；Heirich (1971)；Lofland (1970)。

⁶ Heirich (1971, 59-67)。

⁷ Kassow (1989)。

⁸ Chow Tse-tung (1967)；Wasserstrom (1991)。

除了學生運動，其他許多事實也證實了環境對社會運動動員所起的作用。比如，19世紀的西歐正處於新生的市民社會與傳統的社區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共存時期，大部分社會運動，如英國的憲章運動和法國的巴黎公社，都是由正式組織發起的。然而，這些正式組織同樣嚴重依賴於地方社區所處的自然環境以增強其動員潛力。⁹ 當代西方國家的一些集群行動，比如美國的社區運動或城市暴動，其發起和動員都受到生態環境的影響。¹⁰ 費金 (Joe R. Feagin) 與哈恩 (Harland Hahn) 二人以及弗格森 (Robert M. Fogelson) 都曾提到，一些突發性的大規模城市暴動之所以能夠在美國發生，原因之一即是因為黑人街區人口擁擠，居民也時常在街上遊蕩，一有突發性事件便能迅速聚集起來。¹¹

在有些社會中社會運動的動員方式不得不主要以生態環境為基礎。在那些中間組織欠發達、不受國家控制的組織被認定為非法組織的地方，生態環境和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網絡溝通成為唯一可資利用的動員手段；因此，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動員方式尤其常見。許多專制國家的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往往近似於這種方式，因為獨立於國家而存在的中層志願組織在這些國家中普遍受到壓制。

在過去，學者們普遍認為現代共產主義政體是高度穩定的，因為它對社會的控制得到現代國家的高度滲透結構 (infrastructure) 權力以及現代軍事技術的支持。80年代後期席捲東歐的革命浪潮徹底破除了這個「極權神話」。這樣一來，「一個曾令民眾如此畏懼的專制政體為何一夜之間就土崩瓦解了？」這個問題就成了謎。¹² 在對該問題的研究中，

⁹ 見Roger V. Gould (1995) 和Mann (1993, ch. 15)。Tilly (1976)；Bezucha (1974) 和Aminzade (1993) 曾討論傳統社區的特點以及它們對西歐社會運動動員的重要性。Tilly and Schweitzer (1982) 精闢地分析了從1758–1834年間倫敦在工業化過程中所發生的市民在經濟活動、行政活動以及居住形式上的重新組合，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空間活動形式以及集體運動的地理位置。

¹⁰ 關於社區運動的例子，見Delgado (1986)；Perry, Gillespie, and Parker (1976)。

¹¹ Feagin and Hahn (1973)；Fogelson (1971)。

¹² 這個問題是由Olson (1990, 16) 提出來的。

大多數學者往往強調市民社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¹³ 然而就前東歐國家的政權性質而論，即便是像匈牙利、捷克和波蘭等這些市民社會比較發達的國家，其最初的社會運動動員與其說是通過正式組織或政治網絡，倒不如說是通過生態環境或者以生態環境為依託的策略而展開的。比如，八九學運與1970年的格但斯克 (Gdansk) 和格代尼亞 (Gdynia) 罷工，在動員結構上就存在相似之處。拉巴 (Roman Laba) 在他的研究中發現，格但斯克和格代尼亞罷工是由少數幾個積極分子發起的，他們輾轉於工廠之間，四處招徠追隨者，¹⁴ 還駕駛着播音車到各個碼頭巡遊以吸引更多的人。而諸如工人防衛委員會或教會之類的正式組織，則從未介入運動的初期動員。此外，拉巴的著作還清楚地表明碼頭生態環境在工人動員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儘管這並不是作者關注的重點。

一個專制政體可以消滅社會中層組織，卻無法破壞以環境為基礎的人際交往。事實上，正如本章所要揭示的，專制政體的集權化過程有時反而會促成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人際交往。這種生態環境在政治危機中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動員力量，可以部分地解釋為甚麼貌似強大的共產主義政體實際上是非常脆弱的。

北京的大學

在進入具體的個案研究之前，我們有必要先瞭解一下北京的大學校園布局以及學生在校園裏的日常生活。我的描述從北京高校集中的海澱區開始。

海澱區

北京的大部分高校都分佈在海澱區及其周圍。這種集中分佈形態是50年代計劃經濟的產物。為了適應建設新中國的形勢，當時中央政

¹³ 例如，見Di Palma (1991) ; Ost (1990) ; Poznanski (1992) ; Tismaneanu (1990) .

¹⁴ Laba (1991, ch. 2) .

府決定鑑「蘇聯老大哥」的經驗，在北京的某個區域內集中建立各類大學。這個建立大學區的計劃在50年代分兩個階段實施：第一步是調整現有的大學，並成立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的兩所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也是在這一時期形成其現有佈局的。第二步是興建大批蘇聯風格的專業院校；¹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八大學院」，也就是在同一條路上興建八所專業院校。到1956年第二期工程竣工時，北京已經有31所大學和76,700名學生。而在1949年，北京還只有13所大學和17,442名學生。¹⁶此後，北京高校區持續擴張。到1989年時北京共有67所高校，取錄162,576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¹⁷

北京的校園

中國的大學校園在結構上非常類似。由於北京大學是北京乃至全國的學運中心，我們不妨以它為例描述一下中國大學校園的基本結構。正如北京大學的地圖(圖8.1)所示，中國的大多數大學都有圍牆與外界隔斷。在圍牆內，每所大學都有自己的飯館、學生食堂、電影院、醫院、郵局、理髮店、商店、體育場所及娛樂場所等設施。它們自成體系，勤奮的學生可以一個學期不出校門而絲毫不覺不便。

大部分中國學生都住在學校的宿舍裏，同班同學通常都住在幾個相鄰的宿舍裏。北大的學生宿舍樓有49棟。它們位於地圖的右下角。從28號樓到43號樓住的是本科生，其中每個房間住六至八人。在1988年，這些舍樓總共住了9,271名學生。從45號樓到48號樓是碩士研究生的宿舍樓，而博士研究生則住在25和26號樓。碩士生為四人一間，博士生為兩人一間。1988年這幾幢樓共住有2,893名學生。另外，16號樓到24號樓是給單身的青年教師安排的。其餘的宿舍則是給留學生和短期培訓的特殊學生安排的。圖8.2是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宿舍樓的外觀。

¹⁵ Du Ruiping (1992) .

¹⁶ 張劍、周玉玲(音譯) (1989) 。

¹⁷ 《中國教育統計年鑒》(1989)；《中國高等教育大全》(1989) 。

圖8.1 北京大學地圖，可見學生在校園生態環境的集散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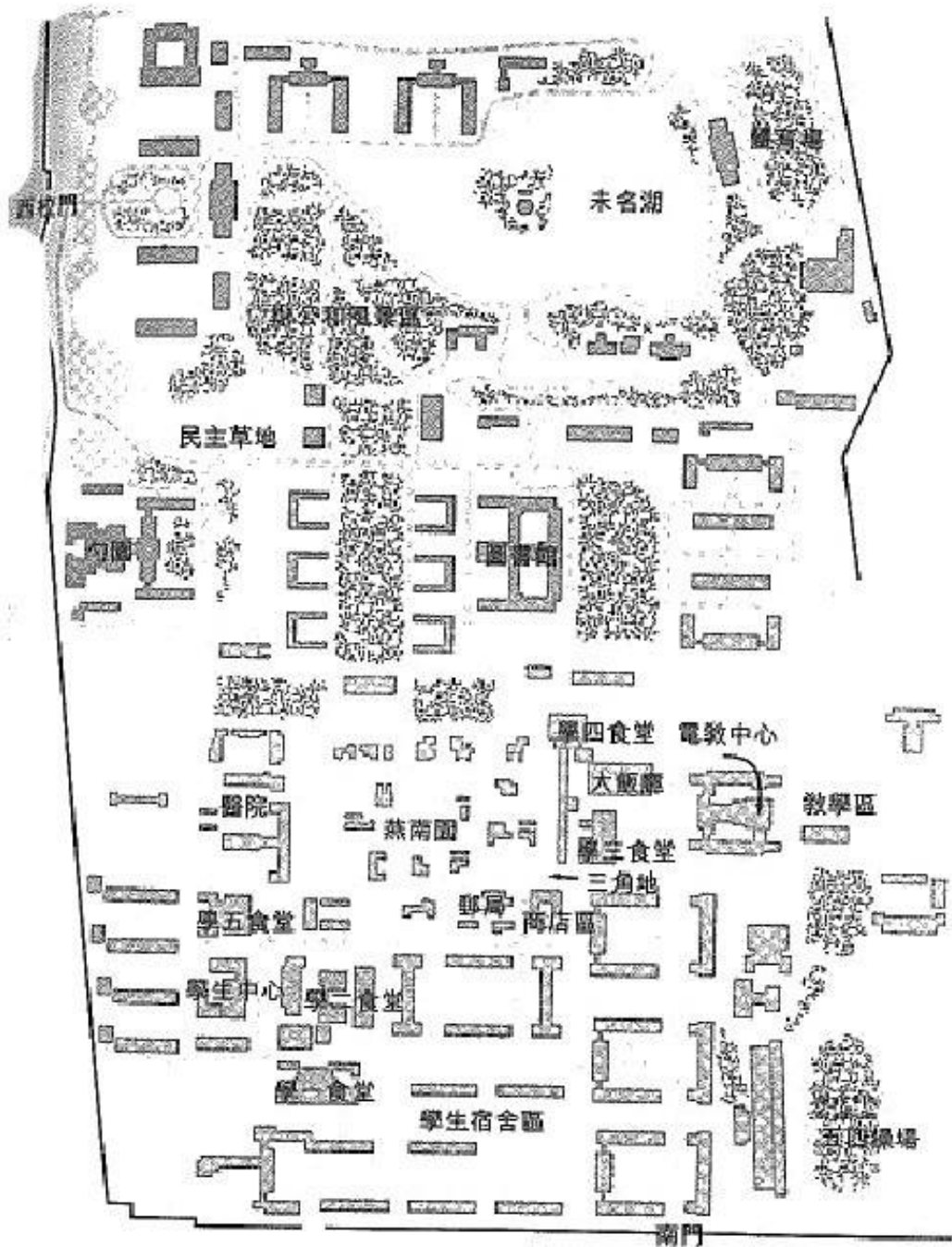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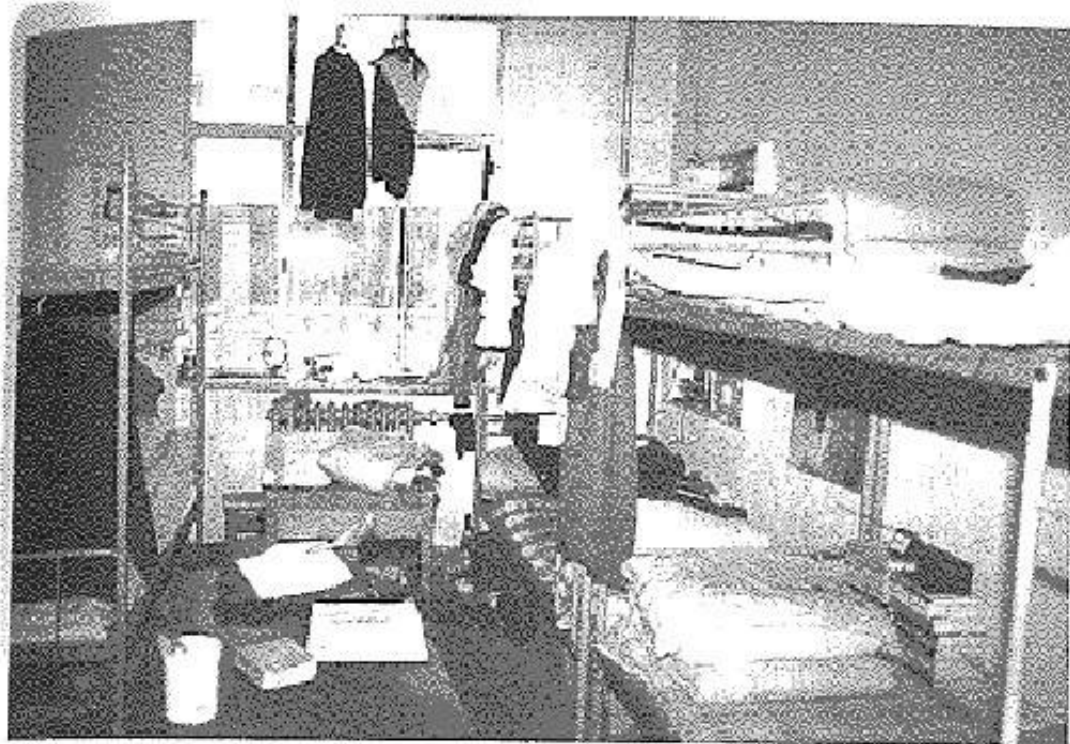
圖8.2 北京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宿舍樓。(趙鼎新攝)



學生的校園生活

一位受訪者告訴我，在80年代後期，北大(其他大學也是如此)學生用於學習的時間並不多。許多學生，尤其是男生，都是在上午第一節課快開始前才起床，然後不吃早飯就去上課。對那些人文社科專業的學生來說，逃課是非常普遍的；至於那些政治教育課，逃課的人則更多(詳見第三章)；北大第一節課早上8時開始，但有些學生直到10時才起床。他們上午的課一般都不去，有些人甚至在12時吃午飯前一直待在宿舍；午休是非常普遍的。對勤奮的學生而言，他們一般下午2時就起來了，但其他人可能睡到3時或4時。晚飯在5時開始。晚飯之後，活動就各種各樣了。有的去圖書館或去聽講座，有的去跳舞或者看電影，有的和男(女)朋友外出，還有的乾脆呆在宿舍裏聊天、打牌或者打麻將。大部分學生10時回寢室了。晚上熄燈是在11時。熄燈後的閑聊是非常普遍的消遣，學生們稱之為「臥談會」，這樣的「臥談會」有時會持續到凌晨2時。

圖8.3. 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生宿舍內部。(趙鼎新攝)



有些學生把宿舍、教室和食堂形容為生活中的「鐵三角」。據調查，中國學生一天之中花在宿舍的時間超過所有其他活動時間的總和。¹⁸ 圖8.3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典型本科生宿舍的內部。

校園生態環境和運動動員模式

在訪談中，我發現北京的校園生態環境便利了異見思想以及與運動有關的信息在校內的傳播。這種校園環境把學生集中在許多以宿舍為單位的網絡中，使他們能夠大量參與運動，促進了不同學校學生在運動中的相互競爭，還支撐了許多以生態環境為依託的集群行動策略。在這一節，我將依次談到這些問題。在下一節我會通過對4·27大

¹⁸ 徐昌華、劉平(音譯)(1985)。

遊行的個案研究來展示，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動員機制是如何在八九學運最重要的一次事件中發揮作用的。¹⁹

異見思潮與學運消息的傳播

北京的大部分大學生都住在能容納六至八人的宿舍裏，相鄰宿舍的一般都是同班同學。男女生通常是分樓居住的。一幢樓裏有好幾百個學生，一片宿舍區甚至能容納上萬人。許多受訪者都說，通常，他們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在宿舍裏閑聊。儘管政治和對政治的不滿不是唯一的話題，但在當時社會、經濟形勢惡化的背景下，它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話題。我在第四章也曾提及，80年代後期學校對學生的政治控制逐漸放鬆以後，宿舍已經成為一個散布異端意識形態的主要場所。

海澱區的大環境也推動了「異見性」觀念的傳播。在海澱區，大部分學校之間相隔不過半小時自行車的路程，校際交流極為容易。八九之前，一些著名的異見分子和自由派知識分子常常應邀到各大學講演。如果演講者的名氣很大的話，其他學校的學生也會騎車前往。運動剛開始時，許多積極分子的首要活動就是去其他大學（尤其是一些名牌學校）看看那裏發生了甚麼事，去那裏看大字報、聽演講，也建立聯繫。可以說，從一開始，校園的這種便利環境就使一場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發的運動顯得有備而來似的。

懲罰搭便車者

八九學運期間，學生遊行往往是以學院、班級或專業為單位的。學者們通常將這一現象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體現，認為它象徵對團結、忠誠和友愛的崇尚。²⁰ 但是，用集體文化來解釋集體團結無異

¹⁹ 下面，我把學生的高度同質性對運動的影響當作一個已經確定的事實，並把重心放在討論關於北京高校的佈局是如何影響學生的密度、分佈、空間運動，以及這些因素又是如何決定學生運動的動員方式的。

²⁰ Calhoun (1994, 170) .

於同義反復；更重要的是，它忽視了這種團結內部的結構基礎，從而錯誤地認為所有參與運動的學生都懷有同樣的動機。在研究中我發現，學生們在遊行時不僅會以學院、班級和專業為單位，還會以宿舍為單位。這種以宿舍為單位的形式，不僅是出於某種集體意識，更是由於校園環境以及以宿舍為基礎的學生網絡構成了學生之間相互影響、游說甚至威脅的基礎。

這裏的關鍵是校園裏，尤其在宿舍般密集的生活環境。六到八個人在一起住四年，意味每個學生都被迫參加了一次阿克塞爾羅德 (Axelrod) 遊戲。在這種遊戲規則下，合作是最優策略，²¹ 因此，一旦大多數學生都認為參與運動是正義的行為，那麼對於那些一開始就不想參與的學生來說，想不參加都難。在接受訪談的56名學生中，有14人曾提到，那些積極參加運動的人在宿舍裏對那些不夠積極的人進行公開的攻擊。同一宿舍或相鄰宿舍的學生也常常相互監督大家在運動中的行為。一位學生說：

幾次遊行以後，所有的學生都加入了運動。沒有去的學生會感到孤立和敵視。比如，政府要求我們復課的時候，只有一個學生去上課了。後來，大家都指責他是叛徒。(第4號)

另一位學生還講述了4月26日晚上發生在他宿舍的一幕，其結果是迫使他也參加了4·27遊行：

[4·26社論播出的時候]宿舍裏的同學都非常憤怒。許多人決定去遊行。他們問我去不去，我說不想去……他們都快要氣瘋了……他們怒不可遏地同我爭吵。我忍無可忍，心想，大家同學一場，你們憑甚麼這麼對我說話？……我們宿舍有個黨員也

²¹ 用博弈論的話來說，這是一個由一小部分人進行長期反復遊戲的囚徒困境模型。就像Axelrod (1984) 的分析已經證明的那樣，只要在同一個遊戲中兩個成員之間能重複地相遇，從長期來看，合作就會成為這兩個成員的唯一最優選擇。換句話說，在此時引入中國文化實在沒有甚麼必要，因為友愛或團結至多只能充當阿克塞爾羅德遊戲的出發點，即促進合作行為更快地轉化為一種優勢行為。

不想去……他告訴我們說，他們剛剛開了會，會上傳達消息說，第二天街上會有很多警察。他要求其他學生也別去……結果大家把氣都撒在他身上。(第42號)

由於宿舍樓裏學生很多，學生之間的相互指責與施壓有時候會超出宿舍的範圍。比如，費貢 (Lee Feigon) 曾提到，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托福班老師被他的朋友指控為賣國賊，主要原因是罷課期間他還在為托福輔導班的學生講課。²² 不過，最生動的要數下面這位受訪者 (第62號) 的描述了：

整個運動期間，有一件事情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法律系的好幾個八九級研究生對運動根本上心，他們幾乎每天都在宿舍裏打麻將。這件事我是從46樓前面的海報欄裏知道的。海報是這樣寫的：「絕食以來，5樓的幾個混混對運動毫不關心，喪盡天良。他們閉門不出，日日麻將。我們對這樣的行為極為厭惡。」……我還記得一張大字報裏有這麼一句話：「其他同學在絕食，你們這些紅鼻子、黑心腸的傢伙竟然在打麻將。小心你們的狗鼻子。」

不過，大部分學生之間的相互施壓則顯得更為微妙。當我問起「你是如何看待不參加運動的學生的？」一個較有代表性的回答是：「無所謂。這些人平時就不和同學來往，沒有人會關注他們的行為。」(第37號受訪者) 換句話說，不參與運動的學生往往會被看成是跟周圍的人不一樣的人。顯然，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生活環境，才造成學生之間的相互監督，從而有效地造就了北京學生在八九學運中的高參與率。

校際競爭

北京的67所高校大部分都是毗連而居。位置的鄰近促進了各校學生之間的相互模仿和競爭，這同樣促進了學生對運動的積極參與。²³

²² Feigon (1990, 148).

²³ 當國家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衰落之後，一些學生將參加學運看成是一種榮耀，並且將一個學校的學生加入學運的程度與所在學校的聲望等同起來，這同樣鼓勵了校際競爭。

在訪談中，我發現，一些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對自己的學校成為4·27大遊行中的領頭羊而倍感驕傲，而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也為自己作為一個小學校卻在運動期間贏得許多「第一」而備感自豪：

後來我算了一下，我們學校共贏得了13項「第一」。我們是第一個上街遊行的，又是第一個罷課的學校。高自聯的第一任主席也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對話代表團的總部也設在我們學校，此外還有很多……我們很自豪。這樣，我們學校的名氣也大了。
(第59號受訪者)

至於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們在談起八九時，當仁不讓地認為自己是整個運動的領袖。他們最響的口號是：「只要北大還醒着，中華民族就不會睡去。」(第51號受訪者) 中國政法大學的一個學生是這樣評價北大的：

4月17日，我們學校上街遊行的時候，北大學生當晚就衝向了天安門……北大的學生總是覺得他們與眾不同。5月初，當他們感到有可能失去對運動的領導權時，他們就開始了絕食。(第60號受訪者)

對於這些評論，我們也許不能從字眼上去過分校真。不過，它們確實揭示了八九期間激烈的校際競爭。而正是高校的大量集中才使各高校學生之間的這種相互競爭變得如此廣泛、瞬時和有效。

環境制約運動動員策略的發展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闡述了校園的生態環境是如何有助於運動期間的學生動員的。離開校園生態環境，就無法合理地解釋八九期間的學生動員模式。在這個層面上，我的分析仍集中在校園環境是怎樣作為一種基礎，促進學生之間的認同感的形成的。這種分析方法並沒有跳出資源動員理論，尤其是顧爾德(Roger V. Gould)對巴黎公社的動員過程的分析框架。²⁴不過，接下來我要討論一些對運動動員同樣重要、但與學生關係網絡並沒有確切關聯的一些發現。

²⁴ Roger V. Gould (1991; 1993; 1995).

北京大部分高校的空間佈局彼此類似，學生在校園裏的日常生活和作息活動也差不多。這種佈局在八九期間有助於許多依托於生態環境的學生動員策略的形成。比如，在所有大學，大字報和海報都集中張貼在專門的地方，運動動員活動也只在特定的地方開展。這些地方往往是一些與學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地方。北京大學著名的三角地、中國人民大學的第三食堂、清華大學的第十食堂，就是這樣的地方。譬如，三角地位於宿舍、圖書館、教室與好幾個食堂之間（見圖 8.1），郵局、書店和其他一些商店也都在附近，學生只要去教室、圖書館、食堂、郵局，或者回宿舍，一般都得經過三角地。

八九期間最重要的學生組織是高自聯，但事實上這個組織勢力單薄，既沒有歷史淵源，也沒有群眾基礎（詳見第六章）。然而，它卻能夠組織起好幾次大規模的遊行來對抗國家。原因何在？除我們前面提到的宿舍因素之外，校園的佈局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比如在北京大學，學生積極分子如果想組織一次遊行，他們只要「在三角地貼上幾張海報，寫下集合的時間和地點、遊行的目的、所用的標語口號等等，到時帶着學生出發就可以了。」（第69號受訪者）如果人數不足，學運積極分子通常會帶領學生在校內先繞上幾圈。我在研究中發現，上街遊行之前先選擇校內遊行是北京學生用來提高學生動員效果的常用手段；這也是以生態環境為依托的運動策略的一個例子。例如，1989年4月17日晚上，有好幾百個學生在北大三角地附近轉悠，他們或是看大字報或是發表演講。正在這時，一些剛從城裏回來的學生傳來消息說政法大學的學生已經上街了。聽到這一消息，在三角地的學生立刻變得非常激動，想馬上去天安門廣場遊行，但他們的號召僅得到大約200名學生的響應。於是，他們帶着隊伍首先跑到宿舍區，在那裏大聲喊叫喧嘩，吸引越來越多的學生從宿舍裏跑出來；遊行隊伍的規模隨之從幾百壯大到五六千，最後他們才走出校園。於是就發生了北京大學在八九期間的第一次遊行。

如果我們用網絡和相應形成的集體認同感來解釋以上這種動員過程的話，這種解釋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立呢？如果採用網絡分析的解釋框架，那麼最接近事實的解釋應該是這樣的：在八九學運期間，北京大學存在着兩種類型的網絡：一種是以積極分子為基礎的學生運

另一種是在結構上類似的、以宿舍為基礎的朋友網。這兩種關係網的內部聯繫都很強。在每個以宿舍為單位的關係網中，有一些學生可能很早就接受了異見思想，因而對運動抱有同情；一旦他們看到外面的遊行隊伍，就會馬上勸說甚至強制室友加入。校園環境的重要性主要表現為它把社會運動的網絡與以宿舍為單位的朋友網絡聯結了起來。如果有學者一心想把運動的動員過程想像為一個網絡過程的話，那就會把生態環境在學運積極分子與大學宿舍網絡之間所起的聯結作用看作是網絡學中的「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²⁵ 或者弱關係(weak ties)。²⁶

以上的假設性解釋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即使是像北京大學規模這大的學校，我們仍可以說每個學生或是通過朋友關係，或是通過其結構關係相聯而同處於一個關係網之中。但這種解釋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我們很難把在一個地方大喊大叫的信息傳遞方式看作是以社會網絡為基礎的，我們一般將「社會網絡」界定為由綫(社會關係)連起來的一系列點(社會行動者)。²⁷ 為了確保社會學的網絡分析更有義，通常這些綫被用以指代那些相對穩定的、在研究之前就較為確的社會關係。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把社會網絡內部的信息和物資交流也看作是專屬於此網絡的成員才有資格和可能享受的特權。²⁸ 說，半夜打雷同時驚醒了不少毗鄰而居的人，我們不能說這些人通過社會關係網而得知打雷的；可是，一個人如果沒有被雷聲驚醒直到有朋友告訴他後他才知道半夜曾打過雷，那麼我們才可以放說，這個人是通過社會關係網獲取這一信息的。²⁹ 顯然，在外面遊行的學生是把所有呆在宿舍裏的人，而不是某個特殊的人群作為目的；換句話說，遊行的消息不是通過既有的關係網絡傳播的，而是

²⁵ Burt (1992).

²⁶ Granovetter (1973).

²⁷ 見Laumann and Pappi (1976) 或Wasserman and Faust (1997) 的類似定義。

²⁸ Laumann and Pappi (1976); Laumann and Knoke (1987, 12-13).

²⁹ 在現實中，區別並不總是那麼清晰。一條通常的法則是，這些關節點之間的聯繫越特殊，也就越有可能從這些聯繫中做出有意義的社會學分析。

通過自然而然的直接接觸所傳播的。這樣的信息傳遞既是散漫，又欠特殊。如果我們認為這種信息傳播方式也是一種以網絡關係為基礎的傳播方式的話，那麼網絡分析就失去了應有的效力和意義。

其次，網絡關係不僅為運動動員提供一種溝通媒介，而且應該激發某種早已存在的團結或認同感。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認為那天晚上學生們是通過網絡關係被動員起來的，那麼那天晚上走出宿舍的學生可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出於團結感，另一類則是接受了室友的勸說或強制。事實卻不是這樣：當時還不過是4月17號，胡耀邦才逝世兩天，正如我在第六章中已經強調的那樣，當時北京的大部分學生還沒有在政治上被動員起來。儘管有些學生確實是出於某種激憤或集體感而參加了當晚的遊行，大多數加入遊行的人並沒有明確的政治動因。我的一位受訪者(第63號)告訴我，當時有超過一半的學生是穿着拖鞋從宿舍出來加入遊行隊伍的，他們在遠沒到達天安門廣場之前就紛紛走散了。這位受訪者和他的朋友一直跟着遊行隊伍，但他們也不過想去「看看熱鬧」。³⁰總之，沒有明確的跡象表明當晚學生之間發生過相互勸說或強制的行為。因此，我也無法從所獲得的材料中硬拼湊一個以共同的不滿、共同的身分認同，或以網絡關係為基礎的動員過程。

那麼，我先前討論過的室友之間的勸說和強制又算是甚麼呢？這裏有一個分界點：大部分學生在運動開始時只扮演一個對運動抱有同情的旁觀者角色，在這時他們對室友是否加入運動並不在意。然而，當政府對學運作出某種反應，而這種反應被大多數學生認為極不合理時，學生們就開始在宿舍裏發泄怨氣，一些比較熱心的同學就開始勸說甚至強制那些比較消極的學生，要求他們加入抗議活動。³¹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學生對4·26社論的反應就是這樣一個例子。

4·27遊行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將運動定性為「有計劃的陰謀和反

³⁰ 當他們到達天安門廣場時，遊行的規模只有2,000人左右，其中包括沿途加入進來的其他院校的學生。

³¹ 這裏所作的區分和Tilly (1978, 7) 關於防禦型與進攻型動員的區分有相似之處。

政府的動亂) (見第七章)。社論在4月25日的晚間新聞中播出。學生對社論中所使用的陳腐的極左語言非常反感，於是決定在4月27日舉行一場反社論的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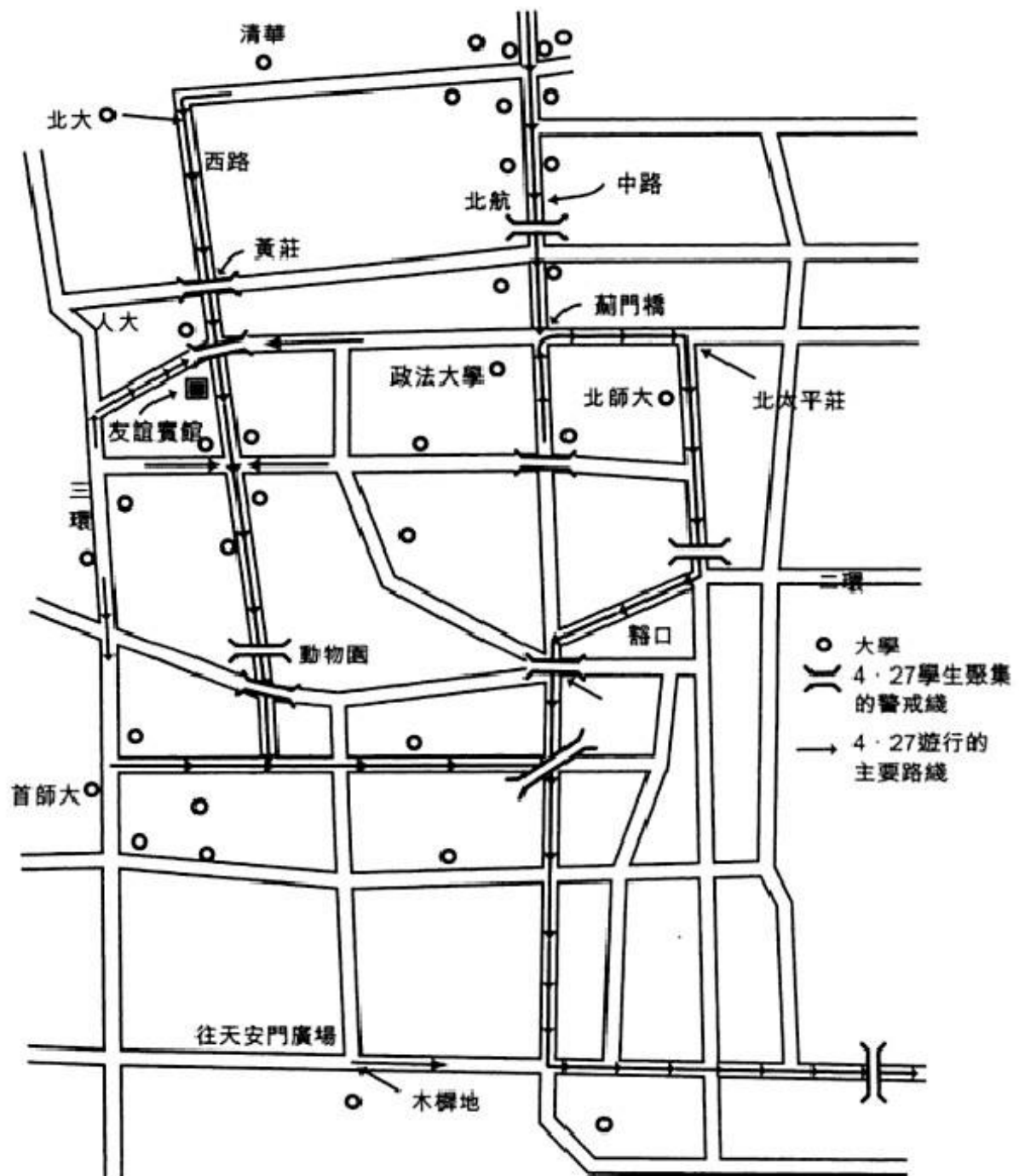
這裏，我想用4月27日的學生遊行作為案例來闡述校園生態環境在學生動員過程中的重要性。4·27遊行無疑是八九學運期間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是自中國共產黨上台以來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的反政府行為。遊行的成功在很多方面影響了運動隨後的進程，最終導致運動的失敗。同樣重要的是，遊行前很多學生認為這次遊行是一次極端危險的行為，甚至比6月3日晚上軍事鎮壓開始之前大家所感覺到的還要危險；一些學生在參加遊行之前甚至寫下了遺書。雖然遊行未遭鎮壓，但政府的確設立了很多警戒綫試圖阻止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我們可以從圖8.4中看到遊行隊伍遭遇的一些主要的警戒綫)。政府力量的無所不在以及所感受到的危險促使學生利用所有可能的資源以確保遊行成功，包括環境條件。

聽到社論和遊行的消息以後，學生和學運積極分子們紛紛聚集在宿舍裏表達他們的憤怒，並討論下一步行動計劃。絕大多數人都預感到會有一次殘酷的鎮壓，但不少人仍然堅持參加遊行——一種極強烈的不公正感覺使學生們無法屈從於威脅；然而，大部分學生還是非常擔心的。除了我前面曾提到的強制以外，一些比較堅定的學生還不斷用各種方式為那些較為膽小的學生鼓氣。一位學生(第59號受訪者)回憶到：

我的好幾個室友都非常擔心他們在第二天遊行中的下場。我不得不去安慰他們。他們說我說的很有說服力，並且說我應該向其他同學講述我的觀點。他們建議我使用樓長屋裏的傳呼器。通常，如果哪位同學有電話來的話，樓長就會用傳呼器要他下來接電話……我們打開了所有的開關，這樣每間宿舍的同學都可以聽到，而外面的人卻一無所知。

同時，很多學校的學生自治聯合會的廣播站也不斷地播放學生積極分子、青年教師以及著名異見分子的講話。4月26日一整天，北京大學的三角地擠滿了人，大家演講、喊口號、唱歌，情緒不斷高漲。

圖8.4 4·27遊行的警戒綫，以及學生示威的西路和中路



遊行隊伍分三路向天安門進發：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清華大學、北方交通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及其他一些高校的學生走的是西路，「八大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走的是中路，同時也有少許學校走了東路。³²

但學生遊行隊伍沒有直接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而是迂迴前進。下面我將以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為例說明學生是為甚麼，又是如何採取迂回路綫的。與此同時，我將說明學校環境是如何在這次遊行動員中發揮影響的。

4月27日早晨，一些學生在中國人民大學聚集，其中許多人來自北京農業大學。在巨大的壓力下，沒有人敢按原計劃出校園遊行。有一位受訪者(第39號)甚至看見一個學生領袖拿着一個紅色的麥克風宣布遊行取消了，但大部分學生並未就此離開。過了許久，有學生建議在校內遊行，得到很多人響應。他們在校內轉了五六圈之後，越來越多的人受到吸引而加入遊行隊伍。隊伍一直行進，學生們也不斷高呼口號，變得越來越激動，膽子也得越來越大。最後，他們群情激昂，衝出了東校門；但在出校門之後，他們沒有直接去天安門。由於害怕與在友誼賓館十字路口嚴陣以待的警察發生正面衝突，學生們朝着與天安門廣場相反的方向推進，希望能與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學生會合。

在那天的遊行中，許多聯絡人(大部分是男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聯絡人不斷向遊行隊伍通報警察的位置和人數，以及其他學校的動態。其中有些聯絡人是由運動積極分子指派的，而更多的則是那些騎著自行車跑來跑去想看熱鬧的學生，他們一邊走一邊散布消息。因此，當中國人民大學的遊行隊伍跨出校門時，馬上就有一些聯絡人騎車飛奔到北京大學，他們在校門口大呼：「人大的學生已經上街了，你們還在等甚麼？」於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也衝出了校門。

在黃莊路口有一條警戒綫。但由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分別從兩邊衝過來，警戒綫被包圍在中間而變得毫無意義，很快就被衝垮了。然後，兩邊的學生匯合在一起，掉頭又向友誼

³² 武仁(1990b)。

賓館路口進發。這時，來自北方交通大學和其他學校的學生已經到達友誼賓館路口南側，只是還不敢去衝擊警戒綫。現在有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隊伍殿後，以中國人民大學為首的、包括許多其他學校的學生在內的遊行隊伍，從另一側輕而易舉地衝破了友誼賓館路口的警戒綫。

友誼賓館路口警戒綫的突破對西路和中路的學生來說都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此後，旁觀的學生紛紛加入。³³ 聯絡人到處向各個學校的學生散布消息，遊行隊伍的規模急劇擴大。一位受訪者(第70號)生動地描繪了當時發生在友誼賓館十字路口的情景：

當人大的學生走到警戒綫前面時，他們不敢繼續前進了。他們讓北大的學生先行。但是北大的學生也不願意為先……這時，一些自告奮勇的組織者從外面加入進來，要求參加遊行的人們排好隊，保持秩序等等。當十字路口聚集了越來越多人的時候，站在外面的人不斷喊道：「上……上……大家一起上！」最後，人大的學生開始往前移動。接近警戒綫時，學生對警察大談憲法權利。警察絲毫沒有反應，學生就開始往前衝。警戒綫很快就崩潰了。目睹這一幕，來自不同學校的學運積極分子和學生衝回他們自己的學校去，鼓動他們的同學。我聽到一個北京工業大學的學生說，我們今天沒面子了，並飛快地跑回他的學校去召集學生。³⁴ 那些被召集來的各校學生等在不同的十字路口。示威遊行的隊伍變得越來越壯大。

那天早晨許多學生騎着自行車在學校之間來回轉悠，他們在路上散佈消息，有意無意地扮演了運動協調者的角色。我的一位受訪者(第57號)就是這樣一位聯絡人：

³³ 學生運動在各邊均被警戒綫自市民分隔開來。詳見下一章有關為甚麼採取這種策略的討論部份。

³⁴ 學生在這裏指他的大學沒面子，是由於那所大學的學生認為太危險而沒有參與友誼賓館的事件。詳見本章前半有關大學之間的競爭的分析。

我一覺醒來就發現首師大的學生已經在操場上遊行了。我想知道人大的情況怎麼樣，於是我騎車去了那裏。我到人大的時候，他們的學生已經去和北大的學生匯合了。於是我就追了過去。當我遇到人大的學生時，他們已經匯合了北大的學生，開始往回走了。這樣，我就騎回了友誼賓館路口在那兒等着。那裏的警戒綫已攔住了北方交大的學生。當大部隊抵達時警戒綫時，兩端的學生齊心協力很快衝垮了警戒綫……學生們把警察推到一邊，我又騎回首師大看看他們那兒怎麼樣了。回去後，我看見很多人坐在學校外面的人行道上。我對他們說：快往車公莊方向去，其他學校的同學快到了。

中國政法大學走的是中路。剛開始校領導攔在學校門口不讓學生出去，說出去太危險了。他們要求學生出於安全的考慮就在校內活動，校長甚至懇求學生不要參加這次示威遊行；面對這樣一位深受尊敬的老校長，大部分學生猶豫了。正在這時，一些出去打探消息的學生回來了，他們在校門外高叫：北航的學生已經衝破了一條警戒綫，正往他們學校方向趕來。政法大學的學生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們推開校長和其他前來勸阻的教師，衝出校園，向天安門方向走去。與此同時，在遊行隊伍外圍形成了糾察隊。被糾察隊圍在裏面的學生只有二百多人。連同追隨者，整個遊行隊伍不超過六七百人。

當最後到達明光村路口的時候，一條警戒綫攔住他們。他們不敢再往前走，於是向北撤退到北京郵電大學。一個學生(第60號受訪者)回憶說：

我們到了北郵，就在外面大叫。我看見北郵的一些老師攔着學生不讓出來。許多學生在宿舍的窗口向我們揮手。我們叫道：「下來！下來！」接着，越來越多的學生翻牆出來。最後，北郵的學生也衝出了校門。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政法大學的學生陸續從學校趕來，站在糾察隊外面的學生也不斷加入進來。遊行隊伍裏的學生增加到七八百人。一些位於政法大學南面的學校，比如中央財經大學的學生，也紛

紛加入，隨着隊伍繼續向北前進。在蕪門橋附近，他們遇到來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和一些其他學校的學生。上文提到的那位受訪者回憶說，兩支隊伍合併後，整個隊伍已是一眼看不到頭了。他們一行向東到達北太平莊路口，折向南行，遇到來自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

在整個過程中，聯絡人不斷把西綫的消息告訴他們，因為西路的遊行隊伍裏有幾個全市最有名的學校。當中路的學生到達北京師範大學時，傳來了西路遊行隊伍已突破友誼賓館前的警戒綫的消息。中路的學生為此歡呼雀躍，決定加入西路隊伍。各路學生於是向西南方向挺進，衝破新街口豁口的警戒綫，最終在西直門立交橋與西路隊伍會合。

這個兩支遊行隊伍會師的場面讓一些當時的目擊者終身難忘。當時，所有的路口都擠滿了學生和北京市民。站在西直門立交橋上四處放眼望去，所有方向全都望不到遊行隊伍的盡頭。一位著名的學生領袖（第69號受訪者）激動地告訴我，在他有生之年，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壯觀的場面。這時候，大部分學生已經不再考慮個人安危了。當最終衝破設在六部口的最後一條警戒綫，進入天安門廣場時，他們才意識到政府已經被徹底擊敗了。在回來的路上，他們放聲歌唱，痛快淋漓。許多學生是走着回去的，到達學校時已經是半夜了。他們已經走了將近20個小時。

究竟甚麼原因導致了4·27遊行的勝利？群眾的不滿和政治的壓制的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可是，宿舍內部的情況、校園環境以及學生對依托於生態環境的動員策略的成功運用都是至關重要的。通常來說，學生們不會直接衝出校園；如果他們這麼做，反而不會有太多的學生追隨，因為那時人群的規模還不夠大，還沒有那麼激動，還有很多顧慮。因此，他們會首先在校園內遊行。通過遊行和叫喊，他們不僅吸引到越來越多的學生，而且營造出一種群情激憤的氛圍。最後，當積聚起足夠的勇氣以後，他們才會衝出校園。

雖然出門時義憤填膺，但上街以後，學生們仍然非常恐懼。因此，當自覺還不夠強大的時候，他們會盡量避免和警察發生衝突。他們會盡量繞開警戒綫，以吸納更多的其他學校的學生。由於海澱區高度密集的大學佈局，學生的這種遊行策略肯定能夠成功。因此，當不

當對警察的警戒綫時，來自四面八方的遊行學生已經把渺小的警察力量團團包圍，使之徹底地失去了效用。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大學之間的即時互動對這次遊行的成功也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沒有聯絡人散布消息說其他學校的學生已經開始在街頭上行動了，許多學校的學生根本就不會上街遊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其他學校學生的加入，許多已經走上街頭的學生也不會走得太遠。正是校園內部以及整個海澱高校區的地理環境使這些依托於生態環境的動員策略發揮到了極致。

與以生態環境為基礎的運動動員 有關的其他問題

我在撰寫這一章時，一些同事和朋友對我的分析角度提出質疑，其中有些問題非常重要，也值得注意。我們都知道海澱高校區是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為甚麼同樣的地理格局在毛澤東時代卻沒有引發類似規模的學生運動呢？³⁵關於這一點，我認為其中的關鍵在於學校內部學生控制體系在80年代的削弱。我在第四章曾談到，毛澤東時代的許多學生往往會向學校領導打小報告，告發那些曾對現實表示不滿的同學。當時他們之所以能夠做出這些從今天的角度看來是「傷天害理」的事情，是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對共產主義抱有真正的信仰，因而認為自己這麼做完全是道德的。而且，當時國家對學生實行統一分配，學生在政治上表現越積極（包括監督其他同學的政治行為），畢業後所分配的工作一般就越好。在這種情況下，學生居住環境的高度密集以及校園的一些其他空間特徵，實際上使政府能更有力地控制學生。但在改革開放以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急劇衰落了；與此同時，體制外的就業渠道也逐漸開放。那種出於政治原因在背後打小報告的做法於是變得既不道德，也無利可圖；這樣，一度有利於控制學生的校園環境反而在學運的動員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³⁵ 由於60年代紅衛兵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得到國家支持的，所以我把它排除在討論之外。

一些強調資源動員的重要性的學者也看到人口密度、人口同質性及其空間分佈對社會運動動員所具有的重要性。³⁶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曾提到，大量工人集中於少數幾家工廠將有利於提高無產階級的政治能力。³⁷ 但是，我在這裏對生態環境重要性的強調卻別有深意。首先，儘管資源動員論的學者之間存在某些重大分歧，但資源動員理論的一個核心論點是，只有當人群的密度和同質性增強了集體凝聚力的時候，它才對社會運動的動員有意義。這一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這個理論想要說明的是，如果人群不過像馬克思所描述的19世紀的法國農民那樣是「一袋馬鈴薯」，那麼，一個高密度的和同質性的人群也不會產生很強的社會運動動員能力。³⁸

我並非有意低估組織和網絡在運動動員過程中的重要性；我在這裏只是想說明，大學的佈局設計、與之相應的人口密度及分佈，以及人群在這一空間內規律性的活動方式，對校內學生網絡的形成十分重要。如果沒有對校園生態環境的深刻認識，我們恐怕很難理解這種重要性。這非常接近於齊美爾 (Georg Simmel) 的洞見，即：如果圍繞着某個靜止的建築物形成了一組特定的社會關係，那麼前者將在人們的互動中充當至關重要的、具有社會意義的樞紐。³⁹ 齊美爾的這個觀點曾廣泛地應用於城市學⁴⁰、人文地理學⁴¹、小團體生態學⁴² 和環境心理

³⁶ 參考Tilly (1976, 1978) 及Tilly and Schweitzer (1982)。

³⁷ Marx (1985a, 227-28)。

³⁸ Marx (1985a, 227-28)。

³⁹ Spykman (1964, ch. 4)。

⁴⁰ Beckham (1973); Burgess (1925); Duncan and Duncan (1955); Fischer (1977); Krupat (1985); McKenzie (1924); Park (1915, 1936); Warner (1963)。

⁴¹ Garling and Evans (1991); Gold (1980); Gollege and Timmermans (1988); Werlen (1993)。

⁴² 見Baldassare (1975, 1977); Case (1981); Festinger, Schachter, and Back (1950); 及Sommer (1967, 1969)。Festinger, Schachter, and Back (1950) 的著作尤其有趣，他們現人們傾向與毗鄰的人交朋友，而且，房屋計劃的設計施比如郵箱和樓梯的位置、大廈內住宅單位的位置，以及單位大門的面向施都會決定人們日常的空間活動、交友和社區內的組織形成模式。

學⁴³的研究。然而，除少數幾個研究之外，⁴⁴這一觀點至今還沒有被用來分析城市生態環境在大規模社會運動中所起的作用。

其次，我還想說明，依託於生態環境的社會運動動員過程不能完全化約為網絡和組織。遊行的迂迴路綫、學生張貼大字報和做演講的地點，以及校區內的遊行形式，在更大程度上都是與校園環境以及整個海澱區高校的空間分佈狀況密切相關的。完全從網絡和集體團結或認同感出發來解釋這些運動動員策略，不僅會模糊我們對一些表面類似、但實際相去甚遠的動員過程之間所存在的差異的感知，而且會誤以為任何一種社會關係都是網絡關係，從而認為所有的信息傳播都是以網絡溝通為基礎的。⁴⁵

我們已經看到，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同一人群因為所處的空間安排不同，會表現出不同的社會運動動員潛力。現在的問題是，除了講述一個令人信服的故事之外，我們怎樣才能判定八九期間的校園生態環境確實對學生運動的動員過程產生了重要影響呢？儘管這只是一項個案研究，但我在研究中收集到的材料可以提供一些比較性結果。首先，80年代北京的學生運動有兩種穩定的模式：外地學生的參

⁴³ Barker (1968) ; Loo (1972) ; Osmond (1957) ; Saegert and Winkel (1990) ; Schoggen (1989) .

⁴⁴ 例如Roger V. Gould (1995) 及Tilly and Schweitzer (1982) 。

⁴⁵ Roger V. Gould (1991, 1995) 當中一系列的論著，提及由於奧斯曼 (Baron Georges Eugene Haussmann) 的計劃使巴黎新的住宅區不再以階級劃分，最終使巴黎公社的動員基礎不再出於勞動階層的自動，而變成跟1848年6月的起義一樣由鄰舍的團結精神建立起來。我的研究跟顧爾德的相似，大家對人們的空間佈置如何影響社會活動的動員，但各有不同的重點。顧氏注重奧斯曼房屋計劃中宏觀設計的因素對社會活動動員的影響，我則鑽研生態環境對大學區以至校園及宿舍各層次的影響；此外，顧氏傾向以網絡解釋依託於生態環境的社會結構，這跟「群體凝聚的力量」(group solidarity) 有莫大關聯，我的策略則以生態環境解釋動員的情況，並顯示了八九學運期間動員不單得力於依託於生態環境的學生網絡，並直接受惠於校園本身的生態環境。

與率比本地學生要高，本科生的參與率又比研究生要高。⁴⁶ 我們可以從不同方面對此做出解釋，但這裏我想從不同生源的空間位置予以說明：許多北京的學生在4月22日罷課後就回家了，所以參加運動的機會不如那些還滯留在宿舍裏的同學。另外，研究生宿舍一般只住二至四人，而且有些人因已經結婚而住在校外，實際上的入住人數比官方統計的要低，因此，在這樣的宿舍裏，很難出現多數人對少數人構成壓力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我還發現，如果一個學校有兩個校區，一個在海澱區內，一個在海澱區外，那麼在海澱區外的那個校區的學生學運參與率就相對較低。北京師範大學的情況就是這樣。一個學生對我說：「我第一年是在北海校區度過的，我們沒有參加罷課，也很少遊行，我們不太回本部，也不知道那裏究竟發生了甚麼。」(第33號受訪者) 換句話說，人必須置身於特定的社會運動環境才會參加一個運動。這個例子是一個其他變量得到很好控制的案例。因為，如果同一所大學的學生參與程度在兩個不同的空間裏是如此的不同，那麼，很難想像除了校園的空間位置以外，還有哪些因素產生了影響。

結 論

在80年代後期的中國，不受國家控制的中間組織仍然是非法的，傳播「異見性」觀念的社會網絡也非常有限。因此，八九學運的組織資源十分匱乏。然而，八九學運仍成功地實現了學生動員。針對這一問題，本章着重討論了校園生態環境在學運學生動員中的作用(特別是在早期運動中所起的作用)。

本章指出，北京的大學佈局在毛澤東時代已基本上奠定了。到80年代後期，北京擁有67所高校，大部分都分佈在海澱區。每個學校內部被分割為學生生活區、教學區、娛樂區、商業區等，大部分學生

⁴⁶ 一項在北京大學進行的研究顯示1986年學生運動中城市學生的參與率為49.6%、農村學生58.9%、小鎮學生68.2%(Liu and Huang 1989)，並指出研究生的參與率顯然較本科生低。

都在校園內生活。每間宿舍能容納六至八人，本科生宿舍樓裏一般住有好幾百名學生，而一片宿舍區往往住有萬人上下。我在研究中發現，這種校園環境培育了聯繫緊密的各類學生人際關係網絡，規定了學生日常活動的空間。在八九學運期間，這種環境對集群行動產生了直接影響。它有助於形成一些學生運動動員的中心地帶，刺激了以宿舍為單位的交流和相互影響甚至強制，激發了校際競爭，及影響了校內外遊行的路綫。就像在4·27遊行中，學生們有效地利用了生態環境，廣泛動員，破壞了國家的控制手段。此外，學校的環境還有助於形成一套穩定的依托於生態環境的運動動員策略，這也構成八九學運的一個獨特之處。

國家·社會關係與運動中的話語 和行動特徵

為甚麼學生會把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及其追悼會當作發起一場民主運動的最佳時機呢？為甚麼在運動中學生經常割破手指，用血寫標語呢？為甚麼三名學生會在人民大會堂前跪着遞交請願書呢？一句話，為甚麼八九學運會出現一系列讓我們備感訝異的行為模式，而這些行為模式又是如何影響運動進程的呢？迄今為止，學者們主要是從文化角度來回答這些問題；¹ 例如，在八九學運初期，為了防止市民參與遊行，學生成立了糾察隊，想參加遊行的人必須出示學生證。如果從文化視角出發，人們會說學生這一行為反映了一種根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² 這種將文化表現完全歸結為文化本身的解釋方法往往是很成問題的。

在研究20世紀中國的社會運動時，我發現，較諸早先的學生運動，八九學運的言辭和行動更接近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例如，就學生的精英意識這一點而言，我發現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學生們宣揚勞工神聖，半工半讀，並與工人和商人建立了廣泛的聯繫。我同樣發現，在1935–1936年間的一二·九運動中，學生組織南下到農村搞宣傳，動員中國農民加入抗日聯盟。³ 如果我們簡單地認為一個社會運

¹ 從80年代開始，興起這樣一種研究方法：它把人類看作情感動物，並認為社會運動中的言辭和行為模式都是由當前的「文本」（意識形態）或過去的「紀錄」（文化）所決定的（例如Baker 1990; Hunt 1984; Sewell 1985）。Esherick and Wasserstorm (1990) 及Pye (1990) 對八九學運的研究也沿用了同樣的方法。

² Chan and Unger (1990); Macartney (1990); Perry and Fuller (1991)。

³ 可以參見Israel (1966, 134–38) 關於這一事件的詳細描述。

動的特徵完全取決於一個社會的文化的話，那麼，由於中國文化在20世紀越來越現代化，八九學運與前兩次學生運動相比，理應表現得更少傳統特徵。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我們需要對這一問題做出解釋。

以上發現促使我對八九學運與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進行了一個更為系統的比較，並進而以國家·社會關係為中心對此問題做了結構分析。在研究中，我發現，八九學運時期的國家·社會關係完全不同於前兩次學生運動。80年代中國的國家權力集中並對社會有很大的統領能力，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各類組織的力量非常薄弱，國家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道德和經濟表現上。由於國家的專制性質和國家政權對社會所具有的巨大的滲透力，因此80年代的學生比起早先運動中的學生來說更有理由擔心受到鎮壓。像以上例子中的建立糾察隊這樣的舉動，完全是為了避免鎮壓，而不是一般的精英意識的表現。此外，由於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團組織不夠強大，八九學運中的很多活動都是臨時地、自發地組織起來的。這些活動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國文化、共產主義的動員風格，或西方文化的影響，參加各種活動的學生也抱持着不同的動機。不過，由於在同一地點往往有不同的學運活動同時展開，所以，同情學運的旁觀者心態，就成為塑造運動模式的一個重要因素。本章的一個核心觀點即是，人們對國家合法性的理解決定了他們對運動積極分子的各種活動以及政府在運動中的表現的看法。80年代後期，絕大部分市民對國家合法性的認同，已經從原來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轉變為政府在經濟和道德上的表現。而對政府行德政的要求與中國的傳統觀念是一脈相承的。⁴ 民眾對國家合法性的這種理解使之更容易為那些充滿道義感的言辭和行為所打動。而一旦國家對這些行為反應不當，民眾就會變得悲憤不已，這進一步強化了八九學運的傳統主義色彩。

十多年前，史路 (David A. Snow) 與其助手發表了一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文中他們把社會運動中的行動看作是運動組織者的話語策

⁴ 見第一至第七章。

略，目的是要發動那些尚未被運動理念打動的個人或團體，⁵ 他們把這個過程叫做「框架協調」(frame alignment)。⁶ 之後，「框架化」(framing) 這個概念已被運用於描述及分析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主體框架)、運動修辭策略、集體行動的符號性意義以及政府、媒體對運動的反應。⁷ 本章的視角與所謂的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具有相似之處，因為我們所關注的都是社會運動在符號層面上的東西。然而，誠如一個在框架分析領域中有影響的學者對該領域研究的評價，⁸ 大部分對社會運動框架化的研究不是熱衷於理論性的概念思辨，就是熱衷於講述一個在社會運動框架化這一視角下而構成的個案故事。⁹ 在他們筆下，「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就像是運動積極分子在揀一個一個的修辭按鈕」；他們的推理也「傾向於根據成功的動員過程去逆推運動積極分子提供的一系列框架，並在兩者之間建立因果聯繫」。可以說，進行框架化過程研究的學者很少像本章那樣高度關注社會中客觀存在的、普遍的「解讀圖式」(在我的研究中，主要指人們對國家合法性的一般認知方式) 及其對框架過程的影響。此外，以前這方面的研究也很少將大眾的解釋模式與特殊的社會結構聯繫起來。

最近，學者們試圖把一個社會運動的話語策略放入該社會的政治機會結構中去考察。¹⁰ 然而，不管是社會運動的話語策略還是政治機會結構，焦點都是社會運動中的行動者。在這種新嫁接而成的「機會結構—話語框架」的方法中，社會運動的話語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看作一個策略性過程。社會結構在這裏之所以進入我們的分析視野，僅

⁵ Snow et al. (1986).

⁶ 不過，不公正(injustice)，或不公正的話語框架(injustice frame) 也是早期社會運動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Gamson, Fireman, and Rytina 1982; Moore 1978).

⁷ 例如Benford (1993); Gamson and Wolfsfeld (1993); McCarthy, Smith, and Zald (1996); Snow and Benford (1988; 1992); Tarrow (1994); Zald (1996).

⁸ Benford (1997, 421, 412).

⁹ 例如Evans (1997); Hank (1995); Ryan (1991); Snow et al. (1986); Snow and Benford (1988; 1992); Williams and Williams (1995); Zou and Benford (1995).

¹⁰ Diani (1996); Evans (1997); Gamson and Meyer (1996); Oberschall (1996).

僅是因為它會影響社會運動的行動者「對成敗的預期」。¹¹然而，社會結構並不僅是一個有助於行動者做出最佳決策的認知綫索或信號，而是同時包含了習慣、情感和在人們頭腦中已經根深柢固的是非觀念；在我看來，這種「機會結構—話語框架」的思路過高地估計了行動者做出理性選擇的能力。與之相反，在我的研究中，我把社會行動者看作是同時具有理性和情感反應的活生生的人。在一些關鍵時刻，八九學運的行動者的確是三思而後行；但在另外一些時刻，他們更容易受到情緒的感染。從方法論上看，我們雖然很難從微觀層次上判定運動期間的某次具體政治行動，到底是受理性驅動還是受情緒驅動，但可以考察在甚麼結構條件下理性行動或情緒行動將佔主導地位。因此，本章研究的重點不是行動者的動機，而是促成特定的傳統性和情緒性行為在八九學運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宏觀結構條件。如果說，「機會結構—話語框架」視角通過機會和策略，試圖把社會結構與運動的行為模式和進程聯繫起來，那麼，我則希望從運動參與者與國家的關係，特別從他們關於國家權力的共同感受這個角度，來考察這一聯繫。¹²

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在組織和開展一個運動時，通常會從文化背景中擷取他們所熟悉的言辭和行動方式。提立 (Charles Tilly) 曾將可資利用的集群行動方式的總和定義為「集群行動劇目庫」(repertoire of collective action)。他同樣令人信服地解釋了近500年來西方國家集群行動方式和策略的變化。¹³然而，一次特定的社會運動不可能將「集群行動劇目庫」中的所有集群行動方式全部付諸實施。因此，只提出文化在社會運動中的重要性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追問，為甚麼運動的參與者會選擇集群行動劇目庫中的某些、而不是另一些言辭和行動方式？本章正是朝着這個方向作出探索。

¹¹ Tarrow (1994, 85).

¹² 雖然強調話語策略框架的學者也承認大眾的解釋模式的存在(他們所用的「解讀圖式」、「經驗通約度」和「敘述逼真度」都表達了這方面的意思)，但是他們的研究重點在於行動者的策略，而不是旁觀者的心態。關於以上這些概念的定義，見Snow and Benford (1988) 及Benford (1997)。

¹³ Tilly (1978; 1986)。

本章將分以下幾個部分展開。在簡要地介紹一下先前的兩次學生運動後，我將對八九學運期間學生的言辭和行動方式（即因變量的差異）作詳盡的描述。接下來，我將勾勒出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和八九運動背後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即自變量的差異）。在最後兩節中，我將進一步說明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是怎樣具體塑造運動中的言辭、行為以及運動的進程的（即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那些對歷史比較法不熟悉的讀者可以看到，我已經在括號裏對每一部分的邏輯參照定量分析方法做了類比。當然，這只是類比而已，因為我在研究中所採取的結構維度是不能用完全操作化的變量來體現的。

兩次早期學運的歷史背景

1919年的五四運動、1935-1936年間的一二·九運動，以及1989年的學生運動，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三次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它們的發源地都在北京，並且迅速席捲全國。這裏，我首先簡單介紹一下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背景，關於這兩次運動的其他信息在後面的比較研究中還會提到。¹⁴五四運動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1917年以後，中國年輕的知識分子和學生企圖通過民主和科學振興中華，並因此而發起了一場廣泛的現代化運動；這股追求現代化的浪潮在很大程度上為五四運動的發起開闢了道路。1919年5月4日，三千多名北京學生齊聚街頭，舉行反日遊行，抗議巴黎和會上通過的有關膠州半島歸屬問題的決議。隨着商人、工人和其他市民的加入，運動迅速擴展到中國其他城市，最後，北洋政府不得不罷免三名親日派官員，並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的影響極為深遠。在政治上它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國民黨的改組，在文化上它推動了白話文和大眾教育的興起和傳播，以及儒家思想和傳統倫理的進一步衰落。

¹⁴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見Chow Tse-tsung (1967); Israel (1966); Israel and Klein (1976) 及 Yeh (1990) 對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研究。

五四運動兼具民主和愛國運動的雙重特徵。與之相比，一二·九運動則基本是一次針對日本侵略者的愛國運動。到1935年，日軍已經佔領整個東三省和河北省大部，北京也實際上為日軍的鐵蹄所包圍。在這種危急的形勢下，1935年12月9日，成千上萬名北京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抵抗日本侵略。在隨後的一年中，運動波及中國絕大部分城市。這次運動的影響也甚為巨大：它幫助中共恢復了已被國民黨摧毀的城市地下力量，並造成國民黨內部統治精英的分裂，最後直接引發西安事變。¹⁵ 這次運動中和運動後的一系列歷史發展促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綫的建立，可以說為共產主義在中國奠定了勝利的基礎。¹⁶

八九運動中的行為模式

儘管我要着重考察的是國家、社會關係對社會運動中的行為模式的影響，但我並不認為社會運動中的行為模式完全是由國家、社會關係所塑造的。和前兩次運動相比，八九運動表現出三個方面的顯著特徵：首先，從表面上看這次運動更加「親西方」；其次，它打上了「文革」和共產主義大眾動員的烙印；最後，和前兩次運動相比，八九中具有中國傳統文化意味的言辭和行為顯得更加普遍。下面，我將逐一介紹這些特徵，然後再用80年代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來解釋為甚麼與前兩次學運相比，八九學運的許多話語和活動均帶有明顯的傳統性。

運動的親西方特徵

在八九運動中，中國學生打出V形手勢來表示勝利，在天安門廣場豎起一座仿照美國自由女神像建造的「民主女神像」，並舉辦了無數場意圖吸引西方注意力的新聞發布會。在廣場上，西方和香港的記者

¹⁵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扣押蔣介石，企圖迫使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變。

¹⁶ Johnson (1962).

比中國記者更容易獲准進入指揮部。此外，學生們還時常收聽國外電台以獲取信息和反饋，並決定下一步行動。¹⁷ 親西方特徵還可以舉出很多，還表現在語言上；在運動中，用外文寫的標語和旗幟隨處可見，如“*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民享，民治〕，“*Absolute Power, Absolute Corruption*”〔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敗〕¹⁸；“*Give me Democracy or Give me Death*”〔無民主，毋寧死〕，“*Glasnost*”〔政治開放〕和“*People Power*”〔人民權力〕等等。如此親西方的態度是前所未有的。雖然前兩次學運都是反日的，但學生同樣表達了他們對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不滿。比如在五四運動中，當遊行到在英租界內的外灘時，上海學生砸碎了掛在黃浦公園門口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¹⁹ 為此，當時的國民黨領袖人物不得不採取種種措施，以防運動發展為一場極端的排外運動。²⁰

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都發生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當時，殖民主義還主導着國際政治。因此，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時常會成為擁有不同地緣政治利益的國家的侵略目標。在這種背景下，民族主義成為運動的主要特徵。五四時期，學生推動西化，只不過是因為他們相信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國。但到八九運動時，殖民主義政治在年輕一代的記憶中已經淡漠；知識分子和學生亦已經不再那麼關注救亡圖存。相反，他們正生活在先輩曾經夢想和為之奮鬥而實現的、具有強大權力的國家之中，並正在為這一強大國家的政治後果而備感苦悶；他們同樣目睹了蘇聯的衰落以及世界範圍內新的民主化浪潮的形成。在他們眼中，國家社會主義已經是一條走不通的路，資本主義和民主正在重新成為世界發展的兩大動力。八九學運的種種親西方的特徵，正正反映國際環境和中國知識分子思緒的這種根本轉變。

¹⁷ 據Macartney (1990, 9-10) 說：「只有西方和香港記者才能獲准進入天安門廣場內一些被學生視為機要的領地。而且，學生領袖王丹幾乎每天都要接受香港記者的採訪，以此瞭解外界對學生的態度，看看他們是否對運動感興趣。」

¹⁸ 參見刊於《血色的黎明》中的照片 (1989, 48, 68)。

¹⁹ 許德珩 (1987, 76)。

²⁰ 劉永明 (1990)。

共產主義大眾動員的烙印

中國長期的共產主義教育在學生身上烙下了一整套習慣和偶像。在八九學運中，每當情緒悲憤時，學生們就會高唱〈國際歌〉。唱〈國際歌〉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裏完全合法，但學生們這樣做，更多的是受中國的革命電影和戲劇的影響，因為這些電影或戲劇往往用這首歌來烘托英雄人物犧牲或發生其他悲劇事件時的悲壯場面。學生們在唱這首歌時，正是為了表達一種悲壯的反抗情緒。

一些在文革中非常流行的社會運動手法也對八九學運產生了重大影響，絕食也許是八九學運期間最重要的抗議方式。無論就其在整個運動中所起到的動員效果，還是在世界範圍內造成的影響來說，這次絕食都是成功的（當然成功的絕食也引起了戒嚴和最終的軍事鎮壓）。值得注意的是，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都沒有把絕食作為一種運動手段，絕食只是在文革中才成為一種很流行的抗議方式。²¹ 我們可以從鄭義的自述中，看出文革對八九學運的影響。²² 鄭義在他的書中描述了文革中一次大規模絕食運動的組織過程。他同樣寫到他如何把這些經驗傳授給北京大學的學運積極分子，並建議學生在4月22日就開始絕食。鄭義書中所描述的他對學生們所講的那些在文革中發生了的驚心動魄的故事，肯定會影響那些聽了這些故事的青年學生，包括王丹、柴玲和張伯笠等人。這些學生以後都成為絕食運動的骨幹。

1989年5月16–26日之間，大約有17萬名外地學生坐火車來到北京。²³ 此外，還有許多學生通過其他交通工具進京。5月下旬，天安門廣場擠滿了新來的學生，他們都不願意離開。這些學生進京有的是為了支持運動，有的是想趁機作一次免費旅遊。這種現象被叫做「串聯」，它對八九學運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雖然在中國早先的學生運動中就有長途請願一說，²⁴ 但只有到了文革，「串聯」才被賦予以

²¹ 比如在80年代早期，雲南知青為了回城發起過大規模的絕食運動，參加者逾千。這迫使中國政府馬上就做出反應。這次抗議非常成功（鄧賢 1992）。

²² 鄭義 (1993, 62–68)。

²³ 吳牟人等 (1989, 474)。

²⁴ Wasserstrom (1991, 88)。

新的意義——大規模免費出遊。到八九學運時，絕大多數老紅衛兵都很可能認為文革是個人和集體的雙重悲劇，但他們普遍對「串聯」懷有美好的回憶。²⁵ 我的受訪者都非常瞭解文革中那些激動人心的「串聯」活動；文革時的創新到八九時就成了一種常規。

八九運動中的傳統主義

與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相比，八九學運中最令人驚訝和最難以解釋的現象是，運動所用的語言和行為顯得更接近於中國的傳統文化和道德。這並不是說中國傳統文化對前兩次學運沒有影響，或者說這三次運動沒有甚麼共同點；例如，在前現代中國，在公共場合下跪是中國人表達不滿和籲請公眾支持的重要方式。事實上，我們發現，在五四運動中，學生經常通過在工人和商人面前下跪的方式來動員他們。然而，只有1989年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上的下跪才真正成為一種重要的運動手段。在先前的運動中，下跪從來未能成功觸發成千上萬學生的情緒，也未有促成全北京範圍的罷課。同樣，這三次運動中都發生了圍繞着葬禮而進行的抗議行動，但是在五四運動中，曾發生在天津和上海的葬禮抗議活動規模都很小。²⁶ 在一二·九運動中，北京學生確實曾為一個死於獄中的中學生郭清舉辦了追悼會並上街遊行。不過，當政府鎮壓這一行動時，學生並未因此而發起進一步的激進行動。²⁷ 而八九學運正是從胡耀邦的突然逝世開始的，並且，運動第一週的抗議活動主要集中在悼念活動上。

80年代的學生還起用了許多被他們的五四前輩猛烈抨擊過、並早已淡出中國政治話語體系的言辭。五四運動曾經嚴厲批判過一些傳統道德，比如忠義、孝順、泛親屬關係等；²⁸ 但在八九學運中，這些傳統話語卻成為學生用來激發市民同情的重要手段。我們時常可以看到

²⁵ 金宇澄 (1996)。

²⁶ Chow Tse-tsung (1967, 129, 143)。

²⁷ 中共中央黨校黨史研究班 (1986, 103–08); Israel (1966, 145)。

²⁸ Chow Tse-tsung (1967, 58–59)。

下列以泛親屬關係為核心的標語：「媽媽，我們沒有錯！」、「媽媽：我餓，但是我吃不下！」、「趙爺爺，李叔叔，快來救救我們的兄弟姐妹！」，還有「你們的大哥已經非常着急了！」。此外，我們還會看到許多強調傳統價值觀的口號和標語，比如：「餓死事小！」，²⁹「忠孝不能兩全」、「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間一到，人民必報！」。³⁰

採用傳統的語言不單是個人行為。比如，〈絕食宣言〉可說是八九學運期間最重要的學生宣言之一了，但當中也充斥了傳統言辭和精英情感，像「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和「請原諒我們，你們的孩子做不到忠孝兩全」。無論在五四運動還是一二·九運動中，這種現象都是很少見的。相反，這種語言（包括其中所蘊涵的價值觀），恰恰是五四運動中一些學生宣言攻擊的目標。

難怪許多中國問題專家都試圖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解釋八九學運的發展。然而，這種觀點儘管很容易找到這樣那樣的證據，它未能解釋為甚麼八九運動比起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來，具有更強烈的傳統文化色彩。³¹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歷次運動所關注的核心問題的不同來解釋這種差異。對五四運動來說，這種解釋是部分有效的。無疑，五四運動所具有的反傳統偶像的特徵，使傳統話語和傳統的集體運動策略失去了合法性。然而，這種解釋就一二·九運動而論，就難以奏效了。因為後者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愛國運動，我們沒有甚麼理由

²⁹ 這是將一句箴言的前半句稍作修改後的結果，其後半句是「失節事大」。這句話在舊中國專門用來鼓勵寡婦為亡夫守節。

³⁰ 這是1989年5月初柴玲喊出的口號 (Hinton and Gordon 1997, 109)。它源於佛家的輪迴思想，即生命是輪迴的，一個人在來生的地位取決於他今生的表現。這是中國傳統民間智慧的一部分。

³¹ 人們也許會簡單地認為八九學運的傳統主義是一次懷舊的文化復興。誠然，人們有某種懷舊的衝動，但這並不足以解釋主流文化傳統的回歸。這種回歸必須同時伴隨着特定的結構變遷，後者或者為文化傳統的回歸創造合適的土壤，或者創制能夠促進某種文化復興發展的組織和制度。在某種意義上，本章可以說是對造成80年代中國傳統文化復興現象所作的制度性分析。

指望一場30年代的愛國主義運動，會比一場80年代的民主運動具有更低的傳統性。

也許有人會認為，八九運動中的學生行為模式來自中國文化的強大慣性。然而，如果認為80年代的年輕人比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中的年輕人受到更多的傳統文化的熏陶，那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可以說，中國在20世紀經歷了它漫長歷史中最迅速的社會變遷。相當多的五四青年都是在傳統的大家族中成長起來的；相比之下，現代學生差不多都出生在城市的核心家庭裏，父母對他們的培養也更為自由。五四時期，女學生必須經過抗爭才能夠留現代髮型，才能夠和男學生在同一所學校裏讀書；相反，對於80年代的大學生來說，男女自由戀愛已屬常規。另外，許多五四和一二·九時期的學生所受的教育仍然是中西雜糅的，而80年代的學生則基本上受的是西方教育。最後，現代學生生活在信息時代，比起早數十年的學生來說，他們可以算是直接生活在西方生活方式和觀念的影響之下（儘管很多時候這種影響是很浮淺的）。因此，我們需要給出別的更為合理的解釋。

三次學運中的國家、社會關係

在本書導論中，我曾用以下三個維度來界定國家、社會關係：國家的性質、社會的性質、以及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聯繫。現在，我將從這些維度出發，來分別勾勒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以及八九運動背後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

乍看之下，我們會覺得這三次學生運動都發生在專制體制下，事實上，它們背後的國家、社會關係卻是大不相同的。五四運動距離1911年的辛亥革命僅八年時間；當運動爆發時，中國有兩個政府：一個是軍閥控制下的北洋政府，另一個是國民黨和一些南方軍閥組成的聯合政府。五四運動旨在反對北方政府中的親日派；中國當時有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和進步黨，儘管兩黨之間存在許多分歧，但它們都反對北洋政府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進步黨的成員大多是保守派，他們是北洋政府在北方議會中的支持者。但在五四運動中，進步黨的一些成員，尤其是梁啟超等人，都非常支持學生。五四運動爆發前，

國民黨已經分裂為南方革命派和北方議會派，兩者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運動的發起者。但一些國民黨黨員，如蔡元培、吳稚暉、張繼、葉儲齋、戴季陶和邵力子等人，卻從一開始就以個人形式支持五四運動。運動爆發以後，無論是北方議會派還是南方革命派，越來越多的國民黨員站出來對運動公開表示支持。當運動的中心轉移到上海時，國民黨事實上已經差不多成為運動的領導者。³²當然，對運動的支持並不限於政治黨派。一些與北洋政府關係密切的大軍閥，如吳佩孚和張敬堯，同樣公開表達了對學生的同情。所以，學生們事實上是得到了那些強有力的政治勢力的支持的。如果說五四時期的北洋政府在專制和壓迫上絲毫不遜於80年代的共產黨政府的話，那麼，在後者的內部，國家精英的分裂則要嚴重得多。

北洋政府的軟弱無力還反映在它對中國社會的控制非常有限這一事實上。在1912-1914年間(當時北洋政府至少在形式上還是全中國的代表)，北洋政府通過了一系列限制公民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等權利的法令。然而，這些法令在地方軍閥控制下的省市和外國租界沒有效力；特別是在外國租界，出版和結社根本就不受中國法律的制約。即使在它自己的勢力範圍，北洋政府也無法消滅那些不受其控制的組織，所以，商會、工會及其他非政府組織早在五四運動前就已經成立了，其中有些組織如北京和上海的中國商會、公民外交聯合會、中國工業協會等，³³在五四運動中更發揮了重要作用。1916年，袁世凱在復辟失敗後隨即去世。在他死後，北洋政府的勢力進一步衰落，而一些由新知識分子控制的報紙、雜誌及組織在北京得到了迅速發展。比如，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前就已經有二十多個社團。其中，進德會超過500人(約佔大學人數的25%以上)，幾乎網羅了大學裏所有的新知識分子。另外一些社團，如新潮社、公民雜誌社和新聞研究會等組織，還為五四運動提供了許多關鍵性領袖人物。³⁴

³² 劉永明(1990)。

³³ 中國工業協會的前身是1912年成立的所謂「中國工人黨」。它在1913年反對袁世凱起義失敗後一度衰落，但在1916年後又逐漸恢復了在上海的影響力。無論是早期的中國工人黨還是後來的中國工業協會，背後都得到國民黨的支持。

³⁴ 張允侯等(1979)。

與五四時期相比，一二·九運動前夕的中國政權更為專制。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後，國民黨開始在全國範圍內鎮壓共產黨勢力。到1935年時，國民黨已經統一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並迫使共產黨放棄南方根據地，長征到陝北一帶。與此同時，國民黨在城市裏大力剿共。成千上萬共產黨員及其追隨者被捕遇害，大部分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都遭到破壞，這種「白色恐怖」還蔓延到更大的範圍。1927年後，親共的工會、學生社團以及左翼組織紛紛遭禁止，其他一些社會組織也受到政府的嚴密監視。³⁵ 在北京的學校，除了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³⁶ 到1935年前在政治上都變得悄無聲息了。

儘管國民黨政權實行高壓統治，但由於其精英內部的高度分化，再加上在社會上存在一個組織良好的列寧主義共產黨，政府對社會的滲透能力受到嚴重影響。國民黨在20年代後期通過北伐統一了中國，但北伐並未在軍事上鏟除軍閥，他們只不過在政治上達成了妥協。統一後，很多軍閥依然控制著他們自己的地盤和軍隊。其中有些人，如馮玉祥和張學良，一方面出於愛國主義熱情，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日本人侵佔了他們在北方的勢力範圍，對一二·九運動抱有極大的同情。³⁷ 而且，在國民黨自己在歷史上和意識形態中，也一直存有偏左的革命傳統。因此，蔣介石能夠鎮壓共產黨，但對黨內深具影響力的左派成員卻束手無策。在一二·九運動期間，左派和自由派國民黨領袖，在宋慶齡和何香凝——她們分別是孫中山和廖仲愷的遺孀——的

³⁵ 例如，上海在1927年以前還是左翼工人階級的政治中心，但在1927–1937年間，左翼工人運動遭到鎮壓，上海工會甚至被地方幫會所控制 (Perry 1993, ch. 5)。

³⁶ 燕京大學是一所美國人辦的私立大學，清華大學則是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興建的。這些賠款是1901年中國和西方列強 (包括日本) 簽訂的條約中規定的。190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決定向中國返回部分賠款，用來修建清華大學以及為中國學生赴美留學提供獎學金。國民黨在這兩所大學的影響力都相對較弱，兩所學校的自由結社空間也因此而相對較大。

³⁷ 尤其是張學良，他因為服從蔣介石的命令，1931年未作任何抵抗就從東北撤軍，此後承受了巨大的公眾壓力。

領導下，強烈支持學生的行動。這樣，國民黨精英內部在對待運動的態度上就出現了高度分化。³⁸

與此同時，共產黨雖然被趕到了陝北，國民黨卻無法徹底消滅他們。在到達陝北之前，共產黨就已提出要與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的口號。當時，駐紮在陝北附近的大部分國民黨軍隊都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從東北撤退出來的張學良的部下。他們思鄉心切，並對未曾抵抗便從東北撤軍一事深感羞辱。因此，共產黨的號召在東北軍廣大軍官中引起強烈反響，他們因此而遲遲不肯接受蔣介石關於消滅紅軍殘存勢力的命令。

1934年底，共產黨在北京的組織已經被徹底破壞。可是，自1935年初開始，中共就通過一個名為「中國軍事抵抗聯合會」的外圍組織來重建地下組織。該聯合會的成員以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為根據地，逐漸擴大影響。到一二·九運動爆發時，中共已經重新建立了北京支部，並掌握了一個激進學生的網絡。³⁹這些學生中的大部分人後來都成為一二·九運動的領袖人物，並為中共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所以，雖然一二·九運動開始時在陝北的中共中央尚不知此事，也未加以領導，但中共在北京的力量卻在一二·九運動的發起和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⁴⁰而且，學運開始後，中共在運動中的地位迅速加強。

³⁸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學生是如何從精英的分化中得益的。1936年2月23日，44名東北大學學生在北京被捕。學生領袖宋黎向張學良求助。張寫信給當時的北京警備司令，請求釋放學生。他還請宋黎以秘書的身份去送信。宋到北京後，地方當局認出他也是搜捕名單上的一名學生，但是沒人敢逮捕他。不僅如此，宋還受到禮遇，44名被捕學生後來也如數釋放（宋黎 1982）。而在八九學運中，此類事情是無法想像的。

³⁹ 陳其武（1982）；姚依林（1987）。

⁴⁰ 史路（Edgar Snow）（1966）強調，一二·九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發的，運動早期的領導人，「大多是基督徒或是受基督教訓練的青年……他們當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員」。看來，斯諾是低估了共產黨在運動發起過程中的作用。事實上，運動的許多領導人在運動未開始前就加入了共產黨。其中一些人，如俞威（黃敬）、姚克廣（姚依林）、王汝梅（黃華）和宋黎，經常參加史路家的聚會。見廖蓋隆、張品興、劉佑生（1993）對這些運動領袖的政治生涯的描述。

最終，共產黨掌握了好幾個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和天津）的運動領導權。隨着運動的發展，中共對它的控制也不斷加強。

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時期，中國國家合法性的首要基礎都是民族主義。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列強的侵略成為一個日益嚴重問題。面對外侮，民族意識首先在知識分子中滋長，並逐漸傳播到其他市民。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更是大大推動了激進主義在中國的擴展。從此以後，富國強兵就成為中國人的夢想（見第二章）。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政治精英發動了一系列改良和革命，並在1912年最終推翻了滿清政府，成立了中華民國。正是在相同的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發起了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

八九學運也是在專制政體下爆發的。但是，此時的國家·社會關係卻和前兩次學運有質的不同。⁴¹ 80年代後期，中國政府依然堅持其統治具有寫入憲法序言的四項基本原則所闡述的意識形態合法性。然而，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廣大市民對外面的世界已經越來越瞭解。他們發現，與西方國家相比，尤其是與那些剛剛崛起的東亞鄰國相比，中國政府遠遠沒有兌現那些許諾給他們的東西。這種匱乏感，連同文革的慘痛記憶以及新一輪國際民主化浪潮，使年輕一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對現政權的意識形態立場展開了越來越激烈的批評。當然，這並不是說，在80年代，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現政權是不合法的；而是說，這一切都意味着公眾對國家合法性基礎的認知，正在從左派的意識形態合法性轉向績效合法性。⁴² 其中，與本章內容尤其相關的，是公眾對國家的道德訴求大大增強。正如我在第一章和第七章中所說的，隨着國家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衰落，道德和儀式方面的表現再度成為公眾用來評判政府好壞的一個重要標準。

⁴¹ 和前兩次運動時的政府相比，80年代的中國政府更接近於Linz and Stepan (1996) 意義上的「後極權主義政體」。根據他們的理論，這種政體是一種衰落的極權主義政體。它強調理性的決策過程，但仍然遵循一整套複雜的官方意識形態。在經濟和社會層面，它能容忍一定程度的多元主義；但由於後極權主義國家的政府對社會仍有很強的控制能力，因此在政治層面的容忍程度非常有限。

⁴² 更多的細節見第四和第七章。

不過，儘管在80年代的中國城市中處處可以感受到這種意識形態合法性危機，但當時並沒有產生跟黨與政府相敵對的政治組織和派別——就像我們在學運初期所見到的那種景象。何況在80年代後期，中共大部分高層職位仍然被那些早在共產黨上台之前就入了黨的革命老幹部所佔據。他們也知道中國經濟落後，問題堆積如山；但他們同樣相信，這些問題並不是共產主義或集權統治本身造成的，而是囿於經驗不足。他們認識到改革是絕對必要的，但他們決不會為此而放棄成千上萬同志用生命換來的江山。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因為老一輩高級將領手中仍然掌握着軍隊，許多高級將領本身就是老幹部（第七章）。因此，在八九學運中，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事實上並未對高層領導集團造成甚麼災難性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西方學者誇大了八九期間中國政府內部的派別鬥爭。而事實是，在整個八九學運中，沒有一個高層領導是真正支持學生的，他們只不過是在如何平息運動的具體方法上存在認識差異。這與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情形截然相反；那時，都曾有實力派精英公開支持學生。

80年代的中國比起毛澤東時代更自由，這為八九運動的興起提供了可能。但是，我們不能高估這種自由度。在共產黨掌權的起初數年內，國家就已經清除了大部分社會組織，代之以受黨控制的工人、婦女、青年和行業組織。到了80年代，改革日漸深入，越來越多的相對獨立的組織開始出現（第一章）；然而，這些新興的組織仍然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與民國時期的組織根本不能相提並論。再者，大部分這種組織在80年代仍保有很強的半官方性質，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真正地反對政府，⁴³ 80年代，真正的異端行為都會遭受從失業到入獄的種種懲罰。因此，在八九運動中出現的多個運動組織都是沒有甚麼歷史背景的；學生運動的動員也更多地是根據校園和天安門廣場的具體情境而行動，而非依賴於組織的力量。

⁴³ 王穎、折小葉、孫炳耀（1993）。

國家、社會關係與運動行為的模式

我在上一節已經談到，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35-1936年間的九一八運動發生時，中國還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政府內部的精英分化，政府外存在着強大的反對黨及各種社會中層組織，而當時國家的合法化基礎主要在於它抵禦外侮保衛國家的能力。直至80年代，儘管當時大部分市民已經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而是根據國家在道德和經濟方面的表現來評判國家的合法性，但政府卻受到一個同質性較強、且對社會控制能力很強的精英集團所控制。下面，我將分析國家、社會關係上的這些差異是如何對八九運動中學生所用的言辭和行動產生影響的。

由於80年代的中國與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時期的中國相比，國家更為一統，中層組織也更為孱弱，因此八九學運不能以一種更自由和更直接的方式展開。學生為了避免正面的鎮壓，不得不借助於合法的集群行動方式，以曲折隱晦地表達出自己的真正要求。八九期間的很多行動，都可以被看成是學生為了創造一個「安全空間」、試圖降低鎮壓風險而採取的種種策略。⁴⁴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我在本章開頭提到的學生在遊行時設立糾察隊的例子。共產黨政府以往對待學生運動的態度一般較為仁慈，但對工人運動或任何在學生和工人之間建立聯盟的企圖，則往往會嚴厲鎮壓。因此，如果遊行時沒有糾察隊，就可能會有一些青年工人和城市流氓加入遊行隊伍，他們的介入常常會破壞遊行秩序，並可能釀成騷亂。為了避免政府以這些負面效應為藉口實施鎮壓，學生逐漸發展出這套糾察隊策略，以保證遊行能夠順利進行。⁴⁵

⁴⁴ Evans and Boyte (1992); Gurr (1986); Lichbach (1995); Opp and Roehl (1990); James C. Scott (1985).

⁴⁵ 例如，在4月22日學生遊行期間，長沙和西安爆發了騷亂，這兩個城市都發生了大規模搶劫。在西安的騷亂中，有10輛機動車和大約20座房屋被焚毀。在4月2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中，政府聲稱學生遊行助長了騷亂。學生領袖程真 (1990, 175) 也闡述了在運動初期不讓其他市民參加遊行的理由。

同樣原因可以解釋為甚麼在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中無關輕重的葬禮抗議在八九學運中會變得如此重要。在一二·九遊行之前，海倫·史路(Helen Snow)建議學生做一具「北方中國的屍體」抬上街頭，舉辦一場摹擬的葬禮，以此示威，但她的建議被當時的學運積極分子斷然拒絕。⁴⁶ 為甚麼葬禮抗議這一被「傳統學生」所拒絕的手段反而為「現代學生」所採用？事實上，正如第五和第六章所提到的，北京的一些激進學生早在胡耀邦突然去世之前，就已經開始籌劃運動了。無論胡耀邦的身體狀況如何，運動都已經勢在必行；胡耀邦的突然去世只不過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而已。而且，由於胡耀邦在去世前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為他的逝世展開悼念活動在中國是完全合法的。這樣，以胡耀邦追悼會為由展開一場集群行動，就掩護了運動積極分子的真正意圖，使政府不能立即出手鎮壓。

為了避免政府的直接鎮壓，學生還採取了其他種種手段；例如，政府於4月26日發表了《人民日報》社論，將運動定性為動亂。不過，當4月27日學生舉行反4·26社論的遊行時，他們的口號卻主要是「共產黨萬歲！」和「擁護社會主義！」，⁴⁷ 他們還將口號集中在官僚腐敗和高通貨膨脹等問題上；這些口號即使在那些保守的共產黨領導人看來也不算激進，使政府很難找到直接鎮壓的理由。可是，許多觀察家由此得出這樣的理解，即認為遊行學生在根本上是忠於體制的，他們的運動在很多方面類似於傳統中國知識分子對帝王的諍諫。我並不否認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賦予了知識分子以特定的社會責任感，即便是現代的中國學生也會受到這些印記的影響；然而，如此理解學生在4月27日遊行中所使用的言辭是有偏差的。早在4月18日，學運積極分子就已經在天安門廣場公布了七項要求，其核心是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第六章)。這些要求自始至終引導着運動的全過程。如果在4月27日的遊行中喊出的口號與先前的這些要求有所不同，我們只能將其解讀為一

⁴⁶ Israel (1996, 115-16) .

⁴⁷ 吳牟人等 (1989, 62) .

種策略上的需要。4·26社論一公布學生們就上街遊行，這無疑是對現政權的挑戰。然而，運動的積極分子將他們的言辭限制在一些中規中矩的口號和一些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上，這樣就能夠在學校內動員更多的學生，在社會上也能夠贏得更多公眾的同情，並且不予政府以鎮壓的藉口。

至此，我已經解釋了國家的集權和強制性如何迫使八九運動中的行動者採取保守策略，以增強動員潛力，並減少直接被鎮壓的可能。然而，策略不是唯一的解釋。在運動中，許多學生割破手指寫下血書；我的一位受訪者說他曾因氣憤難當而一拳打破了自己的臉；一位學生領袖回憶說五月底他曾看到一位婦女淚流滿面、披頭散髮地跪在廣場的學生指揮部外，哭着哀求學生不要離開。⁴⁸事實上，情緒表現是八九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我是一位社會心理學家，我肯定會把八九運動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文化行為歸結為運動中民眾的情緒化反應。很顯然，人在感情用事時，會自然而然地會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行事，也會下意識地遵循在其心中已經根深蒂固的行為法則。⁴⁹

然而，這並不是問題的全部。我們知道，為數不少的學生和北京市民是在一種漸欠組織的狀態下捲入八九運動的。⁵⁰同樣，運動中的大部分行動是以某些特殊的地域為中心而展開的，如天安門廣場、北大的三角地、人大的第三食堂等等（見第六章和第八章）。在運動中，人們經常會在下班後、晚飯後，或任何他們覺得需要的時候，光顧這些地方。在光顧的人群中，大部分人都只是同情運動的旁觀者，但有時候也會受到感染而加入行動。這種相對的無組織性以及以地點為中心的特徵，使運動中行動者和旁觀者的關係非常類似於集市上的表演者和逛集市的人群之間的關係。在八九學運期間，只要去過天安門廣場的人，總會看到若干同時發生卻又各自為政的抗議活動，以及一大

⁴⁸ 在訪談中，這位學生領袖告訴我，在戒嚴令實施期間，天安門廣場就像一個精神病醫院。在廣場之外他還能保持頭腦清醒，但每次一回到廣場，看到那麼多人情緒激昂，他也會馬上變得非常激動和思緒不清。

⁴⁹ Kitayama and Markus (1994); Triandis (1989)。

⁵⁰ 陳小雅 (1996)。

群混雜其間看熱鬧的、抱有同情心的旁觀者。那些發起抗議活動的人在舞台上可能會遵循一些傳統的、現代的或是國外的社會運動的模式。他們或是出於衝動，或是出於計算，或者兩者皆有。但是對於整個八九學運的發展來說，這種層次上的行動和動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無足輕重的，因為這些行動絕大多數都是來去匆匆，並未給運動留下太大的影響。但其中有一些行動，像三名學生下跪和絕食，的確打動了成千上萬富有同情心的旁觀者，從而決定了運動的態勢。正是在這一點上，我發現八九運動比起前兩次學運來顯得更為傳統；也就是說，八九學運的語言和行動策略從整體上看來並不見得十分傳統，但那些能推動運動發展的學運語言和行為，卻往往是非常保守和傳統的。顯然，這裏起關鍵作用的是旁觀者的心態。

在關於「族特裝」(zoot-suit) 騷亂的研究中，唐納(Ralph H. Turner)和蘇銳思(Samuel J. Surace)發現，只有當一個符號能引起某一對象的一致反感時，它才會引發一場針對那個符號的統一集群行動和不可遏止的仇恨。⁵¹ 如果我們把運動中的言辭和行動看成是符號，而把國家的合法性資源看成是與那個符號相應的對象，那麼唐納和蘇銳思的理論是非常有啟發性的。我認為，人們在八九運動中對特定言辭和行動方式的感受，都是由他們對國家合法性的認知塑造的。80年代，道德表現是國家合法性的一個重要來源。因此，人們對學生在道義(文化)上的訴求也就變得更加敏感。一旦政府的表現與傳統道義相悖，人們自然會非常憤慨。當4月22日三名學生跪倒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而李鵬卻最終沒有出來接受學生的請願書時，一場全市範圍內的罷課便迅速掀起了(見第六章)。事實上，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上還能同時看到其他許多抗議行動，但是沒有一個行動能夠迅速地抓住學生的內心，並決定運動發展的方向。一名受訪者(第60號)回憶了當時的情形：

我從來就不相信共產黨。我也從不相信他們會真的做甚麼好事。我想，即使李鵬能出來見我們，也不會有甚麼成果；但是我還是希望他能夠出來說幾句話。然而他卻沒有。我感到非常

⁵¹ Turner and Surace (1956).

幾過，很多人都哭了……在這個時候，我甚至朝自己臉上打了好幾拳，打得鮮血直流。有好幾個朋友把我給扶走了……路上，我看到學生們到處都在哭。我還看到一個記者哭得就像個小孩一樣，並且還在大叫：「該死的政府，沒用的政府！」一些學生則在喊：「打倒李鵬！」

這名受訪者是一位非常激進的學生領袖，但他還是希望李鵬能出來見他們。正如白魯恂(Lucian W. Pye)所言，在這種形勢下出來接受訪問書是一種儀式，一種連中國古代的官員也要執行的儀式。⁵² 可李鵬一直沒有出來。那一天，我的那名受訪者和那名記者的表現確實傳達了一種普遍的情緒——對政府的徹底失望，他們的失望並不是因為政府不民主（雖然他們中的一些人確實是在為民主而戰），而是因為政府領導人不能以得體的方式履行作為國家合法性基礎的儀式。大部分北京學懷着這種失望的情緒，投入翌日的大規模罷課。

在一次非正式的訪談中，學生領袖周鋒鎖告訴我，在4月27日的遊行中，路邊的北京市民對反對官僚腐敗和高通貨膨脹的口號做出了熱情的回應，但對「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民主」之類的口號卻比較冷淡。於是，他注意到，在遊行中，口號的重心自然而然地從自由民主問題轉向了官僚腐敗和通貨膨脹。行人對不同口號表現出來的不同態度是可以理解的。80年代後期，國家合法性的主要來源是經濟和道德表現，大部分學生和北京居民並不真正關心政府的組成方式，他們更關心的是政府行為的道義基礎，以及政府是否能夠穩定秩序和繁榮經濟。集中在官僚腐敗和通貨膨脹問題上的標語能夠引起廣泛的關注，正是因為它們體現了廣大人民對政府的期望。

就學生在運動中對不同的行動做出不同的反應這一點，我們還能舉出許多其他例子。在5月11-13日的絕食動員中，一些激進學生試圖用不同的方式來動員學生加入絕食運動。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給出的主要理由是「學運未平反，東昌又造謠」。⁵³ 這樣的理由並不成功；直到

⁵² Pye (1990, 168).

⁵³ 這是針對幾天前何東昌對運動的評論所做的回應。

5月13日中午，只有七八個學生自願參加絕食。北京師範大學的口號是「為了推動中國民主，我們自願絕食」，這一話語同樣無法讓人信服，只有為數很少的幾名學生簽名參加絕食。在更為激進的北京大學，學運積極分子進行了各式各樣的演講來動員學生。但直到5月12日晚，仍然只有大約40名學生簽名參加絕食。就在此時，學運積極分子柴玲作了一個聲情並茂的演講。在她的演講中，她並未大肆渲染運動的民主性質，而是強調：「我絕食是為了看清政府的真面目，看看它究竟是打算鎮壓還是坐視不管，看看人民是否還有良知，看看中國是否還有良知、是否還有希望。」⁵⁴ 沈彤屬於最初反對絕食的大多數人之一，但柴玲的講話使他改變了看法。他回憶道：

柴玲的演講從她個人的感受出發，並且直截了當，但它比其他任何演講都更能打動我。我一整天都在想學生為甚麼要絕食，但是許多人的演講都沒能讓我滿意。柴玲讓我明白了為甚麼學生應該做出這樣的犧牲。我們要求與政府對話，並且得到他們的承認，但是我們是不是值得為了這兩件事情去獻身？我不這麼認為。但柴玲的演講讓我和其他很多學生認識到，絕食的目標遠遠不止於此。⁵⁵

在柴玲的演講之後，北大簽名參加絕食的人數由大約40人迅速上升到將近300人。倡導民主化的言辭沒有甚麼效果，但當柴玲呼籲學生用自己的生命來檢驗政府的誠意時，許多人報以了熱烈的回應。

上述分析說明了為甚麼雖然八九運動的目標是民主，但整個運動卻圍繞着道德問題而展開。由於國家合法性的基礎在於它的道德表現，從道德上挑戰政府也就顯得更為有力，從而能夠動員更多的群眾。因此，在絕食期間，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內的幾乎所有北京市民最後都支持學生。戒嚴令發布後，大部分北京市民還加入了群眾性的抵抗運動。他們中的大部分，尤其是那些來自基層國家機關的

⁵⁴ 摘自 Han and Hua (1990, 198)。

⁵⁵ Shen Tong (1990, 237)。

人，並不是為了民主而戰；他們是對一個置學生的安危於不顧，甚至還要鎮壓學生的中央政府表示抗議。簡單地說，很多人參加運動完全是出於義憤；而他們義憤完全是因為政府的行為違背了人民心目中好政府的形象。

現在，我想回過頭來談談為甚麼傳統的語言和行動對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的發展沒有起到重要作用。我認為這是出於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從本世紀初開始，列強的侵略對中國來說一直是最緊迫的問題，如何抵禦外侮一直是當時的中國政治精英們所關注的頭等大事。前已述及，當時國家合法性的首要基礎在於它抵禦外侮的能力，而非道德行為和促進經濟發展的能力；換言之，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中所宣揚的民族主義已經對政府的合法性構成挑戰，而一些與民族主義無關的簡單的道德話語卻很難打動人民。

其次，與八九學運相比，在前兩次運動中，一些社會和政治組織在學運中都發揮了顯著的作用。儘管這三次運動在早期均帶有很大的自發性，群情激憤、一時難以控制的場面在前兩次運動中也很普遍，但與八九不同的是，在前兩次運動中，有組織的政治力量隨即介入並逐漸主導了運動的發展。這些政治組織所採用的一些策略行動，使前兩次學生運動相對擺脫了情緒化的言辭和行動。接下來我將闡述這一問題。

運動的組織力量和運動的發展模式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在三次學生運動中，組織分別是如何塑造運動中參與者的行動和運動的進程的。限於篇幅，我的討論將集中考察三次學生運動背後的主要政治力量，即：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國民黨，1935-1936年間一二·九運動中的共產黨，以及1989年運動中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我的討論將限於給出每次運動中的一個關鍵事例。以下從五四運動開始。

我們知道，絕大部分捲入五四運動的組織早在運動開始之前就已經成立了。這些組織具備獨立的資源、政治運作手段和清晰的利益要求。雖然國民黨顯然沒有直接介入五四運動的發動，但許多參與了運

動的組織卻都為國民黨或親國民黨人士所控制。五四運動一開始，許多這樣的組織就介入其中並給予支持，後來那些早年就參加革命、聲名顯赫的國民黨要員，也在運動的領導和協調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五四運動中，像中華各界聯合會這樣的組織，之所以能夠起到運動的協調和組織作用，主要是因為在它名下的各種團體都擁有獨立的組織資源和具有社會威望的領袖人物。⁵⁶

五四運動期間，國民黨高層官員不僅支持運動，而且成功地利用運動來推進自己的利益。國民黨支持運動所提出的民族主義目標，並希望通過運動來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但是，國民黨不想看到這場運動發展成為義和團般的排洋暴亂，也不希望運動損害中國的經濟。畢竟，他們並不想由此而引發另一場革命。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運動的行為模式上。到1919年6月時，運動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上海。6月5日，包括上海工人在內的工商業人士，發起了大規模的罷工以支持學生。儘管當時國民黨控制着上海的大部分工會，但它還是防患未然地做了許多工作，以避免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可能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後果。罷工一開始，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就發表了社論，呼籲工人要「維持秩序，不要捲入任何暴動」。⁵⁷在隨後的幾天內，國民黨通過《民國日報》及其他主要報紙，再度重申了罷工的目標和策略。國民黨強調，罷工並不是針對中國的資本家和西方人，而只是針對日本和北洋政府中的一小撮賣國賊，它甚至要求在租界做各種服務性工作的人員不要參加罷工，以免嚴重影響在華洋人的日常生活。最後，當北洋政府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這三個公認的親日派賣國賊的消息傳到上海後，在國民黨控制下的工會馬上就停止了罷工；當時，上海的學生領袖有不同意見。為此，孫中山立刻邀請主要的學生領袖到

⁵⁶ 中華各界聯合會是由中華學生會、婦女愛國同志會、基督教民族拯救會、中華商會、中華記者協會，以及其他一些包括工人、士紳和宗教人士在內的協會共同組成的。它於1919年6月5日在上海成立，當時的會議是由上海學生會組織的，著名的國民黨要人如黃炎培、葉儲倉和辜孟麟等主持了會議。

⁵⁷ 《民國日報》(1919.6.6)。

在上海的寓所。⁵⁸ 會見時，他告訴學生，已經到了恢復秩序的時候，並且要求學生去積極說服上海的商人馬上結束罷市，⁵⁹ 學生們立即同意。翌日，即6月12日，上海的學生組織了一次慶祝「勝利」的示威遊行，並借此勸說店主們結束罷市。如果沒有國民黨的支持和干預，運動不可能發生這樣的大轉變。

與五四運動相比，一二·九運動發生前夕，中國的社會中層組織相對較為薄弱。事實上，在當時，除受美國和美國自由主義影響的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以外，北京絕大多數大學中的政治組織在國民黨的高壓政策下，均已不復存在或極度萎縮。因此，跟五四運動相比，一二·九學運的興起更具自發性。儘管如此，很多在運動的發起中發揮重要作用並取得運動領導權的學生都要麼是左派，要麼是中共地下黨員。而且，在一二·九運動之前，一個名為「中國軍事抵抗同盟」的中共外圍組織就已經將各校的激進學生組織起來。在一二·九運動爆發之際，這個組織已經在北京好幾所大學和高中設立了分部。最後，中國共產黨在1935年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嚴密紀律的列寧主義政黨，這就意味着它的所有成員都必須聽從上級組織的決定。這些因素均為中共在一些大城市裏（尤其是在北京和天津）逐漸掌握運動的領導權創造了條件。

與五四運動期間的國民黨一樣，中共領導人也是基於民族主義而支持一二·九運動的，他們同樣將這次運動看成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機會，可以藉此重新贏取本身在城市的政治影響力，並且可以跟國民黨及其他政治勢力結成抗日統一戰綫。顯然，此時中共對過分激進的行動沒有甚麼興趣。

⁵⁸ 五四運動期間，孫中山曾數次召見學生領袖，傳達自己的策略性建議。例如，上海學生是5月26日開始罷課的，但上海的學生領袖對下一步行動完全沒有主張。5月29日，孫中山派人和學生領袖見面，並傳達了他的意見。孫中山建議學生大膽行動，以此激起民眾的憤怒（朱仲華 1982）。兩天後，為紀念在北京罹難的一個學生，上海學生發起了一場紀念性的示威活動。據報道，30,000名群眾參加了示威。

⁵⁹ 劉永明（1990, 188）。當時的許多店主承諾，如果沒有得到學生的同意，他們的店鋪不會開市。

一二·九運動一開始並沒有受到在陝北的中共中央的注意。但是，中共高層很快就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時機。運動開始後不久，中共就委派其重要成員劉少奇前往天津負責中共北方局的工作，劉少奇的直接任務就是掌握對這場運動的領導權。此時正值郭清遇害，郭清是一名在獄中被毆打至死的高中學生。北京的學生對此義憤填膺，在北京大學校內設置靈堂並集會抗議；但是，北京地方當局禁止這次集會並在北大周邊佈置了大批軍警，使學生們非常氣憤。當一名學生衝到台上建議抬棺出校遊行時，大多數學生都積極響應，但示威者卻遭到無情的鎮壓。最終，只有六七百名學生成功地走上街頭參與遊行。他們中有百多人受傷，53名被捕，包括七名重要的學生領袖。這一行動很快被劉少奇斥為「極端左傾」的機會主義行為，⁶⁰ 劉少奇借此重組了中共北京市委，撤銷了那些與中共中央政策意見不一的人員的職務，還特地寫信要求學生不要再採取過激行為，要求他們復課、尊敬師長和父母。⁶¹ 劉少奇也希望學生能夠區別對待南京政府和北京的軍隊領袖宋哲元，他提出的口號是「支持宋主席領導抗日！」、「支持29軍對日作戰！」他還與數百名國民黨人士進行頻繁接觸，以爭取他們的同情。劉的努力沒有白費。從那以後，北京學生不再採取過激行動；宋哲元也有所緩和，並釋放了被捕的學生。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一二·九運動改變了方向。

以上案例表明，中國學生的確在運動中易於採取一些像比如葬禮抗議等深具文化特色的集群行動。但它同樣表明，文化對社會行動的影響並不像一些文化理論家所認為的那樣有決定性的。學生們在一二·九運動中發動了一場憤怒的葬禮遊行，但是一旦被鎮壓，他們並沒有採取進一步的過激行動；相反，葬禮遊行被指責為極端左傾，運動轉走一條不同的路綫。運動之所以能夠實現如此大的改向，完全是因為一些學生組織從中發揮了作用，而這些組織要麼由共產黨員直接領導，要麼被一些與共產黨有聯繫密切、並且無條件服從黨的領導的左翼學生所控制。

⁶⁰ 劉少奇是文革之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文革期間，他被開除黨籍，不久去世。

⁶¹ 這篇文章在1987年重新刊印，題為〈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劉少奇1987）。

與前兩次學生運動相比，八九運動是在一個幾乎沒有獨立於國家之外的中層組織的社會中發起的；像五四運動中的國民黨或一二·九運動中的共產黨這樣一些資源豐富、頗具政治經驗的反對黨，在80年代根本就不存在。在八九運動中出現的所有社會運動組織，都是在運動開始之後才成立的，這些組織成立倉促，其領導人也未通過具備一定人數的和合理的程序而產生，領導人本身也沒有甚麼組織運動的經驗（見第六章）。運動的發展不僅導致許多新的組織的成立，而且將許多想法各異、但又頗具政治野心的學生推到了前台。這些學生，不管他們是否屬於學運的領導層，都只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由於當時很多學生都對社會有各種各樣的不滿，任何類型的激進行動都能吸引到相當數目的追隨者。在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中，運動組織都逐漸贏取了對運動的領導權，但在八九學運中則恰恰相反。隨着運動的發展，一些主要的組織日益分裂和邊緣化，運動則越來越轉化為自發性的群眾運動。

那時，在影響力上唯一能與五四時期的國民黨和一二·九時期的共產黨相比的政治力量，就要數一些主要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了。他們通過自己的著作、在校園集會上的演講以及其他行動，為運動的發起開闢了道路，也由此贏得了部分學生的尊重（見第二章）。不過，那些與自由派知識分子聯繫最緊密、對中國的問題和運動的目標理解較深的學生，在運動中的地位卻一天不如一天，並最終讓位於那些通過激進行動而獲得人們信任的學生。而且，由於害怕運動被鎮壓，一些主要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從運動一開始就小心翼翼，與學生保持距離（見第六、七章）。等到他們大規模地捲入運動時，已經是5月14日了，那已經是絕食開始後的第二天。而且，他們最初是充當政府和激進學生之間的斡旋者，希望能結束絕食運動。但是，他們的努力不僅毫無成效，而且他們曖昧的立場更進一步削弱了他們在運動中本來就已很微弱的影響。到了5月下旬，自由派知識分子越來越擔心運動在將來的走向，於是牽頭成立了「聯席會議」，宣稱要將北京參與運動的各方力量都團結進來。可惜這個組織既未能控制住運動的大局，更未能避免悲劇的發生，這可歸咎於80年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與五四運動時期的國民黨以及一二·九運動時期的共產黨都不相同，前者既沒有可資利用

的組織資源，又缺乏應有的政治經驗。⁶² 在這種形勢下，資歷就成為他們唯一可用的資源。然而，與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人相比，80年代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根本就沒有任何「革命資歷」可言。與八九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激進學生不同，自由派知識分子是後來才參加運動的，並且沒有參加被認為最足以體現獻身精神的絕食運動；⁶³ 所以，他們始終未能掌握這次學運。事實上，「聯席會議」所做出的所有討論和決定最後都成了一紙空文。隨着時間的推移，運動越來越受到情緒和激進行動的支配。這最終將運動推向了與政府的正面衝突——悲劇發生了。

結 論

本章將八九學運與五四運動及一二·九運動中的行動模式作比較，我從中發現到，八九學運的話語和行為模式主要具有以下三個鮮明特徵：其一，它在表面上更親西方；其二，它富有強烈的共產主義群眾動員的色彩，特別是那些在文革中盛行的動員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比起前兩次運動來說顯得更為傳統。如果說我們可以用國際環境的變化、運動目標的差異及以往集群行動的經驗積累來解釋前兩點的話，那麼，最後一個特徵只有通過三次運動中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才能得到解釋。

在80年代後期，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呈現出三個相互交織的特徵：一統的集權國家、績效合法性，以及國家之外的社會組織的薄弱。本章證明，由於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社會組織薄弱不堪，自發性集

⁶² 正如第六章中所展示的那樣，中國一些主要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危機中的表現往往與年輕學生們一樣幼稚而激進。

⁶³ 這突出地表現在絕食剛開始時，吾爾開希對12名主要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評論（Hinton and Gordon 1997, 121-23）：「知識分子的問題是他們扮演了一個錯誤的角色。他們充當學生和政府之間的斡旋者。但是，是我們把政府逼到談判桌上的。這是40年來的第一次，但我們做到了。是我們，學生們，充當了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是我們邀請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隊伍。但是他們來到廣場上，把我們當成小孩子。他們對我們說，我們走得太遠了，我們應該循序漸進。他們有甚麼資格來批評我們？」（粗體為本書作者所加）

群行為在八九運動進程中越來越佔上風。並且，由於大量自發行為往往在一個地方同時發生，旁觀者的心態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本章的一個中心論點即是，傳統文化之所以對八九學運的發展起到關鍵作用，主要是因為當時學生和北京市民都是以道德表現來衡量政府行為的。如果學生用一些文化上的或者道義上的行動來挑戰政府，而政府的反應又不夠得體，那麼學生和市民們必然會義憤填膺。

自70年代始，社會運動研究的重心已經從社會心理轉向資源動員和政治過程。如果說，先前的集群行為研究者把社會運動看成是受情緒感染的群體行為，強調資源動員和政治過程的學者則視運動中的行動為運動組織者的理性策略。事實上，在大部分社會運動中，自發性和組織行為都很重要。⁶⁴ 在這一章中我表明，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組織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取決於國家、社會關係。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之所以逐漸為特定策略所主導，主要是因為當時國家精英高度分裂，以及國家之外還存在着較為強大的組織力量。而八九運動之所以會受到情緒的支配，正是因為沒有任何組織化的力量去填補運動發展所帶來的政治真空。從這一角度來看，西方社會運動的研究視角從社會心理轉向資源動員和政治過程其實是反映了某種社會轉型。在西方早期，由於社會中層組織發展尚算薄弱，那時的社會運動與今天相比更具有自發性，也更受情緒的驅動。而在今天的西方社會，民主體制日益健全，社會中層組織發達，社會運動大多是在一個「多重組織域」(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 之下運作，相應地，組織及其策略在社會運動的發展中就變得越來越重要。這也從一個側面解釋了西方社會運動研究理論的轉變。

我的研究表明，社會運動的進程不僅視乎運動組織者的策略，還取決於國家與運動參與者之間、運動積極分子與同情的旁觀者之間、通過一系列互動所生成的規範和符號。因此，就強調情緒以及符號互動過程中情緒行為的生成過程在運動中的重要性點而言，本研究與經典的社會心理學視角有相似之處；⁶⁵ 不同的是，經典理論並未討論符

⁶⁴ Killian (1984) ; McPhail (1991) ; Oliver (1989) .

⁶⁵ 例如Blumer (1946) ; Turner and Killian (1987) .

號和規範的結構基礎。我在這一章的研究中發現，一場社會運動的規範或「解讀模式」(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總是圍繞特定的、合法的象徵符號而產生的，而後者是由特定的國家、社會關係所決定的。正是通過這一點，我的研究得以將微觀的策略過程和情感過程，跟宏觀的社會結構貫通起來。

國家、運動中的溝通和 公眾輿論的產生

社會運動屬於公共事件，而有緣遭逢某個特定社會運動的人，對於這一運動總會產生一定的看法。¹ 因此，媒體對一個運動的報道及其報道方式會對大眾對此運動的認知、支持度，以及發展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² 儘管學者對於媒體的性質各有截然不同的認識，但大多數人都認為西方的傳媒和公眾輿論是相對保守的。人們普遍認為，媒體基本上是傳統新聞源的一個傳聲筒。³ 如果一則新聞故事是關於政府的，通常媒體報道的則是官方的意見；⁴ 對於那些反對現體制的社會運動，媒體都傾向視而不見。⁵ 媒體即使報道一場社會運動，也會對運動的規模和目標輕描淡寫。⁶ 公眾輿論也具有這種扭曲的特

¹ 見Turner (1969) 有關公眾是如何認識社會運動的討論。

² Kielbowicz and Scherer (1986); Ryan (1991).

³ Gans (1979).

⁴ 見Sigal (1973)。這在關於國際新聞的報導中尤其普遍 (Ball-Rokcach and DeFleur 1976; Dickson 1992)。在美國，蘇聯擊落南韓的一架客機，這次事件被媒體描繪成一次道德性事件，而美國擊落伊朗的客機卻只是一個技術問題 (Entman 1991)。海灣戰爭期間，美國的新聞主要強調美軍在軍事和技術上的優勢，卻忽略戰爭的其他方面，尤其是伊拉克平民的傷亡 (Griffin and Lee 1995)。因此，在美國的新聞報道中，海灣戰爭如同一場「任天堂遊戲機戰爭」 (Kellner 1992)。

⁵ 有一些研究為我們描繪了一幅西方媒體報導社會運動的多元畫面 (如Goldenberg 1975; Greenberg 1985; Szasz 1994)。然而，這些研究關注的僅是那些帶有政治性質的利益集團式的社會運動。這類運動往往着眼於一些細枝末節的社會改良，得到一些富有資源的精英的組織或支持，對體制進行的是一種「忠誠的反對」。

⁶ Gitlin (1980); Molotch (1979).

徵。西方的公眾輿論一般都受媒體的左右。在面對那些沒有親身經歷的事件時，這情況更是這樣。⁷ 所以，甘遜 (William A. Gamson) 與莫迪里亞尼 (Andre Modigliani) 發現，美國公眾對核能的性質的看法與美國媒體的宣傳之間密切關聯。⁸ 只有在大家親身經歷過的問題上，大眾對媒體報道的反映才會呈現加多元和歧異。⁹

然而，在研究中我發現，中國的社會運動、傳媒、公眾輿論三者之間的互動與西方社會有着根本的不同。一方面，八九學運一開始，中國的新聞記者就試圖擺脫政府的控制，對運動進行正面報道；另一方面，當媒體對運動進行負面報道時，中國的公眾輿論並未緊貼媒體，而是追隨謠言。然而，一旦政府削弱媒體的控制，對運動的正面報道立刻就壟斷了新聞界，輿論也逐漸向媒體靠攏，謠言不再顯得那麼重要。傳媒與輿論之間的這種關係，本身就是運動進程的一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將八九學運推向了悲劇。在這一章，我將對媒體與公眾輿論之間的互動模式及其對八九學運的影響進行描述和分析。

本章將首先討論八九學運之前中國的新聞報道所涵蓋的範圍。由於八九學運是憑藉一項多重的渠道而傳播的，當中包括國內媒體、國際媒體、學生的廣播站以及口頭交流等等；我在第二部分將通過比較來確定哪一種傳播方式對運動的發展最為重要，並將其作為分析的重點。本章的主體部分將着重敘述八九學運期間中國媒體和公眾輿論的表現。為了保證敘述的連貫性，我在最後一節才會闡釋媒體和輿論的

⁷ Lang and Lang (1981); Pride (1995).

⁸ Gamson and Modigliani (1989).

⁹ 媒體話語與公眾輿論之間的關係一直是爭論的熱點。如果說早期的研究一般認為公眾會對同一個信息來源做出多元反應的話 (如Hastorf and Cantril 1954)，那麼，比較晚近的研究都傾向於認為，西方的公眾一般都會受媒體的左右 (如Connell 1980; Hall et al. 1978; Herman and Chomsky 1988)，介乎這兩種觀點之間。一些研究者認為，根據話題、受眾，以及與個人的關聯程度的不同，公眾對媒體的反應具有程度不等的自主性 (Ball-Rokeach and Defleur 1982; McNair 1988)。但是，沒有研究表明西方公眾輿論會逆媒體而行。關於這方面的更多的討論可以參考Curran (1990)。

表現及其對運動發展的影響。由於我的分析工具主要是前面已經論述的國家-社會關係模型，本章將不再專門涉及這方面的理論問題。

八九學運前中國媒體的新聞報道

有人說，中國的媒體和公眾輿論很容易走向極端，是因為中國的新聞報道面較諸西方媒體狹窄得多，前者的內容又與社會現實相距甚遠。在研究中國媒體的學者¹⁰和要求政府更加開明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間，這個觀點幾乎成了一種共識。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媒體的報道面的確極其狹窄，其內容也與社會現實距離甚遠。但是在當時，正是廣大中國記者的全力配合，如此狹隘和嚴格的新聞報道才成為可能。80年代的改革也觸及到了中國的新聞媒體，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新聞記者開始引入西方的一些新聞原則，如及時性、客觀性、可讀性等等；一些主要媒體的編輯也開始擁有更多的新聞自主權。當時，知識分子的自由傾向興起（我在第二章已經討論過），中國記者開始質疑中共對媒體的壟斷，並要求有更多的新聞自由。¹¹在國家推動的體制改革和新聞記者尋求開放的雙重努力下，中國新聞報道的範圍已有了很大的拓寬。這一節我將着重考察八九學運前夕一家主要媒體的新聞內容，以便讀者對當時媒體的具體情形有一個直觀認識。為使分析在有限的篇幅內達到足夠的深度，我將主要分析198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國內新聞的主要內容。¹²

¹⁰ Lee Chin-Chuan (1994); 馬妙華、劉銳紹、陳天權 (1989); Zhao and Shen (1993).

¹¹ Zhao Yuezhi (1998) 對80年代中期中國媒體普遍的自由化傾向有更為詳細的敘述。

¹² 我選擇《人民日報》是因為它是中國首要的官方報紙。3月15日是星期三，這一天沒有發生任何重大政治事件。我選擇這一天，本來是因為它距八九學運的發生正好一個月時間，後來我才發現每逢週三、週六這一版上的負面新聞的比例總會有所上升（我在文章會解釋）。由於這種偏差是系統性的，而我的目的又在於發掘負面報道的程度，所以這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80年代後期，《人民日報》每天出八版：¹³ 第一版主要刊登重大國內國際新聞；第二版是一般國內新聞；第三版是一般國際新聞；第七版和第八版則主要是一些人文趣事、詩歌和散文，有時還包括一些有深度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另外還有廣告；第四、五、六版的內容每天會有變化；第四版有一個固定的「體育」欄目，其餘欄目則在「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之間輪換，如果輪到「社會生活」，我們就會看到更多的負面故事。第五版每周輪換三個欄目——「經濟」、「政治與法律」以及「國內專頁(教科文)」。¹⁴ 1989年初，逢周三和周六的「教科文」一欄，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知識分子每況愈下的境遇和教育危機。第六版主要刊登一些文學作品、文藝批評、社會理論、回憶錄及其他文化事件；逢周三和周六這一版就成了「讀者來信」。在1988年到1989年間，這一欄充斥着負面新聞。

1989年3月15日的《人民日報》一共有60條國內新聞，其中第一版10條，第二版21條，第四版11條，第五版5條，第六版13條。60條新聞中，有28條(46.7%)是負面的(表10.1)。¹⁴ 在後幾版中負面新聞的比重有很大的上升。第一版中有10%的新聞是負面的，而到第六版就上升到92.3%。這一點不難理解，因為前兩個版面主要報道一些政府行為，編輯是沒有主動權的。但到第四版，編輯就有權決定刊登的題目和內容了，負面新聞也就因此而增多。

讓我們首先來看一下第四版上的新聞。這一版的「社會生活」中刊登了七篇報道，都是有關犯罪和社會失範等問題的，其中有六篇是負面的。試舉兩例：一篇文章題為〈用公車探視罪犯令人憂慮〉，報道很多北京市民利用國家機關和政府的公車去監獄探訪犯罪的親屬，文章結尾列出了一名記者於3月8日在北京一家青少年監獄前記下的32個車牌號；這則新聞記錄了司空見慣的官僚腐敗，恰巧這是即將到來的學生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見第五章)，它也使人們聯想到，政府官員(那些由政府配備轎車的人們)的子女的犯罪率比其他群體要高得多。另一

¹³ 參見Chang Won Ho (1989, ch. 3) 有關《人民日報》版面安排的討論。

¹⁴ 所謂「負面」，並不是指交通事故、謀殺之類的報道，而是指它們側重於揭露一些與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有關的社會問題。

表10.1 198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國內新聞涉及的內容

	版面				
	一	二	四	五	六
新聞的新聞條目總數	10	21	11	5	13
負面報道條目數	1	5	7	3	12
負面報道所佔的百分比	10.0	23.8	63.6	60.0	92.3

註：《人民日報》是中國最大的官方報紙。

該文章題為〈某些農村事實婚姻及早婚嚴重〉，提醒人們注意農村的混亂狀況。據該文報道，僅在廣東的一個縣，記者就發現有14,700對夫婦沒有依法辦理結婚手續。

第五版是「國內專頁(教科文)」。這一版上的五個故事都是負面的。根據我的研究目的，我只把其中三個界定為負面報道，另外兩個是關於溺愛兒童的，與政治沒有太大關係。這三則故事都是關於中國的教育危機的，而教育危機是八九學運的另一個重要主題(見第三章和第五章)。第一篇是題為〈給象牙塔一個立足之地〉的評論。文章批評當時盛行的經商浪潮，強調「並不是所有學術成果與藝術產品都能換成現錢的。如果把一切活動都置於由經濟杠杆支撐的唯一天平上，有相當一批知識分子就只能改行去謀生或掙錢。」¹⁵ 另一篇文章則報道了河南一所師範學校舉辦的一場關於「新讀書無用論」的討論。大部分學生都認為教育是重要的，但他們同時抱怨說要致富不一定需要讀書，讀書越多越沒有出路。

在第六版的「讀者來信」中，有13篇文章專門談到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管理問題。這些文章反映了人們對經濟危機和高通貨膨脹的普遍關注，這也是八九學運時民憤的主要源頭之一(見第五章)。這一版上的一篇領頭文章是由《人民日報》記者撰寫的題為〈在偷盜的困擾中〉的調查報告，描述了一家大型鋼鐵廠附近的居民是如何利用手推車、卡車甚至拖拉機從廠裏盜竊物資的。有時候，一些人竟猖獗到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把鋼材運走；在廠區周圍，則有幾百家店鋪專門收購「廢品」，通過竊去牟取暴利。

¹⁵ 見第三章關於1988年經商熱對知識分子的影響。

由此可見，即使在八九學運之前，官僚腐敗、經濟危機、知識分子待遇等問題業已成為大多數正統官方報紙所關心的核心問題。大量負面新聞及其報道方式都說明，至少在80年代後期，中國媒體新聞報道的廣度在某些方面並不遜於西方。這並不是說中國記者比西方同行享有更多自由，而是說，西方記者雖然在理論上享有更高程度的有法律保障的自由，但實際上他們往往只行使了其中很小一部分權利。而80年代後期的中國記者雖然而對隨時降臨的政府壓制，但他們卻在最大的限度裏充分利用了有限的自由，並同時把西方同行在法律上所享有的自由度當作自己奮鬥的目標。¹⁶

運動期間的重要通訊渠道

在西方國家，大部分人是通過正式的國內媒體來瞭解社會運動的；而在中國，美國之音 (VOA, Voice of America) 和英國廣播公司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之類的國際媒體則構成了市民的重要消息來源之一。在八九學運中，一些非正式的通訊手段，如口頭傳播、大字報、小冊子和學生廣播等方式，也在學運通訊和公眾輿論的形成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¹⁷ 因此，在對媒體在八九學運期間的表現及其對公眾輿論的影響進行整體分析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確定不同的通訊手段在八九期間所發揮的作用。研究八九學運新聞通訊的學者往往強調國際媒體的重要性，¹⁸ 所以在本章中，我將首先對八九學運期間國際媒體的重要性做出評價。我這兒重點討論何舟 (He Zhou)

¹⁶ 記者們採用的策略被生動地稱為「打擦邊球」，就是說球恰好打在乒乓球台的邊沿上 (Hsiao and Yang 1990)。

¹⁷ 正式通訊手段是指電視、國際和國內的廣播電台，以及定期發行的報紙。非正式通訊手段是指大字報、傳單、公開演講、學生掌握的廣播站和報紙，以及口口相傳。關於學生的廣播站，可以參見第四章，註34。

¹⁸ 見He and Zhu (1994) 以及Mark (1991)。請注意，中國政府同樣指責美國之音是學運的「外圍」和謠言中心 (陳希同1989)。單單在1989年6月，《人民日報》就發表了五篇抨擊美國之音報導運動的文章和新聞。

與朱建華 (Zhu Jianhua) 關於八九期間美國之音的研究¹⁹。我之所以特別提及這篇論文，是因為其分析和研究比其他同類作品要深入得多。

何舟與朱建華的研究以71位現居北美的中國學生的訪談為基礎，這些學生八九學運時都身在中國。根據訪談結果，何舟與朱建華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美國之音向千千萬萬中國人傳遞了通過其他途徑得不到的信息；它不僅為學運設定了宗旨（親民主運動），強化了人們的反政府態度，而且對整個運動起到了協調作用。我認為，雖然大部分學生和普通北京市民的確在運動期間經常收聽美國之音或英國廣播公司，但何舟與朱建華二人無疑誇大了外國媒體的重要性。比如，八九學運的民主宗旨並不是美國之音在運動之初才提出來的；早在運動發生之前，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激進學生就已經在校園裏組織了大量講座和討論活動，傳播「異見性」觀念。²⁰ 比如，北京大學的民主沙龍早在運動開始之前就已經成立了，它與美國之音的報道沒有甚麼直接關係，但其關於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理念後來卻成為運動的宗旨。總之，八九學運所表現出的親民主特徵是與80年代後期中國知識界的思潮和話語的直接產物，相形之下，外國媒體的影響倒在其次。

更進一步，在研究中，我曾問我的36名受訪者：「你和你的同學是通過甚麼途徑來瞭解運動的？」²¹ 我列出的備選答案，包括西方媒體（比如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國內媒體、直接觀察、眾口相傳、大字報、學生廣播以及演講等。我要求他們將選項按重要性排序，結果只有15名受訪者（總樣本的16.5%）將國外媒體作為他們的信息來源之一（表10.2）。但在何舟和朱建華的研究中，有27%的受訪者將國外媒體列為主要的信息來源。這一差異的成因很多，我在這裏試指出其中兩個主要方面。

¹⁹ He and Zhu (1994).

²⁰ 參見第二、第五章。

²¹ 我在設計這個問題時，曾期望發現國外媒體對八九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訪談中，我發現實際情形並非如此。於是在後面的訪談中我逐漸放棄這個問題。但在整理資料時，我意識到我這樣做使信息的完整性受到了損失。

表10.2 八九學運中我的受訪者的主要信息來源

	半正式渠道		非正式渠道		正式渠道	
	大字報	學生廣播	個人觀察	眾口相傳	官方媒體	外國媒體
樣本	20	15	18	13	10	15
平均值	1.17	1.73	1.44	2.08	2.00	3.00
標準誤差	0.08	0.20	0.20	0.23	0.20	0.19

註：「樣本」代表做出特定選擇的人數，「標準誤差」是樣本的標準差。有36名受訪者接受了我的訪問（詳情見正文），總共做了91項選擇。「平均值」代表受訪者對該選項重要性的平均估計。

首先，受訪者的來源和所問的問題不同。我的36名受訪者全部來自北京，而何舟和朱建華的71名受訪者中卻有30人來自非北京地區。何朱二人的問題是「你主要通過下列哪些渠道獲得關於六四事件的信息？」雖然用「六四事件」來指代整個八九運動在中國十分普遍，但這個詞語還是會引導一些受訪者僅將注意力放在6月4日的軍事鎮壓上。由於中國大部分官方媒體對軍事鎮壓保持沉默，學生，尤其是那些外地學生，不得不依賴於國外媒體獲取有關信息。

其次，何舟和朱建華只給受訪者三個選擇：中國媒體、國外媒體，以及個人途徑（個人觀察和口頭傳播）。但我的受訪者大部分都列出了我所定義的半正式信息渠道——比如，大字報和學生控制的廣播站——作為消息來源，而何舟的問卷根本就沒有這個選項。從邏輯上講，缺失一些重要選項會迫使受訪者作出其他選擇。如果選項缺失會使人們的注意力均勻地轉移到其他選項，那麼去掉半正式渠道這一項，我的36名受訪者所做出的91個選擇就會下降到56個。這樣，選擇外國媒體的比率將上升到26.8%，與何朱二人的結論是非常接近的。

此外，有多少人選擇國外媒體作為他們的信息來源這個問題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信息來源在他們對運動的認知過程中佔了甚麼位置。因此，我讓受訪者對他們賴以認識八九運動的新聞途徑進行排序。它們的等級序列用數字表示，1表示最重要，6表示最不重要（大部分人只選擇了三四個）。結果發現，大字報（平均值=1.30，標準差=0.12）、學生廣播站（平均值=1.73，標準差=0.20）和直接觀察（平均

值=1.44，標準差=0.20)的重要性都比國外媒體(平均值=3.00，標準差=0.19)要大得多。事實上，我的受訪者群沒有一個人把外國媒體，即美國之音和英國廣播公司，看成他們最重要的信息來源。而且，其中有三個人在未經詢問的情況下就評論說，國外的新聞對他們的影響並不大，因為從其他途徑獲得的信息比國外同類報道更為豐富。由於西方記者對中國文化缺乏深刻的瞭解，其新聞報道所關注的往往不是運動發展的內在機制，而是運動的符號和標語、運動中的明星人物、未經證實的傳言，以及一些趣味故事。總而言之，對大部分北京學生來說，從非官方通訊渠道中獲得的信息更能抓住他們的心，從而打動他們。

外國媒體的影響也因人群而異。戈爾巴喬夫訪華曾吸引了大約1,200名外國記者來到北京，²²但一到北京，那些記者就轉而關注八九學運。他們對運動表現出來的濃厚興趣以及他們對學運積極分子的頻繁訪談和報道，必然會給參加遊行的人造成一種「整個世界都在看着我們」的感覺，這無疑會大大提高他們的信心。而且，外國媒體的報道把海外華人也發動了起來；5月中旬以後，大批海外捐助湧向北京(見第六章)。外國媒體的關注還促使學生們採取了很多旨在吸引外國媒體的策略，比如說打V字型手勢、寫英文標語、頻繁召開記者招待會等等。外國媒體對學運的影響是非常複雜的，但從整體上看，它們在決定北京學生和市民對運動的理解和參與方面，並不像其他通訊渠道那麼重要。

我的受訪者中有十位選擇中國官方媒體作為他們的信息來源之一，相對其他選項而言，選擇這一項的人數最少；然而，那些選擇官方媒體的人都認為官方媒體是他們的一個重要信息來源(平均值=2.00，標準差=0.20)，比國外媒體更為重要。關於這一點，可以有好幾種解釋。我的訪談結果使我得出一個結論——運動期間沒有任何一個通訊渠道能對公眾輿論起持續的影響力。中國的官方媒體在大部分時間保持沉默，使人們不得不借助非官方媒體來獲取信息；但是，也有一段時間中國政府對官方媒體失去了控制。在那段時間，官方媒體

²² Mark (1991, 268).

以極其正面方式報道了運動，人們也開始依賴官方媒體來瞭解情況。由於我關於媒體影響力的提問，並沒有讓受訪者區分各類媒體對他們的影響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因此我的受訪者不得不根據他們的整體印象來回答。在我的訪談中，選擇官方媒體作為他們瞭解八九學運的一個重要渠道的人相對較少，這很可能是因為在整個運動中官方媒體能夠自由報道學運的時間相對短暫。

媒體、公眾輿論與八九學運態勢

我在前面已經談到，北京學生和市民往往同時借助中國官方媒體和其他非正式通訊渠道來瞭解和認識八九學運。下面，我將以官方媒體為中心，對官方媒體和非正式通訊渠道是如何交替塑造北京學生和市民對八九學運的態度，並進而影響他們對學運的參與性質和程度，進行一個實證分析。

運動中的官方媒體一瞥

這裏我想集中分析一下《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刊登的與八九學運相關的新聞。我之所以選擇了這兩份報紙是因為它們被公認為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官方報紙。²³ 表10.3列出了這兩份報紙上有關八九學運的文章和新聞的數量，以及我對這些文章和新聞進行內容分析的結果。²⁴ 如果一篇文章或新聞的標題或關鍵詞含有諸如「動亂」、「反革命暴亂」、「反對四項基本原則」、「資產階級自由化」、「下令逮捕」或「支持中共中央的決定」之類的詞句，我就將該文界定為對運動進行的是「負面」評價；如果含有「愛國行動」、「熱淚盈眶」、「表達（對學生的）支持」、「民主（是好的）」、「（運動）是理性的、和平的、有序的」或「我

²³ 中國的中央電視台（CCTV,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在運動中也有類似表現。見Friedland and Zhong (1996)。

²⁴ 從新聞報道角度來研究社會運動已經不是新鮮事了（Franzosi 1987; Mueller 1997; Olzak 1989; Shapiro and Markoff 1998）。雖然本研究的側重點與他們不同，但也受到這個傳統的影響。

對學生致敬」之類的詞彙，那麼該文對學運的評價就被界定為「正面」。最後，如果報道描述的是一個單純的事件過程，那麼它就被界定為「中性的」。在一個威權國家裏，官方媒體一般不會對反對派的行動進行客觀報道。所以，許多我界定為中性的文章事實上對學運都持有最正面的立場，中立與正面的文章之間只有程度上的差別。如果說中性的文章還試圖在學生與政府立場之間保持一定平衡的話，那麼正面文章的觀點則完全倒向了學生。²⁵

這兩份報紙對運動的報道方式略有不同(表10.3)。《人民日報》對運動做正面報道的時間比《光明日報》晚。5月13日以前，當《光明日報》已經開始正面報道時，《人民日報》的調子還游離於中性和負面之間。

表10.3 中國兩大官方報紙對八九學運的報道模式

	文章數						
	4月27日 前	4月28日- 5月4日	5月5日- 5月13日	5月14日- 5月19日	5月20日- 5月24日	5月25日- 5月31日	6月1日- 6月4日
《人民日報》							
負面	10	6	0	0	10	30	20
中立	0	8	10	15	10	8	4
正面	0	0	0	17	6	3	1
《光明日報》							
負面	10	2	0	0	12	48	24
中立	0	9	7	11	10	7	0
正面	0	0	2	30	5	0	0
總數	20	25	19	73	53	96	49
國家對媒 體的控制 程度	受到國家 控制	國家開始失去 控制	國家控制 崩潰	國家試圖贏回 控制	國家再度 控制		

²⁵ 很多模稜兩可的文章也可以被歸在這一類。比如在5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北京五四學生遊行和平結束：香港股市上升〉，文中把運動和香港市民對經濟的信心關聯起來。論者可以認為這則報道旨在提醒政府，官方對運動的態度將會產生國際影響。但同時也可以認為，這則報道是讚揚政府對運動採取更具安撫性的策略。因此，我將其界定為「中性」。

但在5月20日發布戒嚴令之後，《光明日報》卻比《人民日報》表現得更為馴服。5月25日以後，《光明日報》已經不再刊登任何關於運動的正面報道，而《人民日報》直到6月2日仍在發佈正面消息。²⁶事實上，正如我在後面將會談到的，即使到6月4日，即中國政府實施軍事鎮壓那天，《人民日報》依然以暗示和隱喻的手法在一些文章中表達了對軍事鎮壓的憤慨。

我們可以把這兩份報紙報道八九學運的風格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4月15日到27日。在此期間，兩份報紙一共刊登了20篇與學運相關的文章，但所有這些文章都將運動描繪成一次非法動亂。第二個階段是從4月28日到5月13日，此時我們看到官方媒體逐漸開放，刊載了更多與學運有關的文章，與此同時，對學運套用中性甚至正面筆調的文章也越來越多。這一階段中間有一個清晰的分野：從4月28日到5月4日，負面和中性的報道並存；而到5月5日以後，對運動的負面報道基本消失，正面報道逐漸湧現。政府開始失去對媒體的控制。

第三個階段大致從5月14—19日，幾乎涵蓋整個絕食階段。這一時期兩份報紙上發表關於運動的文章共73篇，許多都是刊登在頭版頭條的長篇文章。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非常正面的，負面的報道則徹底消失了。這時可以說，國家對媒體的控制崩潰了。第四階段是從5月20—31日，這是一個爭奪階段，正面、中性、負面，各種性質的報道同時並存，表明政府正在試圖奪回對媒體的控制權，而記者卻在進行抵抗。²⁷漸漸地，政府佔據了上風。因此在這一階段的初期，即

²⁶ 6月2日，一則短小的花邊報道〈六月的第一天：天安門廣場一瞥〉，出現在《人民日報》的頭版上。6月1日是國際兒童節，許多家長帶孩子去天安門廣場。這則報導描繪了天安門廣場一派其樂融融的場面，佔領廣場的學生們歡迎孩子們的到來，送給他們禮物，與他們合影，還表演了一些節目供孩子們娛樂。報導中的一位家長說他沒有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狀態表示不滿，讓他感到不滿的是廣場附近的兩個公園因戒嚴令而未對公眾開放。這篇文章顯然想表明，學生並沒有製造動亂；相反，是戒嚴令給北京市民的生活帶來了不便。

²⁷ 在幕後起決定作用的是總編輯和編委會的態度，而當時的大多數總編輯是「改革派」理念支配的。

5月20–24日，我們還能看到正面和中性的報道；但到了5月25日，正面報道的數量銳減，而負面報道則劇增。

最後一個階段從6月1日開始，期間出現的49篇相關文章中，只有五篇對運動持中性或正面評價。儘管記者的反抗是顯而易見的，但政府還是奪回了對媒體的控制權。下面我將把重心放在官方媒體上，詳細考察這五個階段中，北京學生和市民在運動中的行為分別是怎樣受到官方的正式報道和非官方通訊渠道所散布的種種謠言的交替影響的。

4月15–27日：媒體的抗爭、政府的壓制與謠言驅動下的動員

4月27日以前，官方媒體對學運或是視而不見或是進行負面報道，但許多記者，尤其是那些80年代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已經開始自發地收集運動的第一手信息了。他們從前方回來，寫出關於運動的正面報道，並敦促主編發表他們的文章。在這階段，報紙的主編們，尤其是那些大報的主編們，不論對運動同情與否，都成功地頂住了這股壓力。²⁸ 但是，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4月23日，在一份主要面向知識分子的小報《科技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的文章，文中正面描述了學生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上的行為；政府試圖阻止這一期報紙的發行，為了抵制政府，該報的許多編輯和記者親自出馬，將報紙送到各個郵局去。後來，北京的很多學校都張貼了這篇文章，文章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²⁹ 這件事雖然僅是千里之堤上的一個「蟻穴」，卻鼓舞了其他報業同行；在接下來的幾天裏，對運動持中性甚至正面評價的報道，開始出現在一些發行量更

²⁸ 根據Faison (1990) 的研究，運動剛開始不久，就有兩名《人民日報》的年輕記者把他們關於學生遊行的報道呈遞給他們的主編譚文瑞，希望能夠發表，但都沒有成功。

²⁹ 這家報紙的主編林澤新〔音譯〕實際上卻不想發表這篇文章 (Faison 1990, 148–49)，但最終讓步了。因為一些年輕記者說服了大多數職員，威脅如果文章不發，他們就集體辭職。

高的報紙上，包括《工人日報》、《農民日報》、《北京青年報》及《中國婦女報》等等。

期間，《世界經濟導報》與中共上海市委發生了一場衝突。對八九學運來說，這場衝突十分重要，因為各地的學生和記者馬上紛紛起來支持《世界經濟導報》，譴責上海市委，試圖通過這場運動推進新聞自由。《世界經濟導報》是上海的一家小報形式的周刊，發行量大約在30萬份左右。³⁰它在名義上歸上海市社會科學院領導；主編欽本立也是由政府任命的。然而，這家報紙主要依靠銷量和廣告收入來支付工資、其它成本和稅收。所以，它只能算一份半官方報紙——中國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混血兒。

80年代後期，《世界經濟導報》成為中國最敢言的報紙，同時也是當時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喉舌。³¹4月19日，《導報》的北京分部和《新觀察》雜誌合辦了一次紀念胡耀邦的討論會。一些敢言的知識分子，如戴晴、胡績偉、嚴家其、蘇紹智、任曉町、陳子明等均獲邀出席。他們討論了兩個問題——為胡耀邦恢復名譽，以及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他們認為，1987年胡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是一場「領導權力的非法變更」。嚴家其甚至說：「時至今日，中國的主要問題還是缺乏民主。一小部分人在完全不考慮人民利益的情況下，經過私下討論就做出了一個不得人心的決定。」

《導報》隨後準備了一篇長達六版的關於這次討論會的報道，打算在4月24日發表。上海當局聞訊後，要求對該報道進行預審。³²預審後，當局希望欽本立能夠刪除其中最為敏感的幾百字，其理由是與當

³⁰ 下文有關《世界經濟導報》的敘述，除非特別註明，均是參考Shen Jinguo (1995)；Faison (1990)；Hsiao and Yang (1990)；吳牟人等 (1989)。

³¹ 見第二章有關《世界經濟導報》在1988年的活動。

³² 在中國，新聞控制是通過預審體制實現的。改革前，所有官方媒體的新聞報道都須經過各級黨委的預審。如果《人民日報》要刊登一則重要新聞，它必須經過主管宣傳工作的最高領導的審查。整個80年代，預審機制從未廢除，但新聞選題越來越多地掌握在主編手中，媒體上出現的大部分新聞都無需預審了。這一套機制叫做編輯負責制。見Hong and Cuthbert (1991, 144) 對預審機制的進一步討論。

時的形勢不合拍。因為，五四運動70週年紀念日即將到來，北京的學生已經上街遊行了，這類內容必將激發學生，從而給政府帶來更多壓力，但是欽本立拒絕了這個要求。4月21日，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親自勸說欽本立主動改變內容，但是欽本立在與江澤民見面之前就已經下令將報紙付印了。等到上海當局發現時，報紙已經印出16萬份，其中一部分已經運往北京。4月23日，江澤民命令報紙停止印刷這一版(版A)，並與欽本立討論印製修改版(版B)。欽本立同意了江澤民的要求，但並沒有讓工人去印製新版。直到4月24日，修改版未見隻言片紙。這種對抗行為激怒了江澤民。4月26日，江代表上海市委撤銷了欽本立主編的職務，並派工作組對報社進行改組。江的這個決定讓上海政府一下子成為眾矢之的。不久，上海、北京兩地的記者、學生以及自由派知識分子，即抓住這個機會舉行各種形式的示威遊行，要求新聞自由。

儘管有這些插曲，當時主要的官方媒體還是處於國家的嚴格控制之下，學生主要依賴大字報、學生控制的廣播站，以及口耳相傳來獲取信息；因此，他們對運動的認識以及隨之而來的對運動的參與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謠言的左右。這一時期的主要謠言，比如我在第六章中已經討論過的「新華門慘案」和李鵬承諾在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後會見學生等等事件，引起了廣泛的憤怒，從而也刺激了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運動。

4月28日-5月13日：媒體的推動和政府的讓步

4月27日學生示威後，政府做了有限度的讓步。政府官員開始和學生對話，有關運動的一些客觀報道也開始出現在主要的官方媒體上。4月30日，趙紫陽從北朝鮮訪問回國後，進一步推動了這種做法。政府的讓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運動的發展。由於大部分學生對政府的讓步措施表示滿意，越來越多的大學開始復課，運動開始退潮。在這一階段，記者發起的抗議活動對於運動的維持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欽本立被解除主編職務後，許多記者聲援他。4月28日，《中國青年報》的18名記者和編輯致電《導報》：「我們向尊敬的《世界經濟導報》

及欽本立同志致敬！不被扭曲的新聞萬歲！」《中國日報》的75名記者和編輯也發來電報：「站起來吧——欽主編是新聞界的楷模；真理永恒——《導報》是十年改革的先鋒。」³³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婦女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及其他報刊的記者都紛紛致電支持欽本立。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和記者試圖通過法律途徑挑戰上海市委的決定；他們宣稱，由於欽本立的主編一職是上海市社會科學院和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任命的，共產黨無權撤掉其職務。因此，上海市委的這一舉動已經觸犯了中共在改革之初就宣布的「黨政分離」原則。事實上，《導報》北京分部在一些北京律師的支持下，甚至決定以誹謗罪起訴江澤民對欽本立的傷害。³⁴

這些抗議活動非常見效。4月27日以後，一些主要的官方報紙上都出現了對運動的客觀報道。5月5日，趙紫陽對胡啟立和芮杏文（當時兩位主管媒體和宣傳的高級官員）說：「把對遊行的報道放開一點，新聞透明度提高一點，風險不大。」³⁵趙紫陽的估計顯然反映了他本人的智囊團和胡績偉的意見，即新聞自由可以有效地緩衝並轉移人們的不滿，同時也可以減少政府的失誤。³⁶次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一篇關於5月4日學生遊行的長篇客觀報道，還附了一張遊行隊伍的照片，隊伍的前面飄揚着北京高自聯的大旗。

記者們於是再接再厲。這一時期最重大的事件要數來自三十多家新聞媒體和報紙的1,013名記者舉行的一場簽名請願，要求與中共中央領導人進行對話。5月9日，大約200名記者到中國記者協會遞交了請願書。政府對此迅速做出了反應。5月11日至13日，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和王忍之依次前往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中國青年報》與編輯和記者座談。在胡啟立會見《中國青年報》記者時，記者部主任郭家寬對胡啟立說：「不公正的媒體報道是導致運動升級的主

³³ 武仁 (1990b, 47)。

³⁴ 吳牟人等 (1989, 138)。

³⁵ Faison (1990, 156)。

³⁶ 胡績偉在1983年以前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既是全國人大常委、中國記者協會主席。他是中國新聞自由的一個主要呼籲者。八九學運之後被革職。

因素。」³⁷胡啟立回答說：「新聞改革勢在必行」。這句話成了5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的大標題。政府高層的反應鼓勵了記者的反抗。

如果說在運動的第一階段謠言對公眾輿論的形成和運動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那麼，第二階段就不是這樣了。儘管謠言依然存在，但不再有明顯效果，因為媒體已經逐步放開。

5月14-19日：絕食、對媒體的失控與 民眾的運動參與

在絕食期間，官方媒體一直以非常正面的方式報道整個運動。5月14-19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總共刊登了74篇有關學運的文章，無一不是對運動的正面描述（見表10.3）。這一趨勢在5月18日達到頂點。在那一天，《光明日報》發表了十篇與運動有關的報道，《人民日報》上則有九篇。它們幾乎佔據了兩份報紙的頭版和二版，甚至將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新聞擠到了一個小角落。下面這段文字摘自5月17日的《光明日報》，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當時中國媒體的口吻及其動員效果：³⁸

從上午開始，聲援學生的隊伍打着橫幅，喊着口號，陸續走進長安街……

與16日相比，遊行的隊伍中工人和中學生明顯增多。北京一些工廠的工人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幟，在這些旗幟中，有一面橫幅上寫着：「要民主要法治！」一些中學的學生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幟來到廣場。有的中學生舉着這樣的標牌：「哥哥姐姐，請喝一碗甜水！」、「爺爺們，請來看看我正在挨餓的姐姐哥哥！」

遊行隊伍打出的標語呼喊的口號多種多樣。主要口號有：「學生愛國，我愛學生」，「鏟除官倒，消除腐敗」，「教教學生，

³⁷ 吳牟人等（1989, 181）。

³⁸ 前揭書，235-37。

救救中國」，「民主潮流，勢不可擋」等。首都宗教界的標語是「慈悲為懷，愛人如己」。中國銀行的標語是「不做官倒的帳房！」。

今天，首都一些街道的交通已出現阻塞，但是廣大學生和各界群眾保持着高度的理智和良好的秩序。由清華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等院校的學生組成的糾察隊堅守在廣場東側和新華門前，一條條寬敞的通道保證了救護車的頻繁進出。各路遊行隊伍也自始至終保持着秩序，沒有意外情況發生。

今天，首都市民也紛紛湧上街頭，看望自己的親人，慰問絕食的學生。不少市民以居委會、居民大院、宿舍樓為單位，帶來了母親們的心，「我的孩子，你在哪裏？」找到了的，母子抱頭痛哭，觀者無不動容；找不到的，流着淚呼喊，呼喊親人，呼喚良知。

今天的北京街頭，救護車揪心的警笛聲已經響成一片。記者與遊行聲援者交談，很多人都是一個想法：學生生命，危在旦夕，事情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刻，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浩浩蕩蕩的聲援大軍喊出一個最強音：黨和政府應該拿出最大的真誠，拿出最切實的行動。

據瞭解，廣場絕食團提出的要求只有兩條，一條是明確肯定這次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一條是與中央最高領導同志迅速進行平等的公開的對話。有位機關幹部向記者表示：這兩條要求不算高，為甚麼就遲遲不見行動？有位工人說：「『主人』要和『公僕』對話，天經地義哪有領導怕見群眾的道理？」一位大學教授說：「一百個小時的絕食請願實際上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因為，人民已經站在了學生一邊，而人民的看法是永遠也不會錯的。」

官方媒體的口徑是一致的：這場運動是愛國的、民主的，學生是理性的、有秩序的，政府是頑固的、優柔寡斷的、不講情理的，而人民則都是支持和同情這場運動的。

當中國的新聞記者要求「新聞自由」時，他們的口號是「我們想說實話，請不要逼迫我們撒謊！」³⁹ 看上去他們似乎希望能夠寫出所謂西式的客觀報道。但是，一旦國家對媒體失控，記者們對整個學運的報道則變得百分之百地支持學生，其中一些人甚至以學生的意見作為評判他們的新聞質量的尺度。一位絕食者回憶道：

在這個階段，（官方）媒體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在那段時間，新聞是自由的。報紙一印出來，記者們就帶着報紙到天安門廣場。他們恨不得往每一位學生手裏塞上一摞報紙。因此，在絕食期間我們能讀到很多報紙，比如《經濟日報》、《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由於糾察隊的緣故，記者們很難進入絕食區。即便如此，東西寫出來後，他們常來徵詢我們的意見。文章發表了，他們也要來聽聽我們的看法。

如前所述，絕食開始以後，政府其實嘗試過與學生進行對話和談判。同時，政府也採取了種種救護措施以保護絕食者的生命安全（見第六章）。政府的這些行為如果加以包裝後得以報道，完全可以提升政府的公眾印象，但是，在此期間，沒有一家官方媒體涉及這些內容。與此同時，學生的表現卻並不像媒體描述的那麼好；記者如果不瞭解學生領袖之間的爾虞我詐，至少也應該看到每個人都不難發現的學生們在廣場上的種種浪費行為。⁴⁰ 他們很可能看到了，卻不願意報道。記者對5月14日學生與政府對話的態度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例子（見第六章）。我的一位受訪者（第58號）回憶說，雙方的對話在混亂中結束，與會記者對學生的表現十分失望。許多記者紛紛跑到學生面前，抱怨他們的表現太差，說他們因此不願意報道這次對話，最終沒有一家北京的大報紙加以詳細報道。這勢必加深公眾的這樣一種印象——政府根本就沒有與學生對話的誠意。我必須強調，這裏並不涉及記者對國家審查制度的顧慮，因為國家審查制度當時已經差不多癱瘓了，這

³⁹ 這是五四遊行時北京記者提出的一條口號，引自梁美芬等（1989, 331）。

⁴⁰ 劉曉波（1992, 142）。

完全是一種自我審查，全由記者與報社自己決定到底哪些該報道、哪些不該報道。⁴¹

5月13日絕食剛開始時，絕大多數北京學生和市民對此既不理解、也不支持。可是，到了5月17日和18日，成千上萬的支持者湧進廣場。公眾輿論發生迅速轉變的成因很多，但官方媒體報道運動的方式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下面是一位農民告訴《人民日報》記者他為什麼要參加示威的一段話：「前幾天我一直在看電視，看到學生在受罪。我非常同情他們，我一定要來。」在與不同職業的人所進行的廣泛的非正式訪談中，我試圖對絕食期間運動的參與情況有一個了解，我所得到的一个常見的回答是：「當時連《人民日報》都支持學生。我們又有甚麼好擔心的？」

5月20日-6月4日：政府的控制、媒體的 抵制與謠言的復蘇

5月19日，中國政府發布戒嚴令。從5月20日到6月4日，政府一直試圖重新控制媒體。雖然中國的官方媒體在軍事鎮壓之後都重新回到政府控制之下，但記者們仍然表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在這一部分，我將把討論集中在《人民日報》上，因為這家報紙的記者對政府的控制措施曾經進行頑強的抵制。⁴²

戒嚴令剛發布時，政府領導人關注的重點是如何使政府官員在對學運的認識上達成共識。政府要求一些大的報紙和電視台站在政府的立場上報道戒嚴令的發布，比如，發表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所作的講話。除此之外，媒體仍處於一種放任自流的狀態。這樣，就出現了同一報紙的同一版面上同時出現負面和正面報道的現象。如果

⁴¹ Berlin (1993, 264) 同樣注意到當5月中旬新聞享有高度自由時，官方媒體的報導常常會以有利於學生的方式歪曲運動，儘管「打倒鄧小平」、「打倒中國共產黨」之類的口號確實在運動的早期階段出現過，但很多文章都申明學生並沒有打出過打倒共產黨或是某個領導人的旗號。

⁴² 關於其他報紙的抵制，見吳牟人等 (1989, 381-82)。

負面報道主要是順應中央高層的要求，中性或正面報道則完全出於記者自己的選擇。

5月25日，當戒嚴部隊佔領北京各大媒體時，情形開始起變化。⁴³此後，各報對運動的負面報道猛增，而正面和中性報道的數量先是急劇下降，到6月4日以後就消失了(表10.3)，可是這並不意味記者開始與政府合作。早在5月21日，《人民日報》就開始使用暗示、隱喻和其他一些淵源於中國文學傳統的間接表達方式來反對戒嚴令；⁴⁴比方說，5月2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一條電訊——在意大利社會黨與基督教民主黨之間的衝突擴大後，意大利總理辭職——這則消息要傳達的意思是，中國總理李鵬也應當下台以平息當前的衝突。次日，《人民日報》頭版又報道了匈牙利潛在的政治不穩定。但是，標題卻用了匈牙利總理的一句話：「絕不允許動用軍隊來解決國內衝突」。

戒嚴期間，此類暗示在《人民日報》上不時出現。6月4日，也就是實施軍事鎮壓翌日，這一趨勢達到高峰。那一天，《人民日報》的國內新聞部分(第四版)，刊登了一條關於殘疾青年奪取運動會獎牌的新聞。然而，這條新聞卻被冠以一個與內容不甚相符的標題：〈人心是不會被征服的〉。同樣，在國際新聞一欄中(第三版)，編輯選取了一組新聞，共三條，其標題分別是〈漢城學生絕食抗議政府屠殺學生〉、〈以色列軍隊侵犯黎巴嫩南部：再次動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及〈波蘭領導人稱選舉是解決衝突的偉大嘗試：不許玩火〉。最後一則新聞的標題以小號字排印，但「不許玩火」卻是大字加黑，並且和新聞的內容本身沒甚麼特別關聯。中國有句老話叫做「玩火者必自焚」，這其實是暗指政府在玩火。⁴⁵

⁴³ 這不是說軍人發揮了甚麼作用，事實上，軍隊從未干涉過媒體的日常運作，但他們的出現表明政府已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從而迫使記者有所收斂。

⁴⁴ 有關這一主題的更多討論，可以參見Frank Tan (1993, 287)。

⁴⁵ 關於波蘭的這則新聞也出現在6月5日中央電視台的晚間新聞中。在報道過程中，中央電視台特意將「不許玩火」的字樣打在空白的屏幕上。

除了間接抗議之外，《人民日報》的編輯還在頭版開了一個花邊新聞專欄，以中性的、紀實性的筆法記錄運動和戒嚴的最新進展。⁴⁶ 5月21-30日期間，這些文章都被冠以「北京戒嚴令實施第X天」的標題。即使在政府對此做法進行干預之後，《人民日報》還堅持在5月31日、6月2日、6月4日的報紙上以幾乎相同的篇幅刊出類似的新聞。我在本章註26中曾經討論過6月2日的新聞。以下我會集中討論6月4日的頭版報道〈昨夜的北京〉。

正如一位前《人民日報》記者所回憶，在街頭目睹衝突和死亡的記者都感到十分憤慨，當他們回到報社向同行說起他們的所見所聞時，許多人都流下了眼淚。⁴⁷ 同時，北京各家醫院都打來電話報告他們收治的傷員人數，外地也不斷有人來電詢問美國之音所報道的大屠殺是否屬實。此外，北京市民也打電話來告知他們看到的景象，並問《人民日報》是否會報道這次事件。那天晚上在報社工作的人都情緒激動，很多人一邊做事一邊流淚。

有記者請求該報當晚值班的第一副主編陸超祺允許他們對當晚發生的情況做個報道；當時陸超祺也哭了，他同意了這個請求。最後，他們寫了一篇大約600字的稿子。陸超祺讓排版的編輯在頭版留出一個花邊加框的位置。恰在此時，某位代表中央的人士打電話給陸超祺，要求《人民日報》不要報道鎮壓事件。陸超祺回答說：「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我們如果完全不報道，是非常令人難堪的。」談話很不愉快地結束了。

陸超祺和同事們討論了電話談話的內容，他們決定對文章做一些修改，但堅持保留這則報道；陸超祺把文章刪減到大約200字。由於已經留出一塊600字的版面，這則小報道稀稀拉拉地充填着較大的一塊地方，並用了一個大字標題：〈昨夜的北京〉。文章是這樣的：

6月4日的《解放軍報》稱，「6月3日凌晨，首都爆發了一場嚴峻的反革命暴亂」。6月3日晚10:00，從軍事博物館附近傳來槍聲，戒嚴部隊進城了。

⁴⁶ 在中國的報紙上，一些短小的趣事新聞常常會用花邊框起來。

⁴⁷ 子夜 (1993)。

從午夜起，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廣安門醫院以及其他醫院正不斷向我們通告收治傷員的死亡人數。至截稿時，戒嚴部隊已經進入天安門。

就這樣，《人民日報》在軍事鎮壓仍在進行時就以第一時間報道了這一事件及其造成的平民傷亡。⁴⁸

戒嚴令發布後，中國媒體對運動的正面報道越來越少，人們再次轉向非正式途徑獲取信息。正如運動剛開始時那樣，謠言又恢復了對學運發展的導向性作用。以下選錄的是一些在戒嚴期間流傳甚廣的謠言：「聶榮臻元帥對鄧小平說，戒嚴令違背人民意志」、「徐向前元帥反對戒嚴，並說他將槍斃任何敢於向學生開火的人」、「萬里已經在加拿大建立了臨時政府」、「北京的所有監獄正在騰地方，以安置將要被捕的學生」、「外交部和其他七個部反對戒嚴令，並拒絕承認李鵬政府」、「全國工商聯將組織全國範圍內的罷工以反對戒嚴令」、「數百名離休將軍呼籲中共中央不要用軍事手段鎮壓運動」、「38軍副軍長自殺，團級以上幹部中有75%的人因為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或逮捕」。

以下則是一些在鎮壓前後廣為流傳的謠言：「一個戒嚴士兵開着一輛軍用吉普在大街上軋死了三個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成千上萬

⁴⁸ 與此同時，北京其他一些媒體機構也報道了鎮壓事件。值得注意的是，6月4日中午，北京電台英語頻道的播音員李丹，播送了一段情緒激昂的話：

請記住1989年6月3日。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一次慘絕人寰的事件。成千上萬的人遭到正在向城裏推進的全副武裝的部隊的屠殺，他們大多是無辜市民。死難者中有我們北京電台的同事。士兵開着裝甲坦克，用機關槍掃射試圖擋住道路的北京市民和學生。當軍隊在人群中打開缺口以後，他們仍然向着街上的人群肆意開槍。有目擊者說裝甲車甚至碾死了在市民面前猶豫不決的士兵。

北京電台英語部深切悼念在此次悲劇事件中的死難者，共呼籲所有聽眾加入我們的抗議行列。我們反對這種嚴重侵犯人權和慘無人道的鎮壓人民的行徑。由於北京目前所處的形勢，我們無法帶給您其他新聞。我們誠摯地懇請您的理解，並對在這一悲劇時刻您與我們同在表示感謝。

名學生被殺」、「超過兩萬平民被屠殺」、「戒嚴部隊讓一些軍隊囚犯充當前鋒屠殺平民」、「38軍、28軍正在和27軍作戰」、「戒嚴部隊開進北京大學，殺死二十多人，逮捕多人」、「李鵬被一個警察射傷」、「鄧小平流亡到外國」、「鄧小平死亡」。

中國政府試圖澄清這些謠言，例如，5月22日的《人民日報》報道了〈聶榮臻元帥和徐向前元帥勸告學生莫信謠言〉的新聞，顯然是要澄清關於他們反對戒嚴令的謠言。5月22、23及24日，《人民日報》和其他幾家主要官方報紙，發表了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政府和部分國家機關對戒嚴行動的效忠信來消除謠言；然而，所有這些努力都沒有取得顯著的作用。街上人頭攢動，三五成群，交換傳聞和意見。一條謠言剛遭否定，又有上百條新的謠言出現，在這方面，政府幾乎無能為力。

口耳相傳並不是謠言傳播的唯一渠道。大字報和學生控制的廣播站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名學生積極分子在其5月21日的日記中提到，絕食隊伍的一輛廣播車在天安門廣場上開來開去，車上的人用擴音器廣播說外交部和其他許多政府部門都宣布脫離政府了，上海市政府也宣布了獨立等等。⁴⁹正如劉曉波在北京各界聯席會議上所抱怨的：

現在，天安門廣場幾乎成了一個謠言中心。無論是甚麼來源，不管是誰，也不論真假，每個人都可以帶來一條消息，通過學生廣播站播出。消息越轟動，價值越高。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話，那麼我們的新聞和共產黨的宣傳又有甚麼區別？⁵⁰

⁴⁹ 《中國新聞摘要》(1994, 8)。

⁵⁰ 劉曉波(1992, 187)。這並不是說所有掌管廣播站的積極分子都在處心積慮地散佈謠言。實際上，他們中的一些人曾經努力阻止這種勢頭。一個曾經負責清華大學廣播站的學運參與者回憶親身經歷時說：「今天，有人說鄧小平死了。我不相信，就沒讓他們廣播……後來，一個40歲左右的中年人來到播音室。他告訴我們這個消息絕對可靠，甚至逼我們播。我還是堅持沒播。我請他坐下來，對他說如果鄧真的死了，形勢將會迅速變化。播出與否關係不大。」(《中國新聞摘要》1994, 12)

這一時期的謠言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政府內部分裂的，一類是關於軍事鎮壓野蠻行徑的。有關政府內部分裂的謠言帶給人們希望，鼓舞他們繼續鬥爭。⁵¹ 而有關鎮壓野蠻行徑的謠言則令人們氣憤，激發他們冒着生命危險去採取報復行動。倘若人們早就知道身邊環繞的絕大部分信息都是捕風捉影的謠言，而早在戒嚴令發布之前，上層國家精英集團內部就已經得到鞏固，他們就會明白，任何形式的抵抗都是冒險的和徒勞的。在這個意義上，謠言塑造了公眾對整個八九學運的理解，並成為導致運動以悲劇收場的一個重要因素。⁵²

國家·社會關係與媒體行為

在上一節我們看到，八九學運期間中國媒體為了正面報道這場運動一直堅持不懈地鬥爭，而公眾直到國內媒體正面描述運動後才接受了它們的報道。換句話說，在中國社會，新聞媒體和公眾輿論均有很強的反體制傾向。下面，我將用80年代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來解釋這種媒體與公眾輿論相互影響的特徵。學者們普遍認為西方的新聞和公眾輿論傾向於與主流文化保持一致。換言之，在西方，不管媒體還是公眾輿論都具有保守傾向。甚麼原因造成了東西方新聞和輿論性質的這種巨大差異呢？

市場控制與行政控制

西方媒體與中國媒體之間一個顯著的差異是，前者是市場化運

⁵¹ 其他謠言也加強了運動發展的不確定性，鼓勵人們加入鬥爭。比如，在運動中有謠言宣稱：根據國際法，一個政府若不能在七天內對絕食做出回應，就必須下台，而戒嚴令如果在兩天內無法實施就會失效。見Calhoun (1994, 77, 94) 對這些謠言的討論。

⁵² 國外和香港的媒體在傳播謠言方面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他們雖然本身沒有製造謠言，但在報道某些謠言方面往往操之過急（見Lee and Chan 1990）。幾位香港記者（盧永雄等1989, 336-44）回憶說，為了提高銷量，香港一些報業老闆甚至繞過他們駐北京的記者，報道一些未經證實的謠言。這些報紙再傳回北京，從而加深了謠言的可信度。

作，而後者直到80年代還基於上處於行政控制之下。這並不是說西方政府從不干涉媒體，事實上，19世紀的英國傳媒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關於國家如何干涉和反對激進的新聞出版物的歷史。⁵³美國在越南戰爭期間，約翰遜和尼克松都曾通過他們與那些富有的財團老闆的交情，去干涉媒體的日常工作，包括恐嚇記者。⁵⁴但是，西方國家通常不會直接介入和干涉媒體的日常運作。因此，在考察政治力量與媒體和輿論之間的關係之前，我將首先簡單地討論一下，西方市場經濟對媒體的影響是否是造成西方媒體與在行政控制下運作的中國媒體之間的差異的主要原因。

有人認為，在西方，所有新聞公司都囿於利潤的考慮，而面臨體制性人手不足的問題。記者不但要仰賴由政府提供、甚或部分經政府人員撰寫的日常新聞，⁵⁵還要依靠「專家意見」，使他們擺脫耗時的調查及免於誹謗訴訟。⁵⁶也有人說，市場運作中，媒體必須依循主流文化和大多數人的觀點，否則就會受到來自公眾的懲罰，導致閱讀率、訂購率以及廣告收入的損失。⁵⁷更為關鍵的是，廣告收入的數額不單取決於讀者或訂購的數量，而在更大程度上是由顧客的購買力所決定的。因為富人的購買力強，所以在以富人為對象的報紙上登廣告，費用也較為昂貴；這使賣給富人的報紙能獲取較大的利潤，從而能夠進一步擴大訂閱基礎。⁵⁸基於上述原因，主流媒體的編輯經常公開鼓勵

⁵³ Cranfield (1978) ; Curran and Seaton (1985) .

⁵⁴ Gitlin (1980) .

⁵⁵ Epstein (1973) ; Fishman (1980) ; Ryan (1991) .

⁵⁶ Soley (1992) ; Tuchman (1972) .

⁵⁷ Gans (1979, ch. 8) 認為在製作新聞的過程中，記者不會感到來自讀者和廣告商太大的壓力。這種說法也許是正確的。但也有可能在Gans開始他的研究之前，作為他的研究對象的新聞集團和記者已經表現得非常順從了，因此記者完全有可能在體制內工作而不會感到明顯的壓力。

⁵⁸ Herman and Chomsky (1988) 。比如Curran (1978) 就曾做過研究，發現由於中產階層報紙在廣告上的收入大規模上升，二戰之後英國面向底層階級的報紙逐漸減少，並最終被以中產階層為取向的報紙擠到了邊緣。

他們的記者去寫有利於擴大讀者面、尤其是那些而向具有巨大購買力的讀者的報道。⁵⁹

這些對媒體的市場控制機制與市場本身的主要特徵非常類似：分散性和非人格性。沒有人能夠創造市場，但每個人、每個機構都必須遵循市場的原則。因此，一些激進的媒體和激進的觀念雖然常因受排擠和壓制而處於邊緣，但這並不會激起專門針對國家的不滿。相比之下，在80年代的中國，一小撮人以政府的名義控制着媒體，控制的尺度隨着國家政策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所以，如果發生甚麼問題，人們就會立刻歸咎於國家。

市場調節理論對理解中國媒體的基本行為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說得通的，但市場力量並不是決定新聞特徵的唯一的關鍵因素。首先，雖然中國的官方媒體一直處於行政控制下，但它不是生而反體制的。在毛澤東時代，媒體是其中一股最忠誠於中共的力量。對絕大多數中國記者而言，毛澤東時代的主要問題不是如何擺脫政府的控制，而是如何最好地配合體制（見第二章）。其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媒體也不是從一開始就以順從機構的姿態出現的。例如，在英國，直到19世紀中葉娛樂新聞興起時，激進的新聞出版才開始走向衰落；衰落是兩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憲章運動的成功鎮壓，以及中產階級的興起。憲章運動遭受鎮壓，沉重地打擊了激進的媒體，而中產階級的興起（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數量上）使娛樂性出版物能夠把廣告費作為主要收入來源，並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出售，正是這種低成本的出版物才摧毀了激進的新聞出版物。⁶⁰最後，如果形勢確實非常糟糕的話，西方記者仍有可能變得激進。又如60年代的美國，當美國軍隊無法贏得越南戰爭的勝利時，媒體和輿論都逐漸站到了政府的對立面。⁶¹

所以，市場與媒體之間並沒有確定的關係。在西方，市場能夠促使媒體順從，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的運作在總體上尚處於良好狀態。新聞不能總是與事實完全相悖，公意可以製造，但這畢竟是有限度

⁵⁹ Ryan (1991, 121–22).

⁶⁰ Cranfield (1978) 指出早期娛樂報刊的讀者主要是中產階級。

⁶¹ Gitlin (1980).

的。否則，新聞記者就會產生很大的良心負擔，而讀者也會懷疑新聞的真偽，甚至會產生抗拒。這就涉及到民眾意識問題，或更準確地說，即民眾關於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基礎的認識問題。

國家·社會關係與媒體行為

本章的核心觀點是，80年代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從根本上塑造了八九學運期間媒體和輿論的激進的反體制性質。下面，我將闡述中國媒體和輿論的激進性質及其對學運發展的影響。前面幾章已經討論過的國家·社會關係的某些維度，構成下文闡述的基礎，這些維度包括國家對媒體的控制方式、國家合法性的來源、社會中層組織的力量，以及被以往的國家行為所塑造的大眾心理。我整個分析的核心是民眾的意識，即包括記者在內的廣大民眾對現實是否滿意、是否信任政府，以及是否認同國家權力在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⁶² 在闡述過程中，我將西方民主體制下的國家·社會關係作為比較的背景。

中國與西方的一個主要差異在於國家對媒體控制方式的不同。在西方，精英的多元化和悠久的法律傳統將媒體置於間接的、非人格化的控制之下。儘管這種限制是普遍存在的，但它主要是由政府、公司老闆、編輯和讀者各自通過市場機制或法律手段施加的影響迭加而成的，來自某一方的直接干預比較罕見。因此，即使記者對種種限制有所不滿，其情緒也缺乏單一的發泄目標。中國的情況就不同了。在這裏，國家直接對媒體施加控制。在毛澤東時代，新聞限制無所不在，

⁶² Gramsci一派的理論家們同樣強調大眾意識的重要性(Gitlin 1980; Gramsci 1971)。但我的觀點至少在三方面與Gramsci的思路有所不同。首先，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強調階級力量，而我則着眼於國家權力；其次，Gramsci一派的理論家認為階級統治是「製造公意」的過程，但他們很少明確指出這一過程所具有的限度。在我看來，公意固然是可以製造的，但只能是在有限度的範圍內。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進一步明確指出「文化霸權」的基礎，及其在不同國家中強度有所不同的原因。在我的論述中，一個國家解決衝突的能力(或保持文化霸權的能力)會因不同國家的國家·社會關係不同而有所不同。

但記者們都很配合；使政府可以在未遭遇任何大規模抵制的情況下，順利地實現了對媒體的箝制。到了80年代，中國的編輯擁有越來越多的自主權，媒體控制就不是那麼一貫有效了。在這種情況下，記者們卻越來越感到體制的限制，越來越把體制看成是新聞自由的唯一障礙。因此，像《導報》事件這樣一次客觀上說不算嚴厲的政府審查，都會引發廣泛的針對國家的不滿和反抗。

在80年代，共產主義中國下的知識分子(包括記者)都曾經受一場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危機。然而，在80年代初，儘管大部分記者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仍然希望改良體制內部，以達到這一目標。他們同時相信，容許媒體批評政府的失誤是防止政府犯錯誤的重要途徑(見第二章)。但是，這樣一種「忠誠的反對」為甚麼最終走向反叛？我們知道，法律、選舉合法性是西方民主的基礎。由於每位成人都有權利投票，政府由多數票選出，因此，選舉本身便成為國家合法性的基礎。這種政治體制是比較穩定的；政府的醜聞和失誤只會造成政府本身的更迭，而不會引發政體的合法性危機。在這種體制下，大多數民眾是非政治性的，激進人士則是孤立無援的。生存於這種政體之下的以利潤為導向的媒體只能報道一些醜聞，或對國家政策及其執行過程提出一些非根本性的批評，而很少把矛頭指向體制本身。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將其權力基礎置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之上，80年代的中國則置於經濟和道德表現之上。政府一旦將其合法性繫於一些具體承諾，那就得對這些承諾是否兌現承擔責任；因此，政府失誤和政治醜聞經常會導致合法性危機。面對媒體，這種政府往往進退兩難——如果嚴格控制信息並限制媒體，經濟和社會就會失去活力；如果政府給予媒體自由，那麼即便是很善意的批評有時也會危及國家的權力，這一威脅勢必促使國家對媒體進行約束，而這種約束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導致新聞界和民眾對國家的不滿，這正是80年代中國媒體與國家之間關係的現實寫照。為了改善績效，中國政府不得不支持改革並向世界敞開國門，但這些政策需要相對開放的媒體，而政府對此卻無法承受。所謂的1983年反精神污染運動和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都旨在約束信息流動；然而，這些運動與經濟改革和開放政

策是相抵觸的。為了保住經濟改革的成果，中國政府不得不唾面自乾地將這些運動草草收場。儘管如此，此類運動卻製造出一批批反體制英雄，把許多記者和知識分子推到了國家的對立面。因此，在80年代，雖然中國媒體事實上正在變得越來越自由，但媒體與政府之間的對立卻一直在加深。國家與媒體之間的關係在中國的發展道路完全不同於19世紀的英國：英國政府最終將媒體納入體制之內，而中國政府卻未能將原本的忠誠反對聲音予以制度化。儘管大部分記者起初只是希望幫助政府進行體制改革，但他們在與國家的實際互動中，卻經常有人轉變為異見分子並獲取廣泛同情。媒體就在這種情況下逐漸走向激進。

在西方，公眾輿論一般總是隨媒體報道而轉變的。在一些社會普遍關心的問題上，公眾輿論總是多元的、分化的，一個話題一旦媒體停止報道，公眾輿論也會逐漸淡忘。而在八九學運中，媒體與公眾輿論的關係正好相反。當官方媒體不再報道或負面報道運動時，中國的輿論跟着謠言走；只有當媒體正面報道運動時，它才開始跟從媒體。⁶³ 這種差異的成因很多，但我在這裏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與媒體和通訊有關的視角上。

八九學運期間，大部分中國人都對諸如官僚腐敗、通貨膨脹、知識分子地位每況愈下等社會問題感到不滿（見第三和第五章）。絕食和戒嚴開始後，公眾非常關心絕食者的健康，並對政府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舉動感到憤怒。一旦非常關注和同情運動，並對官方媒體的新聞感到不滿，公眾就會將注意力轉向其他通訊渠道，但來自這些渠道的種種新聞事後都證明不是捕風捉影就是有意捏造。可是，由於公眾既不滿形勢，又不信任政府，所以那些把政府描繪得顛預無理、從而大快人心的謠言，就被公眾不辨真偽地全盤接受下來並廣為傳播。同樣，由於公眾對學生普遍抱有同情，因此，那些關於政府內部權力鬥爭和政府領導人死亡，以及任何能使人感到政府風雨飄搖，從而激發

⁶³ 確切地說，運動開始之初，學生的意見構成公眾輿論的主流，但隨着運動的發展，公眾輿論逐漸納入了全體北京市民的民意。

人們對運動的信心和參與的謠言，都能得到廣泛傳播並大受歡迎。⁶⁴這就是八九期間一些重大謠言總能激化千千萬萬北京市民的情緒，從而推動運動的發展的原因。

人們為甚麼對這些叛逆性信息那麼感興趣呢？要回答這個托克維爾式的問題，我們必須求助於他的經典回答——社會中層組織薄弱。我們知道，在80年代的中國，獨立於國家之外的中層組織剛剛開始萌芽（見第一章）。大部分中國人仍以其工作單位為中心，從而被組織起來，他們的部門利益從來沒有進入過國家政治。然而，由於當時中國絕大部分人的生活或多或少地都曾遭受毛澤東時代種種國家政策的負面影響，因此，他們普遍對國家感到不滿和不信任，並相應地對國家政治表現出濃厚興趣。所以，在西方，人們的組織和利益一般是多元化的和局域性的，公眾輿論是順從性的，同時在大多數問題上是高度分化的；而在中國，在反政府傾向這一點上，輿論是一致的。

至此，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為甚麼會被謠言鼓動起來，已經得到解釋；但是，為甚麼在絕食期間，公眾又突然發生受到官方媒體的鼓動？這與80年代後期官方媒體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有關。中共執政以後，中國媒體就一直是政府的喉舌。到了80年代，媒體雖然獲得更大的自由，但並未擺脫政府的審查，尤其是在報道社會運動之類敏感的政治問題上；因此，在80年代後期，公眾仍然把一些主要官方媒體對敏感政治事件的報道看成是政府的聲音。由於公眾不相信政府，他們當然也會拒絕相信媒體對運動的負面報道。不過，媒體一旦正面報道運動，公眾輿論就會立刻追隨，這並不完全是因為新聞框架與公眾輿論之間形成了共鳴，更重要的是，由於過去媒體一直是政府的傳聲筒，因此，正面報道使很多人相信，政府，至少是政府主要領導人已經承認運動。對眾多同情運動的北京市民而言，媒體的正面報道完全打消了他們對參與運動可能會帶來的負面後果的擔心，而對運動的正面報道則從另一個角度推動了他們在運動中的參與。在80年代的中

⁶⁴ 根據Turner and Killian (1987, 54) 的研究，聽眾腦海中的知識和情感背景決定了他會吸收、拒絕並進而修正哪種類型的謠言。而且，謠言的傳播速度取決於人們對謠言所涉及的事件的關切程度（見Festinger, Schachter, and Back 1950）。

也會受到損害；而且，一旦謠言超出其控制範圍，導致真相敗露，他就會立刻受到公眾和學生的攻擊。所以，如果確實是政府在散布謠言，那也往往是某些低層官員或特定的政府機構在獨立地或半獨立地行事，而這種情況只有當低層官員與國家積極配合時才有可能。但在八九運動中，大部分低層官員都是同情學生的。

另一方面，對個人來說，製造謠言卻是一種很容易實施的個人抉擇；而且，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通常都相信他們的鬥爭是合乎道義的。因此，運動參與者只要相信謠言能夠促進集體利益，就不會把捏造謠言看成不道德行為。⁶⁵ 所以，在運動中只要消息受到控制，而國家在很大一部分群眾眼中喪失了意識形態合法性，謠言自然就會源源不斷地冒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謠言的製造也與國家、社會關係，尤其是與國家的合法性的來源密切相關。

結 論

我在本章描述了八九學運期間媒體與公眾輿論之間的以下關係。運動開始之初，由於處於國家控制之下，媒體對運動視而不見或是做負面報道。但公眾（在當時主要是將要參加運動的學生）並沒有追隨媒體的報道；相反，他們對運動的認識主要建立在通過非正式通訊渠道傳播的謠言上。從五月初到五月中旬，政府放鬆了對媒體的控制，對運動的正面報道隨之大量湧現。絕食期間，政府失去對媒體的控制，而媒體對運動也呈現出一邊倒的正面報道趨勢。在此期間，輿論追隨

⁶⁵ 從4月22日北京大學的一張題為〈這是一個陰謀〉的大字報來看，一些激進學生確實想故意刺激警察打人：「為了使其他學生不致成為陰謀的犧牲品，我想告訴你們一些事。4月19日，當我正和同學熱烈討論我們打算在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做甚麼的時候，一個並非我同學、但我想你們中的很多人都認識的一個學運積極分子插話說：『最好讓警察打我們；這樣，我們就能有個很好的藉口來動員學生。』我問：『你是不是要我們故意引誘警察來打我們學生？』他回答說：『話不能這麼說，但這對動員學生確實很有用。』（冷銓清、苗蘇菲1989, 37）。但在八九學運期間，學生往往認為這類大字報都是由政府密探寫的。

媒體，謠言在運動中所起的作用較小。戒嚴令發布之後，政府重新控制媒體，對運動的負面報道在媒體中又開始佔據主導，人們對運動的理解再次與官方媒體脫鉤，謠言重新開始塑造輿論。在某種意義上，八九學運期間的官方媒體和公眾輿論都是極為激進的。

本章還討論了80年代後期的國家·社會關係如何塑造了八九學運期間中國媒體和輿論的激進本質。在改革過程中，中國政府主要出於經濟考慮，對媒體有所開放，但是，由於中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與意識形態和績效是密切相關的，這樣，即便是善意的媒體批評有時也會動搖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但隨後政府對媒體的限制又不斷製造出政治異議分子。此外，80代後期大部分中國人都不滿自己的處境，他們不相信政府，而且認為媒體只為政府說話。因此，在八九運動中，中國記者努力擺脫國家的控制，並對運動進行正面報道，而當媒體對運動進行負面報道時，公眾轉而依賴謠言去獲取信息。但另一方面，當官方媒體擺脫國家控制並正面報道運動時，公眾還是把媒體當作中央政府的傳聲筒。因此，正面報道不僅使人們的注意力全部轉向了運動，消除了人們對鎮壓的恐懼，並且還困惑了單位一級政府官員。結果，數百萬人蜂擁上街，支持運動。

結 論

在結論部分我會着重探討三個問題。首先，90年代的中國表現出長期的政治穩定，與80年代動盪此伏彼起的政治局勢截然不同；因此，我們需要瞭解到底是甚麼原因促成了這種穩定的局面。其次，我想說明，儘管中國在90年代經歷了許多進步，但卻引發並塑造八九運動悲劇性進程的國家·社會關係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因此，中國在將來仍有發生另一場大規模社會運動的可能；而且，一旦發生，其態勢也許會與八九學運非常類似。為免重蹈覆轍，現任中國領導人須把政治改革提上日程。最後，我將重點闡述我在寫作中一直試圖努力達到的幾個主要理論目標，以及我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及其分析方法的一些基本特徵。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章大部分的分析不是基於正式訪談，而是我對二手材料的閱讀，以及我在中國進行田野調查時對城市居民的非正式訪談。為了節省篇幅，我將力求簡明扼要。

90年代的政治穩定

進入90年代，除最近因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而引發的一次學生遊行外，中國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經歷了較長時期的政治穩定，與80年代的政治動盪相反。這讓許多觀察家感到非常驚訝，尤其是那些在八九學運之後流亡海外的持不同政見者。在我看來，正是八九學運之後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一系列變化帶來了穩定。

國家領導性質的變化

軍事鎮壓之後，很多中國問題專家都相信，保守派將控制中國領導層，中國的改革將停止。事實上，正如我在第七章所在的分析，

80年代大部分高層領導都有兩個基本共識：一方面，毛澤東時代造成的巨大災難，以及社會中鬱積的嚴重不滿情緒，使當時的大多數高層精英都清楚地認識到改革才是保持政權的唯一出路；另一方面，當時大部分高層領導人都在共產黨執政前就參加了共產主義革命，他們因此對黨保持着高度忠誠。中共領導高層的這兩個特點在鄧小平的核心政治智慧——「兩手都要硬」，即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政治穩定——得到了體現。這兩個基本信念也體現在八九學運後中共高層對下一代領導人的挑選上。

80年代末遭取代的三名高層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和胡啟立，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在處理學生運動時都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似乎不諳處理危機的政治之道。1986-1987年的學生運動開始時，胡耀邦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八九學運期間，當中國媒體試圖擺脫國家控制並正面報道運動時，趙紫陽和胡啟立卻認為媒體開放有利於政治穩定，下令放鬆新聞審查。結果，官方媒體迅速擺脫國家的控制，並隨後在絕食期間對運動進行了極其正面的報道，從而大大促進了整個運動的發展（見第十章）。

這些領導人被撤換後，取而代之的是江澤民、李瑞環，以及後來的朱鎔基。新一代領導人有兩個特點：他們是80年代大城市改革的主要領導者，他們同時對如何處理危機政治也有更敏銳的直覺。讓我們看看來自上海的兩位新領導是如何處理80年代的學生運動的：¹ 1986年，當江澤民得知上海交通大學的學生準備發動遊行時，他迅速前往學校大禮堂會見學生。在會上，為了表明自己比學生對民主有更深的理解，他甚至用英文背誦了林肯（Abraham Lincoln）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的演講；儘管許多人會說這是一場膚淺的表演，但它確實給當時的學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並有效地制止了一場即將發生的遊行。² 如果說這個例子表明江澤民深諳危機處理的政治手腕，那麼他將欽本立解職一事（即由於欽本立拒絕修改將於4月24日在《世界經濟導

¹ 李瑞環當時是天津市市長。他處理當地學生運動的手法也很高明。

² 高阜（1994, 318-19）；何頻、高新（1993, 97）。

報》發表的一篇具有挑戰性的文章，江澤民將其解職（見第十章），則表明他同樣會以鐵腕手段來處理危機。

朱鎔基的情況也一樣。江澤民於1989年5月下旬赴京後，上海由朱鎔基主政。在那段時間裏，他既沒有像趙紫陽那樣顯出任何對運動的浪漫主義態度，也不像李鵬那樣害怕與民眾見面。朱鎔基走了很多地方，並與當地民眾交談，在5月22日和6月8日還分別做了兩次電視講話。³ 為了避免激怒民眾，他很少使用「反革命動亂」這樣的詞彙來指稱運動，他甚至在談話中避免談及運動的性質；相反，他強調運動的負面後果，如公共交通和警察系統的癱瘓、城市的食品供應問題以及日益上升的犯罪率等等；5月下旬，上述這些問題已經引起老百姓越來越多的關注。朱還強調政治穩定關係到每個人的利益，他懇求上海人民為了共同的利益目標而與政府合作。朱確實贏得了民眾的部分支持，當成千上萬名北京市民在街頭為保護學生而戰時，上海的許多工人卻被組織起來清理路障、維持秩序。

與80年代的高層領導人相比，現任領導人在管理國家事務方面更加老到。首先，現任領導人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來應對持不同政見者。80年代，政府經常發表文章、出版書籍來批判異見，並讓人民學習這些文章；這些舉措使本來鮮為人知的異見觀點，反而大白於天下。那時期很多公眾英雄，如魏京生、方勵之等人，實際上都是政府自己製造出來的。到了90年代，高層領導人幾乎不再這麼做了，相反，他們動用職業警察來控制異見分子，並定期與美國政府作為政治交易，將一些異見分子遣送出境；這樣不僅使國家擺脫了很多「麻煩製造者」，而且使異見分子成了國際政治談判中的籌碼，結果，到了90年代，中國一些異見分子的活動失去了其在80年代所具有的公眾影響力。

其次，雖然現任的高層領導人之間有許多權力之爭，但沒有迹象表明他們當中有人想利用八九學運來謀取個人的政治利益。政治本能告訴他們，這次事件是一個巨大的民族創傷，它所蘊涵的情感力量一

³ 朱鎔基（1989）。

且再被激發，將使他們通通遭受滅頂之災。因此，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採取「外鬆內緊」的策略，即嚴厲但又低調地處理與八九學運相關的各類事件，以求在不引起公眾注意的情況下把問題控制住；比如，他們肯定認識到很少人能夠接受把八九學運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於是他們逐漸不把運動稱之為「動亂」，而改變為中性的「事件」或「風波」。與此同時，他們強調運動的不合法律的一面，以及一旦學生得逞中國政局將會出現的「混亂」狀態（經歷過文革的中國人多少會接受這種說法）。每年6月4日，也就是當年執行軍事鎮壓的日子前後，政府就在天安門廣場和一些敏感地區部署大量便衣警察，任何抗議活動的跡象都將被迅速制止。1999年，政府甚至封鎖天安門廣場，進行整修、翻新工作，部分原因是為了防止八九運動十周年紀念活動的爆發。

這一代領導人較為高超的執政能力，在他們對經濟問題的處理上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現。80年代，絕大多數高層領導人缺乏關於市場經濟的經驗，未能充分認識到公眾對改革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究竟有多大的容忍度。在80年代後期，即使公眾對改革的信心已經跌至谷底，他們仍然試圖推行價格改革和其他的激進改革措施，從而加深了八九運動前夕的種種危機（見第二章和第三章）。與之相反，90年代的領導人更關注公眾對改革的容忍程度，最好的例子是1994–1996年間的經濟調整。1992年，中國經濟再度騰飛，但浪費、投資過熱和高通貨膨脹等現象也與之俱來；1993年底，政府決定進行經濟調整，不過，這次調整跟以往不同具有兩大特點：其一，以前的經濟調整往往在經濟狀況糟透時才開始，採取的措施也非常激烈，就像對高速行駛的汽車來個急剎車，整個社會都受到破壞性的影響，而這次經濟調整是在經濟狀況還不錯的時候就開始了，所以政府能夠更耐心地運作整個過程，並把目標僅僅鎖定在那些造成經濟過熱的問題上。其二，90年代初期，市場機制已經開始扎根於中國經濟，與前幾次經濟調整不同的是，這次政府在使用行政手段的同時，還使用了包括利率、貸款和稅收在內的市場機制。

政府的經濟調整使經濟增長率從1992年的14.2%降至1996年的9.7%，通貨膨脹率從1994年的21.7%降至1996年的6%。政府成功地使增長率在四年內緩慢地下降了4.5%。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抑制經

濟過熱卻不導致嚴重的經濟衰退，這還是第一次，⁴ 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將這個調整過程稱為「軟著陸」。⁵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中國經濟雖然依舊問題成堆，但始終保持着合理的增長速度和較低的通貨膨脹。到90年代末，中國經濟遠稱不上健全，但控制尚算良好，中國經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穩定因素；換句話說，經濟調整的成功更增進了政局的穩定。

總而言之，八九運動實際上起了過濾作用，理想主義的政治家被淘汰，一批新的領導人脫穎而出。這些新人已不能被簡單地劃分為改革派和保守派，相反，他們具有馬基雅維利式 (Machiavellian) 的政治觀，並對經濟問題有更好的理解。新一代國家領導人的舉措促進了政權的穩定。

社會的變化

90年代中國社會的變化也穩定了中國政治，其中變化大部分來源於國家政策的調整以及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另外一些變化則來自鎮壓八九學運本身所帶來的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例如，誰也不會料到在八九學運被擊潰以後，中國政府在總體上反而得到了人民的「信任」。這並不是說民眾贊成血腥的軍事鎮壓，而是說，在80年代，由於中國人非常擔心國家政策會倒退到毛澤東時代，所以自然而然地把當時許多國家政策的調整與左傾回潮聯繫起來，感到惶恐不安（見第二章和第五章）。然而，在90年代，改革的步伐並未停止。國家在軍事鎮壓後仍然堅持了改革，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改革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的唯一出路。我在回國期間發現，1993年是中國人仍然關心政府中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間鬥爭的謠言的最後一年，此後，有關派系鬥爭的說法僅見於香港媒體和西方觀察家的報道。因此，雖然說中國在90年代的社會變化絕不會比80年代來得要小。然而，這些

⁴ 劉國光、劉樹成 (1997)。

⁵ 高慶林、王曉光 (1997)；匡志宏 (1998)；劉國光、劉樹成 (1997) 及趙一寧 [音譯] (1995)。

變化已經不會像80年代的那些社會變化一樣，對大眾心理產生嚴重的影響。因為，現在已經很少有人會懷疑社會變革的方向。從這個意義上說，民眾心理狀態的變化促進了政權的穩定。

知識分子精英、普通知識分子和學生，以及市民在八九運動中起到了中堅作用。下面，我將分別討論這些群體的變化與90年代中國政治穩定之間的關係。

知識精英

前已述及，由於知識精英長期被壓制並與世界隔絕，他們在80年代對國家極不信任，對西方的瞭解也少得可憐。他們即使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但仍深受毛澤東式的激進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影響。結果，中國的知識界話語一直被理想主義、機會主義和激進主義所支配。這些都促進了八九運動的產生（見第二章）。

到了90年代，中國知識精英的心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第一，在軍事鎮壓之後，最暢言無忌、最激進的知識精英和學生都流亡到了海外，剩下的都被迫緘口。而且，在90年代，國家雖然與以前一樣嚴禁直接挑釁政權的舉措，但對一般的文化生產卻採取了更加寬鬆的態度。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和1986—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都旨在打擊被正統馬克思主義視為資本主義的那些文化產品，這些運動曾激起許多知識分子的反抗，並把這些知識分子推向了激進。在整個90年代，這樣的運動再也沒有出現。⁶ 同樣重要的是，1992年後，中國經濟再次繁榮起來，這使得中國知識分子的態度和注意力發生了急遽的轉變。80年代，知識精英普遍認為共產主義是中國的禍首，而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則是解決問題的法門。因此，他們不時挑戰中共政權的意識形態基礎，並通過對「球籍」和「黃色文明的死亡」等宏大而抽象的問題的關注而製造出種種危機話語（見第二章）。相形之

⁶ 事實上，正如王蒙和趙士林（1994, 15）所提到的那樣，90年代知識分子的活動「只要不是旨在推翻政府，很少會受到干預」。結果，利益和旨趣各異的知識分子開始組成不同的圈子。

下，90年代的知識分子更多地受經濟利益的驅動，他們一般都無意直接對政權提出挑戰，他們更關心的是那些能夠提高社會的多元化、同時也能給自己帶來直接經濟收益的活動。⁷

第二，在80年代，「新」觀念經常在社會上產生爆炸性影響，形成連續的社會熱潮，如薩特熱、尼采熱、《河殤》熱和報告文學熱等等（見第一章），上百甚至上千名學生會擁向大學禮堂去聽知識精英的報告（見第二章）。不過，經過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信息在中國已經變得極為豐富；比如，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報業，即使在全盛時期也只有兩百多家報紙，⁸ 而這個數字在1991年上升到1,534，在1995年上升到2,000，1995年底，每天總共要賣出720萬份報紙；⁹ 越來越多的報刊書籍將各種不同的觀念帶入社會，新觀念本身也就不再像80年代那樣具有爆炸性的效果。

第三，如果說80年代知識分子的心態普遍流露出親西方的特徵，那麼在90年代，在中國知識分子中興起的則是民族主義。¹⁰ 這股潮流突出地反映在幾部暢銷書上，其中包括《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等，北約轟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後學生的遊行示威也反映了這一點。¹¹ 令人吃驚的是，宣揚民族主義的許多知識精英都是受過西方教育的，並且在80年代都是西方觀念的倡導者。所以，民族主義的興起並不完全是政府宣傳的結果，儘管政府有時也會得益於它所

⁷ 1997年，我非正式地訪談了一名年輕記者。他每月掙5,000–7,000元，他的主要工作是為一家電視台翻譯外國電影。在訪談中，他對他的工作表示很滿意。他還提到他在為電視台工作時，會小心翼翼地避免觸及那些可能直接冒犯政府的題材。不過，他告訴我，除開那些他無意觸及的政治敏感話題之外，他可以自由選擇任何一部電影來翻譯；而對他來說，選擇電影的標準之一，就是能夠提高社會的多元性和寬容度。比如，他告訴我，他已經翻譯了一部有關同性戀題材的電影，希望觀眾能夠逐步接受同性戀是一種生活方式。

⁸ 在最不景氣的時候，也就是1967年，全中國只有43份正式報紙 (Zhao Yuezhi 1998, 17)。

⁹ Zhao Yuezhi (1998, 57)。

¹⁰ Zhao Suisheng (1998)。

¹¹ 李希光、劉康 (1996)；宋強、張藏藏、喬邊 (1996)。

帶來的穩定政權的效果。從表面上看，像幾年前的「銀河號」事件和最近的北約轟炸在激起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中發揮了重要作用。¹² 從更深的層次上看，至少在很多我訪談過的知識分子中，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主要受到兩項持續的事件的激發：在80年代，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曾經為前蘇聯的政治發展道路激動不已，而對鄧小平「摸着石頭過河」的改革方針嗤之以鼻；但是現在，他們對俄羅斯混亂的內政和落後的經濟狀況感到非常失望，也不屑西方國家表現得熱衷於削弱俄羅斯的國際地位，而不是幫助它渡過痛苦的政治轉型的態度。與我交談的這些知識分子雖然知道中國的問題很多，但對1992年以來的許多積極變化都感到欣慰，而對美國媒體關於中國的普遍的負面報道則感到非常失望。很多在80年代要求中國新聞自由的幹將們現在發現，由於文化霸權的存在，偏見在美國媒體中可能是更為頑固。¹³ 換句話說，支配着某些美國政治家和美國國際新聞報道的冷戰思維，反而對穩定中國的政權起了促進作用。

普通知識分子和學生

在90年代，知識分子和「未來的知識分子」（學生）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心態的轉變和社會結構的進一步變化是促進其經濟地位改善的二個重要原因。在80年代，大部分知識分子和學生都對市場經濟的本質缺乏瞭解，瞧不起商業活動，並且堅信改革會給他們同時帶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因此，一旦發現蓬勃發展的市場經濟反而降低了自己的社會聲望和經濟利益時，他們的不滿就宣泄出來了（見第二章）。

¹² 「銀河號」事件起因於美國軍艦在公海上攔截中國貨船，因為美國懷疑中國用這艘貨船向伊朗秘密運送化學武器。結果，根據中國方面的報道，美國海軍登上貨船檢查卻沒有發現任何東西。美國從未對該行動表示道歉。美國軍艦在公海上攔截中國貨船、並進行檢查的消息，在中國輿論中引起了軒然大波。至於轟炸大使館事件，由於有五顆導彈從不同方向同時擊中館舍，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相信那只是一次失誤。

¹³ 陳杰(1999)；李希光、劉康(1996)。

城市居民

在絕對水平上，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在90年代也有改善。不過，與受教育階層相比，該群體在1992年以後的經濟繁榮中的受惠要少得多。¹⁸更糟糕的是，中國開始改革大型國有企業。由於種種原因，越來越多國有企業報虧，不得不裁員甚至宣布破產；破產、解僱、被迫提前退休以及不充分就業，引起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如要分析90年代中國城市中存在的可能的反抗力量，必須提及城市工人。然而，由於某些原因，雖然小規模的罷工和騷動在很多城市頻繁發生，¹⁹但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運動。

我們注意到，中國工人在組織上（尤其在意識形態上）是極其貧困的。知識分子變成富裕階層之後，甚少對組織工人、或給他們提供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意識形態感興趣。沒有支撐造反的大道理，那些落魄者只能通過汲汲於經濟問題的小規模騷動和罷工來宣泄不滿。²⁰

除此之外，一些結構性變化也降低了大規模工人運動的可能性。首先，儘管國營企業存在的問題十分嚴重，但整個國民經濟卻在飛速發展。所以，除去一些老工業城市如鞍山和大同之外，很多地方的年輕人和有工作能力的人，一旦被國營企業解僱，還可以在私營企業中找到新的工作。解僱真正打擊的是那些已經處於社會邊緣、最無抗爭能力的工人，²¹不過，他們的處境有時也不像工資收入所顯示的那麼壞，因為在中國，贍養父母、為直系親屬安排工作，是基本的作人規矩而不是甚麼特殊情況，一個家庭往往只要有一個人做得好，其他成員就可能不會受苦；所以，很多社會問題在家庭層面上得到了解決。

市場逐漸成為支配社會生活的主導機制，也是導致大規模工人階級運動難以興起的原因之一。在80年代，中國社會相對整齊劃一，國

¹⁸ 李強 (1996)。

¹⁹ 李小林、傅興宇 (1998)；牟文進 (1996) 及《世界日報》(1999b)。

²⁰ 比如，幾乎所有在大型合資和外資企業中工作的白領都有較高的教育背景，這意味着他們可以被看成知識分子。在與其中一些人的談話中，我驚奇地發現，他們會經常把那些因失去工作而在大街上遊行的工人稱為「刁民」。

²¹ 在這一群體中，老年人與婦女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來推行政策。因此，國家政策的變化經常會影響許多人，一旦形勢惡化，千千萬萬人都會受到打擊。²² 到了90年代，社會變得更複雜，市場機制逐漸主導社會生活，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取決於特定公司，而不是整個國家的經濟表現。結果，市民的許多不滿都集中到特定的工廠或公司的老闆身上。這與80年代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時候，市民對經濟的嚴重不滿都是衝着國家的。所以，90年代的很多地區性的經濟衝突中，中國的中央政府更多地是承擔調停人的角色，而不是充當靶子；一旦國家能夠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地區性的罷工有時甚至會加強政權的合法性。²³

21世紀初葉中國政治的走向

上面討論了國家-社會關係的變化是如何促進90年代中國的政治穩定的。現在的問題是，這些發展帶來的政治穩定是不是長期的。對於這個問題，我的回答不是那麼樂觀。雖然中國經濟一直表現良好，但嚴峻的社會、經濟問題依然存在，而且在不久的將來還可能會惡化。中國的國有企業持續虧損，金融體制也非常混亂；這是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兩個最大的障礙。由於這些國有企業規模龐大，涉及的利益面廣，國有企業和金融體制的改革將面臨巨大的挑戰。一旦出現差錯，釋放出來的張力將很容易動搖國家政權。當農民大量湧入城市尋找機會，當不景氣的國企導致不充分就業進一步攀升，當新一輪人口增長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推向勞動力市場，中國城市在不久的將來也會面臨日益嚴重的勞動力過剩問題。²⁴ 由於大量新增的勞動力會進入蓬勃發展的私營企業、合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政府對城市居民的控制

²² Zhou Xueguang (1993).

²³ 比如，今年初長沙市政府動用警力鎮壓騷亂，造成一人死亡，上百人受傷。當地百姓非常憤怒。中央政府立即批評了這次鎮壓，並將該市市委書記撤職（《世界日報》1999a）。類似的國家行為通常能消除民眾的不滿。

²⁴ 15-24歲的青年人數將從2000年的960萬人增長到2010年的1,140萬人（Jack Goldstone，個人通信）。

將進一步削弱。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社會保障機制，在經濟滑坡時，對這部分人的管理將會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另外，在過去幾年內，中國政府大規模地擴大了大學招生。如果擴招使大量的學生在畢業時找不到工作，那麼就會出現和80年代類似的情形（見第四章），並有可能爆發另一場學生運動。

要列舉像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而且正處於變化之中的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並不難。我在這裏想強調的是，雖然在過去十年中國的國家、社會關係有很大的改善，但那些導致八九運動興起並影響運動進程的政治條件並沒有根本地消除。如果沒有政治改革，不單有可能出現另一場大規模社會運動或政治動亂，而且運動一旦發生，很可能會依循與八九學運相近的軌迹發展。

關於這一點，成因不一而足，這裏，我想把討論限制在政權的合法性基礎這個問題上。在上一節，我已經論證，八九學運之後中國國家、社會關係的發展，削減了改革初期所產生的一系列社會政治問題，還促進了政權的政治穩定。但問題在於，這諸多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統治方法」的改善，而不是政權性質的根本轉變。直到現在，中國仍然是一黨專政，其所堅持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越來越與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同無關，國家高層領導人，理所當然地全是中共黨員，仍然不是通過公認的程序自由選舉出來的。由於沒甚麼人真正信仰共產主義，國家的合法性實際上還是建立在它的道德表現和經濟績效上（偶爾也會是民族主義）。可是，一個完全將合法性置於道德表現和經濟績效之上的政權，根本是不穩定的，因為沒有任何一種經濟能夠一直保持高增長率，即使中國現在的經濟增長率還能保持數十年，政權的穩定性仍然是無法保證的。現在，中國政權還能夠擁有較高的績效合法性，部分原因是很多中國人對他們在毛澤東時代經歷的政治動亂和悲慘生活還記憶猶新，因此珍惜當前的政治秩序和大為改善的生活，所以，政府打着經濟發展的口號來維持政治穩定，在當前還可以引起許多中國人的共鳴。但再過個十多二十年，當那些直接經歷過文革的人都進入垂老之年，甚至告別人世的時候，情況又將怎樣？那時的中國人會把財富和穩定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國家就再也不能用穩定和發展把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了。總而言之，當一個政權

將其合法性置於績效之上時，它必須努力兌現一些現實的承諾，這是任何以績效為基礎的政權必然要背負的沉重負擔。

有人會說，當社會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時，任何國家的民眾都會譴責政府，但是，對一個擁有多元政治力量的政治體制(比如多元民主制)而言，²⁵ 民眾的不滿在相當程度上可以通過選舉或其他常規程序去選換政府內閣，從而緩解負面的情緒。由於體制本身能夠包容不同的選擇，所以民眾很難聯合起來共同推翻這個體制本身。但是，中國政府，至少就它當前的形式而言，還不能包容其他選擇。而且，由於國家是以績效為基礎的，對高層國家領導人的表現或特定國家政策的任何反抗，都構成對政權合法性的直接挑戰。正如我在討論八九運動中的國家與民眾之間的互動關係時所提到的那樣(見第七章)，這種對立為國家與民眾之間的妥協提供的機會是非常有限的。

無論一個國家的政治性質如何，鎮壓總是解決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手段。不過，當國家是建立在法律，選舉合法性之上時，鎮壓、甚至可能遭到鎮壓的威脅，通常都會向參與運動的人傳達一些必須認真對待的並且是慘烈的信息。此外，鎮壓行動只要是合乎法律的，即使非常嚴酷；在那些統治精英和運動的局外人看來，也具有合法性。²⁶ 然而，在一個以道德合法性為基礎的國家中，民眾經常基於道德去判斷政治問題(見第七章、第九章)；就像八九運動所展示的那樣，在一個以道德為基礎的政治體制中，法律規則對於處理危機政治來說意義不大。²⁷

²⁵ 這裏，我假定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接受同樣的遊戲規則，並且爭奪的只是職務而不是意識形態。

²⁶ 比如，在美國早期的勞工運動和民權運動中，精英和大多數民眾幾乎都不質疑政府鎮壓的合法性。

²⁷ 八九軍事鎮壓之後，我在渥太華(Ottawa)的中國使館前曾經目睹過一場有數千名中國留學生參加的大遊行。當時，一些學生想帶領其他人一起衝進大使館。使館前只有少量警察，他們來回走動，使示威者和使館保持一定距離。每當這些學生衝向使館，警察僅僅舉手示意，表示不行，就成功地阻止了他們的行為。這個手勢的效果讓我非常驚訝，因為在北京，鎮壓之前政府方面的許許多多的警告，都無法讓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認識到國家控制手段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民眾對獨立於政府的法律的尊重。

當一場社會運動從道德上挑戰一個以道德為基礎的政權時，情況就更加糟糕。這時，任何國家控制手段都將被認為是非道德的，自然而然地削弱了政權的合法性基礎。

90年代，我們目睹了民族主義在中國城市的興起。中國政府也發動了幾場愛國主義運動以提高其合法性。²⁸ 但如前所述，雖然中國政府在90年代基本上是受益於民族主義情緒所帶來的政治穩定效果，但民族主義本身並不是政權長期穩定的可靠基礎。民族主義過熱也會攪亂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極需的和平的國際環境。民族主義的目標一旦表達出來，就需要實現，被激發起來的民族主義情緒也就給政府帶來巨大的壓力。最關鍵的是，民族主義是伴隨民族國家而興起的。民族國家的政治基礎之一就是人民享有公民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²⁹，而這些都是當前中國政府還無法完全滿足的。在毛澤東時代，專制政權和民族主義之間並沒有甚麼矛盾，因為那時國家擁有高度的意識形態合法性，人民把共產黨看成是國家利益的保護者。但從80年代開始，認為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是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的中國人逐漸減少，民族主義的含義因而變得很有爭議。³⁰ 在這種背景下，在90年代，中國政府經常限制大眾自發的、民族主義的集群行動。比如在1998年，許多華裔婦女在印尼騷亂中被強姦的消息傳到北京之後，政府拒絕了學生舉行遊行的申請，這不僅導致了學生和政府之間的衝突，而且改變了一些學生對政府的看法。我認為，如果民族主義主導了當前中國的政治生活，那麼以大眾為基礎的民族主義(要求充分的公民權及在中國的國際事物中的發言權)與權威主義(否認公民權和追求國家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之間的衝突將對中國的政權提出極大的挑戰。

在上述分析中，我只使用了「國家合法性」這個概念。然而，我在本書中已經談到，當大規模社會運動發生於中國當前這種國家、社會關係之下，運動的動員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會依賴於人們居住和活動的生態環境而不是組織力量(見第八章)，運動還會受到情感、傳統和

²⁸ 關於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最新描述，見Zheng Yongnian (1999)。

²⁹ Barbalet (1988) ; Marshall (1950)。

³⁰ Guo (1998)。

謠言的支配(見第七、九、十章)，甚至可能受到具有反抗性的媒體和公眾的同情的激勵(見第十章)。所以，這樣一種大規模社會運動一旦爆發，像目前中國這樣的國家其對策實際上是十分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通常只有兩個選擇：放棄政權或實施鎮壓。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經驗表明：當面臨這種選擇時，沒有打過江山的一代領導人是不可能通過血腥的軍事鎮壓來捍衛政權的；即使某些領導人決定鎮壓，那些受過更多專業訓練的士兵也可能不服從命令。也正是這種對政權的突然放棄，而不是漸變，使前蘇聯向民主的轉型過程充滿磨難。

以績效為基礎的政權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而且它很難包容它可能面臨的各種政治挑戰；這對現任的中國領導人來說，的確是個壞消息，因此，現任中國領導人應當把政治改革提到首位。這並不是說中國應該照搬某種西方政治體制，而只是說，政治改革必須堅持這樣一個宗旨，即將國家權力的基礎從意識形態和績效合法性轉變為法律一選舉合法性，這一轉變至少包括從形式上摒棄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如將共產黨更名為社會民主黨)、建立獨立的法律體系，以及逐步建立僅僅是為職務、而不是為互不包容的意識形態而競爭的政治競選體制。

1997年9月，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有一部分是關於政治改革的。這部分內容雖然基本上局限於法律和行政改革(即對政府和公共機構的組織和功能進行改革)，但還是在中國引發了一輪民主熱潮。³¹ 在最近出版的一些著作中，中國學者已經開始研究中國的一系列問題，如呆帳壞帳、房地產投資過熱、資本外逃、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司法不公、踐踏基本人權等等。他們相信絕大多數問題都與官僚腐敗有關，也與缺乏制約政府權力的法制、輿論和選舉手段有關，還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發展到民主化勢在必行的階段。目前大部分著作都是善意地給政府出主意。然而，正如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不斷揭示的那樣，一旦這些知識精英遭政府的強硬

³¹ 董郁玉、施濱海(1998)；凌志軍、馬立誠(1999)；劉智鋒(1999)；劉作翔(1999)；吳大英、楊海蛟(1999)。Rong Jingben et al. (1998)。

反應或不斷湧現的社會問題所挫敗，這種體制內的活動是很容易走向激進的。

幸運的是，這些出版物還可以在中國公開發行。這表明政府至少容忍了這種討論。事實上，高層國家領導人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應該是心中有數的。只不過，八九學運的經驗告訴他們，政治改革是有很大風險的——面對如火如荼的不忠誠的反對力量時，政府會突然乃至全面崩潰。因此，中國政府一直非常倚重法律和行政改革，並將之作為解決當前種種社會問題的出路。法律和行政改革確實能夠解決一些社會問題，也有助於一些現代機構的建立，比如更健全的法律體系、職業化的官僚體制以及以利益為基礎的市民團體等——這些機制都關乎民主轉型的成敗。³²然而，我不知道法律和行政體制改革，如何能帶來作為國家合法性基礎的獨立的司法機關，以及經由選舉而產生的立法機關，並以此替代國家的意識形態和績效合法性。我認為，法律和行政改革的成功，只會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權威主義顯得更加與社會無關，而這從長期來說只會進一步削弱政權的合法性。所以，法律和行政改革雖然絕對必要，但並不能代替更為根本的政治改革。

沒有一個高層國家領導人願意發動一場首先針對他們自己的政治改革，所以，時機非常重要。南韓和臺灣的民主轉型都開始於80年代末：³³南韓的民主轉型發端於大規模學生遊行推翻了政權；而臺灣在開始轉型時，經濟狀況良好，而且反對力量弱小。結果，臺灣的國民黨不僅能控制住最初的民主轉型，而且從中受益。³⁴對於一個像中國這樣幅員遼闊、問題叢生的國家來說，如果政治改革被迫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中倉惶啟動，那麼，社會衝突不僅會衝垮現有的政治力

³² Linz and Stepan (1978; 1996); Przeworski (1991).

³³ Friedman (1994); Wachman (1994).

³⁴ 台灣目前民主危機的來源是社會認同，當一個政黨堅持台獨並在選舉時大舉炒作獨立議題，而另一政黨則傾向於大中國情懷時，這就成了政治當中典型的非忠誠反對，台灣民主因此走向危機。

量，還會釋放出具有分裂傾向的民族主義和其他種種傳統勢力，這不僅會給中國、甚至整個世界帶來災難。政治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須注意把握時機和分寸。世界上許多改革都引發了革命或其他動亂，原因就在於那些改革來得「太少，太晚」。

理論總結

作為社會學家，我們首先應知道甚麼是歷史。用一句話概括，我認為，從縱向上看，歷史是一團有規律的亂麻 (a patterned mess)；³⁵ 但從橫向上看，歷史則是一個由許多關係鬆散，從而能形成多種組合的拼板組成的高度複雜的玩具拼圖 (a poorly interlocked puzzle)——這個想法是在我當時給三歲的女兒拼一幅由200塊拼板組成的劣質拼圖玩具時產生的。關聯充分的玩具拼圖 (a fully interlocked puzzle) 只有一種拼法，但缺乏充分關聯的劣質玩具拼圖則可以有不止一種拼法，雖然只有一種拼法能夠拼出盒子上的圖案。我很驚奇地發現，我的女兒成功地把那200塊拼板拼了起來，而且拼出了一個與印在盒子上的圖案不同的新圖案。我這個比方是想說明，歷史學家手邊並沒有一個現成的印在盒子上的圖案作為重構歷史的準則，因而他們也是在拼一個有各種可能組合的玩具。值得指出的是，我女兒在四歲前玩拼圖玩具時，根本就不看盒子上的圖案；顯然，在這方面，三歲孩子的認知過程與更大一些的孩子和成年人都不一樣，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和那些殫精竭慮要將聯繫疏弱的歷史拼圖拼接起來的歷史學家們很接近。

這也告訴我，為甚麼在理解和分析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時，人們能提出許多不同的、甚至近乎荒唐的描述和解釋；可是，我們並不能因此而打退堂鼓，退回到對歷史的完全主觀主義的理解上去。雖然完全重構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但有些建構的確比另外一些能夠更好地抓住歷史的邏輯。在本書中，在描述一些有待解釋的歷史事件時，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在許多微觀的

³⁵ 歷史是一團有規律的亂麻這個觀念來自於Mann (1993)。

歷史事實上狠下功夫；我還像人文學者那樣，對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和學運參與者的複雜體驗進行濃墨重彩的描述，但是，當要解釋所描述的事件和進程時，我則追求嚴謹而有深度的理論分析。

由於本書的目的是解釋八九北京學生運動的起因和發展，我的任務就是要找出一個能夠對運動的起因和進程做出解釋的模型（包括一整套解釋因素和相關機制）。我認為，這個模型應該包括科學解釋的三大特徵：

第一，它應該是簡約的。這個模型包括的解釋要素不能太多，但必須能夠解釋八九運動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所有重要方面。比如，在關於八九運動的發展模式的研究中，我希望能同時對運動發展的一些重要方面作出解釋，包括國家在八九運動中的作用、運動的動員結構、運動的話語特徵，以及媒體和輿論對八九學運發展的影響等等。社會運動和革命是一個理論高度發達的研究領域，因此我對自己的要求也許並不過分。比方說，政治過程模型和國家中心理論都集中關注國家結構和行為對社會運動和革命之產生和發展的影響；資源動員模型從社會運動發起者所擁有的資源的角度去解釋社會運動的發展；對堅持文化中心論的學者來說，社會運動的發展則是由文化「文本」的內在邏輯決定的。但是這些理論都未能同時解釋我在上面臚列的八九運動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各個重要方面。

在本書中，實證研究部分的各個章節分別分析了與八九運動的產生和發展相關的各個重要方面。雖然大部分有關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理論都無法涵括本書所涉及的所有主題，但就我在每個具體章節中所做的分析而言，從這些理論出發，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至少在邏輯上合理的解釋。我把這種解釋稱為「競爭性解釋」。在面臨這種情況時，我在那一章對有關的競爭性解釋有關的理論還作了簡單介紹，這種寫作手法使本書不像是一個典型的個案研究。因為本書不僅在導論部分有理論討論，而且在很多實證研究章節中也引入了新的文獻。我沒有在導論中集中討論這些理論問題，是因為這些理論所蘊含的分析視角不能統攝全書，將其納入導論會偏離本書的主題。

第二，這個模型必須是可證偽的（falsifiable），即針對同一個現象其他人必須能夠提出不同的理論解釋。在社會學中，不可證偽的模

隨處可見。社會運動研究中的政治機會結構模型就是一個例子。³⁶我在這裏並不想否認機會對社會運動的重要性，而只是想指出，一旦徹底把社會結構理解為主觀性的機會的話，人們就無法提出檢驗這一理論的有效性的替代性假設。一些結構性概念，如意識形態、國家、等級、階級、人口、社區、家庭、性別、種族等等，不僅聯繫着與這些概念有關的某些特定機制，而且其內涵和外延是多多少少可以確定的，即可以把其中某些因素確定為某一事物發展的關鍵，而把其他結構性因素或與其相對的機制排斥在解釋之外。所以，運用這些概念而獲得的理論解釋是可以證偽的。而「政治機會」這個範疇，不是指向某種特定的宏觀結構機制，而是指向關於社會行動者的理性選擇假設。這個概念的主觀性使所有引發運動的因素都可以被界定為這種或那種政治機會。既然所有有利於社會運動的因素都可以被定義為「機會」，我們能爭論的也就是政治機會的某些特定維度對某些社會運動的相對重要性，而不是理論本身；³⁷換句話說，這一理論本身是不能證偽的，因此，我沒有採用這種理論分析方法。³⁸

第三，分析模型必須是以高質量的實證材料為基礎的。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可以採用多種方式從多個層面進行分析和描述；因此，學

³⁶ Costain and McFarland (1998); Eisinger (1973); Gamson and Meyer (1996); Jenkins and Klendermans (1995); Kitschelt (1986); Kriesi (1996); Kriesi et al. (1995); McAdam (1996); Meyer and Staggenborg (1996); Meyer and Tarrow (1998); Rucht (1990; 1996); Tarrow (1992; 1994; 1996)。

³⁷ 人們也許會說，強調政治機會結構的理論家也分析了客觀社會結構在社會運動發展中的作用。然而，一旦我們將客觀的社會結構定義為「機會」，我們就立即對其賦予了主觀品質。這就是為甚麼Tarrow (1994, 85) 不得不在下述意義上定義「政治機會結構」，即它是能「通過影響人們對成敗的期待，從而決定是否採取集體行動的動機」。

³⁸ 現在有些學者試圖通過對各種政治機會結構進行分類來解決這一問題 (Gamson and Meyer 1996; McAdam 1996; Tarrow 1992; 1994; 1996)。比如，Gamson and Meyer將各種類型的政治機會放入一個2×2的框架中，橫軸對應的是穩定和變動、縱軸對應的是文化和制度。但是，這種努力只不過是將大概念割小、並沒有改變這一理論所具有的包羅萬象的特徵。

者們常常對定性分析的有效性的標準有不同看法。不過，在本書中我一直盡可能翔實地重建微觀事實及其背景，以此提高定性分析和理論解釋的有效性。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重構八九學運進程中的一些關鍵事件時，我採取了中國歷史學家的一種「考證式」的研究風格。由於在導論中我已經舉例說明本書是如何重構關鍵事件的，這裏就不進一步析述了。

本書的國家·社會關係模型正是在經驗發現與上述尺度之間的反復對話中建立起來的。雖然「國家·社會關係」這一概念在政治學和社會學中經常用到，但本書試圖將這一理解性概念轉變為一種具有可測量維度和機制的分析工具。此外，很少有個案研究能像本書這樣，把一個如此宏大的社會運動的眾多特徵同時放在同一個框架下進行解釋。

早期的結構分析，試圖從某些結構因素在性質上的差異來推斷社會運動或革命的產生和後果，³⁹ 但是，結構的作用往往表現在社會行動者之間持續不斷的互動中。⁴⁰ 複雜的社會過程通常都具有路徑依賴性；先前的事件即便只是偶然事件，也會在時間和因果關係上限定後續的事件。⁴¹ 社會運動及革命的產生和發展很少是由範疇性的結構條件或個人的意圖預先注定了的。正是由於這一點，本書採取的是一種關係分析方法。我把八九運動的發展規律理解為一種「結構化的偶然」，⁴² 着重分析社會結構是怎樣塑造人們的行為模式，人們的活動又是怎樣把運動層層推進，把路越走越窄，最終使民眾與國家之間的直接衝突變得無可避免的。因此，八九學運剛開始時，甚至連其發動者都不清楚要達到甚麼目標。在其他類型的國家·社會關係中，類似的抗議活動更有可能引發的是社會改良，而不是革命式的流血衝突。因此，我在書中一方面分析了像柴玲、李錄和張伯笠這樣的學生的活

³⁹ Paige (1975); Skocpol (1979); Stinchcombe (1961); Moore (1966)。

⁴⁰ 關係社會學現在受到很多學者的關注，尤其是Tilly (1986); Alexander (1988); Emirbayer (1997)。但這方面的實證研究還很少。

⁴¹ Gocek (1990, 112)。

⁴² Kiser and Schmitter (1991)。

動是如何塑造八九學運的發展的(見第六章)，另一方面又討論了結構性力量是如何把某些具有特定特徵的學生推到運動前沿，讓他們的活動來主導和塑造運動的發展，並最終將血腥衝突以外的任何可能都變成了「不可能的可能」。⁴³

總之，我的研究表明，衝突性集群行動的內在動力如果是由國家·社會關係結構塑造的，那麼它的發展就取決於行動者的持續的互動，而最終結果只有在事物的發展進程中才逐漸確定下來。我也認為社會運動是一個政治過程。但國家·社會關係理論與其他政治過程模型有一個重要區別——前者是在包括國家在內的不同社會行動者之間持續發生的，在中級和微觀層面上互動的交叉點上，尋找社會運動的起因和發展的模式。國家·社會關係模型因此也可以說是一個節點模型(intersection model)。

節點模型意味着社會秩序和社會結果是個體的行動和互動的總和，⁴⁴但是，一旦決定在結構分析中「把人的因素引進來」，⁴⁵我們就面臨人是甚麼以及行動者主體是甚麼之類的本體論問題；比如，對人性的不同假設就會導致對如何實現一個正義的、和平的社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因襲霍布斯、洛克傳統的學者主張精英政治和程序民主，而繼承盧梭、馬克思傳統的學者則主張大眾政治和大眾民主。

在社會學中，關於微觀的個體行動與宏觀的社會結構之間是如何關聯起來，有三種不同的思想流派：⁴⁶第一種觀點認為，社會結構和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個標尺，人們據此進行理性選擇；由於組織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和社會運動研究中的政治機會模型的興起，情境性理性選擇(context-bound rationality)觀念目前在社會學界很流行。⁴⁷

⁴³ Tsou (1991, 295).

⁴⁴ 這個視角一般被稱為方法論個人主義。參見Boudon (1987); Brinton and Nee (1998); Oberschall (1993).

⁴⁵ Homans (1964).

⁴⁶ 這稱為「微觀—宏觀關聯問題」(Alexander, Giesen, Munch and Smelser 1987).

⁴⁷ 關於新制度主義，參見Adams (1996); Brinton and Nee (1998); Czada, Heritier and Keman (1996); DiMaggio (1988); Granovetter (1985).

第二種觀點認為，人類活動是一個由意義驅動的思辯過程，在這種理論下，社會結構就是一個意義體系，人們的行為則是「受文本驅動」的；⁴⁸ 很多研究，包括對法國大革命和最近對八九學運的一些研究，都沿襲了這個傳統。⁴⁹ 與話語分析相關的另一條研究路總是將社會互動看成是受規範驅動的情感過程。在這個傳統中，結構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可以是在潛意識層面上發揮作用，結構約束着人們的感覺，而不是理智。最近興起的關於情感在社會運動和革命中的作用的新一輪研究，說明這個擁有百年傳統的研究方法仍然具有很大的潛力。⁵⁰

在本書中，我不拘一格地援用了上述三種傳統。雖然歷史不只是一個文本，但人們還是經常被文化符號和觀念所打動，社會過程一般總有一個重要的語言維度。我把八九學運期間國家和民眾在意識形態和話語層面上的衝突及鬥爭，看作是一個受意義驅動的互動過程。我感興趣的並不是社會結構對行動者的確定的理性心智過程的影響，而是社會結構對人們的體驗以及由此而來的創造和生產意義的方式所產生的影響。我對80年代中國知識精英意識形態的分析(見第二章)，對國家合法性源泉和運動－國家互動模式的分析(見第七章)，對運動話語特徵的分析(見第八章)，以及對媒體話語與公眾輿論之間互動的分析(見第十章)，顯然都顯然受到了這個傳統的影響。

我還假設運動前和運動中的很多活動都是策略性的，或部分策略性的。全書的分析都深受博弈論的啟發，尤其是奧爾森(Mancur Olson)、阿克塞羅德(Robert Axelrod)和謝令(Thomas Schelling)的研究成果；⁵¹ 然而，在認識論層面上，我並不認為運動中的所有行動都是基於策略性的算計，至於那些想把博弈論推而廣之，以致應用於分析一切社會行動的作法，我更是不能苟同；我認為，我們不能把社會

⁴⁸ Geertz (1983); Jabri (1996); Steinberg (1994); Terdiman (1986).

⁴⁹ 參見Hunt (1984); Baker (1990); Furet (1981) 和Sewell (1985) 關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以及Wasserstrom (1991); 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1990) 以及Pye (1990) 關於八九運動的著作。

⁵⁰ Goodwin (1997); Jasper (1997, 1998); Lindholm (1990); Scheff (1994).

⁵¹ Olson (1965); Axelrod (1984); Schelling (1962).

結構和文化簡單地看成是幫助人們做出最佳選擇的「選擇性激勵」⁵²、「工具箱」⁵³或「機會結構」。理性選擇模型所受到的多種批評，不用我在這裏贅述。⁵⁴但我想補充兩點：第一，對研究文化的學者而言，文化力量作為習慣和本能會在潛意識層面上發揮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社會結構並不是機會，只有當行動者對它有清楚的認識時，它才有意義；但無論行動者是否意識到，社會結構總是會對他們產生著影響。所以，在本書中，社會結構同時具有客觀和主觀品質。

雖然我沒有把社會運動當成純粹的情感過程，但本書的敘述風格在微觀層面上，受到將社會過程看作是受規範或價值驅動的社會互動的微觀社會學傳統的廣泛影響。本書大部分章節的敘述都以時間為序，事件一般也被置於國家與民眾或民眾內部的互動場景中加以描述。例如，讀者會發現，我對學生與國家之間衝突層層升級的分析（見第七章）、對學生為甚麼更容易受到與中國傳統文化一致的語言和活動的影響的分析（見第八章），以及對為甚麼中國的新聞報道與輿論之間的互動會大大推動學運的發展的分析（見第十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費爾芬高（Simson Garfinkel）的民俗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互動儀式鏈（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和唐納（Ralph H. Turner）的一些研究方法的影響。⁵⁵比如，我在第七章中指出，人們的微觀行動和認知在很大程度上依循他們各自對國家合法性的不同理解。由於中國高層領導精英和民眾對國家合法性的理解不同，他們在運動中的行為和感受因此而受到不同認知模式的支配，所以，任何一方的活動都是在不斷地違犯另一方對整個「遊戲」規則的理解，從而激怒了對方。

⁵² 「選擇性激勵」的觀念見Fireman and Gamson (1979); Friedman and McAdam (1992); Gamson (1975); Wilson (1973)。

⁵³ Laitin (1988); Swidler (1986); Tarrow (1994, 122); Zald (1996)。

⁵⁴ Collins (1981); Turner and Killian (1987); Jasper (1997); Lindholm (1990)。

⁵⁵ Blumer (1969); Collins (1981; 1990); Garfinkel (1967); Turner and Killian (1987); Turner and Sarace (1956)。

以往對社會運動和革命的研究很少像本書這樣倚重「合法性」這個概念。本書界定了國家合法性的三個維度，並且根據這三個維度評估了不同社會群體對國家合法性的理解，接下來又指出了關於國家合法性的認識的宏觀結構是如何為社會行動提供基本規範的。可以說，正是這些規範規定了政府與民眾之間以及民眾內部、隨時開而展開的各種中觀和微觀層面的互動模式，而整個八九學運正是在這種互動模式下層層展開，並最終走向悲劇性收場的。

在本書中，在識別結構性力量，以及運動中的國家與民眾之間和民眾內部的互動模式時，我盡可能還原事實。為了確保忠於事實，我對人類行動的模式有意保持了審慎的模糊，並不拘一格地援用了上述三種研究思路；換言之，我同時採用了在他人看來可能是相互矛盾的社會學方法。在一項研究中將多種相互矛盾的社會學方法融於一爐是可能的嗎？這樣做有好處嗎？簡單地回答說，這是可能的，因為本書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是一個經驗模型 (empirical model)，而不是一個形式模型 (formal model)。有些讀者可能對這兩個概念不甚瞭解，所以我想在這裏澄清一下。

從一般的意義上講，構造形式模型或經驗模型是科學研究的兩種基本思路，每種都自有其價值。比如，在社會學中，如果我們在分析中嚴格遵循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 (mode-of-production Marxism) 的方法論，那麼，我們實際上關心的是，當我們把生產方式假設為決定人類行為的唯一的結構性變量時，我們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一個具體事物。如果我們遵循新制度主義，將宏觀結構與理性人模型聯繫起來，我們關心的就是，當我們假設「有限理性」是社會行動的基礎時，我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解釋某種社會現象。不過，我在這裏的研究目的並不是將社會學作為一個形式科學來推動之、發展之，而是希望盡可能如實地解釋八九運動的產生和發展，這就是我所說的經驗思路。在一個經驗研究中融入相互矛盾的理論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益的。因為絕大多數相互矛盾的社會學理論實際上只抓住了複雜的、相互矛盾的社會現實的不同方面，它們只不過是在形式意義上，而不是在經驗事實意義上相互矛盾。

物理學可以藉助理科的一些例子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物理學已

差不多完全為形式方法所支配。在物理學中，像牛頓定律 (Newton's Law) 和麥克韋爾方程 (Maxwell's Equations) 已經能夠完美地描述一些物理事實，因此其他方法就顯得根本沒有必要。但在種群生物學中，情況就要複雜一些。比如，馬爾薩斯 (Thomas R. Malthus) 方程抓住了種群增長的指數性質，但由於受到諸如食品、與種群密度相關的疾病、種間和種內競爭、肉食動物、氣候等條件的影響，很少有種群能夠依照指數法則增長。所以，種群生物學家發展了兩種建模策略。形式模型 (基本上是從馬爾薩斯模型出發) 旨在抓住種群動態的本質，經驗模型 (通常是生命表方法的延伸) 則盡可能地納入多種經驗事實上的複雜性，以最接近地反映種群的動態。與此相類似，我的目標也不是發展某種形式理論，而只是想獲得對八九學運的起因和發展過程的實證解釋。所以，我在實證研究中把社會結構與同時具有策略性和情感性的、現實的人聯繫了起來。儘管長期以來社會學家一直對這兩種方法的存在和性質之差別不甚了了，但經驗模型在社會學中是早已有之。正如史汀甘比 (Arthur L. Stinchcombe) 所說，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 和韋伯 (Max Weber) 成功的秘密在於：「他們都從現實的人和結構出發。」⁵⁶

我認為，關於社會運動的經驗分析不是把社會結構與特定的行為模式聯繫起來，而是把社會結構與現實的人相聯繫起來。這並不意味着結構分析方法不能處理社會運動中的理性和情感問題。對絕大多數人類行為來說，理性策略和情感並不是非此即彼的。既然不能分割一個特定的行為是純粹的情緒反應還是純粹的策略選擇，那麼，在微觀層面上討論它們的重要性就沒有太大意義。因此，我沒有把理性策略、文化或情感當作社會運動的「外生變量」，而是試圖理解理性行為或感情衝動行為分別在甚麼結構條件下佔據上風。八九學運之所以受到情感、謠言和傳統文化要素的牽引，正是因為它是在一個權威主義國家中發展起來的。這個國家具有高度的整體性和對社會的強大滲透力，它還擁有一個發展薄弱的社會中層組織和一個建立在道德和經濟

⁵⁶ Stinchcombe (1975, 27) .

表現之上的國家合法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很多西方學者熱衷於那些推崇理性選擇的社會學理論，這就反映了西方社會的一系列結構變化。即是，當經濟為市場所支配，國家政治以規範的選舉為中心，無所不在的法規條令滲入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時，人類行為最重要的方面好像突然變得能夠計算了。結果，理性主義支配了社會生活；相應地，西方社會學理論也日益從人的理性出發。然而，八九學運中傳統主義的復興告訴我們，至少在政治領域中，在某些特定的結構條件下，文化和情感對社會行動的作用決不容低估。